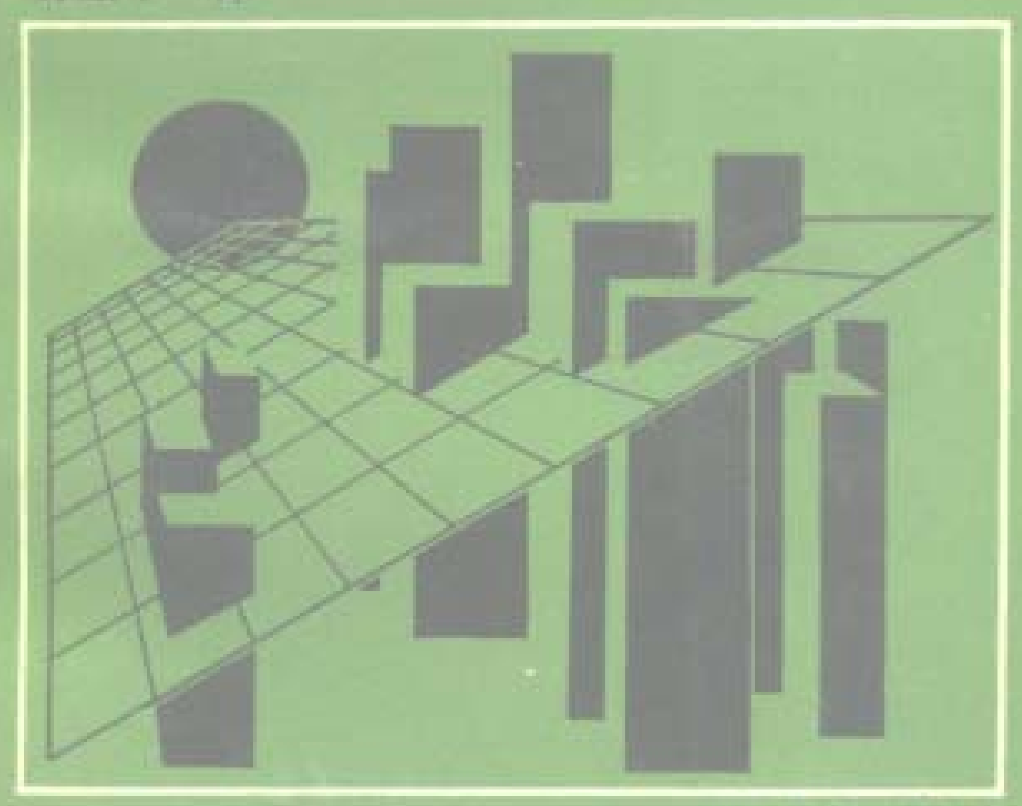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当代社会学理论

[美] 玛格丽特·波洛玛 著
孙立平 译



华夏出版社

当代社会学理论

IUJI WENKU ·

[美] 玛格丽特·波洛玛 著
孙立平 译

责 任 编 辑：沈志华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王洪流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by
Margaret M. Poloma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U. S. A., 1979.

当代社会学理论
〔美〕玛格丽特·波洛玛 著
孙立平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9 千字 插页 2
198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400 册
ISBN 7-80053-364-6/Z·040
定价：4.65 元

译者序言

60年代后期，结构功能主义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便进入了一个没有主流理论的群雄割据时期。其间除结构功能主义仍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流派存在下来之外，各种影响或大或小的理论流派以各种名目产生出来。波洛玛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便是对这些理论流派所作的一个概括而通俗的介绍。

然而虽然作者行文较为通俗，但要把握这些理论和流派，我觉得还有几句话要说。

初入社会学之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常使我感到奇怪，就是西方人在介绍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时候，往往不是将这些流派称之为Schools，而是称之为 Perspectives。如果直译的话，Perspective 是一种透视法。

久而久之，慢慢领悟到，原来是在这些理论家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即社会现象如同其他现象一样，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角度都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部分，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看到事物的所有方面的角度。这些不同的理论和流派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的结果。这也许会令那些想建立一种穷尽真理的理论体系的人感到失望和沮丧，但却更切近于科学精神。有了这种态度，对自己的理论会多一点自知之明，对他人的理论也会更加宽容。

这样，我们对待这些理论的时候，也就应该少作一点对与错的简单化的判断。不错，有的理论可能包含的真理更多一些，有的则

可能少一些；有的角度选得好一些，有的差一些。但可以说，每一种角度都会提供一些其他角度不能提供的东西。有时看起来尖锐对立的观点，其实并无分歧。记得初学社会学时曾读过一本入门的书，作者在说明不同的理论流派的关系时曾作过一个比喻：一个瓶子装着半瓶水，于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说“这瓶子有一半是满的”，一个悲观主义者则说“这瓶子有一半是空的”。在研究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的时候，记住这个比喻是有用的。

孙立平

1988年2月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序　　言

《当代社会学理论》是一部教科书，它旨在为学习社会学的本科生介绍一些在这个领域中值得注意的理论家。本书想在每一种理论观点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从而对最著名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个概括性的考察。虽然对每一种理论都会提出一些批评，但并不想使这本教科书成为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熟悉了每一个当代理论家著作的基本要点或特定的思想流派，对这些当代理论已经有一些书进行过详尽的批评。虽然参考古典理论是需要的，但这本教科书并不想成为一部思想史。当然，学生们了解杜尔克姆、韦伯、齐美尔、马克思和其他的古典理论家是有益处的，但这些知识并不构成理解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内容的先决条件。《当代社会学理论》是想提供有关当代理论的一种框架，一种基本的观点，以使学生能了解那些明天会成为古典理论家的人的著作。

这本教科书既可以和原著结合起来使用，也可以作为使学生自己能深入到当代理论家著作中去的一个基本框架。当然，象这本书中的第二手资料并不能代替直接阅读社会学理论家的著作。如果在当代理论的课程中就讲授了社会思想史，那么就应把《当代社会学理论》同其他的涉及古典理论的书结合起来使用，这样就能说明当代的学术思想是如何得益于过去的。

这本教科书分为三个部分：（1）对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纯理型理论的讨论；（2）对人道主义的或解释性理论的讨论；（3）

对评价性的或应用性的纯理型理论的讨论。这种大致的三分法的目的是能给人一点启发，实际上在每一种类型中都可以对不同的理论家进行比较和区分。学生们应不断地提醒自己，这种分类只是一种纯理型，所讨论的每一种理论都具有其他类型的特质。每一章所讨论的理论家的著作都按其关于人、社会和理论的假设而归之于一定的类型。将特定的理论分成“自然主义的”、“解释性的”、“评价性的”等类型的基础就是这些假设。

每一章(除导论性质的第一章外)都集中于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位代表一个学派的理论家。作者相信，初学者在研究理论时更容易采取“个人的方法”，而不是“概念方法”、“思想流派方法”，或最近才出现的“范式方法”。作者认为，虽然这些模型对于在将来将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连贯起来时是有用的，也可以成为学习中的补充性的方法，但个人的方法则是为学生打下关于理论的知识的基础的最好的方法。

本书的每一章都包括一个导论、理论家的主要著作的提要和对基本假设的讨论。导论将把这个理论家置于一种特定的理论流派之中，并将其与本书所包括的内容及社会思想史联系起来。每一章的主要部分是有关这个理论家的著作的摘要。其目的是提供一个有关这种理论的概括性的、不加批判的摘要，通常是集中在这个理论家的一种或两种最主要的贡献。每一章中的最后一部分都是用于讨论理论家的(1)人的形象，(2)与人的形象有关的社会的形象，(3)对社会学理论的看法。将理论家划分成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评价性的基础，是三种有关的假设。在每一章中都努力对概念加以界定，这些概念是建造理论的基石。书末的词汇表则为最主要的概念提供一个参考读物。

我衷心感谢倾听我的思想和阅读我的手稿的我的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他们以此给予我以鼓励。我要特别感谢I·多伊切

尔、B·加特兰、L·艾萨克、M·M·蒙尼汉和S·A·穆勒，以及由麦克米兰公司挑选的我不知其名的审阅本书初稿的评论家。我要特别感激我的丈夫和同事T·N·戈兰德，他与我一起分享了一个双职工家庭的苦乐辛酸。我还要感谢麦克米兰公司的这本书的编辑K·J·斯科特，没有他的耐心和对这本书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最后，我还要感谢S·格林堡和M·里切尔，他们为《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书的打字和修饰作了很好的工作，使这本书更具有可读性。

玛格丽特·M·波洛玛

目　　录

第一部分　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家

第二部分　解释性社会学理论家

第三部分　评价性社会学理论家

第一章　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探求

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了解还是不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要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正惟如此，我的方法不是如何理解社会学的特点，而是理解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而使用这种特定研究方法的本身就意味着关于人和社会的特定假设是存在着的。

引自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

虽然谁也没有正式地宣布过，但众所周知，任何社会学理论都依赖于一些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assumptions）。正是这些假设，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但是，正如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所指出的，社会学家自己对于包含在他的理论中的假设却往往是不甚了了的。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部分地是由于许多社会学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自己以及关于社会学的形象所造成的。

在建立社会学的学术可靠性的过程中，人们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将社会学理想化为一门必须以科学的中立性和超脱态度为目标的科学。这种把社会学做为一门科学的形象并不是很确切的。但是，尽管如此，直到目前为止，这个形象却一直充当了对许多美国

当代社会学进行检验的基础。古尔德纳已经指出，那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value-free sociology）的可行性一直为人们所怀疑。虽然有些社会学家没有看到或是拒不承认，但实际上，不同的理论观点都利用了一些不同的假设。由于被那种“价值无涉”的科学神话所迷惑，一些社会学家直到最近仍未对于那些包含于不同的理论观点之中的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给予应有的注意。而有的社会学研究人员现在却愈来愈感到要把关于社会的各种理论合并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并非是一件易事，因为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充满着彼此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关于人的形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关于社会的形象的”假设。

社会学中的那些主要的互相对立的派别，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划分。凯顿(William R. Catton)曾经对“泛神论的”社会学(animistic sociology)和“自然主义的”社会学（naturalisticsociology）进行过讨论。① 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提出了“实证主义的”（positivistic）社会学与“解释性”（interpretative）社会学的区别。② 马丁代尔（Don Martindale）也探讨了“人道主义”(humanistic) 和“科学的”（scientific）社会学在历史上的渊源。③ 所有这些术语都已经被使用并且有时是被滥用，而理论家们则并不愿意被加上这样一些标签。比如，D. 让(Dennis Wrong)就表示过，只有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意思才愿意被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由于在实际上往往并非如此，D. 让试图避免那种对人道主义社会学的误解，而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途径称之为“怀疑社会学”（skeptical sociology)。④ 但无论如何，在社会学理论中似

① 凯顿，《从泛神论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社会学》(1966)。

②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解释性社会学的建设性批评》(1976)。

③ 马丁代尔，《社会学理论与价值问题》(1974)。

④ 让，《怀疑社会学》(1976)。

乎仍然有一种单一的两分法，即泛灵论的、解释的、人道主义的和怀疑主义的社会学为一方，而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学为另一方。①

在这里，我们应该强调指出，要对社会学中互相对立的派别做这样的划分，就必须使用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韦伯（Max Weber）所称之为“纯理型”（ideal type）的方法。当我们按照一种极端的方法把某种理论类型描述为“自然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理论，而把另一种理论类型描述为“人道主义的”或“解释性”理论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现实中这种极端的类型是并不存在的。它们都是从现实中产生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社会现象进行探讨。当我们对这些理论逐一地进行探讨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每一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是“实证主义的”，也同时或多或少地是“人道主义的”。在我们对各种类型的代表性理论详加探讨的过程中，对各种类型的假设进行比较和对比的意义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自然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理论的性质

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致力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即社会学是一门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在自然主义社会学家中，有些人把物理学和生物学作为他们的理论模式，也有一些人则致力于把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一些学科还原到另一些学科的水平。凯顿承认，物理主义（把社会学

① 在这本书中，我们选择使用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两个可以互换的术语，而忽略对其进行定义和重新定义的努力，以及对这两个概念的误用和滥用所作的批评。对于人道主义和解释性的亦是如此。我们谨慎地避开“唯灵论”这个术语，因为这是一种贬义的用词。由于所有的社会学都或是按这种方式或是按那种方式努力成为“科学的”，因此，用这个术语去指任何一个类型都是没有意义的。

并人对物理化学的研究)和机械主义(用自然的机械原则解释社会现象)与自然主义社会学是相一致的。凯顿进一步观察了自然主义社会学坚持资料的可检验性的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也许就在于他们相信社会现象是模式化的,是从属于那些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决定性规律的。因此,社会学理论就成为对那些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和密度定律的规律的探求。①

这个理论研究途径,要求对社会学理论进行简明而严格的定义。科学哲学家罗德纳(Richard 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关于理论的这样一个定义,又要求对概念和变数进行精确的定义,反过来,这些概念和变数又产生出陈述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互相联结起来才形成科学的理论。然而,只有在对理论进行大量的经验检验,并得到经验的证实之后,理论才进入科学的定律的领域。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自然主义理论的性质,特别是关于概念的定义、命题的形成、以及如何把命题相互联结起来以形成理论,我们就要对罗德纳关于理论的定义进一步进行考查。

理论的基本单位就是那些为经验检验提供基础的社会学概念或变数。那位写出了为自然主义理论所依赖的著作的早期社会学理论家杜尔克姆把这样的“概念”叫做“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是一个具有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力之外的现实的概念。在杜尔克姆看来,这样的社会事实包括婚姻地位、年龄、宗教、经济状况、自杀率和犯罪率等。而当代的社会学家则把这样的“社会事实”称之为“变数”,或者叫做具有变数性质的概念。比如,自杀率可以增加或减少;一个人既可以是单身的,也可以是已婚或离婚或寡居的;宗

① 凯顿,《从泛神论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社会学》。

② 罗德纳,《社会科学的哲学》(1966)。

教认同包括着天主教、基督教或犹太教等不同的群体。这样的社会事实或变数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能够加以量度的。大部分科学哲学家认为，由于理论是依赖于这些概念和变数的，因此，理论必须是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

变数性的概念以及对于它们的精确定义，是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石。但是这些分散的基石必须通过构成命题而被联结在一起。简单地说，命题就是关于社会事实或变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性的陈述。比如，"不可知论者的自杀率要高于虔诚的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自杀率"这个陈述就是一个命题。因为这个陈述表明了宗教（是一个社会事实或变数）和自杀率（另一个社会事实或变数）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以杜尔克姆对于自杀的研究为基础的陈述就是：在急剧的经济变化期间，自杀率趋于上升。这样，社会学的概念就在命题中被联结在一起而成为罗德纳关于理论的定义所要求的那种陈述。

正如那些简单地被联结在一起的砖石并不是一幢建筑一样，命题本身也并不是理论。建筑材料必须按照方案加以安排才能成为建筑，而命题陈述也必须加以互相联结才能成为理论。现在，我们需要再回到罗德纳的定义，我们看到，理论是"一套系统地互相联系的陈述"。在杜尔克姆对于自杀所做的经典性研究中，他就是使用了我们在上面所引用过的以及没有引用过的那些命题陈述，从而得到了一个关于社会"联系"的理论。杜尔克姆论证了社会联系或群体的凝聚性（cohesiveness）是能够通过可以观察的社会事实在经验上加以度量的，这些事实包括宗教关系、婚姻地位等。比如，杜尔克姆在研究中发现，犹太教徒形成了一个比那些更加个人主义取向的基督教徒更为紧密的社区。那些有了孩子的夫妇与群体的关系要比那些单身汉更为紧密。因此，在杜尔克姆的时代，已婚夫妇和犹太教徒的自杀率要低于没有结婚的人或其他宗教群体

的自杀率。正是通过那些在经验上可以观察的陈述的相互关系，理论才得以形成。

虽然自然主义的理论都致力于理论构造的精密性，但是，公正地说，在自然主义理论中，对这种精密性承诺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在以下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有些自然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是那些处于范畴和类型中的概念的形成及定义，因为这些理论家致力于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不能很快地跳过理论构造的概念水平（参见第八章中讨论的帕森斯）；而另外一些自然主义理论家则很快地对概念进行定义，然后马上转入形成命题陈述（参见第五章所讨论的科塞）；由于理论被定义为一套互相联结的陈述，因此，也有一些理论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概念进行定义，而是要进一步去形成命题并试图把这些命题互相联结起来以形成一种理论（参见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霍曼斯）；此外，还有一些理论家则更关心依据自己对于自然主义模式的理解而对别人的理论进行批评，却不太关心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论（参见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默顿）。这四种强调——概念、命题、相互联系的命题、超验理论(metatheories)——的每一种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对形成自然主义理论的承诺。

自然主义理论还有另外一种研究途径。这种理论途径不仅把社会科学类比于自然科学，而且致力于所有科学的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统一的理论。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近这个统一的知识，但是，科学家在他们各自的学科中工作的时候，应该记着这个模式。一般的或现代系统理论（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进行讨论）就是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的例子。一般系统理论所强调的是，为了方便那些为形成统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工作的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模式。

简而言之，自然主义理论提倡按照自然科学的形象建立社会学。但是，在具体地应用这个自然主义模式的意义上，对于自然主义理论坚持的程度和类型却是不同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严格地用科学哲学家关于相互联系的命题和在经验上的可检验性的要求来衡量的话，那么，就很难在社会学中找到自然主义的理论。因此，社会学理论一直处于这个窘境之中，即理想的理论和现实的理论不相一致，而无论是在社会思想史中还是在当代理论家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同时，由于我们所面临的课题的复杂性，我们在社会学方面的成果还仍然没有达到我们的愿望。

自然主义社会学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

虽然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否认他们对于人的性质作出过某种价值假设，但是，只要仔细地读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事情恰好相反。在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里面，关于人的暗示性的假设表现于与此相关的关于社会性质的假设之中，即人是一种只有通过有秩序的社会才能赎回罪恶的堕落的生物。

其实，人的这种做为一种堕落的生物的形象，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人的这种形象既可以发现于《圣经》之中，也可以发现于有关的哲学著作中。19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就曾经提出一个关于人和社会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可以被看作是自然主义社会学那些并非明确表达的假设的基础。在霍布斯看来，人类的行动是由激情和贪欲决定的，这就使人类处于一种暴力冲突的状态中。但是，除了这种激情之外，人类还被赋予理智。这种理智使得人类得以克服那种自然的堕落状态，并使得暴力冲突转变为非暴力的合作。而这个伟大的功业，则是通过在政治上国家的建立得以实现的。国家为人民提供保护，以使他们免受他们自己的贪婪的、情绪

激动的性质的困扰。因此，在霍布斯看来，人是自私的、好战的，但同时也有安全的需要。为了对人的激情加以限制，为了使人们在社会化中变得顺从，社会便逐步发展起来。

在霍布斯的理论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假设：人们在自然上是自我主义的，是被决定的生物，但是，人类也有进行理性活动的能力。这个假设已经为许多自然主义理论所采纳。虽然大部分自然主义理论家只是含糊地表达了人们天生的自我主义的观点，但他们都暗示，社会对于个人的强迫是必需的。这样一来，人就基本上被看做是社会秩序的产物，而不是一种能够设计和创造他们自己的世界的生物。象霍布斯一样，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也观察到人类的那种使用必须的手段以获得他们所期望的目标的理性，但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目标还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都是社会秩序中所固有的。在以下各章中，当我们集中分析各个理论家的理论以及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的假设时，我们将不时地看到这种个人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形象。总而言之，在自然主义社会学家看来，正是有秩序的社会才能防止人们堕入霍布斯称之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灾难，因为在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是人们的激情占据了统治地位。

人道主义和解释性社会学的性质

人道主义的社会学（humanistic sociology）在三个重要的问题上与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社会学相成对照。首先，与自然主义社会学不同，人道主义社会学接受那种"关于人性实质的常识性观念"，并且试图论证和依赖它。① 比如，象自我这样的概念，对于语言和意义的强调以及人类的自由和决定论等问题，对于大部分自

① 凯顿，《从泛神论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社会学》，第57页。

然主义社会学家来说，都以为是不可捉摸的问题，但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学家来说，这却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第二，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确信："常识性的观念能够而且应当作为更详细的社会学理论由此派生的前提。"① 因此，社会学的理论构造应该从那些似乎是明显的、日常的和平凡的东西入手。第三，"人道主义的社会学产生于对于人性的关心，而不是产生于那种应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方法论规定来研究人类事物的努力"。② 换句话说，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当它脱离对于人性的关心而对科学发生兴趣的时候，它就犯了错误。

自然主义社会学与人道主义社会学之间最持久的争论，牵涉到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科学地进行社会研究的程序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自然主义社会学认为，社会学是从属于自然科学体系的一门科学，相反，人道主义社会学则对这种观点持批判态度。自然主义社会学对于"科学建筑"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学理论构造的模式以及社会学研究的精密性。由于对这种精密性的追求，许多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已经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取向。相反，人道主义社会学则强调人类行为中的那种使人类能唯一地进入创造性领域的性质。人道主义社会学与自然主义社会学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认为人们能够把意义附着于他们所相遇的事物之上。因此，解释性社会学家认为，必须根据人类自己的性质，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所做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能把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以及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还原到自然科学规律的水平）。人道主义社会学家指责说，决定论的或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已经导致了对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的忽视，而这件

---

① 凯顿，《从泛神论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社会学》，第 57 页。

② 让，《怀疑社会学》，第 1 页。

精美的艺术品就是人的解释性行动的产物。

人道主义社会学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

人道主义社会学依赖于对于人和社会的性质所作的与自然主义社会学完全不同的假设。在人道主义社会学内部，虽然各个理论家的假设都有其自己的独特之处，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既使人们不是自由地创造他们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的世界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也是部分自由地形成自己的个人世界。吉登斯把解释学派的其它一些附加性假设概括为：第一，"与自然界不同，社会必须被看作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类的产物"。第二，这个有意义的、可以解释的、容易了解的社会的构成依赖于语言。但这种语言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标志和符号系统，而且也是实际活动的媒介。①

因此，解释性社会学趋于更加强调那种远比自然主义社会学所承认的更富于创造性更加自由的人。虽然解释性社会学家也承认我们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潜在的强迫性力量，但是，他们所集中研究的则是人们形成社会制度的创造性能力。②在牵涉到"制度"或"社会结构"这一类问题的时候，解释性社会学家趋于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现实总是处于一种"被建造"的过程中，而不是一件

---

① 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解释性社会学的建设性批评》，第155页。

② 大部分解释性社会学都趋于以微观社会学为取向，而不是以宏观社会学为取向。瓦格纳就曾认为，这种对于互动过程的强调使得它除了分析小群体以外难于用于分析其他任何事情。他承认，"'解释性的'社会学家要有效地将他们的互动概念从微观社会学领域转向宏观社会学领域，是明显不可能的"。在以下各章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对微观社会学的强调，使得解释性的社会学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理论，而后者强调的是对大规模的组织和结构的研究。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自然主义社会学家集中研究个人（如霍曼斯所做的），以及解释性的社会学研究较大的结构（如伯格所做的），都是可能的。

已经完成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既是社会中的自由行动者，同时也是由已经存在着的社会所形成的。解释性或人道主义社会学所强调的，是世界中的互动以及对于世界的解释，而不是结构的性质。

评价性社会学理论的产生

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中，自然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模式，而解释性或人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则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途径。前者的声望可以通过它被称为"标准的美国社会学"来证明，而后者正在获得"忠实的反对派"的地位。① 虽然自然主义社会学和人道主义社会学都致力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它们对于人和社会所做的假设不同，因此，它们都形成了互不相同的理论。

但是，除此之外，仍有另外一套跨越于自然主义和解释性社会学的假设。这些假设的焦点是"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弗瑞德里希（Robert W. Friedrichs）使用了一个宗教的比喻来讨论或是作为"先知"或是作为牧师的这两种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② 宗教中的先知对他自己的社会进行批判，并号召要对这个社会进行某种改变以避免即将到来的灾祸。但是，正如圣经中的先知在号召进行宗教革新的时候往往与他自己的人民发生争论一样，社会学中的先知也往往与他们自己学科的实践发生矛盾。社会学产生于世俗的哲学（而不是宗教）预言之中。一般公认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就努力要把社会学建成一种关于人性的宗教，这种宗教将发现完美的社会和谐及人的完善性的秘

① 穆林斯，《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和理论群体》（1973）。

② 弗瑞德里希，《社会学的社会学》（1970）。

密。①但是，正如宗教中的先知不能给其他先知以生命一样，社会学不久也放弃了把社会学同已经存在的社会分离开来的信念，而这就意味着进行研究。于是，伴随着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独特的学术性学科的努力，社会学中的牧师制度出现了。这种类似于牧师的社会学家与宗教中的牧师一样，趋于接受那些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并且号召人们对这种社会秩序予以支持。先知派的社会学家所关心的是对社会的批评并提供赎罪的计划，相反，牧师式的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学职业的"慈善机关的性质"。换句话说，先知派的社会学家要求在社会中进行一些变革，而牧师式的社会学家则要求建立一门客观地研究社会现实的学科。

正如宗教中的牧师在数量上要多于先知一样，社会学的牧师也多于社会学的先知，这无论是在自然主义社会学中还是在人道主义社会学中，都是如此。因此，那种社会学必须是在价值上保持中立的警告便占据了支配地位。虽然关于社会学的中立性的意义还远远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它已经对于社会学中牧师地位的加强以及科学的独立性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社会学的先知仍然活跃于当代社会学理论之中，他们认为，社会学的工作不能是与世界上的事务毫无关系的。这些社会学中的先知对那种中立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的可能性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际上，在社会学牧师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并没有使他们由此失去判断力。

社会学中的先知们认为，在价值上的真正的中立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中立性也并非是为所有的人愿意接受的。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关于人、社会、社会学的假设是如何成为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固有的组成部分的。社会学中的先

① 弗瑞德里希，《社会学的社会学》。第69—70页。

知或者叫做评价性的社会学（evaluative sociology）家指出，不了解那些假设，特别是不了解关于他们的理论的意义的更重要的假设，并不能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不偏不倚的学科。评价性的社会学家是同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的这个观点相一致的："警惕科学与价值判断的过分分离，要比警惕这二者的结合更为重要。"①因此，社会学家有责任对他们学术活动的后果加以考察。

达伦道夫在对于凯姆劳特计划（Project Camelot）的讨论中论证了社会学家应该了解他们的工作的全部背景，并且事先估计到他们的研究和理论将要带来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后果。凯姆劳特计划是由美国陆军部特别行动研究机关所赞助的400万到600万美元的研究计划，其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和革命的原因。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笔钱是相当可观的，能够收买到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来进行这项研究。有些社会学家由于不能看到这个计划在隐蔽的价值的意义上的潜在的后果，也就没有认识到美国陆军部所需要的研究结果正是这个计划的要害之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军队对这个计划的赞助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这个计划被撤消。②达伦道夫等人已经对社会学家为美国军队去研究革命是否合适提出了疑问。虽然参加这项计划的社会学家可以用不偏不倚地"发展知识"的术语来表示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目的，但美国军队的目的却是镇压革命这个有着强烈的价值倾向的目的。由于认识到凯姆劳特计划的全部背景，因此，很明显的，价值正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善良的社会学家都不能忽视这个"价值"。

---

① 达伦道夫，«社会理论论文集»。第18页。

② 对凯姆劳特计划的更进一步的讨论见 I. L. 霍拉维茨的 «凯姆劳特计划的兴衰：对社会科学和实践政治学关系的研究»（1967年）。

认识到评价性理论既可以是自然主义的也可能是人道主义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①被弗瑞德里希做为社会学先知的孔德就提倡社会学要按照自然主义的路线发展，相反，孔德的同时代人——卡尔·马克思则可以被看做是人道主义流派中的先知。而在当代理论中，社会学的先知正在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流派中同时产生出来。

本书的结构

按照关于人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的基本假设，以及社会学家把自己看作牧师还是看作先知的自我形象，可以形成一种如图一所示的由四种类型构成的纯理型。

本书的第一部分涉及的是标准的美国社会学，它趋向于牧师型的自然主义模式。第二部分涉及到牧师型的人本主义者，它是对占据支配地位的学派的坚定的反对派。第三部分包括四个值得加以评论的社会学家，有的属于自然主义阵营，有的属于人本主义，但他们在处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时，都是先知型的。

正如我们在这个简短的序言中已经试图证明，并且在下面提到各种理论时还要继续加以证明的一样，对社会学理论的探求并不是一项统一的事业，其基本的东西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成的。

---

① 瓦格纳划分了三种类型的理论：实证的、解释性的、评价性的。我们所使用的"评价性的"这个术语与瓦格纳的用法多少有些不同，按他的用法，评价性的一定属于意识形态，并且有意地充满价值观念。我们认为，在实证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中都存在着价值，而评价性的社会学就是从这两个阵营中发展起来的。在全书中我们要证明的就是，没有任何理论是"价值无涉的"，因为所有的理论都包含着没有加以证明的假设，并要依赖于这些假设。那些认识到这一点并选择与课题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并不夸大对科学的轻视。对于那些或是以自然主义或是以人本主义的学术理论为基础而为社会提供指示的社会学来说，评价性理论家也分享了他们的想象力。

在每一种学派内部，其观点和构造理论的努力也是不同的。① 并不存在一种所有社会学家都对之感兴趣的理论模式，也不存在一种可以用于探讨社会学感兴趣的所有问题的理论模式。这种差别的基础就是对人的性质和对社会的性质的不同假设。这些假设的基本区别，对社会学家在社会中作用的观点的不同以及关于社会学理论的争辩，都将继续下去。不应把这些争论看作是问题，而应看作是有活力和进步的标志。对于更好地理解人以及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说，每一种理论都作出了贡献。

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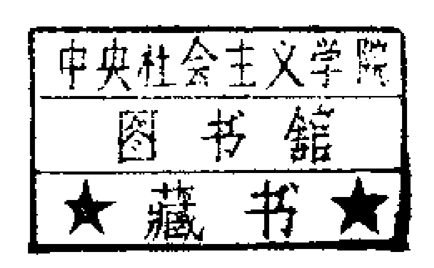
	牧师	先知
理论的自然主义性质	R.K.默顿 G.C.霍曼斯 P.M.布劳 L.科塞 R.达伦道夫 G.兰斯基 T.帕森斯	A.伊兹尼
人本主义	E.高夫曼 H.布鲁默 H.加芬克尔 P.伯格	C.M.米尔斯 D.贝尔 A.古尔德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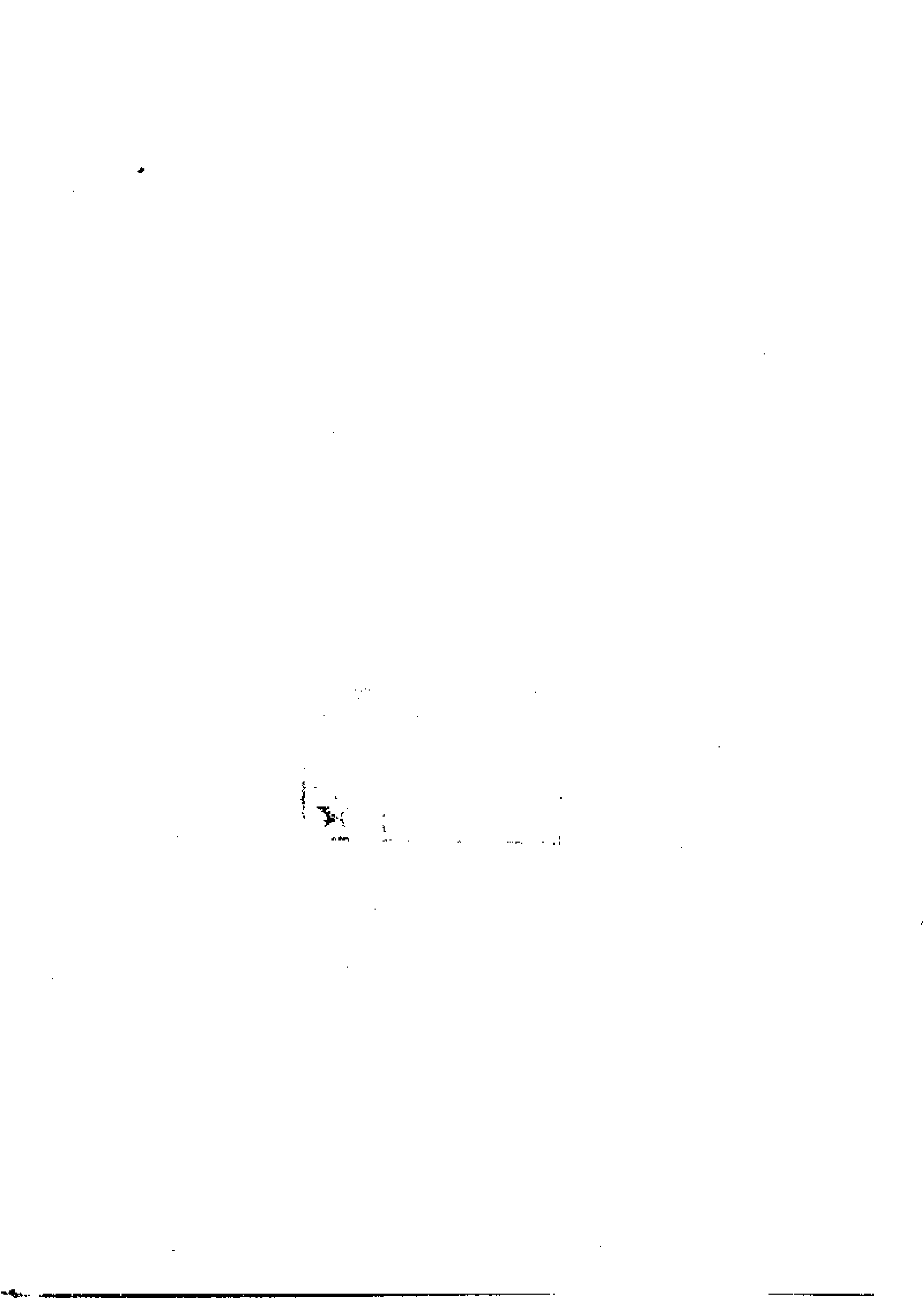
图一

① 我们的观点是，没有办法可以把当代不同的理论观点综合成单一的理论。在当代社会学中出现的把各种理论统一起来的努力都不可能对成为各自理论基础的互相抵触的假设给予公平的对待。关于社会学理论中互相冲突和抵触的认识的详细的讨论，见斯特拉斯的«社会学的规范结构»(1976 年)。

第一部分

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家





第二章 作为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社会学中，可为危机提供征兆和病症的都是一些熟悉的方面：在工作人员中与紧张状态的加深相伴随的信仰的变化和抵触，有时是有销蚀作用的冲突。这种抵触带来了一种强有力的责难，即，现存的模式不能解决它们应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原则上来说是能够解决的。

引自默顿《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

对于社会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是社会学所关心的课题之一，无论是在社会学的创立者还是在当代理论家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① 这种社会学探究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在孔德看来，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静力学（结构）和社会动力学（过程与功能）的。在研究社会结构的时候，孔德接受了“社会类似一个生命有机体”这样一个前提。但是，他没有作进一步的努力去发展这个论题。对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区别以及相似性进行研究的，是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把社会做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① 作为一种观点的功能主义确实并不是一种研究社会的新方法。“谁是第一个功能主义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W. 古德（Goode）说，这个人“就是第一个系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地思考人类社会的人”。见古德，《社会理论的探讨》(1973)。

1. 社会和生命有机体都有一个生长的过程。

2. “社会有机体”和“生命有机体”一样，当他们的规模扩大的时候，它们的结构也随之扩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越大，它们的组成部分也就越多，这正如生物系统愈大，它本身也就变得愈加复杂一样。一个低等动物，比如一条蚯蚓，它与一个高等动物比如人相比，它本身可以互相区别的组成部分就比较少。

3. 生命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个部分，都有一种功能或目的:“它们生长为有着不同的职责的不同器官”。在高等动物中肝脏同肺比较，有一种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同样，家庭是一个有着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不同的特殊目的的制度结构。

4. 在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并且最终会影响到整体。在政治系统中，如果一个民主政府转变为一个极权政府，这样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家庭、教育、宗教等等。可见，各个部分之间是互相依赖的。

5. 虽然各个部分都是互相依赖的，但是，它们都是可以分别加以研究的微观结构。正如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可以为生物学家和医学家所专门研究一样，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则成为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仔细考察的对象。①

斯宾塞慎重地指出，将社会做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仅仅是一个不能被具体化的模式或类比。社会并不是非常严格地类似一个生命有机体，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一个有机系统中，各个部分是以紧密的接触而联成一体的。而在社会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紧密接触并不是很明显的，而是相对分散的。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互相依赖的部分构成的系统，社会学中功能主义思想的这个基本假设开始于孔德而在斯宾塞的著作中得到

① 斯宾塞，《综合哲学》，第436—506页。

继续。

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经典性著作对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特别观点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产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杜尔克姆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有一些必须由它的各个部分来满足的需要或功能，以使它能按照"正常的"状态而存在。假如某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功能就是一种必须被满足的需要。假如在经济方面有严重的波动，就会影响到社会系统各个部分并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一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可以引起政治系统的崩溃，导致家庭系统的改变，并在宗教结构中引起变迁。系统中的这样一个震动，可以看做是一种病态，而这种病态最终将自行消除以便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当代的功能主义者给"正常状态"加上了"均衡"这个术语，或叫平衡系统，而用"病态"来表示不平衡或社会变迁。

杜尔克姆的功能主义为20世纪的两位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所继承并加以发展。马凌诺斯基和布朗都受到那些把社会做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社会学家的影响，并且，他们都对建立在有机模式基础之上的功能分析的性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为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定义的过程中，布朗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解对于当代的功能分析来说仍是基本的①。布朗说：

> 任何重复的活动的功能——比如对于犯罪的惩罚或者葬礼的仪式，就是它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这些活动所作出的贡献，即是维持结构的连

① 布朗，《社会科学中的功能概念》。见科塞和罗森伯格编《社会学理论：一个读本》(1976)，第503—511页。

续性。①

马凌诺夫斯基对于功能主义的贡献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布朗不同，② 但是，他支持功能主义这个基本的概念。马凌诺斯基认为，人类学家就是通过观察"人类学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在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来分析文化。③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虽然杜尔克姆在欧洲大陆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但在那时，他的著作对美国社会学却没有多少直接的影响。在杜尔克姆所活跃的时代，美国的社会学正处于改造和行动取向的时期，非常类似于牧师和社会工作。当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学却遵循着社会行为主义的途径，试图把对于客观现实的研究与对于主观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混合物并不符合杜尔克姆的传统。杜尔克姆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试图论证对于社会学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是不能用心理学来满足的。杜尔克姆对美国社会学的直接的影响，那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才开始的。杜尔克姆对美国社会学的直接的影响，基本上是由帕森斯(见第八章)的努力造成的。帕森斯深受他所研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影响。反过来，帕森斯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学生(包括罗伯特·默顿，在本章我们将用很长的篇幅来讨论他)，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美国的重要的社会学家。

在讨论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的时候，古尔德纳提醒人们注意帕森斯学派的功能主义由以发展起来的环境。④ 虽然当时正是美

---

① 布朗，《社会科学中的功能概念》。见科塞和罗森伯格编《社会学理论：一个读本》(1976)，第 505 页。

② 有关马凌诺斯基和布朗各自对功能分析的贡献的讨论，见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1974)，第 21—25 页。

③ 马凌诺夫斯基，《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见科塞和罗森伯格编《社会学理论：一个读本》。

国和整个世界都处于大萧条的经济动荡时期，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显示了一种对于社会系统重建和延续的信念。在这种经济上的大萧条中，帕森斯的理论是一种乐观的理论。而帕森斯的乐观主义似乎已经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以及在以后历次大萧条中所恢复起来的财富所证实。它们似乎只有通过系统中表面上的混乱才得以生存，这种混乱的后边，就紧接着一个补偿和进一步的发展。帕森斯的乐观主义理论听起来是符合实际的。这正如古尔德纳所说的："象帕森斯的新理论那样，在静态的意义上来观察社会，清楚地对结构下定义，与集体的经验并不相符合，而只是分享了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①

虽然结构功能主义有许多思想并非始终一致的代言人，但他们都认为，社会学是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而这种社会则是一种由各个互相依赖的部分构成的单位。科塞和罗森伯格已经注意到，结构功能主义者关于社会概念的定义并不是一致的。② 但是，无论如何，在标准的社会学用法的基础上对两个关键概念进行定义还是可能做到的。结构③ 就是指"一套相对稳定的和模式化的社会单位"，或者说，是一个"有着相对稳定模式的系统"。诸如家庭、宗教或政府等制度就是这种结构或社会系统的例子。每一种结构，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138—157页。

② 同上，第142页。

③ 结构功能主义在讨论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的时候经常使用"体系"这个概念。一个体系就是构成整体的互相依赖的组成部分所形成的组织。它可以是一种供电体系（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研究课题）、呼吸系统（生物学家所关心的），也可以是一种社会体系（社会学家的领域）。社会体系包括由交互性的角色期望结合在一起的互相联系的身份和地位所形成的结构。比如，丈夫、妻子和孩子的身份（由于每一种角色的期望和履行）就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家庭的制度。制度结构互相联系起来就形成一种更大的社会体系，或是一个城镇，或是一个城市。这些体系都会发生变化，但当体系趋向于均衡或平衡时，这种变化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过程。

都是由相互依赖的部分按照一定的模式构成的（规范支配着身分角色）。科塞和罗森伯格把功能定义为“社会活动中有助于适应和调节它的组成部分的特定结构的效果”。① 这样，功能就是指结构内部的动态过程。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控制着地位的社会规范如何使各种地位能够互相联结在一起并与更大的系统联结起来。

几十年来，在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主导的典范和理论模式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以至于 1959 年戴维斯在美国社会学联合会的就职演说中竟宣称，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是不可分的。但是，在过去的 10 年中，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迫使它的主要支持者对把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社会学中统一理论的主张加以限制。在这方面罗伯特·默顿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曾经对功能主义基本观点的形成作出贡献的理论家。他是对结构功能主义提出更具有限制性要求的提议者，尽管他也承认，这个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促进了社会学知识的进步。但是，默顿也认为，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社会学的全部问题。② 当然默顿仍然是功能分析的一个忠实的捍卫者，他认为功能分析“提出了一个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一种比我了解的其他方法更有效的考虑问题的方法”。③ 用科塞和罗森伯格的话来说，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目前可以利用的最老练的功能主义方法”。④

社会结构在默顿功能主义中的显著地位

默顿关于功能主义分析的模式，产生于他对于经典理论的渊

① 科塞和罗森伯格，《社会学理论：一个读本》，第 490 页。

② 默顿，《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见布劳编《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第 25 页。

③ 同上，第 30 页。

④ 《社会学理论：一个读本》，第 492 页。

博知识。他利用了象韦伯、托马斯、杜尔克姆这样一些理论家的思想作为他研究工作的基础。① 从表面看，默顿没有一个自己的统一理论，或者说，他只是写了有关经典性著作的一些论文，但是，透过他的文章，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主题，这就是，在社会学分析中研究社会结构的重要性。

默顿的早期著作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关于17世纪英国科学产生的博士论文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论文中，默顿研究了基督教与科学产生的关系，这与韦伯用于证明基督教道德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的相关关系的方法如出一辙。在分析英国的皇家科学促进学会的著作的时候，默顿发现，"某些基督教道德的因素遍布于科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对于科学家的工作态度，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②

韦伯的影响还可以见于默顿对于科层制度的讨论。在韦伯之后，默顿注意到现代科层组织如下几点：

1. 科层制度是正式的按照理性组织起来的结构。
2. 科层组织涉及到对于活动模式的明确规定。
3. 在观念上，这些活动是与组织的目的相联系的。
4. 这些组织各部门被整合为整体科层结构。
5. 科层组织的地位是有层次的。
6. 在科层组织中个人的职责和特权是由有限制的、特殊的规则规定的。

---

① 关于默顿与欧洲经典社会学家的关系，见科塞的《默顿与欧洲的社会学传统》一文。科塞赞扬默顿能吸收来自过去欧洲的各种观点，但又不完全恪守某一种观点……默顿向我们介绍了各方面各有特色的理论思想，无论是欧洲人的，还是美国人的；他按照自己的创造性目标来处理这些思想，并用毕生的努力使之成为一种含义丰富的思想。

② 默顿，《清教、虔信派和科学》。载《社会学评论》第28卷，第3页。

7. 权威属于特定职位而不属于特定的个人。

8. 人们之间的关系有正式的规定。①

包括学院和大学在内的大规模的组织就是由韦伯和默顿所描绘的这种科层组织模式的很好的标本。

默顿并没有停留在对结构的描述上，他进一步讨论了作为这种结构组织产物的人格。科层组织迫使个人成为"有组织的、谨慎的、训练有素的个人"。这个压力有时导致对规则的盲目的遵从，而忘记了这些规则建立时的功能和目标。虽然这些规则可以对组织的效率发挥作用，但是，它也可能由于导致过分的顺从而起一种消极的作用。也正是这种规则，可能会引起科层组织成员与这个科层组织所服务的对象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状态。可能每一个学生都会从他们自己的科层组织那里碰到一些麻烦。可以假定，在图书馆闭馆的时候，某个学生要求借出图书馆的库本书，并答应在第二天一早图书馆开馆时还回。那个拒绝这个请求的图书馆员，正是遵循了库本书不能借到图书馆外的规则。由于在图书馆晚上闭馆以后并没有人会使用这本书，这个学生会感到图书馆的这种规定令人难以理解。但是，规则就是规则，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必须坚持那些规则。因此，科层结构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格，这种人格坚持的是规则的条文而不是建立这些规则的精神。默顿主张在科层组织对人格的影响方面进行经验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将证明社会组织与人格形成的互相依赖性。

制度或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默顿著作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这个主题更具体地表现在默顿的另一部经常被引用的著作中，这篇文章牵涉到"自证预言"。在这篇文章中，默顿进一步发挥了托马斯这样的观点，即"假如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是真的，那

①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195—196页。

么，这种情境结果就是真的"。默顿指出："在开始的时候，自证预言是对于情境的错误的定义，这种定义然后导致一种使本来错误的概念得以应验的新行为。"① 而这，正是可以对人们行为作出解释的结构。1929 年大危机时，某些银行的破产其部分原因就是对情境作出了造成银行挤兑、并最终导致银行破产的定义。默顿通过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影响，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对于种族群体的评价，以及这种评价产生的社会效果上。正如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和其他银行的立法平息了民众的恐慌，并且防止了随之而来的全国性银行的破产一样，制度的控制可以用来调节种族群体的遭遇。默顿指出，"自证预言"只是在缺少制度控制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

关于制度对于其成员生活的影响的课题，也见于《社会结构和失范》一书中，在这本书中，默顿力图论证"社会结构是如何对社会中的某些个人施加一种确定的压力，使其成为不遵从者，而不是成为遵从者"。②"失范"(anomie，一个引自杜尔克姆著作的概念)就是文化目标与适合于获得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相分离的结果。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证明富裕，可以作为文化上规定的目标，而获得这个目标的制度化的手段则可能是一种高收入的职业。默顿说，只要社会能为获得文化上的目标提供制度化的手段，失范状态就不会存在。在使用合法的手段获得所情愿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处于遵从的状态中。但是，假如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不相一致，失范或不遵从行为就会产生。许多我们所称之为"犯罪"的行为，就是失范的例子。那些为了买一辆新赛车和购置华丽的服装而贩卖毒品的下等阶级青年，那些盗用公款的会计，那些为过上奢侈生活而从事应召女郎这样非法职业的女大学

① 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第 423 页。

② 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3 卷，第 672—682 页。

生，都是不遵从的例子。这些青年人、会计、女大学生所希冀的目标，每天都在大众媒介的广告中大量传播。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则被认为是犯罪或失范的行为。因此，失范就不是一个可以由心理学理论来解释的心理学概念，而是需要由社会学做出解释的文化和结构的问题。

虽然默顿的社会学兴趣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已经说明他许多著作都侧重于结构研究。他把对经典理论家的解释集中在结构的问题上，不过是他的结构取向的一个明证。此外，默顿还创立了关于功能分析的经典性典范。

默顿的功能分析典范

如上所述，自然主义理论强调理论构造的精确性。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有对概念的确切定义，从而使这些概念再构成清楚的假设。默顿用指出功能分析理论中不精确的用语、模糊的假设和忆说来开始对功能分析的研究。默顿有感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术语经常用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就如同一个概念经常用不同的术语来表示一样。"① 如果把概念作为可以检验的命题的基础，那么，就必须对概念进行清楚的定义。而且，命题的陈述必须清楚，不能模棱两可。默顿的模式就是力图为功能分析的一些基本的分析概念下定义，并澄清功能主义假说中某些含糊不清之处。

默顿引用了功能分析中的三个流行的假定，② 然后着手对它

① 默顿，《理论社会学》(1967)，第74页。

② 默顿认为，虽然这些假设是由功能主义者提出来的，但却是"有争论的，并不是功能取向一定要有这些假设"。默顿相信，布朗明确认为社会的功能统一性的存在，马凌诺斯基则对功能的普遍性和不可缺少性的假设作出了贡献。他的批评并不只是局限于两位人类学家，他认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所采用的这些假设就足以应该受到批评。

们进行修订。第一个概念就是社会功能的统一性(functional unity)，可以定义为"一种使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充分合谐或互相一致的运行，不至于产生持久性的既不能解决也不能调节的冲突的条件"。① 默顿认为，一个社会完满的功能统一性是"常常与事实相反的"。他引用了好几个社会习俗的例子，这些习俗对于某个群体是有功能的(也就是说，它有助于加强群体的整合和凝聚)，而对于另外一个群体则是反功能的(会导致群体的瓦解)。比如，宗教曾经被社会学创始人看作社会的一个重要(如果不说是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也有大量这样的实例，即宗教对一个社会有凝聚作用。但是，我们也有例子说明，宗教的反整合效果。象在贝尔发斯特街道上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发生的战斗，就决不会为宗教的功能统一性提供任何证据。默顿的典范坚持认为，不能被积极功能(整合因素)所迷惑，而无视反功能(解体因素)的存在。他也注意到，对一个群体(即贝尔发斯特城中的天主教社会或基督教社会)具有功能的东西，可能对于整体(贝尔发斯特城)并不具有功能。因此，分析的群体的界限必须明确规定。

第二个假定——即普遍的功能主义 (universal functionalism)——是与第一个假定有关的。普遍的功能主义认为，"所有的标准化的社会或文化形式都具有积极的功能"。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默顿引进了"反功能"和积极功能的概念。然而，很少有哪些社会活动是明确的反功能的。默顿提出，应根据"功能结果的净平衡"来考察文化因素，这就可以衡量它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功能。在我们的关于北爱尔兰的宗教的例子中，一个功能主义者必须设法去考察它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功能，然后必须确定这种平衡表明它主要

---

① 默顿，《理论社会学》(1967)，第80页。

② 同上，第84页。

是消极的功能抑或是积极的功能。

第三个假定——即不可缺少性（indispensability）——使三个假说成为一个整体。这个假说认为："在每一种文明中，任何习俗、物质对象的观念、信仰，都满足一些重要的功能，都有一些任务要完成，在运动的整体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①默顿认为，这个假定是模糊不清的。是功能（社会需求，如新成员的再生产）不可缺少，还是项目（如一种规范，象核心家庭）不可缺少，并不清楚。默顿说：

> 简而言之，不可缺少性的假定一般可以表述为两种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意义。第一层意思是，假设某种功能是不可缺少的，否则，社会（或群体和个人）就无法维持。这就构成了社会必需的功能先决条件或前提概念，我们将有机会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考察。第二层意思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假定某些文化和社会形式对于满足其中的某一种功能是不可缺少的。②

首先，功能先决条件的概念在形成理论之前必须在经验上加以检验。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做出假设。对于第二层意思，默顿提出功能替代的概念。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功能的项目能够被另一个项目所取代或替换，而社会需要将仍然得到满足。

有一个例子可以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不可缺少性这个不完善的假定。甚至在功能迫力已经建立的地方，也往往有不止一个文化项目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从终极的角度来说，生物繁殖的功能先决条件对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必须的。为了社会的延续，人

① 默顿，《理论社会学》（1967），第86页。

② 同上，第87页。

要衰老、死亡，并被其他人所替换。但是，使繁殖活动能得以进行的项目则是非常不同的。在本世纪 70 年代，甚至一些类型的婚姻中，繁殖的规范也受到了挑战，比如，一些妇女明确地希望成为没有婚姻制度约束的母亲。

在对这三个假定进行挑战的时候，默顿说：（1）我们不能假设社会是完全整合的；（2）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文化项目的反功能和积极功能的双重后果，（3）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必须在功能分析中加以考虑。

除了以上对于假说的批驳之外，默顿还注意到不完善的功能主义的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有意识的动机"和"客观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混乱。按照与杜尔克姆相类似的方式，默顿指出，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不是动机而是客观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可以是明显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明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客观结果，它对系统的调节和适应做出贡献，而这种作用是系统参与者所期望并公认的。确切地说，潜在的功能就是那些并非人们预先期望和公认的功能"。① 以前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典型地集中在对明显功能的研究，但是，只研究明显的功能，而忽视潜在的功能，则只能误入歧途。有许多例子表明，对于明显功能的认识远不如对于潜在的结果的讨论那样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韦布伦关于炫耀消费（即人们为了用奢侈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而花钱）的理论就证明了认识潜在功能的重要性。虽然购买一辆汽车的明显功能是为了上下班，但购买"奔驰"汽车则具有了一种潜在的功能，即显示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任何文化活动都既可以从潜在功能的观点也可以从明显功能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的。默顿自己就用了一个政治机构的例子。妨碍民主政府自由运转的政治机构被认为是反功能

① 默顿，《理论社会学》（1967），第115页。

的，就是说，它阻碍了民主过程，对地方政府起了消极的作用。虽然这在明显功能的意义上确实如此，但在这样的分析中却忽视了潜在的功能。比如，在本世纪30年代，当政治机构处于顶峰的时候，他们为受到危机沉重打击的人们提供服务。这些政治机构提供的许多服务，在今天是由福利机构提供的。在这个例子中潜在的功能是比明显的反功能更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一种正确的功能主义分析，将不仅仅看到功能和反功能，还应当分清潜在的功能和明显的功能。

在评论了不完善的功能分析的问题之后，默顿提出了一个严谨的模式和典范，以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这个典范通过提出一些在分析中要回答的问题来对功能主义者进行指导。这些问题包括：

1. 所分析的系统的性质是什么？它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还是种族群体，它是一个小群体（如友朋群体，家庭），还是一个较大的组织（如科层组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对于我们确定什么对一个群体的需要是有功能的，而对另一个群体的需要是没有功能的非常重要。

2. 存在不存在可以按照结果净平衡加以分析的潜在功能和明显功能？正如我们在默顿关于政治机构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功能并非总是人们所事先期望的，也不一定必须为那些系统参与者所承认。

3. 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一种"功能需要"是否只是由于某一特殊群体而存在？默顿不愿去假定，所有的系统都有一套必须加以满足的功能需要，以保证系统的延续。在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默顿提醒功能分析者注意功能替代的重要性。

4. 功能主义者对秩序的问题的兴趣，会妨碍他们对不平衡的研究吗？在提出反功能和积极功能概念的时候，默顿忠告功能主

义者，当文化活动和规范与社会系统相矛盾时，社会变迁就是可能的。有些项目，并不仅仅是反功能的，而且他们也会导致所研究的群体的变迁。

除了澄清概念和揭示出不完善的功能主义的谬见之外，默顿的典范力图做的事情就是来提出一些必须通过功能分析才能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功能主义者必须记住，对一个群体是有功能的东西，对另一个群体则可能是反功能的。因此，社会学家必须留心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潜在功能，而不要被特别明显的明显功能所迷惑。在分析活动的功能性的时候，调查者必须对一种规范具有多种功能的可能性引起注意。由于文化活动不可能是完全整合的，也不可能是完全非整合的，因此，必须按照结果的净平衡来估价其功能性。

对功能主义的批评

在 1948 年，默顿首次提出了他的典范，以促进在研究中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他提出的典范，成为理论发展的模式，把这种理论与社会学的研究理想地结合起来。结构功能主义常常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大量批评，而这些批评，有时并不是公正的。提出这些批评的，包括冲突派理论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下面，我们将讨论一些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固有的一些假设和这些假设所招致的批评。然后，我们将把这些假设与默顿学派的功能主义联系起来。

象所有的理论一样，结构功能主义依赖于对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的性质作出的特定的假设。这些假设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它们集中于社会的结构而不是社会的变迁。社会被想象为由按照一定有秩序的方式互相联结起来的部分所组成。显然默顿的典范框

架是在较早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但它仍然夸大了社会系统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和谐性。①这个问题在本世纪60年代变得特别明显，在那个时候，城市在发生暴乱，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战争在剧烈进行。统一性、稳定性和和谐性并不象是美国社会的特征。

虽然默顿曾主张，“虽然功能分析不必包含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象其他所有社会学分析一样，它能够被任何广泛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所影响”。②事实就是，结构功能主义已经趋向于成为一种保守的社会理论，功能主义运用它的描述能力，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结构，强调地位的稳定。它强调和谐的结构。一个叫做达伦道夫的冲突理论家(我们将在第六章对他进行讨论)，把功能主义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研究，而不是现实的。尽管有这些对立的观点，还是可以说，功能主义并没有充分反映出社会的冲突方面。

结构功能主义不仅依赖某些关于有秩序的社会的假设，而且它也反映出关于人的性质的假设。在功能主义看来，人是一种占据着地位和角色的抽象物，正是这些地位和角色形成了制度和社会结构。按其极端的形式，结构功能主义把人绝对地看作是根据已经存在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加以书写的脚本。在杜尔克姆派反对心理学还原论的传统中，人被看作是由规范和包含这些规范的制度所决定的产物。这个观点已经导致对社会学中的“过分社会化的人”③的概念的批评和“使人回复到社会学分析中”的忠告。④功

① 对此的批评，见吉特林《社会学的反思：对当代理论的批判》(1973)。

② 默顿，《理论社会学》，第93页。

③ 让，《现代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过分社会化的观念》。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6卷，第183—193页。

④ 霍曼斯，《恢复人的地位》，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9卷，第809—818页。

能主义所讲的人是由社会强制和规范决定的，而这些强制和规范几乎没有创造和选择的余地。

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学观点，结构功能主义已经受到批评者各式各样的攻击，这样，使得有些社会学家越来越不情愿给自己的理论贴上结构功能主义的标签。①没有一个功能主义者真正认为所有的观点都要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名称，这就意味着，一些对结构功能主义保守偏见和它无力解释变迁的批评是在反对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综合理论。当我们继续去讨论默顿自己关于人、社会和社会学理论的形象的时候，这些看法将会获得一些证据。

象大部分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家一样，默顿认为人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形成的。我们要强调的是默顿所赋予社会结构分析的重要地位。但默顿关于人的形象的看法，并不是僵硬的决定论。正象史汀肯姆所说的"默顿视为社会结构中心的核心过程的，就是对社会结构替代物的选择。"②换句话说，有些行为模式，是制度秩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有的则是替代物（这一点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唯意志论者）。人们可以对他们的行动进行某些选择，但是这些替代物是按规则的要求由社会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默顿那里，行动者既不是按自由意志行动的人，也不是其行为完全被预先决定了的自动的机器人。

---

① 帕森斯曾为一本给默顿带来荣誉的著作写过一篇论文，他指出，默顿反对"结构功能主义"这个词。"他特别不愿意加上'主义'这个标签，而提出用'功能分析'这个简单的描述性的词要更合适一些"（帕森斯《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理论》）。帕森斯同意默顿的观点，他认为功能分析是所有社会学理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② 史汀肯姆，《默顿的社会结构理论》。见科塞和罗森伯格编《社会学理论：一个读本》，第12页。

正如科塞所指出的："默顿所说的行动者面对着常常有着互相矛盾的角色丛和身份丛，并不断地徘徊于其间。他们既要努力避免过分遵从的斯库拉，也要避免越轨的卡律布狄斯，这样他们就往往成为來自某一方的诱惑的牺牲品。"①

这样的看法可以见于默顿对于失范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于科层组织的个性的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曾简单地讨论过。

默顿关于社会的概念与结构功能分析的建立者杜尔克姆的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社会结构是整合的，社会的规范控制着结构的成员。它们确实是存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在默顿赋予社会学结构分析的优先地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默顿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假设为许多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者所哀叹的静止的性质。默顿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规定包括着如下的认识：(1)"社会结构通过分化产生冲突"。(2)"社会学的两难性存在于规范的结构之中，而这种规范结构有着互相对立的期望"。(3)"社会结构既产生结构内部的变迁，也产生结构之间的变迁"。②虽然默顿的社会结构明显地有它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影响到那些占据这些地位角色的人——但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态的，它承认冲突和越轨行为的结构方面的原因。这个原则可以由默顿所进行的对作为变迁的催化剂的"反功能"和"失范"的研究而得到证明。

默顿承认，他所提出的结构功能分析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只是社会学的方法之一。他承认，理想的是一种统一的综合性的理论，但是，"理想不符合现实事物时"，他就感到存在问题。

① 科塞，《默顿与欧洲的社会学传统》。见科塞编《关于社会结构的思想》，第98页。

② 默顿，《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见布劳编《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第31—37页。

① 虽然默顿致力于发展一般的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和特殊的结构功能分析，但他警告不要过早地接受一种单一的理论典范。正如默顿在如下文字中所表述的：

> 我所要求的是象一个会诊的医生那样，不仅要进行诊断，还要提出治疗的建议，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伴随着分歧、竞争和信念抵触的社会学的慢性危机，似乎要好于为解决实际危机而提出的治疗方法。也就是说，对某种单一的理论观点的描述可以为接近社会学的真理提供更充分更彻底的途径②。

摘　　要

到目前为止，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孔德那里，中间又经过赫伯特·斯宾塞和埃米尔·杜尔克姆。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在杜尔克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并反过来影响了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作为哈佛的一个青年教师，帕森斯向他的学生默顿介绍了埃米尔·杜尔克姆的著作和功能主义理论。

默顿在其社会学的生涯中对早期的社会学著作表现出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偏好，并为进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提出了一种模式或叫范式。他抛弃了那种简陋的功能主义的假设，这些假设提出了"社会的功能统一性"、"普遍的功能主义"、"不可缺少性"的观念。默顿则引进了反功能、功能替代、功能结果的净平衡、显功能和潜功能的概念，并将其组织成功能范式。虽然这个模式超过了

---

① 默顿，«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见布劳编«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第 29 页，

② 同上，第 28 页。

早期功能主义的假设，但仍然存在着问题。在这里，社会本身被看作是一个实体，要大于并不同于其各个部分之和。个人则被看作是占有一个身分角色的抽象位置，这种身分角色包含于结构之中。正是这种抽象性使得这个范式是无法加以检验的。

乔治·霍曼斯以前也是一个功能主义者，他就认为，社会学要离开非现实的抽象性，就必须转向表面上看来就是明显的事实。霍曼斯倡导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人的行为，并以此作为建造社会学理论的基础。霍曼斯的著作及其与功能主义的关系是下一章讨论的题目。

第三章 行为——交换理论：对社会结构的解释

如果说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它就必须认真从事这样的一种科学工作，即对所发现的经验性关系作出解释。解释是一种理论，其形式是一种演绎体系。虽然功能主义学派都在谈论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的理论工作。这个学派并不了解什么是理论，也从没有提出一种作为解释的功能理论……如果认真地努力以构造理论，这就是解释社会现象的开端，而最终的结果是关于人的行为而不是关于社会均衡的一般性命题。

引自霍曼斯《恢复人的地位》

正如霍曼斯上面的一段话所指出的，功能主义的理论虽然对客观现实进行了描述，但它却不能对结构的发展作出充分的解释。当然，公平地说，功能主义对于结构发展进行解释的种子，可以见之于交互性（reciprocity）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中，无论是对于功能主义者还是对于非功能主义者来说，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术语曾经被早期的人类学家——包括马凌诺夫斯基——所使用。对于他们，美国的功能主义者是感恩不尽的。而且，这个概念对于霍曼斯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来说，也是一个中心的概念。一个概念得到如此广泛的承认并且在社会学的应用中又是如此的含糊不清，这种情况还是少见的。①

① 关于交互性概念在理论上的发展，见古尔德纳《交互性规范：一个初步的命题》。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5卷，第161—178页。

这种意义上的含糊不清，已经在交换理论中产生了不可调合的分歧，而这种交换理论正是围绕交互性这个概念发展起来的。在开始时候就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并不存在单一的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确切地说，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几种以交互性期望的社会现象为基础的理论，而每一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渊源于关于人、社会及社会科学的性质所做出的假设。①但是，尽管在这个理论中存在着根本分歧，各种关于社会交换的理论还是共同分享了一些关于社会互动的性质的假设。

各种社会交换理论都是以经济交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即人们提供商品和劳务，同时又期待得到想得到的商品和劳务以作为报酬。各种交换理论家都分享了社会互动是与经济交易相类似的这样一种假设。但是，他们也承认，社会交换并不都是可以用美元或美分来测量的。因为，在社会交易中，用来交换的既有有形的东西，也有无形的东西。比如在工厂中，一个工人为了得到一大笔圣诞奖金这样有形的报酬而同他人进行广泛的合作。但同时，甚至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友谊或友善这样无形的报酬也可以导致类似的行为。而在这时，奖金似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人们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期待得到某种报酬，交互性模式才得以维持。

交换理论的另外一个基础可以见之于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中，② 而对于交换的社会学理论的充分发展则可以

① 对关于社会交换的不同理论的更具体的讨论见海游《理性选择与社会交换》(1976)。

② 对于交换理论及其与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的关系的讨论，见艾克《社会交换理论：两种传统》。有些社会学理论评论家简单地把交换理论看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分支。某些交换理论可以证明这种观念。但是也要看到，在行为主义者霍曼斯(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他)的交换理论、布劳的结构交换理论和更具有社会心理学色彩的塔鲍特（J. W. Thibaut）和吉利（H. H. Kelley）的交换理论中，其假设是很不相同的。

归功于霍曼斯，而劳是在其后对这个理论进行了修正。霍曼斯希望纠正他所感到的功能主义的不足。对于功能主义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功能主义忽视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功能主义的研究集中于或大或小的系统和它们的组织或结构，以及它们的目的或功能。个人被简单地理解为占据一种地位或位置、履行以这种地位或位置为指导的角色。这种对于结构的强调来自于杜尔克姆学派的传统，这种传统试图证明需要把社会学做为一门与心理学析分离的学科。因此，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了一种纯粹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混合物相对立，而这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则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纯粹社会学好象从社会心理学中摆出来的钟摆，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而忽视了社会中做为行动者的人的重要性。交换理论则是这样一种尝试，它力图使理论的钟摆从极端的社会学一端移向重新评价社会系统中个人的作用。①

霍曼斯所强调的，就是使人回到社会学分析中去。霍曼斯作为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在50年代，他却与这种理论决裂了。在讨论霍曼斯对于行为交换理论的贡献之前，我们将简短地考察一下霍曼斯的功能主义和他对功能主义所做的批评。

人类群体：霍曼斯对于功能主义理论的贡献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霍曼斯的社会学生涯开始于结构功

①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虽然行为交换理论将人留于社会学理论之中，但其对人的看法是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决定论观点颇为一致的。这种看法导致了让（Wrong）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关于人的过分社会化的观念"的批评。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交换理论，似乎都认为，人虽然可以进行选择，但却是由结构决定的，如果说还有创造性活动的余地的话，这余地也是很小的。

能主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40年代的理论界正占据着统治地位。霍曼斯的《人类群体》一书集中研究关于系统的抽象概念，而这种研究是以他对于小群体的具体研究为代表的。在他进行这种研究的时候，他深感兴趣的是这种群体的结构成分及其运行。这本著作受到普遍的好评，被称之为功能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罗伯特·默顿写道："自从齐美尔在大约半个世纪前所提倡的分析以来，没有一本著作象霍曼斯的《人类群体》那样对关于小群体的结构、过程及功能的社会学理论做出那样大的贡献。"① 但是，尽管受到这样的赞扬和好评，霍曼斯还是由于功能主义传统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而抛弃了它。

霍曼斯关于群体的功能分析，基本上是对于初级群体而不是对较大的次级群体或组织做出的。霍曼斯把群体定义为："若干经常进行跨时间沟通的人，为了使每个人都能面对面地与其他一切人进行沟通，而不是通过他人进行第二手沟通，他们的人数往往不多。"② 这个定义发源于经典的社会学家库利关于"初级群体"的概念，它展示了结构性组织的一个方面。对符合这种定义的小群体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霍曼斯利用了其中五种这样的研究以发展他的关于小群体的理论。

在《人类群体》一书中，霍曼斯明确地描述了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首先，霍曼斯的理论代表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他把群体看作是由各个互相依赖的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而这个整体或社会系统则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环境系统之中。第二，理论必须是有点抽象的，不等于个别的具体的例子。在建造这样的理论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在形成理论的努力中省略掉一些具体的事实，而

① 见默顿为霍曼斯的《人类群体》一书所写的绪论。

② 霍曼斯，《人类群体》，第1页。

这样理论是概括性的，以超出所研究的单个现象。第三，理论要达到归纳的水平，就是说，要使用个别的事实（在这本书中，资料是来自对五个小群体的研究）以构造能适用于所有群体的更普遍的理论。这种归纳的方法与演绎（霍曼斯在后来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的方法是不同的，按演绎的方法，理论家要先在逻辑上形成普遍性的理论，然后再通过经验性观察将那些经得起检验的命题保留下来。因此，霍曼斯是从个别的经验性事实出发，并从这些事实中形成一种关于人类群体的更普遍的理论的。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归纳分析中，概念性的术语也必须要得到一致的同意。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概念是构成命题的基石，而命题则是产生理论的材料。按照理论的建造程序，霍曼斯创立了一种概念框架，以此来对关键性的概念进行定义。然后，他使用他已经形成的术语对这五种研究分别进行分析，以便从这些选择来的经验研究中形成命题。

我们将简短地提一下霍曼斯对其中的一种研究的运用，以具体地解释他的功能分析，这就是对银行配电房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的调查计划阶段，研究者从很大的西方电力公司挑选了 14 个工人。按照这个计划，要仔细观察工人的工作习惯及友谊模式，并且要服从于调查分析。霍曼斯用一种功能分析的眼光对这个调查报告所提供的资料重新进行考察，而这是可以适用于除银行配电房之外的其他群体的。

以从群体中得到变数性资料为基础，霍曼斯的分析形成了一种对所称的"内系统"和"外系统"的描述。所谓内系统就是由各个成员构成的整个群体，在这个例子中，内群体就是由银行 14 个成员构成的。外系统则是群体在其中工作的房间的布局。因此，内系统是做为整体的群体，而外系统则是由内系统以外的部分构成。内

系统中的个人行为是以规范为指导的，规范是这样的一些观念，即一种"使特定的成员知道应该做的、必须做的和期望做的东西的陈述形式"。① 服从群体的规范受到奖励，违犯它就要受到惩罚。

对银行配电房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些关于群体形成及其详细情形的结构性的假设。在对银行配电房研究中得出这样的假设之后，又进一步根据霍曼斯在《人类群体》中选择的另外两个小群体的研究结果重新进行考察和修改。这些假设是普遍性的，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群体。将这些假设互相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关于群体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理论。

很清楚，在霍曼斯看来，社会的各个部分被组织成为系统，而这种系统又是以最小的社会系统为基础的。正如霍曼斯所做的那样，对小群体研究将导致对更大的群体和整个文明的理解。在霍曼斯看来，整个文明的发展、结构和功能的法则与小群体中起作用的法则是完全一样的。而象《人类群体》那样对小群体的研究的优势则在于，研究这样的群体要比研究更大的群体或整个文明要容易得多。

虽然霍曼斯也承认功能分析的贡献，但后来他开始对功能主义理论进行批评，他认为他自己的功能主义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② 功能主义所要做的是（通过形成精确的概念）对经验观察进行分类，并形成描述这些分类性概念相互关系的命题。霍曼斯认为，功能主义"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智力组织"，但理论必须超越出这种有限的努力。③ 正如他所看到的，对于科学来说，"任何科学都有两件事情要做，这就是发现和解释。通过前者，我们来判断它

① 霍曼斯，《人类群体》，第130页。

②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6页。

③ 同上，第7页。

是否是一门科学；通过后者，我们可以判断这门科学成功的程度如何。①因此，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了进行发现和描述的努力，但它却不能进行解释。在50年代后期，霍曼斯修改了他的理论，希望用社会交换的原则对社会结构进行解释。

交换理论：从杜尔克姆到心理学的还原运动

在脱离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霍曼斯开始强调心理学对于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他向社会学的经典学者杜尔克姆的著作提出了挑战。杜尔克姆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证明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社会事实不能用心理学来解释；因此，社会学不能被还原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杜尔克姆对于心理学还原论的忌讳在今天还是非常有影响的，但霍曼斯打算向这个规范挑战。他认为，对社会行为的所有解释归根到底都是心理学的解释。

然而，霍曼斯并不是用心理学而是用经济学开始建立他的理论的。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依赖于这样的一种假设，人们所做出的行为要么是为了获得报酬，要么是为了逃避惩罚。这种为了报酬的行为交换，是简单的经济交易的基本原则。人们可以为了每周的工资而交换自己的服务。他可以用这笔钱买进杂货，或交付租金，或缴纳网球俱乐部的会员费。每一种这样的开销，都可以看作是经济交换的例子。霍曼斯把所有的社会行为——不仅仅是经济行为——都看作是这种交换的结果。比如，对于工作不仅提供金钱这样的外在报酬，它也提供友谊、满足和增加自我尊重这样的内在报酬，它还能使工人避免失业的耻辱。他还认为，人们是按照尽

① 霍曼斯，《综合的生涯》。见霍罗维茨编《社会学的自我形象》，第20页。

量缩小代价(即惩罚)、尽量提高收益(即减去代价的报酬)的方式行动的。

经济学可以描述交换关系，而社会学则可以描述交换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但心理学才掌握着解释的钥匙。霍曼斯发现，在心理学中适于解释社会结构的理论，就是行为心理学，特别是斯金纳的理论。他注意到：

> 它(斯金纳的理论命题)是由或然性命题而不是由范畴命题所构成的。命题是普通的因果陈述，而不是目的论的陈述。这种命题是高层次的。未来都是可以把握的，它们并不能一下子从更一般的命题中产生出来。这种命题有着广阔的视野：能够用来解释许多事情，而不仅仅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当然，行为心理学也不是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是，我确信，它的失败只是在于缺少资料或在探究长而复杂的因果链条方面的困难，而不在于命题本身固有的不适用性。与杜尔克姆相反，社会学是一种心理学的必然结果①。

很明显，霍曼斯非常坚信行为心理学可以满足任何科学理论的要求，即解释能力。

当然，斯金纳学派的行为主义只是心理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分支。它认为，对于动物行为的理解将产生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行为主义不同意诸如"精神"这样的概念，因为思想是无法直接观察的。正如动物积极寻找报酬和避免惩罚一样，人类这种动物也是努力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而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对于作为交换理论家的霍曼斯来说，个人和结构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由功能主义者所说的"地位一角色"联结的，确切地说，结构和制度包含于

① 霍曼斯，《情感与活动》，第 48 页。

处于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角色交换过程中的个人之中。①

霍曼斯相信，这种交换过程可以用从斯金纳心理学那里借用来的五个互相联系的命题加以解释。通过这些命题，大量的交换过程可以得到解释。而每个命题都相当重要。这五个命题是：

成功命题：

> 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某种行动得到的报酬越经常，这个人就越愿意从事这种行动。②

在这个命题中，霍曼斯认为，如果一个人曾经成功地获得一种报酬(或避免惩罚)，他就倾向于重复这种行动。心理学家斯金纳在对鸽子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个原则，即当鸽子啄一个特定的目标时，就给它一些食物以作为报酬。霍曼斯认为，这个基本原则也可以同样地适用于人类行动。日常生活是由人们寻找报酬的行为构成的。在努力工作了一周之后，我们期望得到一定的工资。我们知道，为考试而学习将得到更好的分数；我们发现，用微笑的表情可以得到热情欢迎的报酬。但是，这个命题必须用其他的命题加以修正。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考试前努力学习，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因此，成功命题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它不能完全经得起经验的检验。

刺激命题：

> 如果在过去一种特殊刺激或一组刺激的出现，曾经成为一个人的行为得到报酬的原因，那么，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相同，人就越可能发生这种行为，或是一些相似的行为。③

刺激命题描述的是能得到所期望的报酬的事情或行动。让我

① 霍曼斯，«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2卷，第597—606页。

②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16页。

③ 同上，第22—23页。

们以一个希望在某门功课中得到好成绩的学生来证实这个命题。这个学生已经认识到他(她)必须跟上功课，以及为了考好，必须花若干小时来集中学习。这个学生特别发现，在考试前一个人进行学习是有益的。后来，他得到了好分数，认识到作为刺激的学习的重要性，这种刺激能带来他所希望的报酬。然而，几年来，学生已经认识到他(她)可以在考试前两天集中学习，也能得到在此以前就学习一样的结果。而且，他(她)也发现集体上课不是有益的。如果这个学生有一个机会选择是集体上课还是个人学习。他(她)可能会选择一个人学习这种刺激。刺激可以与过去的刺激有很大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霍曼斯的命题认为要带来希望的报酬，就要选择更一致的刺激。在这个例子中，个人学习（考试前一天或两天)比群体学习的不相同刺激更为可取。

价值命题：

对一个人来讲，他的行动结果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可能去执行这个行动。①

这个命题尤其涉及行动结果的报酬和惩罚，成功命题告诉我们，一个学生为了得到好分数而学习，刺激命题认为特殊的学习方式比其他的方式更可能带来成功，价值命题描述的是一个人希望刺激提供报酬的程度。让我们假设我们的学生有一个机会在音乐会上认识一位有名的音乐家，而同时，他就不得不把学习放到一边去。我们也假设他的时间表是这样的，如果那时学习没完成，又没有其他时间可以利用。问题成了一个价值问题：对于一个学生，一个好的考分比参加音乐会的享受更有价值吗？霍曼斯的命题假设学生将执行带来他希望的报酬的行动。

剥夺—饱满命题：

---

①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25页。

> 一个人在最近越是常得到一种特殊的报酬，那些任何一个未来的这种报酬对他来说都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①

剥夺-饱满命题进一步修正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特殊行动的完成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继续为价值命题提供的例子，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事实。价值命题并没详细说明一个学生为什么能觉得参加一个音乐会比得到一个好的考分更好。霍曼斯的看法是一个特殊报酬的被剥夺或被满足是解释的关键。我们的学生可能已经在这门功课的考试中有了4个高分。感到另一个高分与参加音乐会这个难得的机会的报酬不一样，在这个例子里，他(她)会觉得音乐会要比一个好的考分提供的报酬更大。如果这是那门功课的第一次考试，那么一个好分数比参加音乐会更被他所期望。换句话说，人类象动物一样，既会渴求某一种报酬，也不想舍弃顾不上的东西。剥夺-饱满与我们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我们对它的估价有联系。

侵略—认可命题：

> 在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预料的报酬时，或得到他没预料的惩罚时，他将感到气愤，他便可能去从事侵略性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变得对他更有价值……在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他预料的报酬时，尤其是得到的报酬比他预料的报酬大时，或者没有得到他预料的惩罚时，他会感到高兴；他更可能去从事认可性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变得对他更有价值。②

在这个双重命题里，霍曼斯所涉及的是人的情感行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他(她)预料的东西，他(她)将变得气愤。让我们假设我们的学生决定参加音乐会，放弃考试前的复习，但是，他们

---

①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29页。

② 同上，第37、39页。

到了音乐会，得知他的(她的)预定票已经被出售了，并且再没有当场的票。很明显，学生没有得到希望参加音乐会的报酬，最大的可能是他(她)受到挫折，并把不满发泄在票房工作人员身上。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这个命题的第二部分。可能学生并没真正预料到因为他生气而得到一张票，气愤仅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但是正在这时，音乐厅的经理偶尔从他身边通过，听到了学生的不满，为了安抚这些学生，经理把他安排在为特殊来宾准备的位子上。显然，学生会感到高兴。其他的事情也一样，学生感到，气愤感情的爆发可以带来结果，最可能的是在以后遇到同样受挫折的情况时，对发泄这样的感情不会犹豫。

霍曼斯强调这些命题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每单个命题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行为做出了部分解释。为了解释行为，所有五个命题——成功、刺激、价值、剥夺--饱满和侵略—认可——都必须加以考虑。虽然这些命题可能看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但霍曼斯坚决认为，我们在建立社会学理论中不能漠视这种明显性。对霍曼斯而言，在一个交换理论中，详细地说明这些命题，并把它们运用到经验的研究中去是很重要的。霍曼斯相信，把这些命题作为一个整体，将使社会学有能力解释结构功能主义者所称的"社会结构"。

霍曼斯坚决主张，在最终的分析里，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本身的存在，是由于被五个命题分析的社会交换，我们可以说，政府以保证个人的幸福生存来换取它的权力；教士花费时间去忠告教区的居民、访问病人、准备礼拜换取管理他的教区并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位；教育体系为保证教职员的职业，用它的服务来换取学生的学费，这些学费都成为工资支票。虽然我们作为例子的各种报酬都是物质的，但霍曼斯承认报酬既可是物质的，也可是非物质的。一个人可以选择教师的职业，这不仅是为了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其他的职业可能得到更多的薪金)，而且还为了和青年人一起工作的内在报酬以及这种服务带来的满足。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帮助穷人的人道主义者不需要任何物质的报酬，他的非物质报酬可以包括满足、他人的尊重和帮助那些缺少财富的人的道德观念。然而，对于霍曼斯来讲，最制度性的社会行为和最不制度性的社会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五个基本的心理学命题的运用和详析来解释。

交换理论和权力问题

在简单的社会交换例子中，我们可以设想友谊必须是对等的。例如：一个人买东西，东西拿到手，又付了钱，就被设想是平等价值。同样，其他的社会关系也常是对等的，具有近似同等价值的礼物交换，社会平等之间的友谊模式，或者公平的劳资交换都是例证。

然而，很明显，在现实世界中，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对等的，社会学家充分意识到一个建立在权力和权威基础上的分层体系。霍曼斯用"最小利益原则"这个术语来解释权力和权威的起源，这个原则是：在持续的社会情景中，得到最小利益的人最能为合作指定条件。这个原则是从对某个参与者的权力中产生的，因为"在交换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报酬的能力要大于对方向他提供报酬的能力"。① 约会关系可以用来证明最小利益原则。家庭社会学家已经观察到，在一对配偶中，那不热衷于保持关系的一方会对支配这种关系有更大的发言权。一个与有名望的足球名星约会的不好看的姑娘是顺从的，她羡慕名星的某一方面，而她所羡慕的方面对漂亮的校园女皇来讲则并不合味。在这个关系中，足球名星可以获得权力，决定约会的次数和他们参加活动的性质，甚至开始按他的

①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74页。

时间来决定他的姑娘做什么。在这个关系里，当他的未婚妻从与他的约会中获得名声时，他获得了关系中的权力地位，这样的不对等关系明确地是面对面联合的一部分。

在正式组织里，不对等关系可以通过强制性权力来保持，强制性权力表示不平等的交换，这种状况与非强制性交换一样是受交换命题支配的。霍曼斯认为，当关系建立在公平交换基础上时，没有任何强制的需要。但是，即使在权力是强制性时，交换也是明显的。在美国，奴隶制可以被看作奴隶主用来对付奴隶的强制性权力，不平等交换也是明显的。食品、避难所和服装都被用来交换服务，虽然这样的交换与被报答的服务并不相等。

霍曼斯相信，有一个向权力平等化发展的趋势，强制的产生只是例外，不是人类关系的法则，这可以通过社会中的分层体系证明，这种体系以经济和地位为基础排列群体成员。[①] 被给予较高地位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提供的大多数东西是需要而又难得的，他得到的大多数东西则是丰裕的。[②] 在群体内，各人地位的差别往往得到群体成员的同意，他们认为，有些人除了有为群体需要的、愿望的资源外，还有一些非常难得的资源。在交换这种难得的资源中，提供者被其他成员给予较高的地位。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种地位法则的简单例子，它是以经济的供求法则为基础的。摇摆歌手在音乐会演出并把他们的歌曲剪辑录音，他们交换到的是获得极高的薪水。按照霍曼斯的法则，他们得到高地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稀有的商品（娱乐以及其他可能同样的潜在功能)。摇摆乐明星得到的钱在社会中是丰富的(如果不是这样，学生就不能换到使明星富裕的录音和听音乐会)；参

---

①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75页。

② 同上，第195页。

加音乐会的年轻人得到了娱乐，这种娱乐实际上只能由几个上层群体提供。大概，超级名星还有些事情，即地方摇摆乐队为大多数没有摇摆乐队的大学演奏。这个同样的原则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中更为制度性的地位状况。

社会中人们的关系及其地位排列应该依据霍曼斯所说的分配公正性。在社会的互动中，人们都期望得到与付出的代价相应的报酬。如果人们不能按照公正性得到相应的报酬，就会在报酬分配方面出现一种不公正或脱节的现象。霍曼斯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交易的满意与否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相对剥夺或相对得益。是否把这种交易看作是公正的、令人满意的，取决于一个人的比较群体。我们可以继续把摇滚乐团作为例子。例如在一个星期五晚上的舞会上邀请一个本地的摇滚乐团，并付给这个群体 200 美元。在下一个星期五，邀请了另外一个本地摇滚乐团，并付给 150 美元。这第二个群体就会把第一个群体作为比较的标准，并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实际上第二个群体的演奏水平是不是达到第一个群体的水平，倒并不是很重要的。霍曼斯将有关比较群体的一般性规则概述如下：

> 一般性的规则似乎是，人们倾向于更多地与和自己联系较紧密的、比较相似的人进行比较，而较少与和自己比较疏远的、不太相似的人进行比较。他们首先与人进行比较的人，就是与人进行直接的个人性交换的人。①

霍曼斯在这本书中所进行的许多讨论，都是以对面对面互动的研究为基础的——这种互动可以称之为准制度(subinstitutional)性互动。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正式化的，但霍曼斯相信，制度就是由这当中产生出来的。霍曼斯并没有将很多的精力用于形成宏观社

①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 252 页。

会学理论，这种宏观社会学理论涉及对制度的分析。正如他在《人类群体》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霍曼斯一直认为，对小群体中微观过程的了解，可以使社会学家更好地了解大规模的组织乃至于整个文明。在霍曼斯看来，后者是分析基本社会行为时得到的原理的伸延。

对行为—交换理论的批评

从关于人的性质的假设来看，霍曼斯的许多观点都是与结构功能主义者相一致的。对于这一点，霍曼斯关于人的形象是，人既是理性的(目标取向)，也是由他自身之外的力量决定的。实际上，霍曼斯自己承认，理性或目标取向的理论与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基本是相同的，因为社会科学都分享了一些一般性的命题。但霍曼斯认为，“理性理论”的局限性要远大于行为心理学：

> 虽然(理性理论)认识到了感觉的重要性，并认为人是理性的，是根据他自己的感觉行事的，尽管他人会了解得多，而自己的感觉可能是错误的。但它把感觉看做是既定的，并没有象行为心理学那样把它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它也把个人的价值看作是既定的，并没有将其与剥夺、与学习新价值的过程联系起来。①

在霍曼斯看来，虽然人是理性的，但他们并不是在“选择的幻觉”之下行事的：“我之所以讲幻觉，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完全被决定的”。②霍曼斯承认，我们总是有一种自由意志的幻觉，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条件。但在现实性上，人们都从属于支配自然科学界的严格的、决定性的规

① 霍曼斯，《社会科学的性质》，第39页。

② 同上，第103页。

律。

霍曼斯说，他的人类模型是把人看作使用利益资源的"新的经济人"。与过去的经济人不同，过去的经济人是"反社会的、物质主义的，只对钱和物品感兴趣，为了得到这些可以出卖娘老子"，① 而新的经济人所希望得到的价值则可以包括从利他主义 (altruism) 到享乐主义。在他们为了获得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又不浪费他们的资源时，其行为就是经济性的："但实际上，如果他为了获得报酬时并不是节约地使用他的资源，或者他并不为将来考虑，并依此行动，他的行为仍然是经济型的。实际上，新经济人并不是一种完人。"②

所以预见到，霍曼斯对人的看法不可能不受到批评。他的基础就是斯金纳的狭隘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很少能认识到人的不同于动物的性质。正如艾克在分析霍曼斯对人的看法时所指出的：

> 在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中有一种痛苦的矛盾，即霍曼斯相信他是在论述心理学——行为心理学——问题，把人作为人，作为人类的一员来研究，但这种心理学的原则则是从动物行为中得到的。更明显的是，霍曼斯没有抓住人当中最根本性的东西：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的行为并不一定与他的过去相联系，尽管过去可以为他们计算将来提供可能性，但他们可以根据现时的好处行事。③

对霍曼斯"经济人"的另一种批评主要是针对他的这种假设，即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公平的"，或者说都是依据分配公正性的

① 霍曼斯，《社会科学的性质》，第 79—80 页。

② 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第 120 页。

③ 艾克，《社会交换理论：两种传统》，第 120 页。

原则进行的。[①] 这些批评者认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趋向于平等交换的系统的看法是不真实的。这些批评者似乎认为，霍曼斯对权力和公正性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奴隶制、低于标准的工资、福利难道可以用交换的原则来说明吗？许多社会学理论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霍曼斯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于他关于人是理性的、被决定的看法。在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上它不同于传统的功能主义的观点：(1) 社会的本质；(2) 功能需求或先决条件问题。在霍曼斯看来，社会并不能离开处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人而存在："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制度、组织和社会完全可以分解为人的行动。"[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观点被指责为心理学还原论。还有一点是与结构功能主义者不同的，就是霍曼斯拒不承认社会群体或系统有自己的需求："有需求的是人而不是社会，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假定有这样的需求存在，我们就会远离关于人类的真理。"在霍曼斯看来，成为社会学分析单位的是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群体。

霍曼斯对理论的许多看法是与其他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相一致的。他强调定义概念、从这些概念中构造命题式的陈述、以及将命题互相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因此，霍曼斯相信，科学的整体将对社会现实提出最终的解释原理。他自己的著作就已证明，他在努力将经济学和社会学与行为心理学结合起来，从而为解释提供一个基础。因此，自然主义理论的目标是解释现象，而不是简单地描述现象。霍曼斯认为，行为科学的统一解释原则可见之于斯金纳

① 进一步的讨论见吉特林《社会学的反思》、辛尔曼《作为象征互动的交换：两种理论观点的趋向》、图尔克与辛普森《制度与社会交换》。

② 霍曼斯，《评论》。

的心理学之中：

> 我相信，这些命题——虽然只是一门社会科学即心理学的学术财富——可以对解释提供最概括性的命题。不仅从研究对象即人类行为的意义上说，就是从对人类行为的概括性命题来说，社会科学也是一门科学。①

其他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并不愿意将社会学还原为心理学的解释。这种心理学还原论很令一些社会学家反感，这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现象具有整体效应，有其自身的性质。这些性质不能还原为心理学的解释(在下一章中要讨论布劳，他也是一个交换理论家，他就批评霍曼斯没能认识到社会结构的整体效应原则)。霍曼斯还原论观点的缺点是，从逻辑上说，心理学还原论将意味着社会学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样一来，尽管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信息交流对更充分地了解社会中的人是有益的，但如果将社会学还原为心理学的原则，这两个学科中的人都不会对此有兴趣。

摘　　要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的，结构功能主义优先强调的是作为社会学分析单位的社会结构。其结果是，个体行动者的重要性受到贬低，以适合于结构分析。在霍曼斯的早期功能主义著作中他就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分析的。在《人类群体》一书中，研究的是产物(product)或人类互动，而不是结构得以形成的过程。

但霍曼斯最终还是摆脱了由功能主义所提供的简单描述的作法，而转向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理论。他认为，这种行为心理学理论

① 霍曼斯，《社会科学的性质》，第43页。

具有解释的力量。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努力把个人带入社会学分析中去，用行为去解释社会结构。虽然霍曼斯是用行为命题来补充他早期的功能主义概念，但他在形成命题并在唯一的社会交换理论内将其互相联结起来方面走得比默顿更远（默顿并没有努力形成命题性的理论）。

在霍曼斯看来，人类行为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和报酬的经济目标。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强制性的权力、分层、权威以及其他的不平等，都可以按交换这个术语进行分析。霍曼斯认为，交换原则提供了传统的功能主义理论所缺少的解释的能力。

虽然霍曼斯的努力在社会学中被广泛接受，但他的著作也受到了批评。较重要的批评包括这样的一些看法，交换理论并没有涉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它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社会群体的整体效应性质，它受到心理学还原论的损害。

虽然霍曼斯认为他的交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制度和准制度层次的行为，但他的理论基本上是处于准制度的、微观层次上的。下一章要讨论的交换理论家布劳的工作则是将霍曼斯的理论扩展到去解释更大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效应。

第四章　交换结构主义：对行为交换理论的超越

在由简单的社会过程推导复杂过程时，以及在一般性地研究社会结构的时候，必须避免两种危险——过分远离可观察的经验现实的斯库拉（Scylla）和忽视具有整体效应的社会和结构性质的还原论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

引自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虽然交换理论已经很明确地作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一种特殊的观点出现了，但在它内部，并不是没有分歧的。正如爱默生在回顾社会交换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在交换理论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的这些争论和区别，与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同样重要的。①

霍曼斯和布劳（P. BLau）已经对交换理论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虽然布劳似乎是把霍曼斯的行为心理学作为他的著作的基础，但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布劳和霍曼斯的分歧要大于他们表面上的共同点。霍曼斯的理论，倾向于心理还原论，这种理论认为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将导致对所有群体行为的解释。而布劳则警告社会学家注意还原论的危险，"这种还原论忽视社会和结构的性质"。布劳强调群体的整体效应性质，而这种性质是不能被还原为个人取向的心理学的。正是这一点使得艾克把布劳的著作称之为

① 爱默生，《社会交换理论》，载《社会学年评》第2卷，第335页。

“集体结构主义的论著”，是与霍曼斯的“个人行为理论”不同的。①

虽然布劳赞扬霍曼斯对研究微观理论所做的努力，但他对霍曼斯的还原论倾向进行了批评。布劳认为，这种理论不能对从微观社会到宏观的或大规模的复杂组织进行概括。布劳认为，微观结构是由进行互动的个人组成的，而宏观结构则是由互相联系的群体构成的。虽然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在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布劳观察到，小群体可以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义务维持社会控制，而整个国家则不能。这些很复杂的、有组织的团体，需要正式的程序和强制性的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②因此，布劳虽然承认交换过程的重要性，但他也对更好地理解复杂组织的功能发挥感兴趣。

布劳感到，社会学中的还原论妨碍社会学家充分地处理象权力和分层这样的重要现象。布劳不同意霍曼斯这样的观点：这些重要现象可以用有关交换的行为心理学原则加以理解。而在另外一个方面，许多试图涉及这样课题的理论家，却已经成为那“远离可以观察的经验世界的抽象概念的斯库拉的牺牲品”。在这些宏观理论家集中研究还原论者所忽视的课题的时候，他们又在微观社会学家所研究的经验性的社会状况中迷失了方向。布劳在他的理论中想要做的，就是利用微观社会学中的交换概念，把它与已经成为宏观理论研究课题的权力概念结合起来。这个努力的结果，可以发现于布劳的经典性理论著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

① 文克，《社会交换理论：两种传统》。

②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1 页。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布劳在开始的时候就接受了由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而由社会交换理论家霍曼斯进一步讨论的社会交换的基本心理学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个人互相吸引及他们期望得到各种类型的报酬。而在布劳的理论中，对于社会报酬的期望是“给定的”，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结构的起源。在回答“是什么东西吸引人们去交往”的问题时，布劳的答案是，“个人由于期待内在的或外在的报酬而被吸引到交换中去”。①

布劳承认，虽然大部分人类行为是以对于社会交换的考虑为指导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这样。他分清了使行为变为交换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1)这种行为的“取向必须是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才能实现的目标”；(2)这种行为“必须采取可以获得这些目标的手段”。② 这些想获得的目标可以是“外在的报酬”(比如钱、商品、服务)，也可以是“内在的报酬”(包括对爱、荣誉、职务、美的追求)。以社会交换原则为指导的人类行为，是形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到此为止，霍曼斯和布劳的理论还是一致的；但布劳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霍曼斯所强调的微观理论。布劳和霍曼斯都同意，小群体中的个人是由于期望得到各种报酬而被吸引到相互交往中去的。但是，尽管交换可以成为小群体中的取向原则，但大组织中活动的进行就不能被还原到这种心理学的水平。布劳则对大组织感兴趣并坚持整体效应原则，这时，他离开了霍曼斯。布劳理论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过程中的变迁，这种变迁发生于社会结构从简单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12 页。

② 同上，第 5 页。

到复杂变动的时候，这种理论也关心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①

与小群体中的关系不同，在复杂的群体中会形成一种分层系统。从这种现象中，可以找到布劳理论兴趣的根据。虽然想得到报酬的愿望是吸引人们参加交换的最初步的条件，但整体效应现象的种子也就播下了；简单的分层系统就是这种整体效应结构特质的一个例子。在人类群体形成的最初阶段，个人都试图表现他对于群体的价值。后来由于这些成员对于群体所作的贡献不同，地位分化便开始出现。比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并且愿意担负群体的领导责任，如果群体成员都是致力于群体的目标，并从中得到报酬的话，一些人将退回来，允许其他人承担这些职务。而领导者则用他们所做的贡献来进行交换，以获得尊重、权力或者是物质报酬。但是，当分化发生时，它就提出了对不平等的地位进行社会整合的需要。这种对于凝聚的需要往往是这样得以满足的，即大部分群体成员“从对于地位的竞争中退出来并在相互间建立起伙伴关系”。这种凝聚力是必须要有的，它在群体追求他的目标时加强这个群体。虽然可以用这个过程来对分层系统的形成进行解释，但分层系统一旦建立，它就是用权力关系而不是用社会交换来维持的。

布劳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交易都是对等的、都是以平等的社会交换为基础的。很清楚，人际关系既可以是交互的、也可以是单方面的。只有在存在对等性，即两个或所有成员都可以用付出的代价换取对等的报酬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讲这是一种交换关系。至于分层系统，那只有当这种关系无论是对处于上层的成员还是对处于下层的成员都有好处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讲这是交换。但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1 页。

在实际上，这种对等关系可以被强制性的权力所取代，地位较低的成员只能得到较少的报酬。强制性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存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用消极的惩罚手段来维持的。因此，强制性权力代表了一种不能用交换的心理过程充分加以解释的"整体效应"的现象。

正如存在着一个从基本上依赖于社会交换到基本上依赖于群体中的权力关系的转变一样，在群体所使用的惩罚方法上也有一个相同的变化。虽然社会赞赏在所有社会中都是一种重要的报酬，但在复杂群体的各种各样的强迫人们行为的手段中，它的作用就显得很有限了。布劳观察到，在复杂的社会中，所有的越轨者都有他们的小群体，以避开社会中对他们的指责。正如布劳所注意到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非个人性强制是特别重要的，而非个人性强制的一个基本来源就是权力"。① 布劳的理论工作主要是从宏观社会学角度对权力进行研究，而不是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交换现象。

1. 权力的分化：

布劳在韦伯学派的意义上把权力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在即使遭到反抗的情况下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的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或是通过停止供给报酬的威慑，或是使用惩罚的手段，而这两者在效果上是一样的，都是造成一种消极的惩罚"。② 这样，权力就被看作是通过消极惩罚形成的控制，而肉体强制——或威胁——则是权力的极端形式。

布劳把艾默生考察"权力——依赖"关系的框架作为分析群体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114 页。

② 同上，第 117 页。

之间或群体内部权力不平衡的基础。那些需要别人服务的人可以用如下方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1. 他们能够提供给他一种他迫切需要的服务，这种服务足以促使他反过来再向他们提供服务，尽管只有他们才有要求这样做的资源。这将导致对等的交换。

2. 他们可以在别处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假定存在着其他的供应者)，那将导致对等的交换，即使建立的是另一种伙伴关系。

3. 他们能强迫他供给服务(假定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假如发生了这种强制，那些能够确保得到服务的人将形成对服务提供者的统治。

4. 他们可以学会不用这种服务或寻找其他替代物。①

虽然以上每一种方法都有大量的例子，但我们这里假设一个同物价上涨进行斗争的个体消费者做为例子。几年来，消费者琼斯一直在与他附近的一个服务公司进行他认为是对等性的交换。他从这家公司得到暖气，并付给公司报酬。但是，由于物价的提高，使得他对这种交换重新进行评价。他得出结论，这种交换是不公平的。这时，他就要考虑他的选择。假如在他周围的地区内有另一家公司与原先的那家公司竞争，琼斯将借助那个竞争者与原先的公司商议一个更公平的、对等的交换。假如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的公司存在(即不存在其他的供应者)，消费者琼斯很清楚地将处于一种依赖的地位，他将被强迫付给较高的报酬，要么就会面临暖气供应中断的局面。摆脱对这家公司依赖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不再需要暖气或找到替代物。比如，建造一个地下室，或用他自己的木材来取暖，这都是寻找替代物的例子。

这四种可以替代的方法表明了对于需要某种服务的社会依赖

---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118 页。

的条件。假如那些愿意得到服务的人不能具备上述任何条件(这些条件表明了他们对供应者的独立性),他就丧失了选择权,他就要答应服务提供者这样的希望,"他可以视对方是否顺从来决定是否提供对方必需的服务"。① 这种对于提供者的依赖性,使得提供者处于一种有权力的地位。提供者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地位,就必须阻止这种服务的其他提供者。② 因此,分化可以看作是商品短缺的产物。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分层系统的形成,也就是将人们按权力基础进行排列。

虽然强迫人们服从命令的能力是权力的最终形式,但这样的权力是很成问题的。由于权力的使用往往招致反对有时甚至招致顽强的反抗,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冲突最好保持在最低限度内。社会要稳定地发挥功能,重要的是下属要按日常职责办事,并愿意服从占据权力位置的人的指导。有权力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缩小他们权力的强制性,将是明智的。消费者琼斯的服务公司可以更好地缩小权力的潜在性,并使琼斯和其他消费者相信(也许是通过作广告),能源是便宜的。

2. 群体中权力的合法性:

布劳认为,"只有合法的权力才能得到自愿的服从"。③ 合法权力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权威。群体一般都自愿地接受合法的权力或权威,这样,权威就可以成为约束群体成员的手段。比如,美国政府的执行部门实际上有通过中央情报局侦察美国公民的权力。但它没有进行这种行动的权威。福特总统认为,这种做法一旦被发现,他还将继续进行这种活动,他要对这种活动进行保护,并对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118 页。

② 同上,第 121 页。

③ 同上,第 200 页。

反对意见进行解释。而美国人民则接受了总统具有否决国会的议案的权力，任命幕僚的权力和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力。这些权力是由宪法规定的，可以看作是合法性权力或权威。

权威依赖于集体中规定行为的共同规范或规则。这些规范强迫人们去执行管理者的命令。这些规范被群体成员所内化并由他们实行。公民承认议会制定法律的权力，工会成员接受其领导谈判协议的权力，学生则承认教师打分的权力。人们在社会化中接受现存的规范，这些规范支配着下属和上级的行为。布劳认为"作为制度化权威基础的规范标准，并不是在上级和下属，或下属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而是产生于社会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被迫接受一种共同的文化"。① 换句话说，在我们经过社会化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接受权威。

但是，运用权力或权威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布劳发现了一种"领导两难境况"，即它既要求拥有对他人的权力，又要求他人对这种权力的赞同。这种两难境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获得权力的过程与获得赞同的过程是矛盾的。一个人可能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惜在下属之中造成怨恨，这就使得他丧失了社会对他的赞同。而在另一个方面，假如一个人过分关心社会的赞同，他会难于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因为这种对社会赞同的过分关心将把这个领导者置于由他的追随者控制的地步，而不能进一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渴望成为一个领导者的人，倾向于用轮换使用能赢得他的支持者的赞成的方法运用这种权力以解决这种两难的境况。

那种使用适度并能给服从者带来足够的利益以作为回报的权力是理想的。这种权力会得到社会的赞同，并使它的命令具有合法的权威。假如权力是压迫或剥削性的，则会导致不赞成，甚至引

---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211 页。

起报复。当一个被压迫的群体的成员表达他的愤怒的感情和敌意的时候，在群体内部就会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这个群体，就会形成一种反对压迫和剥削他们的那个群体的意识形态。

权力是被承认为合法的还是遭到反对，部分地将依赖于那种支配着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系的标准或规律是个别性的还是普遍性的。布劳把这两种价值观念定义如下：

> 个别的标准是指仅仅被内群体承认是有价值的地位特质，比如宗教、政治信仰；相反，普遍性的标准则是无论拥有它还是不拥有它的人都普遍认为是有价值的特质，比如财富、能力都是。①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作为普遍性标准的财富，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是愿意得到的。健康、美和成就也是普遍愿意得到的。相反，对浸礼的宗教信念，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不愿意拥有。民主主义者不愿接受共和主义者的价值观念。这些群体所具有的价值观念和规范都是特别的，只为个别的群体所愿意拥有。

虽然某些内群体可以共同具有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但在这些群体之间，还会由于某种个别的规范而发生冲突。因此，一个群体可能赞成某一个个别性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却是与其他子群体的目标相对立的。近年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个原则。直到 1973 年 1 月以前，堕胎的要求在美国大部分州还是非法的。这种认为堕胎是非法的普遍性价值观念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改变这种情形的力量也在工作，其中的两股重要力量就是，妇女运动和对在一个资源正在减少世界中人口过剩的关心。

由于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在怀孕的早期阶段堕胎的法律是不符合宪法的，这导致了有着对立的价值系统的两个群体的不断斗

---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13 页。

争。这两个群体一方是赞成自由法的人，比如，计划生育和全国妇女组织，另一方则是那些反对堕胎的人，比如“出生权和生活权组织”。当提出修改宪法以制止合法的堕胎时，反对的意见仍然存在。要想通过交换过程使这两个集体的价值观念统一起来是不可能的。是权力而不是交互性交换决定哪一种对于堕胎的立场将变成普遍性的价值，哪一种立场将成为个别的价值。

这个内群体的例子也形象地说明了“整体效应”原则，而这个原则在布劳的理论中则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群体成员资格按共同同意的价值和规范而定。虽然交换可以充当初级个人互动的基础，但只有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才能充当社会群体和组织的社会交易的媒介。这个原则也可以使结构能够在个人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并能长时间地进行这种活动。在个人的友谊中，要分析内在报酬和外在报酬的直接交换是比较容易的。而分享的社会价值观念才是理解较大社会集体中的交换和权力的关键。

布劳指出了四种类型的媒介性价值观念：

1. 个别性的价值可以充当社会联系和凝聚的媒介。它帮助创造一个共同体以代替个人的感情吸引。同时，这种个别性的价值也会导致在一个大集体中的子群体的形成，这可以用无数的例子来证明，如为枪支管制法而积极努力的群体和全国来福枪协会，女权组织成员与非女权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

2. 有关社会贡献和成就的普遍性标准产生分层系统。在这里，地位成为一个使间接的交易成为可能的报酬。那种高级政府职务赋予它的占据者的地位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轻视一个可以赚钱的职业或法律业务而情愿担任挣钱较少的参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总统的现象。为国家服务这样一种普遍性标准为那些个人提供了社会地位。

3. 合法的价值充当运用权威的媒介，并充当大规模地追逐集体目标的组织的媒介。权力必须加以合法化，必须被群体成员承认是合法的。它必须被认为是为获得群体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4. 人们所持的反对意见是重组和变迁的媒介，因为这些意见鼓励对于反对运动的支持，并使这种运动的领导合法化。那些不满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活动的人关于建立"第三党"的议论，就是一个例子。①

布劳相信，由共同价值调节的复杂的社会生活模式正在变得制度化。假如以下三个条件具备了，这样的制度就可以世世代代存在下去，这三个条件是：(1)组织原则必须成为正式化的程序的组成部分，以便使其不依赖于在某一时间内执行它的人而存在。(2)那些赋予制度形式合法性的社会价值必须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传到下一代。(3)社区中的统治集团必须与那些价值相一致，并用权力支持表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反共的美国不愿允许美国共产党的存在，而反宗教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能够允许那些已经存在、并且不惹麻烦的宗教存在。即使在一种制度已经具备了前两项条件，但如果这个制度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也必须由统治集团提供支持。

在概括了布劳关于群体的整体效应的讨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主要思想。首先，在基本的交换关系中，人们是由相互的需要和满足形成互相吸引的。这里就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即那些给予报酬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付给得到的价值以回报。第二，这样的交换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竞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要显示自己能提供的报酬，从而给对方造成印象，而自己又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报酬。第三，这种竞争形成分层系统，在分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280 页。

层系统中，个人以他们所拥有的稀有资源为基础开始分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权力的整体效应概念的根源。第四，权力既可以是合法化的(权威)，也可以是强制的。权威是以合法性价值为基础的，这种价值使得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和组织能够不依赖于亲密的面对面接触而进行活动。群体成员承认群体需要、目标以及个人之间交换的可靠性。相反，强制性权力的使用则往往伴随着问题，特别是伴随着互相对立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虽然布劳深受功能主义和交换理论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并未因此受到损害。在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他使社会变迁成为他的理论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变迁的辩证力量

尽管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广泛影响，但布劳的理论证明他认识到了包含于结构中的动态过程。在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恒久的调适与反调适，它可以在社会交换的辩证模式中得到表现"。①这些辩证的力量可按以下的术语进行考察：(1)进退维谷，(2)分化，(3)动力学，(4)辩证的过程。与大部分忽视社会动态过程的功能主义理论不同，布劳把社会变迁的理论融合到了他的模式之中。

1. 进退维谷：

在布劳的理论中，纯粹的社会交换模式就是外在报酬的对等交换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对对等性和外在报酬这两个因素进行修改，从而形成一种仅仅以权力为基础或者是以爱、满足等等的内在报酬为基础的关系。因此，布劳认为，实际的交换与纯粹的模式会有一定的偏离，这种交换可以看成是一种混合物。在这种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14 页。

交换中，伙伴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互相冲突的利益。

除了混合式的竞争造成的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外，还有三种可以对社会变迁造成影响的“进退维谷”的局面。首先，虽然合伙者在维持他们的关系上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在报酬贬值之前要提供多少报酬上却存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虽然愿望是维护关系（这要求报酬的交换），但在同时，如果太容易或太频繁地给予报酬，就会使它的价值降低，这也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比如，一个不轻易表达爱情的男人表示的爱情，或一个很少对别人表示赞赏的人所表示的赞赏意见，就有较高的价值。另外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由于社会行动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为获得一个目标所必须的行动却可能会妨碍另一个目标的获得。领导的“进退维谷”就体现了这个问题，在那种情况中，获得社会赞赏与运用权力就处于矛盾之中。

布劳认为，个人在非结构性情境中的“进退维谷”状况会产生地位的分化。这种分化虽然可以解除一些进退两难的局面，但同时又产生新的变迁的辩证力量。①

2. 分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交换理论家认为，对于稀有资源的竞争将导致这种资源的有差异的分配。这种稀有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根据集体中不同的成员对集体所作的有价值的贡献而定”。② 由于拥有的稀有资源的不同，有特权的领导位置就会出现。领导者通过劳动分工分派任务，以进一步促进这种分化。因此，具有整体效应的领导者能够在权威或权力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20 页。

② 同上，第 321 页。

3. 动力学：

分化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互相反对的力量导致了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权力可以适度而公平地运用，以使这种权力适于其他人继续处于他们的保护和影响之下。但是权力也可以导致压迫。当人们处于不公平、压迫性的权力之下的时候，就可能产生一种向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进行挑战的反对行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冲突形成的根源，合法的价值遭到反对。

4. 辩证法：

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称之为辩证法。虽然在社会结构中对等性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是似是而非的是，"对等性也同样包含着一种与他人的不平衡"。①因此，可以说，社会力量具有互相矛盾的意义。比如，改正我们社会中对少数群体的错误做法，就是一个例子。假如对少数群体成员(比如黑人或妇女)在工资或提升方面给予优先的待遇，这就可能导致多数群体成员的强烈反对，他们也在为同一稀有资源而进行竞争。同时，如果把黑人或妇女从劳动力队伍中排除出去则会导致代表这种少数群体的集团的反对。

布劳承认，由于既有利益和权力、传统的价值、已经建立的组织和固有的制度的反对，社会变迁是缓慢的。静态的力量和反对社会变迁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但是，在新的需要和新的问题产生的时候，这种社会变迁的辩证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从而形成结构性重组。

---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336 页。

对布劳理论的批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在许多方面是以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为基础的。但是，尽管他们研究的课题都是小群体中的个人交换关系，在其对于社会的假设上，两者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正如艾克所说的：

> 他们（布劳和霍曼斯）都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结构都产生于基本的社会交换过程。但霍曼斯坚决认为，在其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它独立的规律。而在另一方面，布劳却提出整体效应的概念，并由此认为，社会结构一旦从基本的社会交换过程中产生出来，它就获得了一种自主性，它有独立于它所由产生的原始过程的自己的规律。①

因此，布劳的理论虽然是以霍曼斯关于交换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他却不愿接受霍曼斯这样的观点，即所有的社会过程都可以还原为心理学现象。② 但解决整体效应和心理学还原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正如霍曼斯所说的：

> 问题恰恰在于怎样对整体效应进行解释。布劳似乎认为，整体效应现象需要用新的命题来进行解释，但实际并非一定如此。我相信，整体效应过程以及在社会互动中整体效应的事物的性质，可以用解释非社会行为的一般性命题来解释。③

霍曼斯和布劳关于社会结构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他们假设的分歧。但两种假设都不能证明他们的观点。布劳关于社会结构的

① 艾克，《社会交换理论：两种传统》，第 180 页。

②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 193 页。

③ 霍曼斯，《评论》。见图尔克和辛普森编《制度与社会交换》，第 363—379 页。

整体效应性质的看法避免了心理学的还原论，并赋予社会学以一种特殊的对象。毫无疑问，与霍曼斯的心理学还原论相比，布劳的观点更符合社会学的传统，更容易被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接受。

布劳对于人的看法与其他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与霍曼斯对人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布劳要比霍曼斯更强调社会交换行为的经济基础，但却忽视霍曼斯所强调的行为心理学。正如艾克所指出的，在布劳看来，人的基本动机是经济动机(即用认真计划的行为获得利益或其他收获)，他要使用的是人的模式，而不是以动物行为为基础的模式。①

与其说布劳关于人的看法接近交换理论家霍曼斯的看法，倒不如说更接近帕森斯或默顿的看法。虽然布劳是按照传统的"利益"和"获得"概念看待经济动机的，但霍曼斯的理论中却蕴含着这样的意思：所有的理性行为都可定义为"经济性行为"，经济模式适用于所有的行为。根据帕森斯和默顿的看法，布劳相信，人们都是按照理性追求特定的目标的，但目标的获得却要受到社会结构中制约因素的限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权力是特别需要加以考虑的现象，它不能被还原为纯粹的交换模式。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目标，但必须是在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布劳关于社会的看法是与经典结构功能主义相近的。布劳把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看法归纳如下：

> 我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是从对它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进行简单的、具体的定义开始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就是人组成的群体或阶级，如男人和女人、种族群体或社会经济阶层；这都是人们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中的位置。在这些部分内部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结就是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们的社会关

① 艾克，«社会交换理论：两种传统»，第169—170页。

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他们的社会互动和沟通过程之中。①

虽然布劳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不太相同，但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在结构功能理论中，社会结构是"既定的"，并没有对它的发展给予足够的理论上的注意。在布劳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结构是从社会交换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整体效应现象。

布劳的理论虽然从社会学的角度改进了霍曼斯的还原论，但也遭到一些批评。布劳理论最大的弱点是它依赖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人类行为是以交换为指导的。②这种过程是"既定的"，不能进行充分的证明、证实和解释。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关于交换在社会关系中重要性的前提，他就会追随布劳的理论。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个前提，要接受他的整个理论是不可能的。

还要注意到，布劳的社会学立场要比霍曼斯更为坚定，他力图去分析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集体内部的差别。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艾森斯达特就批评布劳没有对人际交换、制度行为和组织的区别进行充分的分析。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布劳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差别，但他却没有对这些差别进行深人的分析。

布劳的著作尽管有这样的缺点，但在社会学理论中是半经典性的。由于他把权力和压迫看作是社会现象，它超越了传统的功能主义。它没有静态功能理论的局限性。布劳试图使读者注意到

① 布劳，《社会结构的参数》。见布劳编《研究社会结构的途径》，第 220—253 页。

② 对此的进一步讨论见贝尔斯塔特《对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的批评》（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0卷第 789—790 页），以及辛普森的《社会交换理论》一书。

③ 艾森斯达特，《对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的批评》，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71 卷，第 333 页。

社会结构建立和维持的动态方面。因此，布劳的分析既不仅仅是微观的，也不仅仅是宏观的，他既关心微观的社会也关心宏观的社会；他力图证明怎样才能把某些基本的原则既应用于微观也应用于宏观现象。他的理论的这些方面毫无疑问要比那些不足更为重要。

提　　要

在作为社会化基础的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布劳分析了结构和集体动力学。由于要在读者面前展示出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两个层面，布劳强调，在小的关系紧密的小群体中的社会行为与复杂组织中的社会行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布劳认为，交换的原生类型是有关外在利益的互惠交换。但在实际的关系中，这种原生类型中的每一个方面——互惠性或报酬——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象以单方面的服务为基础的权力关系中，就会缺少或完全没有互惠。

在布劳看来，交换是大部分社会关系的基础，但是，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的交换与复杂的社会组织中的交换之间是存在差别的。这些差别主要有如下三点：

1. 在面对面互动的团体中，交易是直接的；而在大的集体中，社会价值对调节复杂的结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2. 复杂的结构部分地是制度化的。"这种固定的制度因素对社区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施加传统性的影响"。① 而面对面互动的团体并不拥有这种稳定的制约力量。

3. 面对面互动的团体是由个人构成的；大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结构。

---

①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282页。

虽然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是相当一致的，但它要比经典功能主义更加注意社会变迁的现象。布劳提出了社会变迁的四个组成部分或四个方面，即：进退维谷、分化、动力学和辩证过程。当社会变迁的力量面对稳定的力量的时候，结构重组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布劳使交换理论脱离了心理学还原论并纳入社会学的领域，这就使交换理论可以成为分析复杂组织中的交换和权力的基础。但是，他的理论很明显地依赖于这样一种前提，即大部分人类行为是以交换为指导的。对于那些反对这个前提的人来说，布劳的理论是一种非凡的思辨的产物，但却缺少可靠的基础。

第五章 冲突结构主义(一):用冲突维护结构

社会心理学忽视外部现实的存在，这种现实限制着个体行动者的驱动和愿望，并退而主要关注于个人的认知、感觉和主观表达。如果我们不想屈从于社会心理学的话，就不得不转向马克思、齐美尔和杜尔克姆的遗产，这些遗产告诉我们，个人的内驱力并不能使我们逃离社会制约的掌心。

无论如何，我赞成这样的一种观点，即结构分析虽然是重要的，但还是很不够的。完全关注于结构因素将导致有意无意的对社会过程的忽视。我手头的一些具体的例子似乎可以表明，结构因素并不是直接对社会行为起作用，而是要以社会互动的过程作为媒介，而冲突则是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社会互动并不只是由冲突构成。

引自科塞«结构与冲突»

20多年来，科塞(L. A. Coser) 一直献身于研究社会学中强调社会结构的流行模式。但同时，科塞也指出这种模式常常忽视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与那些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作为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的社会学家相反，科塞致力于探索把这两种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的可能性。科塞承认有些结构的形成是结构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认同和一致的结果，但他也指出社会群体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另一个过程，即社会冲突。

在研究美国早期理论家的时候，科塞注意到他们承认冲突的

存在，这种意识反映在他们改革社会的精神之中。①比如斯莫尔和温森特这两位著名的美国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的作者，当他们写道："社会学产生于现代的改善社会的热情"的时候，就反映了社会学的改革倾向。根据这个根本性的取向，冲突被看作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既可以有积极的作用，也可以有消极的作用。

然而，当代的社会学家却经常忽视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这意味着他们把冲突看作对社会群体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科塞决心证明冲突对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维持所做出的潜在的积极贡献。他是在那些关于冲突问题的经典社会学观点，特别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关于冲突问题的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这项工作的。

象齐美尔一样，科塞并不企图建立一种囊括所有社会现象的综合性理论。齐美尔确信，建立一种全观性的社会理论还为时过早，因此，他从来没写过象杜尔克姆、韦伯、马克思那样重要的宏观社会学著作。相反，齐美尔提出社会学要提炼和形成一种可以包括经验世界内容的"形式"或者叫作社会学概念。在研究形式和内容的区别的时候，齐美尔把社会学与几何学进行比较，因为几何学研究的是物质的形式，而社会学研究的则是社会的形式。三角形、正方形、圆都是几何形式。每一种形式的内容，包括形状、颜色、大小、质料等等，都可能是不同的，但基本的形式却可以是相同的。冲突就是齐美尔所讨论的一种社会学形式。冲突是互动的一种形式，它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等等可以是不同的，这正如三角形的内容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一样。科塞接受了齐美尔关于冲突的观点，从齐美尔的著作中形成了一些命题，并把齐美尔的思想加以推广以解释在什么条件下冲突对于社会结构有积极的贡献，而在什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16—19 页。

么条件下会有消极的作用以致削弱社会结构。

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建立和维持的功能

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来说，它可以充当一种手段。冲突能够使群体内部和外部界限得以建立和维持。与其他群体的冲突，可以有助于对群体身分的肯定，它使群体不与它周围的社会相混淆。

冲突的所有这些积极功能都可以在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发生冲突的地方看到。在国际舞台上，这种冲突采取军事行动或谈判的形式。在一个地区，冲突可以产生新的群体并形成结构认同。

而且，与外群体连续不断的冲突还可以使群体成员的身分感得到加强。几年来，战争已经加强了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或以色列人对内群体的认同，加强了北爱尔兰新教或天主教的认同。宗教群体、种族群体和政治群体常常是在面临困扰的情况下得以建立的，因为冲突具有加强对内群体认同的积极功能。

1. 安全阀制度：

安全阀制度是一种机制，它通过运用潜在的社会冲突以维持一个群体。安全阀可以使猛烈的蒸汽不断排泄出去，而不至于破坏整个结构；冲突也能帮助一个动乱的群体"净化空气"。科塞注意到，这样一个安全阀"可以充当发泄敌意的出口"，没有这样一个出口，对手间的关系就会被割断。①

因而，安全阀制度或实践可以使对结构的不满得以表达。一个学生社团或一个教师福利委员会可以作为大学里的安全阀，为学生和教师表达不满提供一种手段。一个公司科层组织的人事处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41 页。

长也可以起类似的作用。好的商店办公室是调节商店与消费者之间冲突的安全阀。这些制度使由冲突产生的"蒸汽"发泄出去而不破坏大学、公司或经济体系。

当安全阀发挥作用以调节冲突时，也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因为人们并不是想通过安全阀产生重要的结构性变迁，因此，基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在大学中处于制订政策地位的，既不是学生社团，也不是教师群体。只是由于大学的同意这些群体才能存在，他们至少是部分地被更大的结构管理和控制的。同样，一个公司的人事处长并不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所有这些机构都是为调节潜在的冲突和间接地阻止冲突群体发展而设立的。然而，这些机构也可以通过冲突而引起变迁。正如科塞所说的：

> 通过这些安全阀，可以阻止敌意反对它最初建立时的目标。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体系和个人都要付出代价：它减轻了改变系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压力，同时，它也控制着个人间的紧张，从而产生了毁灭性爆发的可能性。①

2. 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

在讨论冲突的时候，科塞把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加以区别，现实性的冲突"产生于关系中特定要求的实现受到挫折以及对于参与者的收益的评价，它的目的是要获得假定的受挫目标"。工人反对经理的罢工可以看作是现实性冲突的例子，因为经理掌握着增加工资和提高其他劳动福利的权力。另一方面，非现实性冲突则"不是由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由其中一方发泄紧张情绪的需要引起的"。② 在没有文化的社会中，巫术中的复仇，通常是非现实性冲突的一种形式，而在具有较高文化的社会中，找替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48 页。

② 同上，第 49 页。

罪羊则往往是一种非现实性冲突。在群体之间的关系中，找替罪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不能发泄对真正存在问题的群体的不满，而是把一个替代群体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许多勤奋工作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成员常常对"依靠福利的专业乞丐"表示不满，因为这些人滥用了他们辛勤工作所获得的收人。但实际上，税收的大部分是以津贴的形式或者是间接地通过减税的形式流进了富人的腰包，而以福利援助的形式给予穷人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然而，要同那些领取农田津贴的政治家或那些得到大笔石油贬值补贴的石油企业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于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就把接受福利的人作为反对我们的税收制度的目标。这样的非现实性的冲突是剥夺和挫折的结果，而且，正如我们在这个例子中所见到的，这种非现实性冲突是原来的不允许表达的现实性对立的转移。

当然，也存在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在某些方面存在无法发泄的不满，当现实性的冲突发生时就可能伴随着不正常的感情。比如，一次针对雇主的罢工之所以会表示出很深的敌意，可能并不仅仅是由于雇主与受雇者关系紧张，很可能是由于对其他权威性人物的敌意得不到发泄的缘故。因此，把在其他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攻击性能量积累起来，而在冲突的过程中释放出来，是完全可能的。①

3. 在紧密的社会关系中的敌意：

科塞注意到，没有敌意和攻击性的现实性冲突也是可能发生的。比如，两个毕业于同一个法律学校的老朋友，可能在法庭上分别代表着作为对手的委托人。这种事情就提供了一个例证。在法庭听证期间，每一个律师都认真地保护他的委托人的利益，甚至对对方进行攻讦。但在离开法庭之后，他们就可能忘掉彼此的对立。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57 页。

在一起喝一杯，重叙旧情。这种没有敌意的冲突通常并不牵涉到参与者的整个个性，而只是表示了他们之间一种片面的关系。

但是，在紧密的社会关系中，当冲突已经形成的时候，要保持不动感情，是很困难的。科塞注意到：

> 关系越紧密，感情投入越深，就越是倾向于压抑敌对的感情，而不是把这种敌对的感情表达出来。相反，在次级关系中，比如企业合伙人的关系，敌对感情往往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出来；而在初级关系中，往往不是这样。在初级关系中，由于参与者是全部投入，他们的行为总是避免对他们的关系造成损害。①

矛盾的是，关系越紧密，表达敌对感情就越困难；而这些感情被压制的时间越长，它们的表达对于维持关系也就越重要。由于是全部的个性投入到这种紧密的关系之中，因此，当冲突爆发的时候，就可能更为激烈。

因此，根据科塞的命题，一切事情都是对等的，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冲突没有夫妻之间的冲突激烈。不过在这种紧密的关系中，人们都力图压抑他们的敌对感情，以避免冲突，但这种压抑也可能引起敌意的积累。如果冲突继续发展，就会导致爆发。比如，丈夫和妻子之间可能在如何合理使用家庭收入上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两人都已感到分歧是无法调合的，但他们又都对他们婚姻的其他方面感到满意。这样，他们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但是，沉默并没有解决分歧，冲突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当冲突爆发的时候，不仅会争论到现实的经济问题，与此无关的其他事情也会搅进来。丈夫的母亲的上一次来访，小儿子不慎打碎了窗

---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62 页。

子，以及由妻子选择的家俱的样式，都可能成为争论的问题。并且这种现实性的问题也可能将非现实性的问题带出来，比如雇主拒绝增加工资，修理工漫天要价，以及最近一件需要举债的什么事情等等，都可能在冲突提出来。

在紧密的关系中，尽管冲突爆发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但科塞认为，没有冲突并不表明这种关系的强度和稳定性。相反，冲突被表达出来，则是这种关系有生命力的标志。而缺少冲突只能看作是将冲突隐蔽起来，而这却是将来真正麻烦的前兆。

冲突的功能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冲突既可以在促进群体的意义上发挥积极的功能，也可以在破坏结构的意义上具有消极的功能。科塞引用了齐美尔的看法，即冲突的作用可以是积极的。① 因为冲突可以通过在群体中建立团结和平衡而减低群体内部的紧张程度。他通过对犹太人社区的观察来说明，在这个群体中，冲突的增加是与这个群体同更普遍的社区互动的增加以及被整合进这个社区有关。因为一个孤立的群体要存在下去，同质性是必不可少的，而同质性就意味着缺乏内部冲突，但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群体与更大的社会缺乏整合。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群体内的冲突很少。但是，在美国社会中，不同观点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则反应了他们与更大的社会的整合。

科塞认为，决定冲突是功能的还是反功能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作为冲突对象的"问题"的类型。如果冲突并不涉及他们关系的基础，冲突就具有积极的功能；如果冲突冲击到核心价值，那么，这种冲突就会具有消极的功能。假如一个人结婚是为了要做父母，而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72 页。

另一方则不想要孩子，这种由于是否要孩子而发生的冲突就牵涉到对他们这种关系目标的看法。科塞认为，"人们可以预见到，这种冲突将会比关于度假计划或家庭预算的冲突更有力地冲击他们的关系"。[1] 当由于表面性问题而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冲突可以成为维护结构的工具。但是，当冲突是由于核心价值而发生的时候，这种冲突就可能威胁到社会群体的存在。

科塞通过观察那些结构较松散的开放社会如何允许非实质性冲突以防止会危害到群体一致的核心价值的冲突来继续他的研究。在两个或更多的对立群体之间，冲突可以互相抵销，实际上起到把社会"缝合"在一起的作用。在较为表面性的价值上所发生的冲突中，对立的群体可能从不触及到将会引起社会解体的基本问题。美国就是这样结构松散的开放性社会的代表。在美国，从堕胎到核能到繁多的税收等问题上都存在冲突。但这些问题并不涉及核心价值，因此冲突将不会威胁到社会结构。实际上这种冲突倒可能促进结构的联系，因为在这些冲突中，群体可以把不同的观点置于不同问题之上，而不会把分歧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

无论是在大规模的结构还是在小型结构中，内群体的冲突都是结构状态良好和其关系有生命力的标志。科塞与那些总是把冲突看成是一种消极力量的社会学家截然不同。丈夫与妻子、雇主与受雇者、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分歧，都是正常的事情，它能增强由关系所建立的结构。实际上，允许冲突存在的社会或群体往往是受到严重震荡最少的社会或群体，而这种震荡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分裂。在这种情形中，冲突一般并不围绕核心价值而发生，这种冲突有助于结构的巩固。而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群体中，冲突受到压制，但当冲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可能造成这个群体的分裂。因

---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73 页。

此，科塞坚决否认把缺少冲突作为关系的强度和稳定性的标志。①

影响与外群体冲突的条件和群体结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科塞证明了与外群体的冲突可以有助于明确结构之间的界线。同时，与外群体的冲突也会加强群体内部的整合。科塞感到，"在冲突爆发前群体的一致程度"与冲突是否会增强群体的团结有最重要的相关关系。②科塞进一步指出：

> 假如一个群体缺少基本的一致意见，外部的威胁很可能不仅不能增强团结，相反，倒会引起普遍的冷漠情绪，这个群体就会受到解体的威胁。比如，关于经济萧条对家庭的影响的调查已经表明，那些缺乏内部团结的家庭在萧条面前反应冷淡，并且往往发生分裂；相反，较团结的家庭则往往在经济萧条中使家庭成员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③

当一个小的、有着密切的内部关系的群体正在与外面的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不大可能容忍内部的分歧。这类群体将进行工作以保持群体一致，并对背离行为做出反应。可以用一个宗教教派做为这种群体的例子。当发生背离行为的时候，这个教派或是进行工作使持不同意见者改变自己的信仰，或是强迫他们回到这个教派中来。科塞仍以齐美尔的著作为基础，重新阐述了齐美尔的下述命题：

> 那些与外部不断进行斗争的群体不大可能容忍内部的分歧。他们对分歧的容忍不会超过可以破坏群体团结的程度。这样的群体往往具有一些类似教派的特征，他们根据某一种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85 页。

② 同上，第 92—93 页。

③ 同上，第 93 页。

特殊的特征挑选成员，因此，在规模上往往是很有限的，并且要求其成员要将全部个性投入进去。①

科塞认为，在这样的类似教派的群体中，其内部团结依赖于成员对群体生活所有方面的参与。这种群体能够用以解决分歧的唯一办法就是持不同意见者自愿或被迫退出这个群体。相反，"教堂类型"的群体并不卷入持续的外部斗争，对成员的个性也没有特殊的要求。这样的群体似乎允许"可以容忍的冲突"的存在，这种群体具有一种适应变化的能力。

有着紧密联系、类似于教派的群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可能依赖于外部敌人的存在。这种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也许有一个现实性的基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冲突是以非现实性的问题为基础的。正如科塞所说："这样的冲突并不是受想获得某种结果的愿望所支配，而是受消除紧张以维持个性结构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这个群体寻找敌人的目的并不在于为他的成员获得某种结果，而仅仅是为了维持它自己的结构。"②因此，一个不能容忍内在冲突的类似教派的群体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甚至不得不捏造出敌人，以消除其内部成员之间的敌意与愤怒，阻止他们将愤怒在群体内发泄。

科塞用劳工联合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作为这种社会现象的例子。但相似的例子也可以发现于处在战争中的国家、正在形成的宗派，或一个国家中的极端政治团体之中。在象"上帝的孩子"这样的宗教群体中，虽然不容许内部的争论，但它与外面的不信教者的斗争却可能有助于吸引并支持改信宗教的人。科塞认为，假如使这个群体受到人们注意的冲突突然停止了，这个群体很可能找到新的敌人以进一步促进群体的成长和加强群体的团结。通过与外群体的对立，这个群体不仅确定了自己的身份结构，而且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103—104页。

② 同上，第105页。

也在斗争中增加了整合和团结。

还以"上帝的孩子"这个教派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有关意识形态与冲突的命题的例子。象"上帝的孩子"这种宗教教派的成员，经常被视为狂热者，被洗过脑等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宁死也不愿放弃信仰。类似的例子也可以发现于早期天主教、早期摩门教以及早期共产主义者或各个国家中的自由事业的倡导者中，尽管他们的信念是各不相同的。科塞通过下述命题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 在参与冲突者感到他们是作为集体或群体的代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理想而战斗的时候，这种冲突往往要比那些只是为了个人的原因而发生的冲突更加激烈、更加冷酷无情。
>
> 在个人因素不能做为缓冲因素被引入进来的时候，将个人因素排除在外会使冲突趋于更加尖锐，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就可以看作是使冲突结果不断激化的例子。这种严密的意识形态联盟，在僵强的结构中比在较灵活的、可调节的结构中更容易产生。①

简而言之，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对现存的核心价值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与外群体的冲突可以增加群体的内部团结，在松散结合或类似于教堂的结构中，即使在感受到外部的威胁是对群体有关的情况下，只要群体内部的不同意见还不能对群体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就将被允许存在。但是在关系紧密、类似于宗教教派的群体中，内部冲突似乎是不太可能允许表达的。这种群体的冲突焦点倾向于外群体。科塞认为，严格组织的斗争群体实际上也许是为了统一和团结而特意寻找敌人。这样的群体可能感到一种实际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118页。

上并不存在的外部威胁，然而这样的想象的威胁与现实的威胁一样，可以有同样的群体整合的作用。

毫无疑问，50 年代的功能主义集中研究社会整合，而忽视了社会中的冲突问题。这种观点倾向于把冲突看作是破坏性的、起分裂作用的。科塞在坚持结构功能主义传统的同时，证明了冲突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科塞对于冲突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讨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 我们对于冲突类型的区别、社会结构的区别的讨论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或只有不充分的对冲突的容忍和冲突的制度化，冲突将会是反功能的。那种造成分裂的威胁并冲击社会系统的一致性基础的冲突强度，与结构的僵化相关联。就这一点而论，威胁这种结构均衡的东西，并不是冲突，而是自身结构的僵化，这种僵化使敌意积累起来，这种敌意一旦在冲突中爆发，就会沿着一条主要的断裂带而形成有力的冲击。①

对冲突结构主义的批评

虽然科塞有时候被认为是与其他结构功能主义的范例不同的，但是，仔细读一下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是始终致力于结构功能主义这种主流理论的。② 他对理论的贡献并不超出功能主义的

①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 157 页。

② 比如，特纳在他有关社会学理论的论著中就把科塞列在为冲突理论做出贡献的人之中。但是，科林斯在《冲突社会学》一书里对冲突社会学所作的综合性研究中，既没有引用科塞的论述，也没有将科塞的著作列为参考书。同样，吉特林在《社会学的反思》一书中也认为，科塞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功能主义。作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说在社会学中存在一种冲突范式的话，科塞也并不是它的代表。在作者与科塞私下交谈的时候，曾问他你希望人们记住你对社会学的哪些贡献，科塞很自然地回答说"肯定不是对冲突理论的贡献"。科塞的贡献是在于将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冲突引入到结构分析中去。

传统，尽管它并不符合极端的自然主义的模式。这可以用暗含在他的社会学理论中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来证明。

科塞把冲突理论看作是一种局部性的理论，而不是能解释所有社会事实的方法，这一点是很清楚的。① 科塞同意功能主义者罗宾·威廉士的观点："现实社会通过一致、相互依赖、合群性和强制结合在一起，现实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表明，按这种方式运行的实际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怎样才能加以预测和解释。"② 科塞对社会学理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包括冲突局部理论和一致局部理论的统一理论。这些局部理论的任务是"使研究者能敏锐地认识到一套套与纯粹的社会学解释相关联的资料"。③ 他把社会学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并表示了下述看法：

> 在最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唯一可能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就是由被认为对解释特殊的社会现象有重要作用的许多局部性的中程理论构成的。正如强词夺理的政治理论已经抛弃了关于赞同还是强迫是政府'真正基础'的无益讨论，心理学已经抛弃了关于本性还是养育是人格的主要决定因素的无结果的探索一样，社会学如果离开这样的无结果的探索道路，它也就将成熟了。一种成熟的政治理论会认识到，赞同和强制都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一种成熟的心理学也会认识到决定心理现象的，是本性和养育的不可分离的、交错的相互作用。社会学现在回到这种原始的和无益的非此即彼的争论中，确实是一种退步。④

按照杜尔克姆的传统，他强调社会学必须运用社会事实去解

① 科塞，《社会冲突研究的连续性》，第 9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9—10 页。

释其他的社会事实。科塞赞成社会学需要运用客观的指标去解释客观的社会事实。因此，很清楚，科塞关于人的模式并不属于社会学心理学的范围，而是属于传统的社会学阵营。人并不能自由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受他们处于其间的社会制度的制约。对于科塞来讲，现实不是查尔斯·霍顿·库利或乔治·赫伯特·米德的主观现实，而是杜尔克姆和功能主义者的客观现实。人受到社会结构压力的制约，这种压力限制着自由和创造力。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些社会制约。例如，科塞自己就曾经对西方知识分子阶级的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在他的一本著作中，他说："正如动物只在适于它们生长的环境中生长一样，人也只有在良好的制度背景中才能发展。"① 科塞感到，虽然知识分子帮助建立文化规范和价值，但他们只有在良好的环境中才能这样做。对于知识的发展，"演员和背景"这二者都必须具备。在《社会学思想的大师》中，科塞对优秀学者的卓越论述也做出了同样的强调。他运用一种把思想与较大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的环境二者联系起来的知识社会学框架，证明理论家的著作是怎样与历史的背景和个人的生活史相联系的。

对于科塞来讲，社会结构显然依靠自己而生存，并且作为一种制约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与结构功能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科塞把他的看法表述如下："如果冲突问题在心理学的关于先天的侵略性、原罪或那些邪恶的人类咒语的研究中不能加以解释的话"，② 冲突社会学必须探求源于结构的、导致人们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价值。科塞对功能主义的贡献是他对社会结构怎样才能成为社会冲突的产物以及怎样才能通过这样的冲突来维持所进行的描述。他的大部分命题都围绕着社会冲突对社会制度的强度和功能

① 科塞，《理想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第3页。

② 科塞，《结构与冲突》。见布劳编《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第215页。

的。

虽然科塞致力于一种统一的、科学的社会理论，但是他缓和了在人类行为研究中极端自然主义或极端决定论的倾向。这种研究可以由他的方法论取向来证明，即自由地运用作为资料来源的历史去支持他的理论论点的方法（功能主义常被指责为即使不是反历史的也是与历史无关的，科塞却受不到这样的指责）。实际上，科塞可以放在自然主义一人本主义连续统一体中的人文主义一端。他似乎更注意的是社会学的"创造能力"和"生气勃勃的改革"，而不是关于"社会学是什么样的科学"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塞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科学，但是，它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不应过早地寻求精确的科学方法，而牺牲实质性的问题。在对美国社会学联合会成员所作的会长演说中，他既批评了在一些理论努力中极端强调主观的倾向，这以称之为本土方法学的一种探索为代表；也批评了一些数学理论的极端准确的测量企图，这以途径分析为代表。① 他认为这两种探索都是"以牺牲实质性理论为前提的对于方法的过分主张"。他在下面的论述中表达了他对当代社会学状况的关注：

> 我认为，在这两者（途径分析和本土方法学）当中，过分强调方法已经导致对意义和实质的忽视。但是，最终能用来对我们的学科进行评价的，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实质性认识。这个社会结构是我们的生息之所，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生活的进程。如果我们忽视这个主要任务，如果我们拒绝回答这些问题的挑战，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生来就具有的权利，退化到宗派的对立，成为对少而又少的东西了解得多而又多的

① 科塞，《研究实质性问题的两种方法》。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40卷，第698页。

专科研究者。①

科塞的著作与许多在社会学中被加上理论标签的著作一样，都缺少一种方法论上的严密性。他的概念往往从直觉上来说是令人感兴趣的，但却不能做到操作化以便可以精确地进行检验（如前面讨论过的核心价值的概念，一个人怎样才能在一个毁坏结构的攻击之后决定一件事情是否具有核心价值。这个概念以及其他一些概念还有同义反复和循环推理的痕迹，而这些概念对科塞的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正如许多理论家所主张的那样，按一种不够精确的方式来研究重要的理论问题毕竟要比用精确的方法研究大量琐事更为重要。

摘　　要

科塞从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著作中形成了他的冲突理论。以齐美尔关于作为一种交往形式的冲突的论文为基础，科塞设计了用以检验冲突对社会群体的功能性的命题。与齐美尔一样，科塞在理论上也是努力构造一种关于社会的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理论。

由于许多功能主义分析都蕴含着冲突对群体是反功能的意思，科塞试图详细地论证是在什么条件下，冲突会对社会结构的维持起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冲突可以成为群体得以形成，群体的界限得以建立的机制。因此，冲突可以通过对群体身份的再确认而把群体成员联系起来。冲突是成为凝聚力的源泉还是成为解组的起源，依赖于紧张的起因，冲突的结果，解决紧张状态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要取决于冲突产生于其中的结构的类型。因

① 科塞，《研究实质性问题的两种方法》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40 卷，第671—700页。

此，科塞区别了群体内和群体外这两种冲突，区分了核心价值的冲突与表面性的冲突，区分了产生结构性变迁的冲突和从安全阀制度中释放出来的冲突，还区分了松散联系中的冲突与紧密关系中的冲突。他也把现实性的冲突与非现实性的冲突区别开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决定作为社会过程的冲突的功能性的因素。

科塞关于冲突的著作最好被称之为“冲突功能主义”。科塞并没有抛弃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和许多假设，而是要在这种理论之上加上冲突的动态方面。在科塞看来，整合的观点和冲突的观点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解释框架。这正如他所说的，这两者相对于一种充分的解释理论来说，“都可以使观察者相对地认识到一种或另一种资料或事件……因此，冲突和秩序、破坏和整合都是基本的社会过程，虽然其比例和构成是不同的，但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①

① 科塞，《课题导论》。见《社会问题杂志》第28卷，第1—10页。

第六章　冲突结构主义(二)：对社会结构的解释

关于冲突的社会学理论的目的是在于改变目前流行的从社会结构因素推导事件所造成的对历史事件无法进行解释的状况——换言之，就是通过预先的联系来解释某些过程。当然，对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冲突进行描述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证明，这样的冲突是以特定的社会结构安排为基础的，因此只要这种社会结构存在，冲突就一定会产生。因此，社会学理论的任务就是从特定的社会结构推导出冲突来，而不是把这些冲突归结为心理学变数（"侵略性"），或归结为描述性的历史变数（如黑人向美国移民），或归结为某种偶然性。

引自达伦道夫《走向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

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忽视冲突的状况表示不满的，并不单单是科塞。在科塞的著作出版不久，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就对他在暂居美国期间（1957—1958年）用英文写的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改写（达伦道夫的理论著作最初都是用德文出版的，因此不熟悉德语的美国社会学家对此了解不多）。与科塞一样，达伦道夫也对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批评，因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社会变迁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象科塞那样）借助齐美尔的理论，而是对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采取部分批评、部分接受并加以修改的做法，来创造他自己的

理论。象科塞一样，达伦道夫起初也是把冲突理论看成是一种局部性理论的，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用以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达伦道夫认为，社会是具有两副面孔的，一副面孔是冲突，另一副面孔是合作（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虽然也可以分析一些事物，但冲突理论可以分析得更好）。

虽然达伦道夫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者，并自称是"冲突理论家"，但人们可以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功能主义学派。①明显的只是，达伦道夫已经对于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学探究法（指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即功能主义不能解释冲突问题。达伦道夫认为，社会冲突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关键。达伦道夫与科塞一样认为，要使用冲突的观点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

对马克思理论的再认识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达伦道夫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对卡尔·马克思理论的部分批评、部分接受并加以修正的基础上。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局部性批评时，达伦道夫勾划了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以来，在工业社会中已经发生的一些变化的轮廓。这些变化有：（1）资本的分化；（2）劳动的分化；（3）新中间阶级的产生。下面，我们将简单地讨论一下达伦道夫所感到的每一种变化。

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是

① 韦恩加特（P. Weingart）怀疑达伦道夫实际上是否超越了功能主义理论。他认为，达伦道夫指责功能主义没有能对合法化的社会系统的关系中产生的冲突作出解释，但达伦道夫的理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认为，达伦道夫的理论并不象它的创立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功能主义的替代，而是对关于社会结构的整合理论的补充。

属于同一个人的。工业家或资本家管理并拥有资本，工人或无产者为了生存就要依赖于资本。达伦道夫认为，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在20世纪已经发生。那些为许多人所拥有、但没有人可以单独进行控制的大公司的产生，可以看作是达伦道夫所称的“资本的分化”的例子。在专业化的时代，那些控制着公司的人也许并不拥有这个公司，而拥有这个公司的也许不能控制它。在这个专业化时代，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象工厂工人一样，是挣工资的受雇者。工厂工人和管理人员可能都分享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因此他们都是部分的所有者。在达伦道夫看来，资本的分化使辨认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家很困难了。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是独占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而由于20世纪的到来，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被分开，不再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所有。

达伦道夫认为，并不仅仅资本在分化，劳动也在分化。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性群体。到19世纪末叶，明显分化的工人阶级就已经出现，熟练工人处于这个阶级层次的顶端，而非熟练工人则处于这个层次的底部。无产阶级不再作为比资产阶级更加一致的群体而存在。木匠、管工、卡车司机被给予比保健员、女侍者等更多的工资。

资本和劳动的分化已经导致中间阶级的增加，这种情况马克思也没有预料到。对于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阶级革命的现实状况，达伦道夫的理论做出了贡献。马克思虽然承认19世纪就存在中间阶级，但他认为，所有这些小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当革命到来时将加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也没有预见到工会的产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工人的社会流动。正如达伦道夫所看到的：“很可能马克思的理论中包括着真理的因素，但假如是那样的话，在上个世纪中社会平等的扩大已经使得阶级斗争和革命变迁

完全不可能”。[1] 正是这种社会流动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阻止了革命的酝酿。假如这种流动突然停止，达伦道夫预料到将会通过革命行动打碎这种社会结构。

根据达伦道夫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所以不太可能发生，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原因就是可以通过制度化使冲突得到调节。这种调节或制度化可以用劳动工会的产生来证明。劳动工会使社会流动容易发生，并调节着工人和管理者的冲突。通过冲突的制度化，每个社会都具有了一种应付在社会中产生的新的问题的能力。达伦道夫认为，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开始于对工人和经理做为合法的利益群体的承认："组织以冲突群体的合法性为前提，它由此排除了无数不断的游击战的威胁。同时它使得对冲突进行系统的控制成为可能。组织就是制度化。"[2]

在指出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的变迁时，达伦道夫认为，他已经批驳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方面。但达伦道夫认为，仅仅批驳是不够的："对于旧的理论的批驳只有在它成为新的理论发展的开端时，才有意义"。[3] 然后达伦道夫利用这种批驳形成了自己的能对历史发展做出解释的冲突理论。

通向关于工业社会冲突的社会学理论

在形成对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学批评的过程中，达伦道夫在肯定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另外一些观点。正如在上一部分曾讨论过的，由于社会变迁，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并没有在工业化国家中发生。因此，很清楚，社会阶级不再象马克思认为的

① 达伦道夫，《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第61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 同上，第73页。

那样仅仅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基础的。然而，达伦道夫却接受了马克思把阶级冲突作为冲突的一种形式而且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的思想。接着，他对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理论加以修正以充实进更多的新成果。

达伦道夫提出，阶级划分有一个新的基础，这可以取代马克思关于作为阶级区别的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概念。达伦道夫说，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权威关系，为阶级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这里存在着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服从地位的人之间的两分法。换句话说，一些人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一些人有权威，而另一些人则没有权威。达伦道夫承认，在权威很少的人与具有很大权威的人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这种在统治的程度方面的差别常常是很大的。① 从根本上来说，这里仍然是两个阶级系统，即那些通过统治而参与权威结构的人与通过服从不参与权威结构的人。因此，达伦道夫所讨论的阶级斗争是以权威为基础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础的。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那些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并不如那些行使合法控制权的人重要。

1. 准群体和利益群体：

达伦道夫认为，在每一个以冲突为特征的团体中，在那些分享结构中的权威和那些在结构中处于服从地位的人之间，都存在一种紧张状态。这正如达伦道夫所说：

假如把群体冲突理解为关于权威关系合法性的冲突，那么，在经验上，群体冲突也许是非常容易进行分析的。在每一个团体中，统治群体的利益都表现为一种价值，正是这种价值

① 达伦道夫，《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第173页。

构成了一种有关他的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相反，从属群体的利益则构成对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包含着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的威胁。①

达伦道夫所说的利益，既可以是明显的（被认识到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潜在的利益）。潜在的利益就是“行为的潜流”，它是依据一个人所承担的特定角色决定的，而且保持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但这还是属于心理学的范围，直到它们成为有意识的目标的时候，它们才成为社会学的课题。比如，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没有权威的阶级的成员，但做为一个群体，他们也许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状况。那些在60年代觉悟有很大提高的少数群体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群体包括黑人、妇女、土著美国人和奇卡诺人。当潜在的或没有认识到的利益变成明显的有意识的目标时（比如报酬平等，公平的就业机会），达伦道夫称之为“显在群体”的组织才形成。比如，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妇女基本上是一个准群体，在她们所参与的大部分社会结构中，其权威都被否定。但到了60年代中期，妇女们的潜在利益变成有意识的和显在的，妇女解放组织发展起来。这样，处于权威地位的男人与处于服从地位中的妇女之间的冲突通过结构性组织得以调节或缓和。现在，两性之间的老年潜在冲突也是通过对这样的冲突制度化来进行调节的。达伦道夫说，企图去压制或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在现代社会中，一旦利益的对立被认识到，就必须通过制度化调节冲突。

2. 冲突群体、群体冲突和社会变迁：

根据达伦道夫的观点，阶级冲突必须被理解为是“产生于为协调团体所必不可少的权威结构的群体冲突”。②一旦这些冲突群体

① 达伦道夫，《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第176页。

② 同上，第206页。

作为利益群体而不是做为准群体而建立起来，它们就会处于冲突之中,并在社会结构中引起变迁。比如,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这是马克思所关心的主要课题）要通过工会而制度化。反过来,工会就将成功地从事冲突活动,这种冲突会带来法律和经济领域的变迁，并在社会分层系统引起具体的变化。新的中间阶级的产生实际上就是通过阶级冲突制度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迁。

达伦道夫强调，他的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简单的两个阶级模式相比是多元的。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做为分析的单位，人们或是通过所有权控制着生产资料，或是并不享有这种所有权。人们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在用权威关系替代(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做为阶级理论的核心的时候,达伦道夫指出,这种两个阶级的模式并不能适用于整体社会而只能适用于社会中的个别团体。

>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假如有50个团体，我们就可以看到会有100个我们现在所说的阶级或冲突群体。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么，在团体权威结构之外的对立中,就会产生无以数计的冲突群体和冲突。①

达伦道夫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冲突群体和冲突并不是这样的无处不在的。一般地说,不同的冲突只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之中,因此,实际的冲突往往是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中。这种现象意味着，一种制度(如教派)中的权威人物并不一定要参与另一种制度（如国家）的权威之中。假如在大部分制度中都发生这种分离，那么，冲突激烈程度就得到了控制。换句话说,假如在一个团体中，一个群体的下属成员仍然是另一个群体的下属成员，冲突的爆发将会更加强烈。达伦道夫在下面这个类似于命题的陈述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当冲突群体在几种团体或几种冲突中相遇时，

① 达伦道夫,《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第213页。

不同场合中产生的能量将合成一体，不顾一切的利益冲突将会发生。"[①]在我们所举的作为一个准群体的妇女这个例子中，这一点就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在大多数群体中都是处于服从的地位。在法律上，妇女们从属于他的丈夫；在办公室中，往往得不到提拔。甚至在志愿团体中，她们也常常因为她们的性别而被拒之于权威结构之外。同样的例子，还可以见之于少数群体关系、劳工关系、以及民族关系之中。

达伦道夫认为，财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虽然并不能决定他所说的阶级，但却能影响冲突的强度。他提出了如下的命题，"权威地位和其他方面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程度越低，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②]换句话说，那种具有较高经济地位的人的群体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和权威都被剥夺的人相比不太喜欢参加激烈的关于权威结构的冲突。

如同科塞一样，在达伦道夫看来，并不能在社会中消灭冲突。冲突对于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迁是有功能的。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化去调节冲突，而不要企图压制它。

对达伦道夫理论的批评

达伦道夫的冲突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科塞的冲突理论相类似。在其最著名的《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一书中，达伦道夫(象科塞一样地)认为，冲突理论只是一种局部性理论。[③]在科塞和达伦道夫看来，冲突是一种在社会结构分析中必须加以考虑的现

---

① 达伦道夫，《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第215页。

② 同上，第218页。

③ 达伦道夫在后来的文章中改变了他的这种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强制观点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可以按均衡的术语进行描述的问题而不能按强制的术语进行描述。达伦道夫认为，强制的观点是更概括更成熟的，"一般地说能提供有关社会和政治生活问题的更多的信息"，因此，应当由它来替代功能主义。

象。① 这两种冲突理论以及达伦道夫与结构功能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可见之于他们对人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所做出的假设。

达伦道夫对有关人类的模式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他认为这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之点。他认为，社会科学所讨论的"人"，都是经过人为加工了的抽象物。为了进行科学的分析，采用这种人为加工的模式是有用的。比如经济学把人描绘为"经济人"，是一种"完全的理性人"。这种模式对于研究消费者是有用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总是仔细比较物品的有用性和价格。心理学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人类的模式，这种模式把人看做"总是追求邪恶的，尽管他们不断地做好事"。这种"心理学的人"受超我的控制，超我控制着邪恶的冲动。社会学又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的模式，即把人看做是一种"社会学人"，把人看做是人与社会的结合物。与"经济人"和"心理学人"一样，"社会学人"也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可以使人们对其进行科学的讨论和分析。它只是代表了一种关于人的不完全的观点。

达伦道夫认为，"角色"是理解社会学人的关键性概念。② 每个人都占有多个社会位置，并在每个位置上从事活动。达伦道夫认为，每一种角色都留给扮演者一定程度的自由，因为每种角色都没有规定完全固定的行为方式。社会塑造人的行为，而人又部分自由地去塑造社会。③ 比如，父亲的角色就意味着，他对满足孩子

---

① 特纳在对科塞和达伦道夫的著作进行综合的时候，论证了两人理论的可比性和互补性。他特别注意到了冲突的原因、冲突的强度和暴烈程度、冲突的时间、冲突的结果等问题。特纳认为，这两种理论是"不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

② 达伦道夫，«关于社会理论的论文»，第 19—87 页。

③ 同上，第 58 页。

的情感需求感兴趣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每个家庭都是不同的，这里没有来自社会的固定不变的规定。实际上，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都存在一定的自由和弹性。达伦道夫认为在自由人的形象与由角色决定的人之间，要有一种平衡："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自由问题，就是由角色决定的行为和自主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方面，至少是对于社会学人的分析证实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辩证矛盾。"①

关于人的两种形象之间也存在这种矛盾。一是道德的形象，按这种形象，把人看作是完美的、独一无二的、自由的；二是科学的形象，这种形象把人描绘为一种被其他因素决定的角色的聚合。我们已经知道，功能主义以及其他自然主义理论倾向于科学的形象，相反，人本主义或解释性的理论则倾向于道德的形象。而达伦道夫则把社会学人看作是科学的形象的代表。在达伦道夫看来："人的这两个方面的特点，表明了不同知识类型存在的可能性"。②达伦道夫认为，关于人的道德属性，社会学什么也没说。③他强调"人是依据自己的角色去行动的。因此，正是在实现与社会位置相关的所有期待的范围内，人才在社会学分析中被加以考虑。"④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社会学人具体化，并要记住，这种模式只是现实人类的一幅局部特写。

达伦道夫关于社会的基本看法也是与结构功能主义相一致的，他们都把社会看成是一种实在。达伦道夫更明确地说，在我看来，社会大于"他的所有成员之和"。⑤与大部分结构功能主义者不

① 达伦道夫，《关于社会理论的论文》，第 44 页。

② 同上，第 81 页。

③ 同上，第 101 页。

④ 同上，第 90—91 页。

⑤ 同上，第 51 页。

同的是，达伦道夫把强制和冲突看成是理解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对形成角色期望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在研究社会的时候，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哪些机构负责制订规则，并对这些机构进行精确的描述。在我们讨论达伦道夫阶级理论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权威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是如何重要，以及关于权威的冲突又是如何导致了我们社会中制度的发展。

顺着结构功能主义的思路，达伦道夫把社会角色看作是人的科学形象与社会结构的联结点。而他则把社会结构看做是一张巨大的组织图，"在这组织图中，无数的位置象太阳与行星系统一样被置于其间"。① 这种组织图虽然相当复杂，但恰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虽然达伦道夫顽固坚持有关人和社会的科学模式，但他并不同意科学社会学所强调的价值无涉社会学。② 因为，现实的人并不仅仅是社会学人——他既有道德的属性也有科学的属性，社会学家不应满足于价值中立的立场。他说：

> 但是，对于我来说，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警惕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分裂，而不是它们的混淆。做为一个社会学家，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在完成科学探索之后就止步，而是应把这作为起点。这就要求我们要经常考虑我们学术活动的政治和道德后果。

---

① 达伦道夫，《关于社会理论的论文》，第53页。

② 根据达伦道夫对价值无涉的社会学（见第一章）所进行的评论，可以将达伦道夫放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有关评价性的或应用社会学的那部分进行讨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达伦道夫的理论本身很少有能对评价性社会学进行论证的内容。虽然他承认他致力于这一点，但他最著名的著作并没有象第三部分所选择的作者那样提供评价性理论的例证。

要求我们在著作和课堂上公开表明我们的价值信念。①

达伦道夫强调，社会学家必须敏感地察觉社会学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说："任何不能忍受社会学不充分性的人都应否定社会学，因为武断的社会学要比完全没有社会学还坏。"②

尽管达伦道夫号召一种介入性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要考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社会应该是怎样的"（他将其看作是"理论"的任务），尽管他号召"用他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并参与现实的变迁过程这才是社会学的事业"，③但很明显，达伦道夫自己的主要理论仍然没有超出自然主义、非介入性的传统。虽然在他阐述他的理论时象先知一样讲话，但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于象牧师一样来说明社会结构。

提　　要

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利用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冲突理论来创立他自己的关于当代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理论。在达伦道夫看来，阶级并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象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在于拥有权威，也就是拥有统治他人的合法权力。当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经济、独裁政府还是自由政府——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对权威的控制而进行的。

达伦道夫认为冲突群体产生于能够组织起来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他这样描述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准群体成为一种能冲击结构的利益群体。做为这些利益的结果而形成的制度，成为引起社会变迁的媒介物。人们应该努力通过有效的制度化来调节社会

① 达伦道夫，《关于社会理论的论文》，第18页。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278页。

冲突，而不是压制它。

达伦道夫的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的局部性理论。他要用这种理论来证明组织为什么会产生于阶级冲突，并且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说他的理论是一种局部性理论，还可见之于他对人类的性质和社会学的性质所进行的讨论。社会学把社会人（相对的有道德人、心理人、经济人等）做为自己的对象。但同时，社会学家必须认识到人的其他方面。

第七章　进化观点中的冲突与结构

> 近年来社会科学中最令人惊奇的发展之一，就是对进化论感兴趣的死灰复燃……。这种兴趣重新出现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尽管当代社会科学中有大量的理论，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满足对有意义的基本历史模型的需求。
>
> 引自兰斯基《进化观点中的社会结构》

有些当代理论家已经提出对于冲突和结构观点的综合将优越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本身。①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科塞是怎样企图把功能主义者的注意力引向社会冲突过程，并把它并入功能主义分析。虽然科塞所提供的这个局部性理论毫无疑问地使许多功能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但是，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主义的传统，它与功能主义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它对静态的、非历史主义的功能分析进行了改进，但它仍然不能对长期的历史趋势，以及强制性权力与这种趋势的关系做出充分的解释。

兰斯基（G.E.Lenski）则形成了一种目的在于对冲突理论和功能主义分析进行综合的理论，而不是将这两种观点简单地并列起来。虽然他的理论主要是涉及社会分层问题，但是它却代表了一种把人类的一万年历史纳入社会学模式的努力。兰斯基在一个进化

① 见伦芬《辩证法和功能主义：走向理论综合》，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8卷。吉特林，《社会学的反思》。

论的框架中，对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的假设进行了综合。按照兰斯基的理论，只有进化论才能分析结构和过程，并且并不仅仅限于很短的一段时间。

兰斯基的分层理论主要是力图去综合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对于社会阶级的存在及作用的发挥所做的解释。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家已经形成了他们各自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戴维斯和莫尔写出了从功能主义观点分析社会分层的经典性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认为分层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 作为一种功能机制，社会必须以某种方法把他的成员分配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并促使他们去履行由他们的地位所赋予的职责。因此，社会必须使自己关注这两个层面的动机：对个人逐渐灌输情愿处于某种地位的愿望，而一旦处于这种地位，则愿意履行这些地位所赋予的职责。①

戴维斯和莫尔认为，职业排列是由于不同地位在功能上的重要性不同。就是说，给予某种位置的报酬要足以促使人们接受经过努力才能完成的而对于社会是必须的工作。因此，社会不平等就是一种策略，它确保由最合格的人负责地承担最重要的职责。与这个决定性因素相联系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位置要求一定的技能、才智和训练，这就使能承担这种职责的人的数量比较少。戴维斯和莫尔注意到："比如从事现代医疗事业是大部分人力所能及的。但是医学教育工作则是繁重的，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如果这个位置不能带来与代价相当的报酬，就没有人愿意从事这种工作。"②

虽然戴维斯和莫尔的看法只是早期功能主义的观点，与后来其他分层理论是不同的，但是很清楚地是，它是以整合和一致的模

---

① 戴维斯（K·Davis）和莫尔（W·E·Moore），《分层的若干原则》，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43页。

② 同上，第243页。

式为基础的（对戴维斯和莫尔的理论推理与布劳的交换结构主义的相似性的讨论，见第 4 章）。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功能的发挥来说，阶级的存在是必需的，这些阶级在一起合作以确保社会需要得到满足，而这种体系至少是社会成员心照不宣地同意的。因此，这种分层体系就是为了使社会能正常地发挥功能。但是，这个模式只是代表了关于分层的一个局部性观点。

人们经常把关于分层的功能主义模式与冲突模式加以比较，这种冲突模式强调的是强迫和强制，而不是强调意见的一致。许多冲突理论家分层模式的基础可以发现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阶级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而并非是一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代表着上层阶级，这个上层阶级压迫和统治着工人这个下层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历史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两个阶级的模式，或者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或者是地主和农奴的关系，或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冲突推动社会变迁，只有通过冲突才能使社会从阶级压迫系统发展到一个无阶级社会。

关于分层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这两种观点依赖于不同的传统，而这不同的传统又都依赖于关于人和社会的性质的不同假设。功能主义是以保守传统为基础的，这种传统把分层看做是为满足做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需求所必需的。相反，冲突理论则怀疑这样一种"社会需求"的存在。它更关心的是个人需要、愿望和利益，强调的是那些为有价值的、同时又是供应短缺的商品和劳务而斗争的子群体，而不是规模更大的社会。这样的区别反映了他们对于人的性质的假设的对立。兰斯基指出：功能主义强调人类的社会性；就是说，如果不与他人一起生活于群体之中，个人将无法生存。但是在同时，"他们对于人类的基本属性是抱不信任的态度的，因而

强调需要强制性‘社会制度’”。①相反，冲突理论家对于人的优点是比较乐观的，而对于与人类属性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则表示不信任。由于对人的看法不同，功能主义更倾向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完美的系统，相反，冲突理论家则倾向于把社会看做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

兰斯基对于社会学理论中的所有这些两分法表示怀疑，无论这种两分法是把人看成“好的”或“坏的”，还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或者认为不是一个“系统”。社会学家不应创造这种反映两分法的概念，而应该努力去建造能反映某种现象显现的程度的变数概念。比如，问题不在于社会是否是一个完美系统，而在于社会的系统特征存在的程度。相类似的，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需要整体强迫，而在于强迫存在的程度。在避免区分范畴概念的同时，兰斯基认为，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都提供了统一的分层理论可以从中产生的“命题”。兰斯基研究社会中权力和特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这种保守的和激进的观点进行综合。

分配系统的结构和动力学

通过使用从比较保守的功能主义传统和比较激进的冲突理论观点中选择出来的关于人类性质的假设，兰斯基提出了关于商品和劳务分配的两条规律。兰斯基假设的假定前题可以概括如下，(1)人类是一种要生活于社会之中的社会存在；(2)人类一般把自己或他的群体的最佳利益置于别人利益之上；(3)人类对于可以在社会中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欲望是无止境的；(4)个人参与为得到稀有的商品和服务斗争的能力是不平等的②。假如这些关于人的

---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22页。

② 同上，第30—32页。

假定前提是正确的话，兰斯基提出了如下的两个命题：(1)"人们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分享他们他们的劳动产品，即确保生存以及确保他人能进行为自己所必不可少的再生产活动"；(2)"权力决定社会所拥有的几乎全部剩余产品的分配"(兰斯基几乎没有为人类活动中的利他主义留下余地，他相信，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①

通过使用这些假设和前提，兰斯基继续构造他的理论，并在他的论文中用历史上的资料对这个理论加以检验。兰斯基承认，虽然人类的性质是共同的，但其分层体系却存在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商品和服务分配的不同形式是与一个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有关的。在不发达的社会，商品和服务是根据个人需要分配的。在较发达的社会中，权力则是左右分配系统的力量。兰斯基断言：

> 在最简单的社会中，即在技术上处于最原始状态的社会中，商品和服务全部或大部分是以需要为基础进行分配的。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可以利用的商品和服务的比重在增加，这时将按照权力对这些商品和服务进行分配②。

因此，兰斯基假定，权力和需要是支配分层系统的两个原则。社会越复杂，在分配可以利用的资源方面，权力的作用就越重要。

然后，兰斯基进一步去讨论在技术先进的社会中的权力现象。虽然强力和强制的使用"对于获得社会中的权力是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不平等系统的主要基础"，③但是，这种权力一旦获得，强力就不再是保持权力位置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一点上，建立和维持一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运用权力的基础就变得更为重要。新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44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51页。

的统治必须合法化，必须将强权统治变为权利统治。这里的意思就是，必须用制度化的权力取代强迫，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又不是个人性的。

兰斯基指出，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在强制统治时期或"强权统治"时期与制度统治时期或"权力统治"时期之间存在一种政治权力的循环。① 强权统治是以新的精英人物用强力夺取权力为特征的，并最终要使用暴力。在这个阶段中，有组织的反抗遭到镇压。在第二个阶段中，统治集团努力减少对于赤裸裸的强力的依赖，而是增强它的合法权威。这个时期的趋势是立宪政体，或叫权力统治。除非对精英人物有一种持续性的挑战，否则，一个长期的趋势就是强力的作用的降低，而说服和刺激的作用加强。在有些时候，这种权力的立宪统治可能再一次受到强力的挑战，从而这个周期重新开始。

兰斯基承认，政治周期的持续时间、经济形势和意识形态的性质会是非常不同的，但他提醒说，政治周期之间的区别虽然不能任意缩小，但那些通过强力夺取权力的人逐步通过利用宪法的手段进行统治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如此。最终，这些统治集团还要被强力或强力的威胁所消灭。变化是形形色色的，但这个基本框架是不变的。②

分层系统的结构

与分层系统的动力学或过程相联系的就是系统的结构。在这里，兰斯基所关心的是系统所包含的三种单位，即个人、阶级和阶级系统。个人创造阶级并成为分析的基本层次，而阶级又形成阶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59页。

② 同上，第61页。

级系统。个人、阶级和阶级系统都处于互相联系之中，同时也处于对稀有资源的竞争的关系之中。

兰斯基把阶级定义为"社会中有着相似的强力、特定的制度化权力、特权和威望的人的聚合体"。[①] 在兰斯基的著作中，他集中研究的是权力阶级，他认为，在有着重要的剩余产品的社会中，这种权力阶级决定着特权和威望的分配。在兰斯基看来，阶级就是一种权力阶级。虽然这些权力阶级的权力各不相同，如工业领袖阶级、军事评议会、有组织的工厂工人阶级的权力都是不同的，但是，在韦伯关于权力所作的经典定义的意义上——把权力定义为人或群体甚至是在遭到他人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的地位都是相似的。因此，阶级是按照他们拥有的控制稀有资源的权力的程度来定义的。

在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几个阶级的成员。因此阶级归属必须被看成是多元的现象。兰斯基用一个个人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 在拥有的资产方面，他也许是一个中等阶级的成员；由于他在工厂工作，他又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成员，他还可能是黑人中的一分子。他所承担的每一个较重要的角色，以及他在财产层序中的地位，都会影响到他在生活中能得到的东西的机会，因此这当中的每个因素都会将他置于一个特定的阶级之中。由于这些资源并不是完全相关的，因此他不能单独地被置于某个阶级之中。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当从技术处于原始状态的时代转变到技术发达社会的过程中，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换句话说，在现代工业社会，更加需要多元分析。[②]

---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74—75页。

② 同上，第75—76页。

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阶级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在这里，一个人同时是几个阶级的成员，而在每一个阶级中的位置都有着不同的潜在权力。

因此，每一个阶级都包含着差异，即他们之中的影响的程度不同，比如工人和黑人，就权力的意义而言，这两个群体都可以被看做是阶级。尽管在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差异，但是每个阶级的成员对于利益都有共同的立场，并与不分享这些利益的阶级处于对立的状态。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阶级又形成阶级系统。兰斯基把阶级系统定义为，"是按照某些单一的标准被排列的阶级顺序"。① 因此，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在单一阶级系统之中加以排列。比如，在一个假定的社会中，"政治阶级系统"可以由10%的精英或领袖，20%的科层职员，50%不关心政治的人，和20%的统治集团的敌人构成。在同样的一个假定的社会中，"财富阶级系统"可以按照10%的富人，25%的中间阶级，45%的穷人，20%的穷困的人来排列。"职业阶级系统"可以按较大的土地占有者到独立农场主、职员、商人，再到农民和手艺人，最后到乞丐和失业者的顺序排列。可见，兰斯基要证明的是，在分配系统的结构中，不仅存在个人与个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于稀有资源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也存在于阶级系统之间。兰斯基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使教育机会均等，这将提高"教育阶级系统"的重要性而降低"种族或性别阶级系统的"重要性。这种变动会迫使雇主把受教育的程度作为雇用人的标准，而较少考虑一个人在种族或性别阶级系统中的归属。关于阶级系统之间斗争的另一个例子，可以见之于极权主义国家中。在那里，"政治阶级系统"的地位在上升，而其他阶级系统，特别是财富阶级系统的地位则衰落了。威望和特权被赋予处于高位的党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80页。

员，而不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赋予拥有最多财产的人。

兰斯基的那个由个人、阶级、阶级系统构成的分层体系，是一个复合体，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多样性。他把这种分层体系看作是一个"车轮里面包含着车轮的系统"，这很符合结构功能主义关于互相联结、互相依赖的看法。同时，他也承认生活中的分层的动态事实，即对抗和敌对，并把它与社会的结构特征联系在一起。

兰斯基在逻辑上推演了一些命题，这些命题可以在他有关分配体系的结构和动态的假定前提的基础上加以检验。这些命题如下：

1. 在分配系统中，不平等的程度直接随着社会剩余产品的多寡而变化。

2. 垂直流动率趋向于随着技术和社会变迁的速度而变化。

3. 阶级敌对的程度趋向于随着向上流动率的相反方向变化。①

通过使用人类学和历史的文献以及社会学的研究，兰斯基进一步考察了他的假定前提和按照不同的社会类型派生出来的命题。兰斯基在他的著作中为他的研究所选择的社会类型是狩猎和采集社会、简单园艺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分层课题的引证

狩猎—采集社会是一种"产品生产技术还很原始的、很不发达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其他的技术因素也是很原始的"。② 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居住的距离很近以维持生活，每天的生活周而复始。在这种社会中，各种差异通常是直接由物质环境的不同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85页。

② 同上，第96页。

造成的。兰斯基认为，讨论这种社会分层系统的关键，就是"缺少可以见到的经济剩余"。①观察者注意到，"在产品的分配上，几乎接近于完全平等"。②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经济产品剩余的缺少使分层不可能沿着这条线索形成。但是，威望的分配是一个与产品的分配相当不同的问题。正如兰斯基所注意到的，"在这里没有供应短缺的问题，不平等并不能影响到群体生存。其结果就是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对于尊敬的不平等分配趋于成为尺度"。③在可以见到的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兰斯基通过逻辑演绎说明："在原始的采集—狩猎社会中，权力、特权和威望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函数。遗产仅仅提供机会，对个人真正有价值的是要求以个人素质为基础来评价行动。"④由于对个人能力的强调，在这种的社会中，代际与代内流动性是非常高的。

简而言之，由于狩猎—采集社会很少有产品和资源的剩余，分层系统不可能依赖于这种剩余。群体的生存要求合作以最低限度地满足社会中的个人的生存要求，但在这里仍然有一个分层系统在起作用，这就是以威望和荣誉为基础的分层系统。

简单园艺社会代表着分配系统进化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在那里，"社会建筑于园艺经济的基础之上，镐是基本的工具"。⑤高级的园艺社会虽然也建立在园艺经济的基础之上，但它使用的是锄头和其他先进技术，比如，梯田、灌溉和施肥。在将简单园艺社会和高级园艺社会进行比较的时候，兰斯基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进入高级园艺社会以后，与简单园艺社会相比较，那里的不平等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 102 页。

② 同上，第 103 页。

③ 同上，第 104 页。

④ 同上，第 109 页。

⑤ 同上，第 118 页。

系统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以这个观察为基础，兰斯基提出了下列原则："在进步的园艺社会中，政治系统和亲属系统的分离以及所导致的国家的发展，成为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的必要的先决条件。"① 他进一步指出："政府制度提供了解决这些社会里分配和分层问题的钥匙。"② 在高级园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阶级形成基础的继承遗产现象出现了。

简单地说，简单的园艺社会在缺少剩余产品方面很类似于狩猎—采集社会,而只有剩余产品,才能使确定的社会阶级发展起来。而在高级园艺社会中,园艺技术的改进带来了一定的剩余产品,以及分离出来的政治系统的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阶级系统是以先天的因素为基础的，而并非主要以对于群体所做出的贡献为基础。

农业社会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另一个重要阶段。犁的发明和牲畜的使用使农业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兰斯基还指出,"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是与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相媲美的"。③ 进行战争的技术变得越来越有效。在这里，我们看到军事阶级的产生，它的位置处于政治阶级之外。其他阶级也加入了农业社会的层次之中,包括外来民族(从战争中得到的)、商人(由于商品运输的改进)和城市居民,也包括统治阶级,即那些靠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过活的人。这个社会类型是以严格的分层社会为特征的,这种社会主要依赖于财产继承以作为阶级的基础。

工业社会代表了分层系统进化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工业社会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农业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兰斯基注意到，"使用的原材料更加不同,能源也相当不同，工业更加复杂和有效

---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 160 页。

② 同上,第 160 页。

③ 同上,第 193 页。

率"。① 在这种工业社会中，消费大量增加，生产也大量增加。兰斯基指出，部分地是由于有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为人们所愿意拥有的产品不再稀缺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不平等出现了正在缩小的迹象。他认为，"成熟的工业社会标志着不平等增长这个古老的进化趋势的第一次关键性逆转，不平等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曲线的关系，它在发达的园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上升，而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工业社会却开始下降"。② 但在同时，兰斯基倾向于赞成根据人类的性质，不平等将永远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保守派的观点。他利用了社会学家对工业社会之中分层系统的研究来证明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一种向不太僵硬的分层社会的运动。

在分析了各种社会的详尽的相似性和区别之后，兰斯基回顾了他在逻辑上推演出的关于分层的一般理论。兰斯基认为，他在开头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是一种有效的理论。

> 分配系统的最基本特征似乎是我们在前面发现的人类的某些永恒因素与技术中不断变化的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做为一种假设，这些因素的影响似乎是由一系列的组织因素调节的。③

正如我们看到的，兰斯基的命题直接依赖于他对人和社会的性质所做的假设。这些假定的特质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不变的。兰斯基认为，他对人类的性质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即把人类看做基本上是自我实现的。但是，他认为，在对社会的看法上他是倾向于激进的传统的，即把社会看做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系统。关于"不平等系统是在何种程度上由强制所维持"的问题，兰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298页。

② 同上，第308页。

③ 同上，第435页。

斯基的回答是，这依赖于技术的发展程度。在分析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经济剩余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理论是比较保守的。而在分析有较多经济剩余社会的时候，他坚持的则是一种激进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强制在维持分层系统中的作用。① 兰斯基认为，他的理论可以说既是保守的，又是激进的，既是功能主义取向，又是冲突取向。但是，作为对两种对立的社会学观点的整合，它依赖于追溯技术发展的进化论框架。

对兰斯基综合进化论的批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毫无疑问，兰斯基接受了把人看做是一种自我实现（self-seeking）的生物的假设。这种假设在他的理论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是与功能主义关于人的模式相一致的。这一点，可由戴维斯和莫尔关于分层的理论来证明。人的利己主义的、自我寻求的性质必须由社会的制度结构来制约。兰斯基支持这种观点，他指出，研究成果表明，人在婴儿的时候是一种极端自我中心的生物，他的全部动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愿望。② 当孩子通过社会化进入他人的生活时，他学到群体的规范。但是，兰斯基注意到，"对于规则的遵守可以看作仅仅是理智地对待自我利益的一种形式"。③ 兰斯基承认，利他行为也是可能的，但他相信，在社会决策的层次上，这种行为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可以推断出，兰斯基所讲的人是很少有自由的、自发的性质，而是由内在的自我性质决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社会结构的规范抑制的。

与他自己对人的看法相比，兰斯基关于社会的理论更倾向于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 441 页。
② 同上，第 26 页。
③ 同上，第 27 页。

冲突学派。要接受把社会看作一个抽象的完善系统的观念，兰斯基的态度是犹豫的。正如兰斯基所说的，"如果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完善的社会系统，我们就应该不再去杜撰假定这种系统存在的理论，而把我们的精力用在建立这样的理论上——这种理论假定一切人类组织都是不完善的系统"。① 因此，他认为合作和冲突都是这种不完善系统的组成部分——合作和冲突这两种过程是人类生活的正常特征。正如我们在兰斯基的分层理论中看到的，冲突或一致的地位有赖于时代和哪种类型的统治。强权统治是充满紧张和强制的，相反，权利统治则是以规范性的、一致的秩序为基础的。在这两种类型的统治中，合作和冲突都会不断出现。

兰斯基研究分层的方法就是利用历史资料以发现存在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分层模式。他认为，进化论的模式是合适的，必须对社会本身进行分析，而不是分析那些抽象出来的因素：

"有这样一种想法，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就应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社会本身转向构成它的各种因素——制度、社区、团体、角色和个人，这样，我们就会专注于由这些更小的实体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专注研究这些课题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以致忘记那些对社会学提出的首要的大问题。"②

由于注意的是某些因素而不是社会整体，就会使社会学还原为对特定时代的具体社会事实的研究，而忽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广泛性的课题。恰恰是这种反历史的、局部性的观点导致了激进理论和保守理论、冲突取向和功能取向的分裂。兰斯基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社会科学家们看到这两种观点和假设各自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34页。

② 同上，第141页。

进化论模式可以使社会科学家们追溯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这种模式也可以使他们发现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兰斯基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决定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1. 人类的遗传的遗产（即工具和生物进化过程中所牵涉的行为趋势）。

2. 人类缓慢形成的以增加遗产的技术。

3. 环境对人类活动和技术发展的阻碍，特别是那种隔断来自其他社会的信息的环境。

4. 各个社会之间为了维护以疆界为基础的资源而发生的你死我活的竞争。①

兰斯基认为，就是我们今天的技术社会也是要受到这些决定因素的影响的。虽然他看到，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意识形态和知识在社会结构的形成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但他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在他看来，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发展和变迁。只有对"人类的整体社会结构"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说明在社会中遗传、环境和技术这三种因素是如何互相作用的。

提　要

兰斯基的分层理论是想按进化论的框架把冲突理论与功能主义综合成为一种统一的理论。从激进的冲突理论中，兰斯基得到了有关社会的性质、有关强制在分层系统中的作用、有关社会冲突产生不平等的程度的假设前提。从保守的功能主义中，他得到了对于人类性质和不平等的不可避免性的看法。兰斯基力图把有关

① 兰斯基，《权力与特权：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第147页。

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获得的，以及国家在分层系统中的作用的激进观点和保守观点结合起来。

《权力和特权》这本书就是对整个社会分层系统的研究，在这本书中，兰斯基要回答的问题是：谁能得到什么？为什么会得到？兰斯基的回答是，在技术、技术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系统的僵硬性之间，存在一种曲线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缺少剩余产品，几乎不存在经济上的分层，但在那里却存在一种以个人威望为基础的开放性的分层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冲突和强制都处于最低水平。当社会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技术和更复杂的结构时，经济产品的剩余成为在竞争中获胜的有效手段。在这样的社会内部或各个社会之间，冲突和强制在分层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中，也有迹象表明，随着剩余产品有效地增加，不平等的程度开始降低。兰斯基认为，尽管由于人类特有的属性，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与农业社会相比，高度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中的分层僵硬性已经降低了。

第八章　一般体系理论:通向关于行为科学的统一理论

社会文化进化如同有机进化一样是按从简单到复杂的分化进行的。与这个领域中的早期观念不同，进化并不是按单一的特定的路线进行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包含着不同的形式和类型。但从较长远的观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特定阶段相同的形式对未来的进化发展起作用的潜能却并不相同。而且，人类行为模式的差别也是人类的条件之一。

引自帕森斯《社会的进化》

在以前各章所讨论到的所有理论家与大部分经典作家的广涵理论相比，都只是形成了关于社会的局部性理论，这是众所公认的。关于这一点，可以由许多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的对于历史没有丝毫兴趣的特点所证明。因此，兰斯基试图用他自己的局部性理论去矫正这个缺陷，在这方面，科塞也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请不要忘记，兰斯基的著作只牵涉到分层问题，然科塞的著作也只是对作为交往的一种形式的冲突问题的分析)。但是，经典社会学却通过时代问题而牵涉到整个社会，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如下几种广涵理论：奥格斯特·孔德的“三个阶段的法则”，所涉及的是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然上学阶段再到实证阶段的发展；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关于从机械性联系的进化的思想，涉及到后者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社会规律所发生的变化。巴雷托(Vilfredo Pareto)关于从革新时期到保守主义统治时期的"精英

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现代社会的日益增长的理性性质的分析。

正象由这一章开头的引文所证明的，正是在这种广涵理论的传统中，帕森斯决定了他自己的工作目标。把社会学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财富综合成一种综合性的总体性理论，是帕森斯全部学术生涯所努力的目标。帕森斯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至少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很明确地是建立于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之上的。这三个阶段是：社会行动学派阶段，传统的功能主义阶段，最后是一般体系理论或叫现代体系理论阶段。我们将简单地讨论一下前两个阶段，而把强调的重点放在第三个阶段，这最后一个阶段代表了帕森斯最近在理论上所做的努力。

第一阶段：社会行动学派

在帕森斯的学生时代和他做为一个青年教师的早期阶段，他就对于四位不同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发生了兴趣，这四位社会科学家是：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社会学的工程师巴雷托和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帕森斯对这四个人的兴趣的结果，就是于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这本书是对这四位学者关于社会经济秩序的著作的综合，它标志着帕森斯自己所称的“我的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① 按照帕森斯自己的说法，进行这种综合的目的在于“对一种而不是几种理论进行研究，以便能提供一种单一的系统理论推理。而这种理论推理只有通过对这个群体(杜尔克姆、马歇尔、巴雷托和韦伯)的批判性分析

① 帕森斯，《论社会体系理论的建设：个人史》(1970)，见《代达罗斯》第99卷，第831页。

才能形成”。[1]

《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焦点，是理性的社会行动的概念，这个概念则是社会学大师韦伯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韦伯关于社会学的经典性的定义，使社会行动成为社会学家的中心概念，韦伯对于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是一门试图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以便由此做出对于社会行动的进程及事件的因果解释的科学"。[2] 在韦伯看来，对于"社会行动"的研究就意味着了解附着于社会行动之上的意义和动机。韦伯的《基督教道德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这样的研究的一个例子。在这本著作中，韦伯探讨了向理性的世俗宗教的运动(基督教的加尔文主义)与对于利益的理性追求(资本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在这个通向理性的社会行动的过程中的其他一些趋势包括：科层组织的产生(科层组织是作为更具个性而较少目标取向的结构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以及法理领导者的产生(比如，在品质而不是在感召或传统的特质的基础上挑选领导人)。在当代社会中，行动更加趋向理性，也就是说，用最有效的手段(比如资本主义的组织，合格的领导者)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如组织，领导)。

帕森斯的行动理论深受杜尔克姆、马歇尔、巴雷托和韦伯的影响，它所强调的是情境因素对于个人行动的作用。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作为一个宏观理论家的帕森斯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那些指导和调节人类行为的社会价值和规范。客观的条件(结构特点)与集体的约定相结合，就形成一种某一特殊形式的社会行动得以发展的价值。比如，或者人们并不接受宗教的信条，或者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消灭，基督教就不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做出任何贡献。因此，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必须同时

---

①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第五部分。

② 韦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1947)，第88页。

为社会科学家所关心。

由于对于结构的关心，《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被看作通向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的一个步骤。在第二个阶段，韦伯的"社会行动"的概念仍然是帕森斯理论中的核心思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中，帕森斯强调得更多的是对于结构的描述。在这第二个阶段中，杜尔克姆的功能主义观点和有机论观点（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把社会看做类似于一个由各个互相依赖的部分构成的有生命的有机体）以及巴雷托关于体系的概念（它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处于均衡或平衡状态的整体）占据了支配地位。正是杜尔克姆和巴雷托提供了帕森斯用来建造他自己的关于社会的宏观理论的社会学概念。

第二阶段：宏观的功能主义①

虽然帕森斯仍然把社会行动的概念作为他的理论的基本概念，但他的学术目标逐渐由对于社会行动的强调转移到对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强调。结构是在一个有着互相渗透互相依赖的组成部分的体系的意义上被概念化的。尽管帕森斯继续在学术上保持韦伯对于他的影响，但杜尔克姆和巴雷托著作的影响却明显上升。在本世纪40年代，帕森斯开始强调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功能主义的重要性，这可以由他于1949年在美国社会学会上所作的《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地位》的就职演说得到证明。② 帕森斯的第一部系统的功能主义著作，就是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体系》一书。这本书紧紧地依赖于巴雷托关于"体系"的概念，就象他的《社会行

① 这一节的大部分是根据马丁代尔（Martindale）的《社会学理论的性质和类型》中关于帕森斯著作的论述改写的。

② 见帕森斯《社会学理论论文集》第一章。

动的结构》一书是依赖于韦伯的"社会行动"的概念一样。虽然帕森斯仍然保留了"社会行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已经仅仅成为一种社会体系得以从中产生的因素。

帕森斯把社会体系看作是组织社会行动的三种方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互相联系的行动体系，即由被分享的价值和符号构成的文化体系以及由个体行动者构成的人格体系。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帕森斯所主要关心的是社会体系。假如这种社会体系是总体性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假如这种社会体系是一种局部性的体系，它就可以以更小的体系为代表，如家庭体系，教育体系以及宗教制度。

我们可以通过地位角色这个概念把个人与社会体系联系起来并对它进行分析。所谓"地位"就是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比如教师、妈妈和总统，而"角色"(在功能主义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则是附着于象教师、妈妈、总统这样的地位之上的被期待的行为或者叫作规范行为。换句话说，个人在社会体系中占据一个地方（地位）并按照这个体系所规定的规范和规则来履行这个地位（即角色)。由于这些角色都牵涉到相互的期望，因此，这些角色都是交互性的。比如，对于丈夫这个地位，就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规范角色(如一个好的供应者)。但"丈夫"这个角色并不是独立的，由于"丈夫"这个角色是与"妻子"这个角色互相依赖的，因此，"丈夫"这个角色是交互性的。

按照帕森斯的观点，社会体系趋于均衡或稳定。换句话说，秩序就是体系的规范。当规范中发生秩序混乱或失常时，体系就进行调节以使它自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帕森斯把这个体系均衡的概念归功于社会学家和工程师巴雷托。

如果说帕森斯把社会看作一个处于平衡中的体系的概念能够追溯到巴雷托的话，那么，他关于体系整合状态的观点则可以归功

于杜尔克姆。在《杜尔克姆对于社会整合理论的贡献》一文中，帕森斯指出：

> 我认为，可以说把社会联结在一起的正是社会整合，这个问题，是杜尔克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所一贯关注的。在那个时代中，人们找不到比这更具战略意义的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①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帕森斯形成了他那著名的“模范变项”(pattern variables)以作为将行动范畴化或“对社会体系中的角色进行分类”的工具。②这个从汤尼斯(Toennies)关于社区与社会的经典性两分法中产生出来的五重的模式复项，被帕森斯看作是“分析社会体系的主要理论框架”。③这些模式变项是：

1. 情感性与非情感性(affectivity versus affective neutrality)。这个模式变项所指的是，在某种关系中行动的个人，或者是为了满足情感上与精神上的需要而工作，或是他们在情感上是中立的。比如，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对于满足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就是合适的，而在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中，人们就不会希冀得到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因此，可以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情感性的关系，而售货员与顾客的关系则是一种非情感性的关系。

2. 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self orientation versus collective orientation)。在自我取向的关系中，人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在集体取向的关系中，群体的利益则占据支配地位。比如，一个想买一辆新汽车的人所感兴趣的只是这种交易对他个人

---

① 见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1960)，第4页。

② 帕森斯，《修改后的模式变项：答罗伯特·杜宾》。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5卷，第193页。

③ 帕森斯，《论社会体系理论的建设：个人史》。见《代达罗斯》第99卷，第844页。

的结果，并不关心汽车商或更大的经济社区的利益。但同是这个人，他也许是一个工资价格管制的坚定提倡者，他认为，这样的管制措施对于经济集体会有好处，而对他个人则只是间接有利。

3. 普遍性与特殊性(universalism versus particularism)。在普遍性关系中，一个行动者根据适用于所有的其他人的标准而与另一个行动者发生关系；而在特殊性关系中，所使用的则是加以挑选的标准。假如一个政府是在工作是否合格的基础上雇用职员，包括进行公共服务考试，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普遍性关系的例子，因为它雇用职员的标准在理论上是适合于所有的人的，而不管这些人的性别、民族、种族等等如何。

4. 品质与成就(quality versus performanec)。品质变项是指在一个以出身为基础的群体中的先赋地位或成员关系。成就这个变项则是指个人在后天所获得的成就。那些有财富的青年只和同样有财富的青年建立友谊关系，就可以看成是品质关系的一个例子。而成就关系则可以是一种在喜欢与不喜欢的基础上形成的友谊关系，而不考虑彼此在年龄和社会阶级方面的不同点。

5. 专一性与泛布性(specificity versus diffuseness)。在专一性的关系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只是在片面和有限的情形中发生联系。店员和顾客的关系就是一种以买卖为基础的非常有限的关系。相反，家庭关系则是一种泛布性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整个人都投入到互动的过程之中（而不是仅仅将一些片面性的地位投入互动过程）。

帕森斯认为，这些模式变数可以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体系中的行动。在社会体系中，有些关系是以情感性和品质为特征的，比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是一种先赋的并满足情感上的需要的关系。但也有一些关系是并不亲密的，比如汽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关

系就是一种专一性的与非情感性的关系。① 帕森斯把这些模式变项看作是把他的关于行动的理论建造成为关于复杂的社会体系的理论的基础。

在前两个阶段中，帕森斯的理论对社会结构的静态描述无疑地要多于对于社会变迁的动态研究。帕森斯认为，只有首先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描述，理论家才能对社会变迁进行研究。② 按照他在将近40年前所开创的广涵理论传统，帕森斯试图把变迁的课题注入到他以前的静态模式中。

第三阶段：一般体系理论

我们可以把帕森斯的理论看作是一个从传统的功能主义到一般体系的模式的转变。在讨论帕森斯学派的理论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那种跨学科的一般体系理论或叫现代体系理论，而帕森斯学派的理论则是这种一般体系理论在社会学中的一个最好的标本。

一般体系理论：通向统一的科学理论

一般体系理论或现代体系理论③ 既非起源于社会科学之中，也并不是一个创造。近40年来，生物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一直在阐述和传播一般体系理论这一发现。但是，直到1955年，贝塔朗菲才提出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以

① 在帕森斯提出这些模式变项之后，又对其中的一些变项进行了一些修改。比如，在回答杜宾（Robert Dubin）的批评的时候，帕森斯抽掉了“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这个变项，并且对其他几个模式变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这样一来，这些模式变项就即与体系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工具性——完备性的轴）联系起来，也与体系和它的环境的关系问题(内外轴)联系起来了。

② 帕森斯，《论社会体系理论的建设：个人史》。见《代达罗斯》第99卷。

③ 原文 general or modern system theory 在我国通译为普通系统论。——译注

进行一般体系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已经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体系的模式、原则和规律，而不用考虑这些体系的特殊类型。根据这个观点，贝塔朗菲认为：

"要求一种关于适用于一般体系普遍性原则而不是关于或多或少的特殊种类的体系的理论是完全合理的。鉴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定一门叫作一般体系理论的新学科。这个学科的研究课题，就是发现和阐述那些对所有的一般体系都是有效的原则。"①

贝塔朗菲认为，由于科学工作中与日俱增的专业化，在学科之间有时甚至在一学科的内部所进行的沟通都越来越困难。虽然不同的科学领域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但是，还是可以创造出一些共同的概念和原则。贝塔朗菲认为，在潜在意义上说，那些最可能获得成果的相似性，可以围绕"体系"这个概念加以考虑，而体系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于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中。

贝塔朗菲提醒人们注意到，他的理论"并不是探讨那些模糊不清的表面性的比喻"。② 为了表明一般体系理论的实际内容，贝塔朗菲指出了这个理论的五个重要目标：

1. 在各式各样的科学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一种普遍性的整合趋势。

2. 这种整合的方向似乎是朝着关于体系的一般性理论。

3. 这种理论是在科学的非物质领域中形成一种精确的理论的重要手段。

4. 只有通过各个学科的共性，统一的原则才可以飞速发展，而这种理论将使我们更加接近于科学的统一这个目标。

---

① 贝塔朗菲，《一般体系理论》，见《现代思想的主流》第 11 卷，第 32 页。

② 同上，第 33 页。

5. 这将导致对于科学教育的整合的进一步的要求。①

贝塔朗菲对于那些切望一种关于科学的统一理论的人对于物理还原主义的强调深表遗憾。物理还原主义的支持者强调要把其他的科学(包括社会学)还原到那些物理学的规律。② 贝塔朗菲认为，这种还原主义的研究途径对科学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在这些科学领域中必须有一种信息交流（而不仅仅是只从一方向另一方传递信息)。对于物理学的过分信任会使人们误入歧途。贝塔朗菲写道："我们不能把生物的、行为的、社会的水平还原到最低水平，即物理学的构造和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在个人的水平中发现那些构造和可能的规律。"③ 因此，贝塔朗菲的目标之一就是发现那些跨越所有的科学学科的知识的方案并促进在这些科学领域中的沟通。通过对这种知识的综合，就向科学的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般体系理论已经在几乎全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都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④ 而最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帕森斯的最近的著作，一般都认为是贝塔朗菲所提倡的一般体系理论在社会学中最好的样本。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帕森斯的理论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关于有生命的体系的理论。我们已经注意到，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对于四个社会理论家的一种有意义的综合。以后，帕森斯又继续按照贝塔朗菲的传统对不同的思想进行综合和整合。

帕森斯的著作代表了他在将近 40 年的时间中对于理论构造

---

① 贝塔朗菲，«一般体系理论»，见«现代思想的主流»第 11 卷，第 38 页。

② 在讨论霍曼斯(见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了另一种类型的还原主义，即心理学还原主义。关于社会学中的物理还原主义，参见凯顿（Catton）的«从泛灵论社会学到自然主义社会学»。

③ «现代思想的主流»第 11 卷，第 49 页。

④ 关于这方面可见布克赖的«行为科学家的现代体系研究»。

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希望最好能够只是简单地讨论一下帕森斯学派的理论中的一些表面性的东西，而提出一个基本的框架以使那些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自己进一步进行研究。这里我们将分别讨论下述三个问题：(1) 帕森斯关于广涵理论的概念，这一点可以由他自己的行动理论得到具体的解释。(2) 这种行动理论关于社会的观点。(3) 将变迁问题引入他的模式。

帕森斯关于广涵理论的概念

帕森斯的学术目标包括对于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弗洛伊德学派 (Freud) 的心理学的研究。① 这些有选择的兴趣，都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复杂的社会学理论中。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并不仅仅代表帕森斯，它也紧紧地与其他行为科学纠缠在一起，包括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生物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的一些方面。

帕森斯构想这些科学的统一，因为所有这些科学都牵涉到对有生命的体系的研究。帕森斯知道那些无生命的体系例（如物理—化学体系）也具有一些与有生命体系相同的性质，但他决定不去研究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和相似性。确切地说，他只继续对有生命的体系进行研究，并且认为："功能是理解所有的有生命的体系的中心概念。"② 有生命的体系这个概念来源于生物学，象在他之前的杜尔克姆一样，帕森斯认为社会类似于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帕森斯的新发展试图论证：(1) 有生命的体系存在于环境之中并对环境起反应；(2) 这种有生命的体系维持一种组织和发挥功能的模式，因此，这种体系不同于环境并在某些方面比环境更加稳

① 关于那些对帕森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见帕森斯《论社会体系理论的建设》。

② 帕森斯，《关于社会学中一般理论的若干问题》。见 J. C. 麦克金尼和 E. A. 迪尔亚肯编《社会学的观点与发展》，第 29 页。

定。[①] 帕森斯强调，有生命的体系是开放性的体系，就是说，它们和环境进行交换。

概括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帕森斯的广涵理论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点：(1) 帕森斯是一个体系理论家；(2) 他试图把来自所有的研究有生命的体系的科学的材料——包括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融合到一起；(3) 做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社会，仅仅是若干有生命的体系之一；(4) 虽然社会有它自己的界线，但它与其他有生命的体系是互相依赖的。关于最后一点，每个体系在概念上都有几个层次的界限(这意味着需要一种对于内部整合或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的调节)。但由于这些体系都是开放性的体系，因此，也需要一种"与环境的外在关系"。换句话说，对于有生命的体系的分析有两个向度：一个就是构成整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另一个向度则牵涉到体系与其环境之间的交换。比如，我们既可以在丈夫、妻子、孩子这些组成部分的地位的意义上把家庭概念化，也可以讨论这个家庭是如何与其他局部性社会体系结成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同样的，我们可以讲一个由制度性的组成部分构成的社会体系，但这个社会体系也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它与其他体系包括生物体系和心理体系发生交互影响。

功能迫力或功能先决条件 (*functional imperatives or prerequisites*)：那种贯穿于所有的有生命体系的共同特质就是四种功能迫力或功能先决条件。帕森斯认为，任何有生命的体系要继续存在下去都必须满足某些特定的功能或需求。这些功能迫力包括两套关系：(1) 它们牵涉到内体系的需求，和体系在处理它与环境的关系方面的需求 (内外轴)；(2) 它们牵涉到需要一定的

① 帕森斯，《关于社会学中一般理论的若干问题》。见 J.C.麦克金尼和E.A.迪尔亚肯编《社会学的观点与发展》，第 30 页。

目的或目标，以及满足那些为获得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工具性——完备性的轴）。以这些前提为基础，帕森斯推演出四种功能迫力。这四种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有生命的体系的功能迫力是：潜在的维模（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整合（integration），目标实现（goal attainment）和适应（adaptation）。维模是指如何根据一些秩序和规范以确保体系中的行动的连续性的问题。整合则牵涉到杜尔克姆这样一个课题：如何调整体系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整体。而满足体系的目标以及在这些目标中的优先性的确立就牵涉到目标实现这个先决条件。适应则是指体系确保它从环境中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并通过整个体系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的能力。这四个共量可以发现于一切有生命的体系之中，无论它们是生物体系、社会体系还是心理体系。帕森斯强调说："这个四功能方案是以处于从单细胞有机体到最高的人类文明的所有的组织和进化发展水平上的有生命体系的基本性质为依据的。"

功能迫力以之为基础的两个轴可以图解如图二。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通过帕森斯的开放性体系模式的控制过程看到各个功能迫力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这个四功能的方案被应用于帕森斯学派

---

① 在开始的时候，控制论仅仅被用于遗传学、工程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直到60年代，这个概念才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G. A. 狄奥多森和 A. G. 狄奥多森两人把控制论定义为："是对于人、动物和机器中的沟通的研究，它特别强调信息的反馈以及这种反馈在控制过程中的功能。"图二中的箭头指明了功能迫力中的反馈过程。

控制论理论家用反馈这个术语指"关于过去行动的知识导致对于将来活动的修改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行动有效地朝向获得目标的方向"。要记住反馈以下几个要点：（1）过去的活动与即将进行的行动有关；（2）这种活动的目标在于获得某个目标。比如一辆汽车（象所有的机器一样）——包括它的吸气体系就提供了关于反馈机制的具体解释。吸气体系是排泄脏物的装置，包括一个气筒，这个气筒为各种吸气支管提供空气。空气的吸入引起一些未燃的碳化氢在各种吸气支管中燃烧，而不允许它们跑到大气中去。但这些碳化氢的燃烧可以由于过分的混合而导致逆火。为了防止逆火，调气体系就要有一种反逆火阀，以控制气筒中空气的流量。因此，气筒和各种气管的活动都是与反逆火阀有关的。这些部件按照一种动态的方式在一起工作，以把进入到空气中的脏物降到最低限度。

的整个理论。在我们进入对体系的相互联系的结构进行描述的时候，这个方案将得到进一步的具体解释。

在帕森斯的广涵理论中，有生命的体系是第一级水平的体系。而那种可以说明所有的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行动体系则是有生命体系的一个子类。因此，四种功能迫力牵涉到体系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建立这种关系必须满足的手段。在帕森斯在《社会体系》一书中所形成的三个互相依赖的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和人格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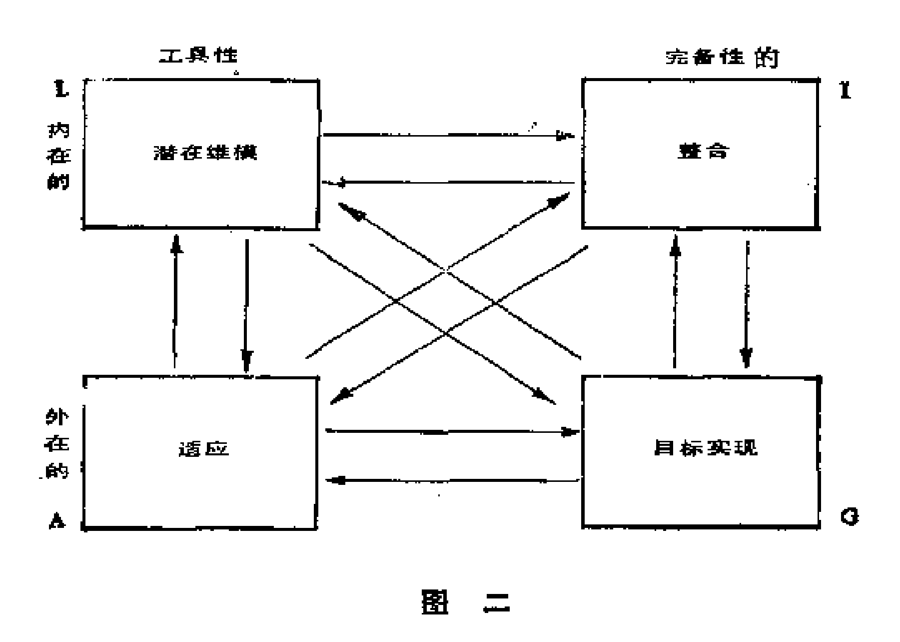


图 二

系）的思想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第四个体系，即行为有机体。按照这种方法，帕森斯就可以把每个体系都看做满足行动体系的功能迫力，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些体系中的每一个，都是有生命体系的一个子类。社会体系是整合的源泉；人格体系满足目标实现的需要；文化体系维持体系的模式；而行为有机体则满足适应的需要。托比（Jackson Toby）曾对帕森斯关于行动体系的功能迫力的观点进行过如下的讨论：

在他（帕森斯）所称之为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的水平上，

他认为，行为有四个互不相同的、在象征的意义上被组织的强调：(1) 寻求心灵的满足；(2) 译解符号意义的兴趣；(3) 适应物质——有机环境的需要；(4) 与人类的其他成员发生联系的企图。①

接下来，这些准体系中的每一种都一定有四种功能迫力，这些功能迫力是在被分类为一个体系的它们自己内部实现的。帕森斯强调这些体系的互相依赖性，因为他看到："具体地看，每一个经验性的体系都是所有这些体系的总和；因此，那种并不作为一个有机体，一种人格，社会体系的一个成员，文化体系的一个参与者的具体的个人是并不存在的。"② 每个学科都有一个做为它的研究对象的特定的体系。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对于理解维模的功能迫力而做出了许多贡献。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人格，这是与目标实现的迫力相一致的。行为有机体以及它的适应过程则为生物学所探讨。而社会学的任务，则是研究社会体系以及整合的功能迫力。

关于一般行动体系中的社会的观点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帕森斯把社会仅仅看成是更一般的行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行动体系的四个准体系中的每一个都要满足一种功能迫力。文化体系对于潜在的维模以及创造性的模式变迁负责。人格体系则满足目标实现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过提供报酬或惩罚以减少不被期望的行为来实现文化原则。而行为有机体则

---

① 托比，《帕森斯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见帕森斯编《社会的进化》(1977)，第4页。

② 帕森斯，《关于社会学中一般理论的若干问题》。见麦克金尼和迪尔亚肯编《社会学的观点与发展》，第44页。

③ 帕森斯关于社会的理论基本上形成于《社会进化和比较的观点》(1966)，以及它的姊妹篇《现代社会体系》(1971)两部著作之中。

被作为适应的准体系，这是那种成为其他体系基础的人类基本能力的中心点。行为有机体包括一套行动所必须适应的条件，包括一些与物质环境进行互动的所必需的基本机构。这种互动主要是通过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输入和处理信息，以及通过对物质环境的急迫需要的自动活动进行的。①

而社会体系则负责把这些准体系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行动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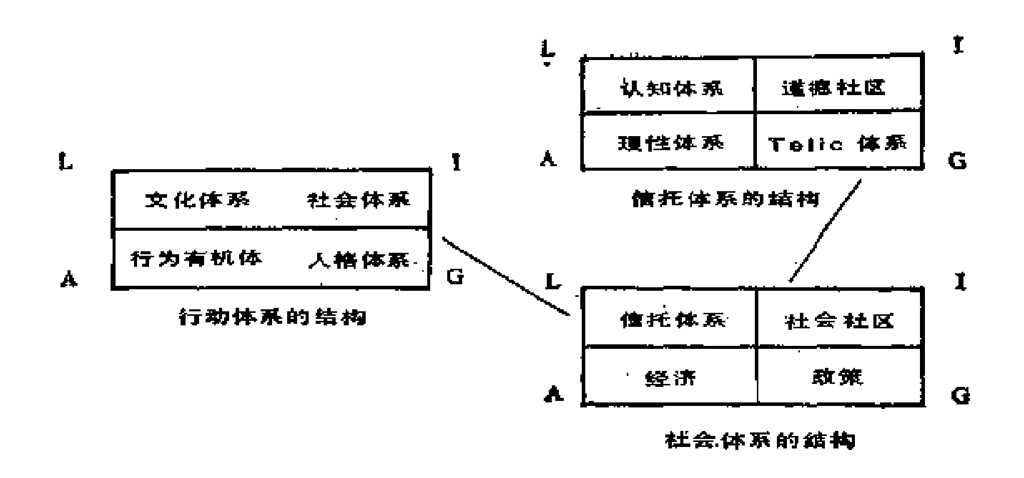


图 三

正如图三所表明的，帕森斯的逻辑是，在四个行动准体系（文化、社会、人格、行为有机体)中的每一个中，维模、整合、目标实现、适应这四种功能追力都必须被满足。这对于社会体系也象对其他体系一样，都是如此。在社会体系内部，潜在维模是通过信托体系实现的，② 这是一个与文化体系有密切联系的体系。整合的功能

---

① 帕森斯，《现代社会体系》，第5页。

② 信托体系（fiduciary）是指文化传统的传递者对于社会的其他部分所发挥的托管作用。

先决条件则是通过社会的社区来满足，适应的功能先决条件是通过经济体系满足，而目标达成则通过政体来满足。

作为宏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社会虽然是我们所要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但它只是社会体系的一个例子。帕森斯说："我们把社会定义为相对它的环境来说——包括其他社会体系——以最高水平的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种类。"① 大部分社会体系——学校、教堂、家庭、企业——都仅仅是社会的准体系。这些准体系互相联系起来，就包含了这个最高水平的自我满足的社会体系（同时它也具有对环境的最有效的控制），即社会。

很明显，简而言之，帕森斯的广涵理论方案已经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当代社会学中的那些局部性理论。首先，帕森斯的广涵理论方案是跨学科的，为了理解作为一个开放体系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甚至需要有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的知识。第二，这个理论的目的是要在一个宏观社会学的框架之内，把那些有限的关于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微观理论）综合到一起。帕森斯把这种理论称之为"行动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所分析的是"人类由以产生有意义的目的并在具体的情境中实现这种目的结构和过程"。② 第三，由于各个体系都要通过功能迫力或功能先决条件的满足而互相联结起来，因此，社会学对一些局部问题的关心——如社会分层、社会交换、政治权力等——都可以在帕森斯的复杂结构理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通过满足功能迫力或功能先决条件而与其他的系统联系起来。

---

① 帕森斯，《现代社会体系》，第8页。

② 帕森斯，《社会的进化》（1977），第249页。

将变迁引入传统的功能模式:

虽然帕森斯早期的理论是在于创造出一种宏观的社会理论，但由于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使得他的理论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那样完美。后来，他提出了一些新的连接点和因素，比如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有机行为等。

另一个变化是帕森斯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均衡（强调体系的稳定性），到提出动态均衡，最后到建立关于一般系统论的控制论模式的转变。① 帕森斯认为：（1）控制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中的控制。（2）他认识到不同因素通过反馈过程而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了谁决定谁的争论。（3）它为解决系统中的稳定和变迁这个棘手的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帕森斯把控制论和进化看作是将变迁引入他的结构模式的主要手段。

在控制论模式中，帕森斯提出了进化论，以解释从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运动，而在这当中有四种主要的结构变迁过程：分化、适应性增长、延伸内纳、价值概化。②

分化（differentiation）：可以定义为"社会中的单位或子系统分化成具有不同结构和功能的单位的过程"（这很类似于杜尔克姆所说的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分工不断扩大）。这个过程是与进化中的适应性增长过程相联系的。"如果分化产生出进化程度更高的系统，那么，与从前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功能履行相比，新分化而成的子系统必然会提高履行基本功能的适应力"。③ 换言之，新分化而成的结构必然会比分化以前的系统能更好地满足系统的

① 帕森斯，《论社会体系理论的建设：个人史》，见《代达罗斯》第99卷，第849—850页。

② 帕森斯，《现代社会体系》，第26—28页。

③ 帕森斯，《社会的进化》（1977），第250—251页。

需求。

适应性增长 (adaptive upgrading)：可以定义为"将更广泛的资源用于社会单位，从而使社会单位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以前的限制的过程"。①帕森斯举例说明这个道理，比如，要生产大量不同的商品，现代的工厂就比农民的家庭更经济划算。工厂结构的发展标志着分化过程。而适应性增长则可以见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厂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的资格是一种先赋性身份)，它可以从大量的潜在劳动力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工人(他们可以承担任务，其身分是自致性的)。

但是，分化和适应性增长都会在系统各部分的整合方面产生问题。适应性增长可以使系统的成员从无所不在的制约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人们在其进行的工作中有一些选择)，并且能从工人中得到更一般化的承诺，这在农民的家庭中是很少能得到的。农民的家庭要求的是对家庭的整体承诺，而这一点恰好可以成为经济运转的基础。将分化的工厂和家庭进行整合的问题只有通过延伸内纳 (inclusion) 过程——结构变迁的第三个过程和价值概化 (value gene ralization) 过程，即第四个过程，它可以使新的发展合法化——才能解决。换句话来说，要形成新的规范和规则以调控家庭和工厂，以确保两种分化的结构的整合。这种规范的一个例子就是青年选择配偶以及脱离原来的家庭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另一个规范是允许孩子自己将进入的工作领域，他在这个领域中寻找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由父母来决定。这些规范以及其他大量的调控家庭和工作领域活动的规范都必须加以合法化，或者说要在社会中贴上"赞同的封条"。而这部分地要通过价值概化，即"在一个比价值牵涉到的情境概括程度更高的层次上来表达这种价值

① 帕森斯，《社会的进化》(1977)，第251页。

模式，以使它与更广泛的事物联系起来"。①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价值概化之一，就是主要关心个人（与集体相对）权利的个人主义哲学的产生。它是指由个人选择自己的配偶、工作、教育水平以及其他的权利，而不是由家庭来限制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权。

帕森斯关于社会的进化论是指向系统控制环境的能力的提高。通过对社会的功能先决条件的理论分析以及对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证据的考察，帕森斯指明了使控制成为可能的进化发展的一些重要的突破点。其中之一就是分层系统的出现，这种分层系统承认不平等，可以使胜任的领导人处于最有利于控制环境的位置。另一个突破点就是"明确的文化合法化"，它使得文化系统可以将权威和威望的各种变异合法化。还有一个就是由普遍主义的规范调控的概化的法律系统，也就是说，这种规范可以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化的方向就是离开先赋性和特殊主义而走向自致性和普遍主义（见前面对模式变项的讨论）。

虽然帕森斯侧重的是对行动结构的研究，但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在关心过程。这可以以他的进化论和所使用的控制论模式为证。我们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形成一种可以适用于20世纪的单一的统一理论，而且也可以看到他努力通过使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资料来讨论系统发展中的长期性趋势。

对帕森斯理论的批评

对帕森斯对美国社会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自称为帕森斯理论的批评者的古尔德纳就指出：

① 帕森斯，《社会的进化》（1977），第251页。

无论在学术上是否可行，在社会的意义上是否'相关'，可以说帕森斯远远超过了当代其他的社会学家。他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世界上影响并吸引了社会学家的学术注意力。正是帕森斯为30年来的讨论提供了理论上的课题，尽管他的反对者并不少于他的支持者。①

如果说在当代社会学中有一位处于中心地位的理论家的话，这个理论家就曾经是帕森斯。

帕森斯对人、社会和理论的看法属于主流社会学的自然主义阵营之中，这一点可以由他对人的假设来印证。帕森斯关于人的看法很明显地趋向于理论续谱中的决定论的一端。②人们的行动是为了获得目标(理性的行动)，但他们的行动是受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控制的。与默顿(见第二章)一样，帕森斯所讲的行动中的选择也是由结构创造的选择。可以由模式变项和将行动类型化的努力来印证这一点。可以说帕森斯是把人类看作自我实现的生物，他有进行决策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能力，但他又要受规范和场合条件的制约。

但一般地说，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并不是人，而是体系的行动。帕森斯所讲的作为社会学的课题的社会系统是与他对于人的看法相联系的，即人是由复杂的结构决定的。所有的体系都是开放性的，就是说要其他体系的影响并影响这些体系。与个人相比，体系的现实占据着支配地位。换句话说，社会结构是独立存在的，而不是由社会互动中的个人形成的一个简单的群体。正如穆林斯所说的：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168页。

② 斯科特认为，与帕森斯的晚期功能理论相比，他早期的"行动理论"更强调人受主观意志的支配。我同意特纳和兰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即帕森斯对人的看法一直是决定论的。

帕森斯并不是简单地对个人的活动感兴趣，他选择了研究赋予社会以秩序的规则和规范。他断定(1) 在整个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套价值观念，(2) 规范中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怎样从事社会生活。①

对帕森斯研究社会的方式提出的主要批评涉及到结构功能主义所固有的保守主义的偏见，不能对革命性的、急剧的社会变化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这种偏见，我们已经在有关结构功能主义的那一章中进行了简单的讨论)。让机智地指出："困扰帕森斯理论的原因，就是他力图去解释服从和社会的稳定性……他极力使反对者的观点不能成立。这样，所发生的暴动、革命和历史变迁都成为不可理解的了。"② 虽然帕森斯力图通过一般体系理论来修正他的功能主义模型，但他的修正只能用以解释体系中的缓慢的变化，而不能对暴动和革命作出充分的解释。

帕森斯将进化论用于控制论模型中，并没有使批评者感到满意。进化论一直与社会学相伴随，并在 19 世纪英国古典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中达到顶点（见第二章有关斯宾塞对功能主义的贡献的简短的讨论)。虽然帕森斯的进化论力图避开 19 世纪许多进化论中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浪漫派的观点，但他象先驱者一样并没有能解释变迁过程。换言之，帕森斯描述了通向现代社会的运动，但却没有具体说明这种运动是如何由一个阶段到达另一个阶段的。在许多人看来，帕森斯的进化论方案不过是换瓶不换药。

帕森斯对理论性质的看法甚至受到那些致力于自然主义理论的社会学家的强烈批评(当然可以想见，也受到更人道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的批评)。帕森斯致力于广涵理论，而不能提供可以在经验上进行检验的命题，这是令许多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感到烦恼

① 穆林斯，《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与理论群体》，第 58 页。

② 让，《美国社会学的失败》，见《评论》第 28 卷，第 375—380 页。

的。帕森斯最著名的学生之一——默顿就怀疑，广涵理论是否能操作化和进行实际研究。正惟如此，默顿把帕森斯的理论看作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取向，而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理论。① 社会学怎样开始研究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 又如何最终把文化体系、人格体系和行为体系联系起来？研究者从什么地方着手检验帕森斯所认为的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需的四种功能先决条件？要从经验上证明帕森斯观点的正确与否是很困难的。

虽然默顿只是对帕森斯理论的广涵性质提出质疑，但吉特堡（H. L. Zetterberg）认为，尽管帕森斯的理论也提出了定义和概念，但这些定义和概念并不真正是理论性的。吉特堡倾向于把帕森斯的著作看作是"社会科学中的一般性的分类学"。② 这种分类学是根据概念和定义来提出概念和定义；虽然它是分类和描述的框架，但并不是理论。在吉特堡看来，"理论是要进行概括并赋予人以灵感，它不是描述性的研究，而是证实性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检验特定的假设"。③无论是默顿还是吉特堡都认为，以目前这种状态的帕森斯理论而论，它不可能提出可以在经验上进行检验的命题。

特纳对帕森斯理论的可检验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评论，他认为"在面对经验性的事项时，帕森斯似乎常常放弃行动方案"。④特纳认为，"如果帕森斯致力于可以在经验上进行检验、在逻辑上进行推演的命题式陈述，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就会对所提出的概念感兴趣"，⑤ 但它并没有对帕森斯所提出的理论和理论材料进行

① 默顿，《论理论社会学》，第 54 页。

② 吉特堡，《论社会学的理论与证实》，第 21—29 页。

③ 同上，第 28 页。

④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 51—54 页。

⑤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 51—54 页。

验证。

帕森斯所致力的只能是自然主义的社会学，这是与其他的科学努力相一致的。他认识到，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他并没有"解决……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但他认为，"我所关心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很重要的"。① 就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如果说帕森斯不是最主要的人物的话，也是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

摘　　要

从帕森斯在早期作为一个社会行动理论家，到他对功能主义所作的重要贡献，再到他发表一般体系理论的著作，都表明了一种要形成统一的社会理论的不懈的努力。由于他的理论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因此不仅在社会学中，就是在其他行为科学中也可以听到帕森斯的声音。

帕森斯的理论指出，所有生命体系都必须满足维模、整合、目标实现和适应这四项功能先决条件。生命体系的次级分类是行动体系，包括行为准体系、心理准体系、文化准体系和社会准体系。最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就是社会，它对行动体系进行整合。信托体系、社会社区、政策和经济被看作是社会的功能先决条件。

虽然帕森斯认为，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必须优先于对社会变迁的分析，但他也承认，社会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帕森斯的控制论模型提出了四种互相联系的进化性的变迁过程：分化、适应性增长、延伸内纳和价值概化。 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在其他过程和社会结构中产生反馈。

在最初的 40 年中，帕森斯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改的过

①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体系》，第 38 页。

与人道主义社会学的假设的差异常常导致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所关心的，是形成能更精确地量度社会现象的所谓定量技术。人道主义者则常常对这种方法进行批评，而提倡更多地使用定性研究方法。

第九章　数学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应用

在对许多不同的社会学资料进行解释的时候，社会学有时要使用古典的统计方法。但是，由于缺少将统计结果合并成社会理论的程序，参数估计很少能直接与社会学理论的评价和修改相联系……因果模式似乎可以为社会学家提供一种更乐观的方法，以密切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引自兰德《路径分析的原则》

社会学的奠基之父孔德曾经断言，数学是人类用以探索自然现象规律的最有力的工具。① 当社会学对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进行探讨的时候，用曾经为自然科学服务的数学为社会学来引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数学社会学已经作为一个较大的学科中的一个专业发展起来了，但它的许多支持者都不愿意承认这种专业地位。它的倡导者认为，那不是"只有那些迷路了的数学家小派系感兴趣的狭窄的专业化领域"、"它与社会学的所有领域都是有关的"。② 对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数学工具，这样数学社会学这个术语的有用性就是可怀疑的。在讨论社会学中的各种观点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更激烈地反对数学理论这个术语。就数学本身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一种语言。

① 孔德，《实证哲学》，第32页。

② 比奥长普，《数学社会学的因素》，第4页。

但它是一种非常精密的语言，是一种可以促进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语言。巴图斯把数学模型与有机模型进行了比较，后者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在社会学理论中非常流行，并为功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二章关于功能主义的讨论)，这种简单化的生物学模型已经过时了，它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作用已经极为有限，在帕森斯派的理论中尤其如此（见上一章所进行的讨论）。同样，数学也不能为社会学提供一种单一的、独一无二的理论，而只能提供一种可以从中发展出各种不同理论的模型。②

假如人们愿意使用数学社会学这个名词的话，对于什么可以列入数学社会学的范畴，社会学家们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一般地说，它包括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1)一种可以称之为"抽象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在使用数学知识的时候，更注意的是数学模型化，而不是具体的数学资料，或者说，它关心的是利用数学知识对社会现象进行"如果……那么……"的数学游戏；(2)另一种可称之为"统计或应用的方法"，它要考察的是经验观察中的模式，并力图从这些资料中形成理论。第一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学的博弈论为代表，第二种方法的代表则是路径分析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新因果理论"。这一章将简单地讨论一下博弈论，然后更多地来讨论

---

① 巴图斯，《群体行为的简单模型》，第3—4页。

② 有机模型是由两个人用于社会学的，一个是H·斯宾塞，他对不断增加的英国政府的活动持反对态度，并倡导"适者生存"的概念，另一个是美国的反对派、社会学家、社会改革者 L. F. 华德，他呼吁将社会学用于改造社会。这个模型也为功能主义的奠基之父 E. 杜尔克姆的理论著作提供了基础，但他与斯宾塞一华德的理论观点有所不同。正如我们看到的，从有限的意义上说，这个模型也存在于帕森斯学派的理论之中，尤其是其对行为有机体的关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它是有机模型，而不讲是一种理论，正如(在社会学中)我们讲数学模型也不讲数学理论一样。

新因果理论，后者近十年来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中占有一个日益重要的地位。

博弈论：定义和举例

博弈论是一个与数学语言密切联系的跨学科领域，它已经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兴趣。博弈论所关心的，既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也不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它所强调的是，假如人们是按照博弈战略来理性地行事，他们的行为将如何。换句话说，如果完全是一种使用逻辑和数学定理的"如果……那么……"模型，就可以说，如果给出X或人的理性，事件Y就会发生。

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博弈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消长博弈(zero—sum game)和非消长博弈(nonzero—sum game)。消长博弈的原则是，"获胜一方的得益足以引起失败一方的损失"。大部分室内游戏都属于消长博弈，如象棋、许多种扑克游戏等。游戏的双方都知道固定的博弈规则，每一方都有在规则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每一方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所进行的选择。在消长博弈中的双方，都能在数学的意义上来了解对手，这种知识构成了整个博弈论的基础。消长博弈的模型也是建立在潜在的冲突和对立的基础上的。博弈的双方都力争成为胜利者，但那里却不能同时有两个胜利者。此外，这种模型还假定，有关博弈搭档的信息是有限的。双方共同知道的唯一信息就是博弈的规则。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并不纠缠在这种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损失的情境之中，在生活博弈中，他们也没有被禁止去沟通他们的行动或同其他的博弈者谈判。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第二种类型的博弈，即二人的非消长博弈。由于没有(象有关消长博弈那样的)关于非消长博弈的整合理论，

这种非消长博弈往往被标之以“性的战争”、“囚犯的窘境”的绰号。① 我们将把囚犯的窘境作为非消长博弈的例子来进行简单的讨论，这是一个人们经常列举的例子。

让我们假设有两个人，他们被怀疑犯罪而被逮捕，并被放进两个隔开的囚室之中。每一个嫌疑犯都可以对行为进行选择：他既可以招供，也可以保持沉默。由于囚犯是处于隔离的囚室之中，因此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商量，但他们都知道他们各自的决定可能造成的结果。让我们假定这些结果如下：

1. 一个嫌疑犯招供了，而另一个却并不招供。这就意味着，那个招供的人获得了自由，因此他通过提供证据而与法律进行了合作，而他的同伙将被判刑 20 年。

2. 两个嫌疑犯都招供，他们各被判刑 5 年。

3. 两个嫌疑犯都保持沉默，他们都由于私藏武器而判刑1年。

一个博弈理论家可以用这种窘境提出问题，即这个犯人如果在逻辑上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行动，他应该做什么。与消长博弈的情况不同，犯人的窘境提供了一种或是进行合作(与信赖为基础)，或是在逻辑上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动的可能性。如果双方都天真地按博弈理论行事，他们将都保持沉默，服从一年徒刑的判决。这样可能得到按双方结合起来看是最好的结果，但这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博弈战略。同伙 A 可能在同伙 B 没有招供的情况下招供了，并得到赦免。在这种情况下，同伙 A 将得到自由，同伙 B 将要服刑20 年。对于同伙 A 来说，这是最好的战略——如果同伙 B 并没有招供的话(如果 A 和 B 两个人都招供了，两个人都将被判刑 5 年)。很清楚，在招供与不招供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风险。

以这个例子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博弈双方可以对合作与不

① 巴图斯，《群体行为的简单模型》，第 223 页。

合作进行选择。如果A、B合作（都不招供），其结果按A、B双方结合起来看是最好的。如果A、B都不合作（都招供），其结果按结合起来看是最坏的（每个人监禁5年）。但要合作，囚徒A必须依赖于囚徒B的善意。他可以不按理性行事，因此，他可以作出不合作的选择。

囚犯的窘境所提供的模型也可以扩展并应用到对于社会的研究上。戴维斯列举了五种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囚犯的窘境的例子。

1. 有两个公司到某个市场上出售同一种商品。其产品的价格以及两个公司的总和销售量在几年中都没有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每个公司占领的市场的比重，而这却依赖于他们各自为库存所做的广告的多少。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假设每个公司只有两种选择：是花600万美元，还是花100万美元。

2. 水源短缺，市民们被告知要节约用水。假如每个市民都从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出发来对这种要求作出反应，将没有人会节约用水，因为很明显，个人节约的那一点水对城市的供水情况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却带来很多麻烦。但是，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利益行动，最终结果对每个人都将是灾难性的。

3. 如果没有人纳税，政府机器就会停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愿望，大家都纳税，包括自己。当然，最好的是，大家都纳税，而自己除外。

4. 在连续几年生产过剩之后，农民们同意自愿地限制他们的产量，以使价格能不断上升。但没有任何一个农民的产量就可以对价格造成严重的影响，这样，每个人都尽量去生产，并销售这些产品，而一旦如此，生产过剩就会再次发生。

5. 有两个不友好的国家都在做军事预算。每个国家都想通过建立更强有力的军队来取得对对方的军事优势，因此每一方都要花很多钱。为了获得相对优势，每一方都处于紧张状态，同时也

会变得更穷。①

正如我们在这些例子中看到的，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是合作与竞争的混合物，与其说它类似于室内游戏，倒不如说类似于囚犯的窘境。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获胜、另一个人失败的竞争性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可能是失败者——也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胜利者。竞争中有合作，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相。

虽然这样的非消长模型对研究社会要更为有用，但其发展比消长模型却慢得多。在消长博弈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定理，但这些定理用于非消长博弈上，还不能令人信服，特别是在涉及到两人以上的时候。尽管博弈论已经被用来分析一系列的人类行为，从军事战略到经济形势，以及婚姻关系，但其结果，虽然在学术上和数学上是令人振奋的，但却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社会学理论。戴维斯曾对这种情况做如下小结：

> 至少从数学家的观点来看，最令人满意的理论是二人竞争的博弈论；但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竞争的博弈是很少的。更普遍的情况是，在二人博弈中，部分是竞争的，部分是合作的，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普遍接受的理论。②

但是，还是有一些社会学家在博弈论方面继续进行发掘，以期找到一些理论上的"金块"，以丰富我们的科学理论。

新因果理论

虽然博弈论已经找到了进入社会学的途径，但它受到的对待，远不及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新因果理论。新因果理论并不只是一种

① 戴维斯，《博弈论：一个非技术性的导论》，第95—96页。

② 同上，第x页。

数学模型，它也提供了一条沟通理论与研究的桥梁。新因果理论没有使用假设的模型或“如果……那么”的情况，新因果理论的坚实基础是经验性的社会世界。它是将包括广泛使用的路径分析在内的统计分析，扩展到构造社会学的理论。

穆林斯（N·Mullins）追溯了社会学中新因果理论的发展。[①]他把新因果理论中理论与资料的互相结合与功能主义的更抽象的、更理论化的思考相对照。虽然结构功能主义者都关心理论的发展，但理论家们往往是提出模式，让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去进行检验。在另一方面，方法论者则为对检验感兴趣的人提出进行研究的技术。穆林斯注意到，“这种模式是由默顿和帕森斯建立的；这两个人尽管都不是方法论上的老手，但他们都能找到在方法论上经验丰富的同事[如拉扎斯菲尔德（P·Lazarsfeld）特别是斯多福（S·Stouffer）]和学生，和他们一起工作”。[②]这样，在“理论家”和“方法论者”之间造成了一种人为的角色分工。穆林斯指出：“一个既从事理论又擅长方法的人可认为是卓越的社会学家，但卓越的社会学家为数很少。”[③]

新因果理论家不只是在原则上而且也是在实践上，致力于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互相联系（功能主义者只是在原则上）。当他们作为理论家在社会学的实质性领域进行工作时，照例要使用方法论者的工具。这些数学取向的社会学家，反对理论与方法的分家，认为理论必须建立在“方法论基础”之上。穆林斯认为，在结构功能主义者和新因果理论家之间有一种很紧密的关系。他认为，后者（他们现在是处于社会学这一行的顶端）与前者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于他们的技能和兴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差异并不

① 穆林斯，《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与理论群体》，第213—249页。

② 同上，第214页。

③ 同上，第240页。

是不可调合的。穆林斯预测说，“我的希望是，新因果理论与标准的美国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之间本来就不多的差别将逐步地消失，他们双方将综合起来；这样一来，由于新因果理论在理论家的思想和技术之上加上了一种综合性的方法，社会学将有更广泛的用途。”①

穆林斯认为，新因果理论在社会学中正处于一种有力的和受尊重的地位。虽然他也承认新因果理论家“并没有完全被(社会学)这个学科完全接受(而且也似乎并不可能被完全接受)”，但他“希望，从这个学科的成员中将出现大量的研究、著作和合作者”。②布劳和邓肯（O. D. Duncan）合著的著作就是应用新因果理论的一个例子。布劳与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可以看作是发展新因果理论的一个著名尝试。

《美国职业结构》：一个新因果理论的例子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新因果理论致力于在理论与研究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虽然人们不只一次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努力，但我们这里所举的这部著作却表明了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关心。布劳和邓肯在他们的著作中谨慎地表述了他们的目标：

> 本书旨在对美国的职业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是我们社会分层系统的重要基础。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从最初的职业到最终的职业流动过程，被看作是职业结构动力学的反应。通过分析这些职业运动的模式、影响这些运动的条件以及职业运动的后果，我们就可以部分地解释美国分层系统的动力学。这种探索的基础，就是对所收集的经验性资料进行考察，

① 穆林斯，《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与理论群体》，第241页。

② 同上，第238页。

这些资料是从有代表性的样本，即20—64岁之间的20000多个美国人中得到的。①

布劳他们注意到，他们并没有要自己去证明与"社会政策和行动计划"有关的研究结果，然后他们继续写道：

> 我们并没有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即以我们的经验研究的结果为基础，来形成一种关于分层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局限于报道"事实"，或是让材料自己来讲话，它也不意味着我们赞成科学研究与理论之间的人为的分离。相反，我们力图将我们的研究结果置于一种理论框架之中，并对这些结果提出理论上的解释。

布劳和邓肯所强调的是，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没有任何一次研究，包括他们的研究，就可以独立地形成一种完备的理论。但他们坚信，他们的内容广泛的著作有助接近这种理论知识。

布劳和邓肯的主要工作是集中于研究社会流动和职业结构中的分层，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分层的讨论中举出一个新因果理论模型的例子。布劳和邓肯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分层，也就是"个人或是被置于或是自己置于系统中包含的特定层次地位的过程"，既可能是由于先赋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成就的原因。② 在当代社会中，分层涉及到先赋性（由于出身而拥有的特权）和个人成就两个方面。布劳和邓肯指出："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这两个原则哪个相对重要些，是一个需要定量化的问题。我们的努力就是寻找一种有关的定量化的方法。"③ 他们选择了一些有关的定量化的变数，他们认为，这些变数就足可以描述"地位变化的主要轮廓"。

① 布劳和邓肯，《美国职业结构》，第1页。

② 同上。第63页。

③ 同上。第64页。

在他们的基本模型中，他们只分析了5个变数：V是"父亲的学历"；X是"父亲的职业身分"；U是"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W是"被调查者的第一个工作身分"；Y是"被调查者在1962年的身分"。这些字母是随意选定的，用以代表不同的变数。每一个变数的有关内容可以用一个数码来表示。比如，0代表"没上过学"，1代表"一至四年级的初级小学"……7代表"四年制大学"，8代表"五年制或五年以上的大学"。

布劳和邓肯把他的方案概述如下：

> 在分析中，控制概念方案是较容易的。我们认为，可以把个人的生活周期看作一种时间序列，这个序列可以最后用一些分类的或量化的手段来进行部分的或大略的描述。从理论上来说，最好能观察一大批新出生的人，然后在他们的一生中进行追踪调查。但在实践上，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对问题进行回溯，选择出接近于那些刚出生的人的样本，并指示出他们一生中的某些经历。我们假定这些资料是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并可以用观察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①

他们为进行分析所选择的变数，表示在图四的相关矩阵中。这个矩阵的资料，可以表明被调查者1962年的职业地位与他的第一个工作、受教育程度、他父亲的工作、他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是用这个例子，可以对被调查者的第一个工作(可以推断那是在1962年之前的)和他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父亲的职业、受教育程度作出相关分析。然后将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父亲的职业身分做出相关分析。最后，是对父亲的职业身分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进行相关分析。由于完全相关是变数之间的关系等于1，

---

① 布劳和邓肯，《美国职业结构》，第164页。

五个地位变数简单相关

	变数	Y	W	U	X	V
Y	1962 年职业地位	…	.541	.596	.405	.322
W			…	.538	.417	.332
U				…	.438.	453
X					…	.516
V						…

图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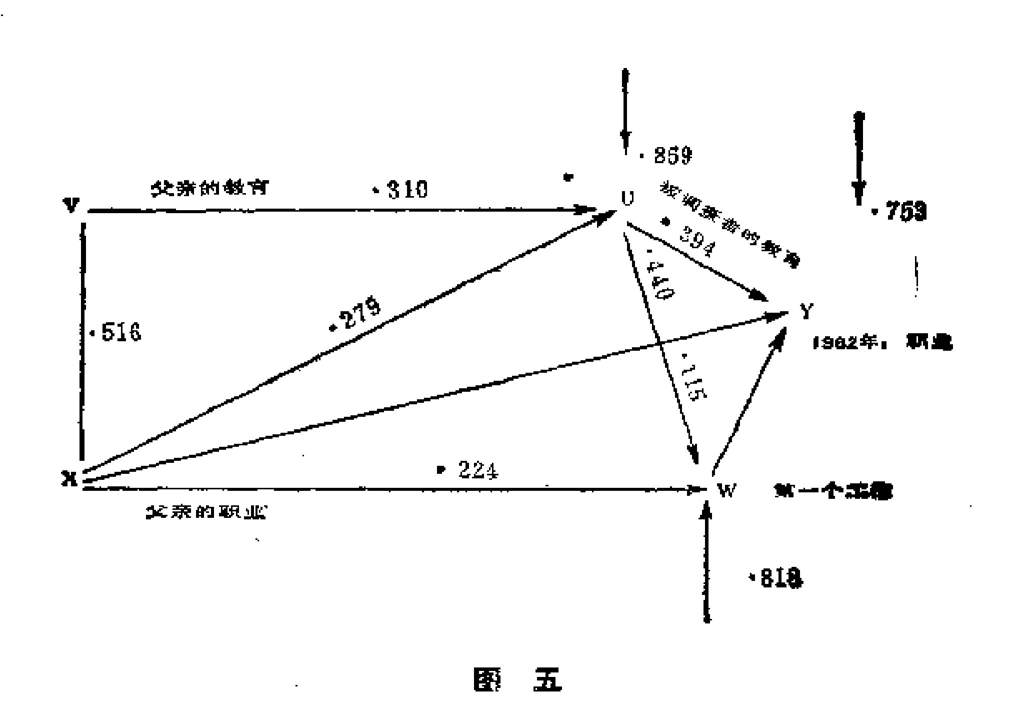


图　五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相关程度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变数Y（1962年的职业身份）与变数U（受教育程度）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关系(.596)，而变数Y（1962年的职业身份）与变数V（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只有.322，前者要强于后者。

这种简单的相关虽然是描述性的，但本身并不是理论。为了对他们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布劳和邓肯不得不对这些变数

的因果关系作出一些假设。在这个研究中，因果关系的确定是一种严格的逻辑程序，“必须避免印象和含糊不清的逻辑表述”。要将因果推理与变数之间的相关结合起来，研究者就必须对这5个变数进行排列。以这些资料所提供的统计相关为基础，并使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者就可以构造图五所示的分层过程模型。对这种简单的路径图，可以作如下解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职业在时间上要先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职业和第一个工作，因此是“因”。同理，被调查者的受教育要先于他的第一个工作以及他在1962年的职业，并与后两者有一种因果上的关系。

对这种路径图的接受，要依理论上和经验上的考虑而定。首先，这种考虑要包括有关因果排列的假设：“在设计这个图之前，我们至少要知道——或是愿意假定——所观察的变数的因果排列……这种知识是外在的，是先于资料的，它要描述的只是关系或相关。”①

第二，因果方案“必须是详尽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原因都要考虑到”。在这个模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没有加以度量的其他因果关系作为“剩余因素（residual factors），也就是假定它是与保留的因素不相关的”。因此，在表五中，变数W的.818或近82%的“因”没有加以度量；在变数Y中，这个模型不能解释的“因”达75%；在变数U中，不能解释的“因”有85.9%。布劳和邓肯认识到，有许多事情是需要由剩余因素来解释的，可以基本把这种情况看作是“黑箱”（black boxes）。他们指出：“我们距离做出可信的因果推断的距离还很远，这里所展示的各种方案最好被看做是第一次近似于充分的因果解释。”②

需要考虑的第三点是，就那些包括在模型中的变数而言，这个

① 布劳和邓肯，《美国职业结构》，第171页。

② 同上，第172页。

路径模型是否令人满意。"从经验性的方面来看,在最低限度上也要检验因果图的充分性，即它是否能够对所量度的变数之间的相关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① 然后布劳和邓肯对路径分析中所牵涉到的基本统计定理进行了检验,发现它们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

布劳和邓肯欢迎对他们的模型进行修正，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分层过程。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著作看作已经完成的理论产品，而是把它看作是形成更精确的理论的最初步骤。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逻辑工具和更好的处理资料的手段。

路径分析是可以用于构造因果理论的几种统计技术之一，布劳和邓肯使用的就是这种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为现实提供一个简单的模型，因为它只使用几种有限的变数，并证明它们的相互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布劳和邓肯的模型使用了 5 个变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被调查者的第一个工作、被调查者在 1962 年的职业。不可否认，这个模型并没有对整个现实进行描述,而是局限于观察职业流动。其他可能有关的变数(如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智商、妈妈的受教育程度、历史因素)都没有放到这个模型中去。目的就是要选择那些更相关的变数,也就是对解释所研究的现象更有用的变数。其他的变数(如上面已注意到的)可以称之为外在变数（exogenous variables)，但在模型中并不研究它们。

如同所有的统计技术一样，路径分析也要求在有效地使用资料之前，要作出一些假设。虽然在这本书中我们不能对这些假设进行讨论，②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所考察的变数必须是能加以精确量度的。毫无疑问，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就是这样的变数。如果

① 布劳和邓肯,《美国职业结构》,第 173 页。

② 对路径分析的原则以及它所作出的假设的讨论，可见兰德（K. C. Land）的《路径分析的原则》一文。

将这种技术或其他先进的统计技术用于分析不太可能定量化的变数，如工作的满意程度、父子关系等，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并会引起很多争论。那么，路径分析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用于构造理论，特别是用于构造超出对有限的社会现象进行有限的解释的理论，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在社会学理论中运用数学的批评

在对每一章作结论的时候，我们都会涉及到有关人和社会的形象的问题，这些形象或是明确或是暗含地包括在我们所考察的理论之中。这个问题对于数学社会学来说似乎是不适用的，其理由就是本章开头的一段所表明的：所提出的理论实际上是否是社会学的理论，或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学理论，对此是大可怀疑的。换句话说，有关博弈的各种理论，与其说是社会学问题倒不如说是数学问题。同样，有关路径分析的理论，也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关于数学和统计学的假设，最好还是放到社会学方法和统计学的课程中去进行讨论，在那里才有可能形成必需的数学基础。可以认为，数学社会学只是简单地将数学定理应用于社会学，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

但我们可以推断说，为了使用这些模型，数学社会学必然对人持一种决定论的观点。比如，在给出了关于所有的变数的知识以后，我们就应该能够计算出个人职业流动的可能性。在使用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来研究人类行为的时候，社会学家常常就有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即人是受与支配自然科学同样的决定性法则支配的。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并不存在将数学用于构造理论的唯一方法，这样，如果不把某种方法特地挑出来，要批评其理论假设是很困难的。为了形成一般性的批评，我们将依靠马萨里克（F·

Massarik）对社会科学中各种应用数学的方法的讨论，以及他对四种数学和反数学的亚文化的看法。① 我们将对其中的每一种进行一下简单的讨论，以论证或是盲目地在社会学中使用数学或是盲目地反对在社会学中使用数学的作法所存在的问题。

1. 有名无实：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多德(C·Dodd)是较早地将数学应用于社会学的人之一，他"讲话很有激情，确信需要一种数学社会学"。② 虽然多德的著作表面上看是很有逻辑性和严密性的，但它纯粹是描述性的，如果说对社会学家构造更好的理论的能力有贡献的话，这种贡献也少得可怜。马萨里克指出，"困难就在于它使用的是有名无实的符号系统，而缺少真正的数学重要性"。③

马萨里克认为，虽然这种技术的支持者们在30—40年代都是很有前途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文化的产儿是注定要流产的"。④ 这种努力中的一些分支对后来这个领域中的数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这些"有名无实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形成他们的希望，只是在研究数学社会学的历史的意义上，他们才具有某种重要性。

2. 乏味的统计学家：按部就班的使用者的文化。马萨里克对这种文化的定义是，"他们的命根子就是资料流，他们的身分象征，就是进行数学计算"。⑤ 虽然正确地使用统计学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乏味的统计学家"只是带了点唯科学论的气味，而不是真正的科学。马萨里克指出：

> 当数学统计学家和方法论者创造新程序的时候，按部就班的使用者的文化却正在流行，这种流行一时的风尚达到顶

① 马萨里克，《巫术、模型、人和数学文化》，见马萨里克与拉图什所编的《对行为科学的数学探讨》。

② 同上，第10页。

③ 同上，第10页。

④ 同上，第11页。

⑤ 同上，第12页。

点，然后又消失了。比如，在某些时间里，各种技术都流行起来，包括变异分析、多元相关、因素分析等，这些技术本来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是适用的，但在行为科学历史的某些特定阶段，这些技术却被不适当地滥用，因为似乎他们就是"做那些事情的"。①

由于近年来路径分析在社会学中广泛流行，其中的某些应用已经受到批评。正如科塞所提出的，② 值得怀疑的是，路径分析是否具有形成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更好的理论的潜在性。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在社会学中不加区别地使用统计学。许多社会学家并没有受到数学和统计学的充分训练，这是造成在这个领域中误用或滥用统计技术的因素之一。同时，电子计算机也产生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结果，但其中可能有许多并不适用的数据资料。因此马萨里克反对的第二点，就是不加区别地使用统计程序。

3. 反数学团体：无论是在社会科学中还是在更大的社会里，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反对在研究人时使用数学的意见。马萨里克指出了反对意见的几个来源。③ 一是害怕数学会造成非人化的结果；这种担心是由电子计算机在商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广泛应用引起的。其战斗口号就是，"我不想当数码，我是活生生的人！"马萨里克认为，在社会学界中主张这种思想的人们宣称，"人类行为的本质就是如此的微妙、如此的变化多端、如此的复杂，又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决不能被简化为那些令人误解的、简单化的数字语汇"。④ 反对在社会学中使用数学的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干脆拒绝学习

① 马萨里克，《巫术、模型、人和数学文化》，见马萨里克与拉图什所编的《对行为科学的数学探讨》。第 12 页。

② 科塞，《寻求本质的两种方法》，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40 卷，第 691—700 页。

③ 马萨里克，《巫术、模型、人和数学文化》，见马萨里克和拉图什所编的《对行为科学的数学探讨》，第 15—16 页。

④ 同上，第 15 页。

它的语言，拒绝与那些建立数学模型的人对话。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如何在社会学中使用数学有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试图使用数学，但又常常为不能恰当地使用数学而感到内疚。

对于在社会学中使用数学的反对意见，似乎主要是来自人道主义社会学家，而不是来自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人道主义社会学家对人的假设与自然主义同行的假设是不同的。由于基本假设的不同，他们反对自然主义的理论，这自然也就包括更特殊一些的数学理论。

4. 模型建立者的文化：一个在上升的世界。在考察模型建立者的时候，马萨里克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些社会学家，他们关心的就是数学模型，而根本不考虑现实的经验世界。虽然所建立的模型会有助于社会学理论的有意义的发展，但它也会将人引向歧途，因为他们把建立模型本身当作了目的，而不是当作实现更好地了解人类行为的目的的手段。正如马萨里克所指出的：

> 模型本身就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在概念上非常精致的最终产品。它可以从逻辑上证明某种看法，也可以从逻辑的基点来进行批评。但是从模型建立者的气质看，他们更适于进行抽象，而不适于处理繁杂的、多少有点“脏”的资料，特别是自然主义者所得到的整个系统的、格式塔式的资料。这样，模型本身就“自动地成为一种动机”；而经验检验被看作并不是很重要的，是脱离了方案派的“主流”。①

一个全力于博弈理论的数学公式，而不考虑它对于社会科学的有用性的社会学家，就是这第四种失误的例子。实际上，大部分数学社会学就是由在不使用资料的情况下建立的模型构成的，这使它成为马萨里克最后所做的批评的对象。

① 马萨里克，《巫术、模型、人和数学文化》，见马萨里克和拉图什所编的《对行为科学的数学探讨》，第17页。

摘　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学一直为理论与研究的两分法所困扰，对此，无论是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都深感痛惜。一些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喜欢用精确的方法来构造理论，相反，人道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则常常反对这些由自然科学方法支配的研究程序。一些人预言新因果理论是一种利用精确的统计分析和所产生的资料以作为理论构造的基础的方法。

按其最完善的形式，它可以使用电子计算机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可以使社会学家不再去建立那种寻找现象的单一原因的简单化理论，而转向更复杂的、多因果模型。路径分析的支持者认为，使用象路径分析这样的方法，社会学家可以更加接近于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新因果理论可以适用于马萨里克对合理使用数学模型的描述，他说“多因果性，以及各种力的互相作用问题可以越来越多地加以恰当的处理，而不用对人类关系的无限复杂性加以粗暴的处理”。①

许多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在社会学中靠近人道主义一边的社会学家，对于数学在理论构造中的有用性是表示怀疑的。他们认为，虽然有限制地使用数学和统计学对资料分析来说是有价值的，他对于形成理论并没有什么用处。那些对将数学用于精确的理论构造的潜力表示乐观的人，则指出了在构造新因果理论中使用路径分析的正当性。新因果理论是具有理论上的潜在性，从而代表了自然主义社会学家所寻求的资料和理论之间的联系，还是一种只有有限的理论价值的简单的资料分析技术，这个问题还要看一段时间。从时间上来说，它的理论成果还不成熟。只有时间才能决定它不断成熟或是夭折。

① 马萨里克，《巫术、模型、人和数学文化》，见马萨里克与拉图什所编的《对行为科学的数学探讨》，第14页。

自然主义社会学小结

在开头的那一章中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人们对我们所称的自然主义纯理型理论支持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其结果是形成一个在社会学中寻找理论的理论上的连续统一体，这很类似于在自然科学中对理论的寻求。这种理论的特征是，它假设人们的行为是受那些在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模式制约的。社会学理论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规律。

在这一部分讨论的理论家可以划分为对立的社会学思想的"学派"。一个流行的人为的两分法就是"冲突学派"与"秩序或功能学派"。根据这个模式，可以说兰斯基和科塞代表了冲突学派，而其他的理论家则可以归入"秩序"学派。我们认为，这种对"冲突"与"秩序"的划分并不是社会世界的反映，社会世界包含着这两种现象。这里所讲的社会学的所谓秩序学派与冲突学派的区别，大部分是在于他们强调的东西不同。比如默顿就不否认社会冲突，而只是在他的功能主义范式中强调秩序和一致。反之，科塞经常被称之为"冲突理论家"，但他并不否认社会结构中的秩序，而只是想证明冲突是结构由以产生和变迁的过程。布劳在讨论社会关系中交换和权力的作用时，很明确地接受了秩序和冲突这两个概念。兰斯基在他的分层理论中则企图把关于秩序的保守观点与关于冲突的激进观点综合到一起。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所要证明的是，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家——无论他们是秩序的观点还是冲突的观点——都分享了关于人和社

会的性质的假设，并认为把自然科学的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模式是适宜的。所有这些理论家都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假定，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世界支配的，就象自然界受稳定的规律支配一样。虽然人们也可以进行选择，但大部分选择是由结构决定的。社会因素制约着个人，并决定他们的行动。虽然这种假设在表达上以及在被接受的程度上是不同的，但是，自然主义社会学家都同意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似性是有用的。

但同时，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部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包括是强调秩序还是强调冲突。这种情形也可以通过理论家是关注于广涵理论还是关注于更有限的局部理论来加以证明。还可以看到，这种差别还表现在，有的人试图从已有的资料中构造理论(归纳理论)，如同新因果理论所做的那样；有的人则先从逻辑上构造理论，以为后来的经验检验提供命题（演绎理论)；或是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应使用，正如兰斯基在分析分层系统时所要做的那样（在人道主义的框架中亦可发现这些差异的根源)。我们认为，自然主义社会学中的这些重要的不同之点，根源就在于他们对构造理论的最佳方法持有不同的见解。

公平地说，自然主义的理论家都致力于理论构造的精密性，但他们对这一点认同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自然主义理论家强调的是置于范畴和分类中的概念如何形成和定义。这些理论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理论构造中不能很快超越概念的层次。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第八章进行讨论)就是这种学者的代表，他们强调的是抽象的概念及其范畴化，而不是概念陈述。其他的一些自然主义理论家则是很快给他们的概念下定义，然后就去形成概念陈述。路易斯·科塞(第五章)就可以作为这种方法的例子。在科塞的著作中，每一个命题都成为新的一章的基础，但

他并不试图把这些命题系统地联系起来。由于把理论定义为一套互相联系的命题，因此，一些理论家不仅要对概念进行定义，而且也形成命题，并试图把命题互相联结成一种单一的理论。乔治·霍曼斯(第三章)有关交换理论的著作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也有一些理论家要比关心形成自己的理论更加关心按照自然主义的模式来对理论进行批判。比如罗伯特·默顿(第二章)，在他为社会学提供一些引人注目的理论洞察时，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超验的理论途径；也就是说，他是评论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形成作为一套互相联结的命题的理论。所强调的这四个方面——概念、命题、互相联系的命题、超验理论——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坚持自然主义理论的一个类型。

在自然主义理论中还有另外一种途径，也就是他们不仅将社会科学类比于自然科学，而且实际上致力于所有科学的统一。这种观点认为，必须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统一理论(而不仅仅是不相干的局部理论)，从理想上说，这种理论应该是合并而成的统一理论。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统一的知识本身，但科学家在各自领域工作的时候应该记着这个模式。以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第八章讨论的)为代表的普通或现代系统理论，就为这种途径提供了一个例证。普通系统论强调，为了创立统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模式，以方便科学家间的沟通。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自然主义理论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学要按照自然科学的形象塑造自己。但是，就这种模式的具体应用来说，它们忠实于自然主义理论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从现实性来说，如果按照科学哲学家所提出的关于互相联结的命题以经验上的可验证性的严格条件来衡量，就可以说社会学中很少有自然主义的理论。这一直就是社会学的两难状态——理想的理论

与我们在社会思想史和当代理论家的著作中发现的理论的不相符。从许多方面来说，由于我们研究的课题的复杂性，我们的社会学产品还没有满足我们的科学抱负。

第 二 部 分

解释性社会学理论家

第十章　在扮演生活中的行动：作为理论的拟剧论

由于戏剧的语言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学之中——社会学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来研究舞台中的事情就是很有意义的。其价值还在于，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那些令人费解的问题。所有的世界① 都象一个舞台，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上来，用烦恼消磨我们的时光，我们所有的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但舞台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物？

引自戈夫曼《框架分析》

在大部分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中，所强调的都是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或更大的社会结构。除了霍曼斯的社会行为主义外②，处于互动中的个人都没有成为理论注意的中心。无论是按照冲突或一致，还是根据这两个过程的综合来分析社会群体，个人行为一般都被作为结构性齿轮上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轮牙而一带而过。

在自然主义的社会学中，个人被看作是直接对社会刺激发生

① 原文 word，显然是印刷错误，应为 world。——译者注

② 虽然霍曼斯愿意从对个人的行为的研究开始来推演社会学理论，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关于人的模型公认是决定论的，他的理论模型很明显是自然主义的。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所要证明的，戈夫曼关于人的模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论的，其与霍曼斯的理论相去不远。但戈夫曼关于理论的看法以及他所熟练地使用的人道主义的资料来源，又使他远离自然主义，而趋向于人道主义的一端。

反应。附着于人类互动之上的意义以及对人类互动的解释被忽略了，以适合于自然主义模式中被决定的人的形象。这些理论中的大部分(交换理论可能除外)都很少论证过人类互动的形成过程。人道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试图将强调的重点从结果转移到人类参与互动的动态过程，而这种过程最终将产生出结果。它强调的重点是人类行动者，而不是社会结构。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无论是理论家们认为社会结构决定个体行动者，还是认为个人的行动对社会结构的作用，其强调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功能主义者是前一种理论家的典型代表，而社会心理学理论则典型地代表后一种理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曼斯最初是作为一个功能主义理论家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后来他转向了社会心理学理论。戈夫曼（E.Goffman）则相反，他常常被看作是一个非常关心分析人类互动的理论家，但他的批评者却认为他过于强调决定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情境了。象霍曼斯一样，也可以将戈夫曼置于极端的自然主义与极端的人道主义之间的某个地方。①

如同霍曼斯一样，戈夫曼的理论也把个人（而不是更大的结构)作为分析的单位。但与霍曼斯不同的是，戈夫曼并没有利用其他的科学理论来形成自己的社会学模型（霍曼斯是使用了行为心理学和经济学)。正如这一章开头引用的导论性的引文所表明的，戈夫曼使用了戏剧和舞台的比喻来描述人的行动。正是因为如此，戈夫曼被称之为"拟剧论者"，即使用戏剧舞台的语言和形象。戈夫曼在1959年出版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为他的关于

① 虽然戈夫曼是在功能主义的影响登峰造极的时代接受社会学的训练的，但他强调的是个人，并选择特定的技术来收集资料以支持他的理论观点，在这方面他与功能主义是分道扬镳的。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所受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许多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都是在那里发源的。相反，霍曼斯则是在哈佛受的教育，那里是美国功能主义的发源地。

个人在社会世界中的行动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并为他以后的一系列著作提供了框架。

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

戈夫曼的兴趣不在于社会结构，而主要在于面对面互动或合作。戈夫曼将面对面互动定义为"在互相直接见面的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行动的交互影响"。① 这里通常有一种由一系列的个人行动构成一种活动的机会。在某种社会情境中的特定参与者的活动总和可以称之为表演，和其他人一起投入这种情境的人既是观察者，也是共同参与者。每一个行动者都是表现剧情的人。戈夫曼给剧情下的定义是，"表演期间所显示出来的预先建立的行为模式，它在人们互相接触的时候表现出来，或是由人们来表演"。②

在讨论表演的时候，戈夫曼认为，个人可以将自己展示在他人的面前，但这种表演所给予人的印象却是不同的。一个人可能很真诚地相信他所表演的行为，也可能对自己的表演抱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比如，一个医生可能对他治愈某种疾病的能力是不太自信的、甚或是怀疑的。但是在与充满疑虑的病人进行互动时，他就可能进行表演，使病人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日常互动的过程中，表演者可能会对自己的行动感到不耐烦，但观众却可能接受这种表演。比如，当一个医生开了一个减轻瘘的感染的药方时，人们就会相信这个行动有助于减轻病人的痛苦，而病人通常也就相信这个诊断和所开的药方。

按戈夫曼的看法，表演有两个区域，即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个人按一种一般性的固定方式进行表演，以为观看表演的观众规定

①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15页。

② 同上，第16页。

特定的情境的部分"。① 它包括布景和个人的门面，后者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外表和举止。再看医生的例子，他表演的剧情就是发生在经过特别装备的办公室这个布景中。外表则可以定义为"在告诉人们表演者的社会地位时起作用的标志"。② 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就是把医生与其他办公室职员区分开的标志。举止则是"在告诉人们表演者在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时起作用的标志。"③ 比如，我们可以预期，医生在接待病人的时候，将是自信的、不动感情的、镇静的，这有助于从职业的角度加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戈夫曼认为，在从事例行事务的时候，个人将显示出自己的一种理想化的面孔："表演者会掩盖或部分地掩盖与他自己理想的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④ 虽然一个人可能有大量的例行事务要做，但他趋于将手中正在做的看作是最重要的。因此，虽然一个医生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可爱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或是一个很好的网球手，一个业余诗人，但她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医生所要做的事情就远比其他角色重要。同样，在网球场上，她作为一场球赛的比赛者的角色所要做的事情也会优先于她作为一个医生的角色。自我的理想化面孔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使表演者能"加强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对按规定所做的事情的表演以及他与观众的关系具有特殊和唯一的性质"。⑤ 因为没有任何病人愿意受到象对待商品那样的对待，医生必须强调病人与医生关系的唯一性，而没有超出适合于这个职业行为的范围。

---

①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22页。

② 同上，第24页。

③ 同上，第24页。

④ 同上，第48页。

⑤ 同上，第48页。

除了进行表演的前台地段之外，还有一个后台。所谓后台，主要是依所考虑到的观众而定。医生的私人办公室就可以成为一个临时的天堂，在那里，他休息的时候可以脱下他的白大褂，可以把脚搭在桌子上，可以和护士开玩笑。在这个后台区域中，虽然护士可以看到他，但病人看不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办公室可能会成为一个会诊室，这样就又成了一个前台。

表现剧情往往不是由一个人单独来做的，戈夫曼提出剧组这个概念，用以指"在表演某种剧情时进行合作的一些人"。① 这样的小组可以是医生与所接待的病人，也可以是总统和他的顾问班子。戈夫曼提出了剧组表演中的一些基本因素：

> 首先，在剧组表演进行的时候，似乎剧组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用不适宜的行为使表演走样或中断的力量。每一个组员都依赖于同伴的合适的行为，反过来，这些同伴也要依赖于他。
>
> 第二，剧组的成员为了在观众面前造成特定场景的意义，就必须互相合作，而在彼此之间，他们似乎就不太可能维持那种自己给人的特殊印象。……然后(在台下)"放肆说笑"又可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联系的程度与他们作为一个剧组行动的次数以及表演的数量成正比。②

戈夫曼认为，"如果在剧组的成员中存在普遍的意见不一致，这不仅会使他无法进行统一的行动，而且也会妨碍他们所要塑造的现实"。③ 在按剧情进行表演的时候，剧组的成员必须能够得到信任；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挑选。一个向某个病人说另一

---

①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 79 页。

② 同上，第 82—83 页。

③ 同上，第 86 页。

个病人的闲话的护士，一个不能给雇主找到足够顾客的委托人，一个使总统犯罪的白宫中的副官，都是破坏剧组按剧情演出的例子。

剧组是为了观众而演出的。戈夫曼认为，一个剧组就是一个"秘密社会"，而且并不仅仅在外表上是如此。戈夫曼继续写道：

> 由于我们都参与了这个剧组，我们就必须与那些有着某些可爱的过错的人合作做某些事情。由于每一个剧组都要维护某些情境定义的稳定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隐瞒或掩盖某些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表演者有时会偷偷地偏离他作为一个同伙的行为。①

表演者必须能成功地表现性格。在出现危机或中断的时候，他们要有某种"补救表演"的特质。戈夫曼提出，有三种类型的特质或活动可以用于克服妨碍表演者的因素：

1. 表演者所使用的补救自己的表演的预防性措施；
2. 观众或局外人用以帮助表演者补救其表演的保护性措施；
3. 表演者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使观众和局外者能为了表演者而使用那些保护性措施。②

预防性措施包括戏剧的忠诚（要对它们的作用保持沉默，这几乎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戏剧训练（包括按自己的路子进行表演，而不受他人表演的干扰）及戏剧上的慎重态度（在事先决定进行表演的最好方法）。戈夫曼认为，忠诚、训练和慎重的态度是保证剧组的表演不出错的三种基本特质。

而最重要的保护性措施之一就是老练。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要确保后台是不能随便进入的。戈夫曼说，"人们都要自动

---

①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105页。

② 同上，第212页。

离开没有被邀请进入的领地"。[①]但在必须与局外人进行互动的时候(如有两伙人在饭馆中坐在相邻的两张桌子旁)，老练就要求人们必须记住这是在进行表演。

如果"观众运用老练或保护性措施来为了表演者而保护表演的话"，表演者就必须按同一种方式行事，这样才能收到老练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老练对老练"。[②]戈夫曼举了一个例子，即一个秘书玩了一个手腕，告诉一个来访者她的老板不在家。对于来访者来说，明智的做法是从接待室中退出来，避免听到老板对秘书在电话中讲什么。

在《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一书中，戈夫曼把社会机构看作是一种封闭的系统；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正在进行的特定表演，而不考虑其他制度对表演的重要作用。戈夫曼认为，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察机构。[③]这些角度包括：技术的角度(根据其效能对制度进行分析)，政治的角度(根据需求)，结构的角度(根据地位)，文化的角度(根据制度的道德价值观)，戏剧的角度(根据上面所进行的分析)。拟剧论把自我看作是由社会情境所决定的产物，在许多方面就如同舞台上的性格是预先写好的剧本所规定的线索和活动的产物一样。性格是存在于戏剧舞台这个封闭的系统之中，而与舞台之外的更广阔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行动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在表演期间他给人的印象。

在戈夫曼对精神病院所做的经验研究中，继续把自我看作是封闭性系统的产物。这样，拟剧论就成为一种描述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戈夫曼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即"当一个人在主观上

---

①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 229 页。

② 同上，第 234 页。

③ 同上，第 240 页。

经历住院者的社会世界时，这个社会世界的状况”。①

《庇护所》：对总体制度的经验性的拟剧论分析

《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一书虽然也援引了日常生活的例子，但并没有把经验研究与理论结合起来。戈夫曼的第二本书，即《庇护所》则既包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理论的内容。这些资料是从对精神病院的四年多的观察中得到的，其中有一年他集中观察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一个叫圣·艾丽扎贝斯的医院的实际活动。戈夫曼想要“了解住院者的社会世界”，②并要将他的观察结果和见解形成一种理论观点。

戈夫曼的拟剧论涉及的是作为封闭性系统的产物的互动。因此，他认为来研究一种纯理型的封闭性系统是适宜的，这种封闭性系统就是他所说的总体性制度。戈夫曼把总体性制度定义为“一种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切断了与更广大的社会的联系，这些被控制的人形成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有正式管理的生活区”。③很清楚，精神病院就很合乎这个定义。

戈夫曼提出，这种总体性制度有五种类型：

1. 所建立的制度是为了照顾丧失生活能力且无危害性的人的；如盲人之家、老年之家、孤儿之家及收容穷人的机构。④

2. 所建立的机构是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同时又对社区造成威胁的人，当然这些机构建立时也许目的并不这样明确，如：

---

① 戈夫曼，《庇护所：关于精神病人及其他受庇护者的论文》，第 ix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xiii 页。

④ 同上，第 4 页。

结核病保健所、精神病院、麻疯病院。①

3. 所建立的第三种类型的总体性制度是为了保护社区免受有意的威胁，而被隔离的人的福利并不是被考虑的直接目标，如监狱、感化所、战俘营、集中营等。②

4. 所建立的制度是旨在更好地完成某些工作任务，并为他们调整自己提供一种唯一的工具性背景，如军营、轮船、寄宿学校、工作团体、殖民隔离带，以及生活在服务人员生活区的人所看到的公寓大楼。③

5. 所设立的机构成为现实世界的退身之地，并常常成为宗教培训站；如修道院、修女会，以及其他寺院。④

戈夫曼认为，在较大的社会中，人们要参与许多群体的活动，如谋食的群体、工作的群体、游戏群体，他们要依赖于不同的参与伙伴。而在一个总体性制度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同一些人共同来做的，并处于严格的日程表和严厉的权威的支配之下。在这里面，在管理者或处于权威位置的人与被管理者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鸿沟；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在精神病院中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住院者的世界和职员的世界。戈夫曼的主要注意力就是在于分析处于总体性制度中的住院者的世界和他们的行为。

病人被送进医院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别"旧的"自我。被接纳住院就代表着一种转变，即从住院前病人的舞台转到(住院)病人舞台，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戈夫曼说，"我认为，住院前病人原来至少有一部分权利、自由和作为一个公民的满足感，而最后

① 戈夫曼，《庇护所：关于精神病人及其他受庇护者的论文》，第4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同上，第5页。

④ 同上，第5页。

的结果却是通过对精神病人的隔离几乎剥夺了所有的这一切"。[①]戈夫曼所关注的就是，这种剥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在戈夫曼看来，这是制度结构的结果：

> 这样，自我可以被看作是存在于社会系统为其成员所作的安排之中。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并不是个人被赋予的特质，而是存在于把他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的社会控制的模式之中。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构成自我的时候，并不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②]。

在对精神病治疗机构的讨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戈夫曼认为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观点。病人对这个组织表示认同，他进行活动的根据部分地是对机构规范的服从，部分地是对这些规范的反对。戈夫曼认为，自我是对与结构的合作和对结构的反抗之间的一种平衡。他认为自我是处于对结构的认同和对结构的反抗之间的一种实体。自我试图对这两个极端进行平衡。他认为，总体性制度中被隔离的成员是这样，更大的社会中的参与者也是如此。为了自我的形成，人们必须对组织和结构表示认同，并与之发生关系。

无论是在精神病院还是在其他的社会情境中，行动者都要学会影响整个系统。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就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即为了使自己得到某种特权而向职员行贿。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也是精神病院生活中的一部分，就象在其他制度中那样。戈夫曼分析的焦点是描述自我的表演。他强调指出，即使是在总体性制度中，个人也并不简单地是系统的产物。在任何社会关系中，"我们都会发现，个人总是要使用某种方法在他自己和别人要求他认同的事物

① 戈夫曼，《庇护所：关于精神病人及其他受庇护者的论文》，第140页。

② 同上，第168页。

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保留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①

戈夫曼并不象许多功能主义者那样把自己的社会学分析局限于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戈夫曼看来，正在经历的或是短暂的情形，正是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适宜的领域。临时性结构中的行为，可以按照拟剧论的框架来进行分析，就如同制度中的行为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样。戈夫曼对象公共汽车站和鸡尾酒会中的聚众这种临时结构的兴趣，成为他后来的一些著作的主题。

对印象管理的进一步解释

戈夫曼后期著作的主题实际上是《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一书的引伸。在《际遇：对互动的两项研究》(1961)一书中，戈夫曼继续对面对面互动进行描述——特别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是如何管理他给予人的印象的。《际遇》一书就是对"非固定群体"中的印象管理的研究。在这本书中，戈夫曼集中研究了"当人们同意在一段时间里将知识和感觉上的注意力集中于一点时"的面对面互动。在对一些情境进行分析的时候，戈夫曼所使用的仍是拟剧论的框架，也就是说，个人是在熟练地扮演角色，而这种角色部分地是由结构制约决定的，部分地是对结构制约的反抗。在日常的际遇中，个人会创造性地管理自我给人的印象。他对角色距离所进行的讨论就可以提供一个例证。

角色距离 (role distance) 的定义是"个人与一般公认的角色的分离点"。② 角色接受 (role embracement) 则是指"公认的对角色的贴近"，③ 角色接受是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所承担的角色而

---

① 戈夫曼，《庇护所：关于精神病人及其他受庇护者的论文》，第319页。

② 戈夫曼，《际遇：对互动的两项研究》，第314页。

③ 同上，第315页。

变化的。戈夫曼用"旋转木马"游戏作为一个例子。戈夫曼报告说，在五岁之前，孩子会不折不扣地接受作为一个骑木马的人的角色。但从五岁开始，他就开始不太虔诚了，这种不虔诚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长。戈夫曼指出，成年人的角色扮演与青年不同，成年人和青年人对角色的接受程度也不同于四年级的学生。角色距离和角色接受似乎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关，这些地位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有关的变项。一个已婚的女教授与"妻子"这个角色的距离会大于一个将全部时间都用于家务的妇女。有四个小孩的妻子和妈妈与妻子这个角色的距离要大于她刚刚结婚的时候以及孩子都长大的时候（其结果是他更贴近于"妈妈"的角色）。一个工厂的工头可以发现，由于他的管理职责的增加，他要比他的下属离熟练工的角色更远。因此，无论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还是在同一个人的不同生活周期中，其贴近角色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在《公共场所中的行为：聚众的社会组织笔记》一书里所作的研究中，戈夫曼继续表现出对非固定性社会群体的兴趣。戈夫曼观察了街道、公园、饭店、剧场、商店、舞厅、会议室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地方的面对面的接触，而他的兴趣则是对非制度化情境中自我的表演进行描述。虽然公众聚集的场合中的行为并不是按教堂、办公室或家庭的那种方式制度化的，但在短暂的相遇中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进行互动，这是值得社会学关注的。再重复一遍，人们在临时性的情境中也非常认真地管理着他给别人的印象。

在《瑕疵：有缺陷者管理笔记》一书中，戈夫曼分析了自我表演中那些有疑问的方面。瑕疵者是指"有使自己不能充分地被社会接受的缺陷的人"。瑕疵者包括象盲人、少数群体、从前的骗子，甚至包括不要孩子的夫妇。在戈夫曼看来，这些人或者是不受信任的，或者是令人怀疑的。不受信任者是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

瑕疵是现实的，可见的，比如身体上有残疾的人，少数种族群体的成员，妇女，一个异常肥胖的人，或是一个矮子。一旦制度结构和情境起作用，这种瑕疵就取决于一个人在寻找充分的社会接受时所进入的群体。比如，一个女律师可能受到怀疑，但一个女理发员就不会受到怀疑。一个黑人企业家可以被黑人社区充分接受，但如果他要在精英居住区买一所房子时，就可能要受到污辱。戈夫曼感兴趣的是对这些有瑕疵的人的印象管理进行描述。

除了不被信任的人之外，还有一种人，戈夫曼将其称之为令人怀疑的人。令人怀疑的人是指这样的一种人，"他们违犯为人们所接受的标准时，并不是直接表现在表面上"。①这些个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关于管理表现出他们的某种缺点的信息的问题。一个售货员衣冠楚楚的外表不会表明他曾因为逃避所得税而坐了六个月的牢，外表也不能表明一个年轻漂亮的母亲是不能生育的。要得到这些信息，只用眼睛看是不行的，还要借助于其他手段。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是关于瑕疵问题以及有瑕疵的人是如何管理他们的缺点的趣闻的集锦。在戈夫曼看来，瑕疵并不是人的一种变态，而是由不同的情境引起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而且也必然会经历某种耻辱，在这个时候，他们将会努力去管理受到损害的形象。戈夫曼强调指出，瑕疵"并不足以将具体的人分为有瑕疵和正常的两个群体，有瑕疵的和正常的指的是角度而不是具体的人"。②

《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论文》

我们都是生活舞台上的演员，这是贯穿于戈夫曼的所有著作

① 戈夫曼，《瑕疵：有缺陷者管理笔记》，第5页。

② 同上，第137—138页。

中的一个主题，在《框架分析》一书中，他进一步展开了这个看法。他承认，“在这部著作中他所要处理的材料是在以前的著作中也涉及过的——欺骗、骗术、骗子群体和其他类似的表演”。① 戈夫曼说，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将自己有关的思想进行整理，并构成一种概括性的陈述”。② 虽然框架分析并不足以实现戈夫曼的形成概括性的理论陈述的目标，但却为他对拟剧论方法的使用提供了又一个例证。

《框架分析》基本上是对于主观现实的研究。框架被定义为“一种情境定义，它是根据支配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作出的”。③ 根据这个定义，他为这部著作标之以《关于经验组织的论文》的副题。戈夫曼强调，他的著作并不是要讨论社会组织：

> 我并没有要求来谈论社会学的中心课题——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对这些课题已经并将继续进行很好的研究，而一点也用不着涉及框架问题。我所面对的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结构，而是个人在他们社会生活的任一时刻所拥有的经验结构。我个人认为，在每一个方面社会都是第一位的，而个人的参与则是第二位的；但这篇报告所涉及的则是属于第二位的课题。④

框架可以将个人对事件的经验组织起来，并且包含着现实的不同层次。虽然所强调的个人是主观的，但并不仅仅是一种心态。规则和规范支配着我们的活动，我们要学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合

---

① 戈夫曼，《框架分析》，第 14 页。
② 同上，第 14 页。
③ 同上，第 10—11 页。
④ 同上，第 13 页。

适的框架。在任何特定的活动中，我们都要使用一种来定义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玩笑，一个偶然事故，一个错误，还是一种梦境，一个骗局，或是在演戏？换言之，我们需要认真观察每一种情境，并赋予它以意义。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要使用现存的规范和规则。

在这里，我们会再一次看到贯穿于戈夫曼著作中的印象管理的主题。人们是依据目前所处的情境来展示自我的。也就是说，自我是依据框架所提供的规则或规范在行为中展示出来的。正如戈夫曼所说的：

> 这里存在着一种个人和角色的关系。这种关系要符合互动系统——框架，正是在这种互动系统或框架中，角色被扮演，并可以窥见到表演者的自我。这样，自我就不是一种半遮半掩在事件后面的实体，而是在经历这些事件时管理自己的一种可以变化的程式。正如目前的情境规定办公室职员的装束一样，我们也会掩饰自己，这告诉我们要在什么地方进行表演以及如何进行表演①。

戈夫曼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如同在其他所有著作中一样，试图使社会学家们认识到研究非制度化行为是与研究制度化行为同样重要的。他自己要做的就是要从一种冷漠的旁观者的立场对事件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行人的规则到鸡尾酒会。他也力图客观地描述面对面互动中的公开的行为，并特别强调描述人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给人的印象的。戈夫曼并不否认在社会学中进行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但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个人的即刻投入”，或称之为情境中的实际行为，而这却常常为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所忽视。

① 戈夫曼：«框架分析»，第573—574页。

对戈夫曼的拟剧论的评论与批评

戈夫曼的社会学途径代表了从科学的模式到人道主义的转变，也就是说，戈夫曼更关心的是研究处于呈现过程中的人，而不是将他们的行为进行抽象以适合预先提出的命题或理论。他的关于人的模式以及对社会学理论的看法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途径是截然不同的。①

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分支学派交换理论都把人看作或多或少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帕森斯、默顿、布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霍曼斯，都把人看作是由他们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产物。戈夫曼则远远超出了这些理论家，他认为人对于角色来说是有一些自由的。这可以见之于前面讨论过的戈夫曼对印象管理的讨论（当然也会有错误和不适当的管理）以及他的角色距离和角色接受的概念。

古舍尔特（R. P. Guzzort）和金（E. W. King）机智地指出，戈夫曼所说的人是一种表演艺术家——骗术艺术家②。社会中的行动者不断地活动以维护自己给人的印象。他们不一定要按照规范性的标准从事活动，相反，他们设计了一种“令人可信的印象，即已经达到了那种标准”。③戈夫曼关于人的模式中所固有的假设与前面所讨论的理论家的假设是不同的。一个基本的区别就是，帕森斯、默顿、霍曼斯和布劳都认为人们是按理性寻求对自己有用和有价值的目标的。古尔德纳认为，拟剧论与这种观点是

① 加姆森（W. Gamson）在评论《框架分析》的文章中曾探讨了将其列入自然主义理论模式的可能性。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方法论问题以及培训象戈夫曼这种类型的研究者的可行性。

② 古舍尔特和金，《人性与现代社会思想》，第254页。

③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251页。

不同的，因为它“深入到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纯自我的性质中去，并将其表达出来：它是关于出卖灵魂的社会学”。①目标并不是以事物的有用性为基础的，而是以是否愿意具有那样的外表为基础。

在戈夫曼看来，人类充满着他们给予他人的印象。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关于人的狭隘的观点。正如布鲁默所说的：

> 由于过分强调了人们在相遇时对别人的看法的考虑，而认为人类在对待自己时主要关心的就是这种自我认识，这种看法是有些牵强的。团体中的人们并不总是注意别人怎么看他，以及他如何来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在有的时候他们会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更甚于他人。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在与自己互动时的中心内容。②

戈夫曼所讲的自我，并不是一种形成中的实体，而作为形成中的实体的自我对象征互动主义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这样，作为一种表演的性格的自我就不是有一定位置的有机体，它的基本命运就是诞生、成熟、死亡；它是一种戏剧效应”。③

在戈夫曼对自我的研究中仍然留下了许多没有回答的问题。古尔德纳提出有四个基本问题戈夫曼没有能进行研究④：

1. 为什么行动者只是选择并表演了这些自我，而不是另外的一些自我？

2. 其他为什么会接受或拒绝所提出的自我？

3. 说有些自我在其结果上是更令人满意的，这是指对自我来说的，还是对别人来说的？

---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383页。

② 布鲁默（H. Blumer），《行动与互动》，见《社会》第9卷，第50—53页。

③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253页。

④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380页。

4. 财富和权力是如何影响成功地设计自我的?

戈夫曼的分析并没有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作出充分的解答。

拟剧论对社会世界的观点基本上是把社会世界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种社会机构的周围有着固定的界限,特定类型的活动有规律地发生于其中"。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戈夫曼关心的是行动者组织他们的经验的方式,而很少关心社会结构本身。为戈夫曼的理论思考提供资料的就是特定的情境。正如古尔德纳在评论拟剧论时所指出的:

> 这种社会理论所论述的是详尽的情节,只看到了狭窄的人际关系范围内的生活,是变动的、非制度化的,是一种超越历史与社会的存在。这种生活只是存在于变化的、短暂的"际遇"之中。戈夫曼与帕森斯不同,帕森斯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弹性的、固态的橡胶球,尽管可以剥下很多层来,但作为一个球还是存在的,而戈夫曼则并不认为社会生活是一种坚固的、完备的社会结构,而认为社会生活象一根弯弯曲曲的绳子一样的不规则的、曲折的狭窄的过道,人们惶惶不安地闯进去。从这个观点来看,人就是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是做游戏的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于社会结构的,并越来越偏离文化上标准化的角色。不是把他们看作是系统的产物,而是把他们看作是为提高自我而"影响系统"的个人。②

重要的是要记住,戈夫曼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文化、社会结构或权力的存在。他实际上认为,拟剧论只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一种途径。③ 对于一种机构,可以从结构、文化或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但也

---

① 戈夫曼,《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第 238 页。

② 同上,第 379 页。

③ 同上,第 238 页。

可以从戏剧的角度来观察。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戈夫曼认为他关心的东西在社会学中是处于第二位的，处于第一位的是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①。

与此同时，戈夫曼还对存在于许多社会学中的科学模式进行了批评：

> 这似乎涉及到一个情有可原的神话，即假设只要你按科学的方法来做，其结果也就是科学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这些方法并没有揭示出自然主义的研究领域。记录我们对社会活动的看法的概念也没有产生。并没有形成可以将大量的事实源源不断地置于其中的框架。对于正常行为的认识并没有积累起来。差距还很大。②

戈夫曼自己使用的是“非系统的自然主义的观察”的方法，以收集支持自己的看法的资料。在他的最近的一部著作中，他依靠的主要是传播媒介，包括报纸中的报道、电视节目和杂志。他运用一种艺术的才能来使用这些观察材料，并从中创造出他称之为拟剧论的社会学观点。他的理论方法更接近于艺术型的人道主义，而不是理论化的科学命题。其结果却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努力，以及对面对面互动所做的富有见识的解释。

摘　要

戈夫曼使用戏剧中的语言和形象来对那些将自己展示给他人的人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他们的活动及所产生的成就是由结构支柱、固定的结构、暂时性的情境以及支配表演的规则和规范决定

① 戈夫曼，《框架分析》，第13页。

② 戈夫曼，《公众中的关系》，第 xv—xvi 页。

的。虽然戈夫曼的拟剧论不能完全不顾及舞台的结构和戏剧的脚本，但他的分析则是集中在个体演员的表演上。他的第一部著作《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就为他后来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提出了这样的课题。人是按由社会环境所设计的脚本在生活中进行表演的演员。他们部分地是按脚本来演，部分地则是对脚本的反抗。人们要"影响系统"以展示出适宜的自我形象。

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戈夫曼强调社会学家需要研究非稳定的社会群体。这种临时性的群体包括：大街、公园、饭馆、剧场、商店、舞厅、会场以及其他聚集场所中的面对面的相遇。他也涉及到在某些方面有瑕疵的人，以研究他们在有某种瑕疵的情况下是如何展示自我的。他一再强调的是印象管理，即当别人观察他们时，他们是如何表现自己的。

戈夫曼把人看作是一种"虚伪的"艺术家，他向别人表演一种令人可信的行为，这种对人的看法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决定论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戈夫曼经常被称之为"象征互动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布鲁默对拟剧论的批评中所看到的，这个标签可能是不恰当的。戈夫曼提出了行动的问题，但却没有能对互动进行充分的研究。在象征互动主义者看来，要在"我"之外加上另外一个处于互动中的人，才能构成使自我有意义的"我们"。自我并不是简单地出现在一种孤立的情境中；而是处于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中，要对社会世界中的其他行动者作出创造性的解释和反应。这种解释以及处于创造性过程中的自我，是布鲁默的象征互动论的基础，这是下一章的课题。

第十一章　象征互动主义者的观点：人与意义

我的目标是描绘出 G·H· 米德眼中的人类社会的性质。虽然米德在他的思想框架中将人类社会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并没有描述出它的基本特征。他主要关心的是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他关于人类社会的思想主要是用于处理这些问题。他的论述表明，人类的群体生活基本上是意识和心态形成的条件，它是一种目标世界，作为有机体的人类拥有自我，并以构造行动的方式发生自己的行为。……在他沿着这条线索而做出了辉煌的贡献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人类社会勾划一种理论框架。然而，在他的著作中是蕴含着这种框架的。要构造这种框架，就要探讨他所分析的核心问题的寓意。

引自 布鲁莫《米德思想的社会学含义》

象征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是一个诞生于心理学传统的美国社会学流派。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James）、贝得文（J.M.Baldwin）和杜威（J.Dewey）等人的著作都对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发生过影响，而正是库利在美国社会学中帮助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库利有句名言，人们互相对对方所有的想象就是可靠的社会事实①。这就提醒人们要注意到主观世界的现实。当代的库利，托马斯（W.I.Thomas）也强调需要研究主

① 库利，《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研究》。

观事实，然而也不能忽视客观事实。这个观点具体体现在他的这样一种看法之中，假如人们把某一事物定义为现实的，那么，他们的主观定义就有现实的客观影响。① 托马斯提醒社会学家，人们附着于现象之上的主观意义有客观的效果或结果。社会心理学必须了解现实的这两个方面。

尽管社会学家库利和托马斯是象征互动主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常常被人们看做是这个学派最有影响的创立者的，则是他们的同时代人——20世纪初期的美国哲学家米德(G.H.Mead)。米德接受和发展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它既强调外在的客观的行为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也强调内在的、主观的行为对于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性。米德处于库利的极端主观主义和杜尔克姆的极端客观主义之间。在库利那里，只有"想象"才是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而在杜尔克姆那里，只有具体的社会现象即"社会事实"才适于进行社会学分析。

如果把象征互动主义和自然主义社会学流派做一个比较，② 我们可以说，后者强调社会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主观的意义。象征互动主义传统重视一般社会学分析所忽视的问题，即对于人类行为的主观的和可解释方面的分析。象征互动主义不是把人看做一个由客观结构或情境决定的产物，象征互动主义所讲的人至少部

① 托马斯，《不适应的女孩》，第41—43页。

② 我们一开始就要承认，在这一章中并不涉及象征互动主义理论中的不同观点。比如库恩就对象征互动论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而布鲁莫的伟大贡献也是有局限的。梅特泽尔和彼特拉斯就认为库恩和布鲁默是代表了象征互动主义中的两个不同的学派：前者是更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衣阿华学派"，而布鲁默则明显地是代表人道主义的、解释性的"芝加哥学派"。

布鲁莫无疑曾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发言人。斯通和法比尔曼所编的《象征互动主义选集》的献辞中谈到了布鲁莫的重要地位："作为教师和学者的布鲁莫保证了我们所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的象征互动主义观点的生命力，并不断地进行对话。"

分地是自由的发挥作用的。它不是把行为看作对社会刺激的直接反应，相反，象征互动主义强调社会学家需要考虑到行动者对于客观刺激的主观定义或解释。

米德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以及它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也承认处于客观世界之中的个人对客观世界所作的主观解释也是重要的。布鲁莫（H.Blumer）的著作继承了米德的思想。这种继承关系使得我们在讨论米德的学生布鲁莫对于象征主义的贡献之前，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米德关于这个理论的经典论述。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

支配米德社会心理学的是关于社会现实的动态观点而不是关于社会现实的静态观点。人们以及他们的社会秩序都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而不是处于完成了的状态中。米德想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即个人是如何成为这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组织的一员的。

米德的解释就是，自我是对较大结构的客观现实的内化或主观解释。"自我"实际上是对于"概化的他人"或较大社区的社会习惯的内化。它是"主体的我"和"客体的我"的辩证统一，主体的我是一种冲动的自我，而客体的我则是人的社会方面。这个自我在人们学会"承担他人角色"或在从玩耍转变为进行游戏时发展起来。在"玩耍"中，孩子们所了解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比如在与一个洋娃娃或一辆玩具卡车进行玩耍的时候，孩子们并不需要知道其他人所起的作用。但是，在进行游戏的时候，孩子们则必须考虑到参加这个游戏的其他人的角色。这种情况可以用垒球游戏的例子加以形象的说明。在进行垒球游戏的时候，每一个球手都必须知道其他球手的期待和实际行为。同一个模式也可以适用于生活

的游戏。在生活游戏中，一个人的角色是通过认识他周围人们的角色来承担的。比如，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就是根据他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而承担的。一个部长要根据各种各样的下属的角色来扮演自己的角色。这种对角色的承担，能使行动者分享其他参加游戏的人的观点。

米德指出，人并不仅仅要了解他人，也要有了解自己的能力。因此，人们不仅仅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同时也同自己发生象征性的互动。象征互动是通过使用语言的姿势进行的，而语言则是一种最重要的符号。符号并不是完成了的事实，而是处于一种连续的过程之中，正是这种传播意见的过程，成为象征互动主义者分析的课题。处于互动中的人要学会理解常用的符号，并使用这些符号以理解游戏中的其他行动者的角色。比如，一个演员知道，观众站起来喝彩，意味着观众由于他的表演而感到非常高兴。把自己投入观众的角色，演员就知道，再表演一次将受到赞赏。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演员不一定要接着表演，他可能用一个谢幕的动作来自由地改变互动。因此，对于所有互动来说，人们都可以通过替代行为自由地改变互动。在米德看来，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就是处于社会情境中的不同行动者之中的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而在强调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和客观现实（而不是主观现实）的功能主义时代，努力使米德学派的传统保持下来的正是米德的学生布鲁莫。

象征互动：观点和方法

布鲁莫的象征互动主义依赖于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是：

1. “人类以某一事物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为基础对这一事物发生行动。”

2. 这些意义产生于“他与伙伴发生的社会互动之中。”

3. 这些意义通过解释过程加以修改。①

一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并不是固有的，这里可以举蛇的意义做为例子。对某些人来说，蛇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动物；在自然爱好者看来，它是自然界严格的生态平衡中的一个链节。无论是一个人在他的花园中打死一条并无恶意的蛇，还是专注于它的自然完美性，都依赖于这个人事先赋予蛇这个对象的意义，这些意义都是从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其父亲是一个自然爱好者而他自己也在学校中作过动物实验的孩子，他对蛇的反应将会不同于一个只是从《创世纪》中有关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描写中得到对蛇的印象的孩子。所有的对象都可能受到同样的对待，也就是说，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附着于他们之上的意义。这些意义都产生于与他人的互动，特别是与重要他人的互动。正如布鲁莫所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对于个人的意义是产生于其他人由于某一事物而对他发生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动发挥作用以定义这事物对个人的意义”。②假如父母对不害怕花园中的蛇的孩子表示赞成，这个孩子以后还会这样做。但是，假如父母和玩耍伙伴对这个孩子的行为不赞成，那么，这个孩子将不仅改变他的行为，而且也将改变他赋予这个对象之上的意义。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的自然爱好者和憎恶蛇的人，并不是自动地内化关于蛇这个对象的两种极端的意义的。布鲁莫认为：

> 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因此，所谓解释不应该被看作仅仅是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2页。

② 同上，第6—9页。

已经存在的意义的自动应用，而应看作是一个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义被使用，被视为一种指导和形成行动的手段①。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例子来形象地说明这个解释过程，这个例子就是一个青年妇女每天晚上乘坐一个男同事的汽车回家。她把这种行为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朋友和邻居情谊的表示。在一个晚上，男同事问她，要不要在回家之前去喝点什么，这样就产生了她不能不进行解释的刺激。我们可以想象，青年妇女仅仅把这作为一种友谊的表示，并停下来喝点饮料。也许他进一步与她讨论自己婚姻上的不愉快，并表示如果他的妻子象她就好了。这时青年妇女就可以将这种行为解释成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邀请，至少在因果关系上是如此，并开始谢绝乘这个男同事的汽车回家。她将怀疑他帮助和信赖她的动机，也可能她是误解了那个已婚男同事的意思，他也许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好朋友。重要的是她赋予"你今晚需要乘我的车回家吗?"这个问题的意义，而不是问题本身。

布鲁莫认为，人们并不是由于一些来自外部的"强迫"(象结构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而行动，也不由于"内部的强迫"而行动(象心理还原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布鲁莫认为：

> 并不是个人存在于早已存在的事物中，这些事物对他发生影响并引发他的行为，正确的图景是，他在他的连续不断的活动的基础上构造他的对象。在他的无数次行动中——无论是学穿衣服这样次要的行动，还是象职业活动这样较重要的、有组织的行动——个人为他自己规定不同的目标，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义，判断它们对于他自己是否合适，并在判断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这就是解释和以符号为基础的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5页。

行动①。

因此，人类是有意识的能进行反思的行动者，他们通过布鲁莫所称的"自我指示"与他所注意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自我指示是一类"运动着的沟通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个人注视某一事物，对它做出估价，赋予它一种意义，并以意义为基础决定自己的行动"。② 这种自我指导的过程发生于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中，每个人都力图参与他的同伙的行动，并根据他对同伙行动所作的解释使他自己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相一致。在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中，那个青年妇女就是按照当时的情况以及她以前的经历来解释男同事的邀请的。这可以使她发生疑问，赋予这种邀请以意义，然后在她所赋予的意义的基础上做出反应。

人类的行动中充满着解释和意义。这种行动结合在一起，而且包含着功能主义者所说的"社会结构"。布鲁莫把这种社会现象叫做"共同行动"，或"对于不同参预者的不同行动的社会组织"。③ 每一种这样的行动都是按过程的形式进行的，都与其他人的行动过程互相联系。在布鲁莫看来，行动远不是戈夫曼在解释印象管理时所描绘的单个人的表演。在从事共同行动的人中就包含着社会结构。象教堂、公司企业、或者一个家庭这样的制度，都是从事共同行动的集体。然而，这些制度并不是稳定的结构，因为就行为来说，即使是在建立起完善的模式的时候，其互相联系也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可能是相似的）。可以考察一下包括丈夫、妻子和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就是处于一种日常生活的连续过程之中，当孩子两个月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与孩子六岁时候的婚姻关系会截然不同。当丈夫的工资增加的时候，丈夫的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80页。

② 同上，第81页。

③ 同上，第17页。

职业在家庭中就有了更大的重要性，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对于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和父母的角色，都不存在简单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家庭结构中形成的，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对家庭中的象征互动做出反应。布鲁莫认为是互动先于结构。他认为，正是"群体生活中的社会过程创造和支持着规则，而不是规则创造和支持着群体生活"。① 换句话说，结构功能主义者所讨论的规范并不决定个人的行为，而是具体的个人的行动决定了关于行为的规范或规则。结构功能主义者强调，人是自己社会的产物，而象征互动主义则强调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结构是进行互动的人的产物。

作为象征互动的社会

在布鲁莫看来，要研究社会就必须研究共同行动，而不是专注于他认为是含糊不清的系统和不易捉摸的功能先决条件。社会是人们之间进行象征互动的结果，确切地说，社会学家应该关心的就是社会的这个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布鲁莫来说，象征互动主义理论的特点就在于要对互相之间的行动进行解释和定义，而不是仅仅按照"刺激—反应"的方式对于其他的行动做出反应。一个人的反应并不是直接按照他人的行动做出的，而是在他们附加于这个行动上的意义的基础上做出的。布鲁莫认为，"因此，人类的互动是由符号的使用、解释、探知另外一个人的行动的意义作为媒介。这个媒介相当于在人类行为中的刺激和反应之间插入一个解释过程。"② 虽然所有的社会学都关心人类行为，但却往往忽视了对附着于这些行为之上的解释和意义进行分析。但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19页。

② 同上，第78—79页。

尽管是解释提供反应，但这种反应却是一种在符号基础上的行动。

布鲁莫并不承认群体和结构的优先和支配地位，他把群体行动看成是个人行动的集合，"人类社会应该被看作是由行动着的人构成的，社会生活应该被看作是由人们的行动构成的。"① 布鲁莫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个思想，指出，群体生活是对人们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情境的反映。这些情境虽然是结构性的，但布鲁莫对那种忽视在相对稳定的情境中解释的重要性的倾向进行指责。布鲁莫观察了结构功能主义和象征互动主义对社会的看法在两方面的区别：

> 首先，从象征互动主义的观点看，人类社会的组织是一个社会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而并不决定社会行动。
>
> 第二，这样的组织以及其中的变迁，都是行动者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与行动者无关的强制的产物②。

社会学对于结构的专注已经导致对不断变化的解释性行动的忽视。

布鲁莫所提出的象征互动主义包括了一些"根本的想法"或基本的思想。这些根本的想法可以概述如下：

1. 社会是由处于互动中的人类构成的，这些活动通过共同行动按照复杂的方法组织在一起，并形成组织或社会结构。

2. 互动是由对他人的活动作出反应的社会活动构成的。非符号互动仅仅涉及到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比如，咳嗽可以清扫喉咙。象征互动则牵涉到对于行动的解释。假如一个观众在他不同意演讲者的观点的时候咳嗽了一下，这声咳嗽就成为一个

---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84—85页。

② 同上，第78页。

用来传达反对意义的重要符号。当然语言是最普遍的重要符号。

3. 客体并没有固有的意义，确切地说，意义是象征互动的产物。客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 物质客体：比如桌子、植物、汽车；(2) 社会性客体：比如妈妈、教师、部长、朋友；(3) 抽象的客体：比如价值、权利和法律。布鲁莫把客体定义为"能够加以处理的事物"。正是通过象征互动，客体才"被创造、被肯定、被改变、被抛弃"。① 比较一下美国和印度对待和使用牛的不同做法就可以发现被用于物质客体的意义的作用。在这两个社会中，客体(牛)是一样的，在美国，牛意味着"肉食"；而在印度，牛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用跨文化的观点来看的时候，甚至那些其意义我们以为是习以为常的物质客体，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意义也是不同的。

4. 人类不仅要认识外在的客体，而且也能把自己当做一个客体来看待。一个男青年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学生，一个丈夫或一个年轻的父亲。这种关于自己的看法，象对所有客体的看法一样，是在象征互动过程发生的时候产生的。

5. 人类行动是由人们所构造的解释性行动。正如布鲁莫所注意到的："从根本上说，就人类而论，其行动是由对各种事物的解释，以及在解释的基础上产生的行为构成的。对事物的解释包括了他的希望、愿望，他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使用的手段，自己的行动及对他人行动的参预，他关于他自己的形象，特定行动结果等。"②

6. 行动是由群体成员互相联结并被组织到一起的，这被称之为共同行动。共同行动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对不同的人的不同行

---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10—11页。

② 同上，第15页。

动的组织"。大部分共同行动是可重复的、稳定的，它构成社会学家所称的"文化"或"社会秩序"①。布鲁莫的许多象征互动主义观点是从他对于米德理论的解释中发展出来的。但米德忽视了对适合于象征互动主义的研究方法做详细说明。布鲁莫对于这个课题给予很多关心。

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布鲁莫了解米德的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哲学观点在方法论上的弱点。虽然哲学是象征互动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但是，"注意的中心应永远是经验世界。"② 方法论或叫科学程序的逻辑，可以使社会学家从事对于科学理论的探索。但是，布鲁莫批评了当代社会学把方法论与先进的统计技术等同起来的倾向，他认为，分析仅仅是方法论的一个方面。布鲁莫对"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广泛存在、并得以确立的这种信念提出了疑问，这种信念认为：忠实地坚持那些被共同接受的研究程序，就能自动获得关于经验世界的可靠的科学成果"③。布鲁莫也批评了社会科学的对于预先建立的理论模式和过分讲究的调查技术奴隶般的依赖，他催促人们回到经验性世界。他强调说：

> 通向经验有效性的道路并不存在于玩弄探讨方法之中，而是存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考察中。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建立和解释骗人的理论，不能靠设计精巧的模式，不能靠追赶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靠采用最新数学或统计学方案，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靠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17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同上，第28页。

查统计的规则。这样的关注，正好不能到达它所要求的方向——虽然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是不能否认的。需要的是，走向经验性的社会。①

在布鲁莫看来，经验性的社会是由人类以及他们在生活进程中的日常活动构成的。对这样的亲密行为的认识，只有通过第一手观察和参加一个群体才能获得，而不能在缺少对于具有密切关系的群体了解的情况下获得。布鲁莫认为：象征互动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对社会现象的直接考察，——"即科学地研究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的不耻下问的方法。"②

布鲁莫提出了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考察的两种探讨方式，即探索和检视。探索是一种可以使观察者"较清楚地理解他的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了解合适的资料，形成什么是重要的关系脉络的思想，并按照关于生活的知识形成自己的概念工具"的灵活方法。③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检验和修改观察的需要以得到有关主观的研究领域正在进行什么的清晰图景。从探索中，可以得到布鲁莫所称的"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敏化概念通过为使用者提供"一般的参考意义和达到经验方向的指导"而使研究者接触到他正在研究的事物。④布鲁莫把诸如文化、制度、民德和个性等大量概念都看作是敏化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虽然缺乏清楚的界定，但它们都"依赖于关于相关事物的一般意义"。⑤

这种敏化概念使第二种探讨方式即检视成为可能。通过检视，研究者可以按照经验证据对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考察。布鲁莫将检

---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34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第40页。

④ 同上，第147页。

⑤ 同上，第147页。

视与研究奇异的自然对象的方法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把它挖出来，更近地观察它，翻过来倒过去地从不同角度观察它，提出它是什么的问题，再回过头来根据我们的问题再对它进行考察，按不同方式对它进行试验和检验。”①布鲁莫的方法无疑是经验性的，但他力图避免社会学研究中极端定量方法的无效性——这种方法与其是将社会学引向成熟不如说是引向迷途。

对布鲁莫互动主义的批评和评价

象征互动主义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中“忠实的反对派”②。布鲁莫的象征互动主义虽然承认模式化行为的存在，但却对结构功能主义关于这种行为的具体概念——如结构、规范、地位——提出怀疑。布鲁莫也对与结构功能主义相联系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方法论倾向于定量化而不是理解。象征互动主义所强调的是对互动的解释过程，而不是强调社会群体的产物。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的前提是把人看作一个创造性、自我生成的人，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被决定的。正如布鲁莫所指出的，象征互动主义对人性的看法是与其他社会学理论截然不同的。

> 人类并不仅仅是对某些因素的作用发生反应的有机体，人类应被看作是一种不得不与它注意到的事物发生牵连的有机体。在自我指示的过程中他遇到这些事物，并把他注意到的事物做为客体，赋予它某种意义，而且把这意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基础。③

人类并不仅仅是一种反应性的有机体，他也是一个行动着的有机体。也就是说，“他要根据他所作的解释塑造自己的行动，而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44页。
② 穆斯林，《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与理论群体》，第75—104页。
③ 同①。第14页。

不是仅仅对某些因素的作用作出反应。”

在目前已经出现的所有理论中，布鲁莫理论所提供的对人的看法，是最有创造性的。在霍曼斯号召把人带回到社会学分析中去以前很久，布鲁莫就曾指责社会学过分重视结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曼斯在他的理论中虽然也涉及到人，但他对人的看法是非常决定论的。正是由于他的理论的这种决定论性质，使得D·让指责“在现代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过分社会化观念”。① 让批评了社会学中过分整合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导致了关于人的“过分社会化”或决定论的看法，随着结构功能主义地位的提高，这种观点的影响非常之大。

简而言之，在米德的理论受到功能主义者忽视的年代，布鲁莫继承了米德的传统。功能主义者通过使用“角色”这个概念证明他们把人带入了自己的分析，但是，他们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与互动主义者的用法有很大差别的。简单地考察一下地位和角色这两个概念就可以发现在用法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对功能主义的讨论。帕森斯把地位角色看作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地位是指在系统中的位置，角色则可以看作是与这个位置相联系的被期待的行为。结构功能主义者在自己的理论和分析中倾向于把地位与角色等同起来；而象征互动主义者则看到了这两个概念的重要区别。布鲁莫把社会身份（如父亲、总统、学生等）看作一种社会客体，在这个客体之上可以附着一定的意义；对于身份的解释可以影响对角色的承担或行为。比如，一个女孩子通过与母亲的互动学习到，母亲都愿意把生活搞好。也许她还可以学习到，做好妈妈与搞好业务对个性的要求是不同的。正是在童年的互动的基础上，才可以对妈妈的身份做出反应，而且也只能如此。因此，角色是由人的互动形成和改变的，

① D·让，《当代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过份社会化的观念》，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6卷，第183—193页。

而不是由强力性的结构决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布鲁莫对社会的看法来源于他的"志愿人"模式。人类社会是象征性互动，而不是具体化的、自主的结构。在布鲁莫的社会学理论中，他反对把社会看作是作为整体效应结构而存在的实体：

> 按象征互动主义观点来看，社会行动存在于进行行动的个人之中，他们通过解释过程而将各自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群体行动就是这些个人的集体行动。与这种观点相反，一般的社会学观点则认为，社会行动则是存在于社会或某些社会单位的行动之中。①

换句话说，布鲁莫强调需要把社会看作"行动着的人们"，而不是对人们起作用的强制之源。社会是一种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框架。

象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布鲁莫关于人和社会的看法也要求他必须考虑适于进行象征互动分析的方法论。他强调设身处地的反省，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把生活史、个案研究、日记、书信、非直接访问和参预观察做为收集社会学资料的最好手段。很清楚，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连续统一体中，布鲁莫是靠向人道主义的、解释性的社会学一边的。他认为，必须把人类作为特殊的对象来研究，这种研究不能以自然科学为榜样。②

①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观点与方法》，第84页。

② 在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讨论的理论家中，布鲁莫的社会学方法是最接近于他以前的学生戈夫曼的。他称赞戈夫曼对日常生活和平凡事物所作的"有洞察力的分析"，而这在社会学中是一直受到忽视的。他也赞扬了他以前的学生的研究程序：

> "他按照科学先驱们的思想来向新的方向探索，并将他的研究形成一种当社会科学研究百求而不得的稳定的方案。幸运的是，他的兴趣是在于研究经验世界而不是作研究用的神圣方案。通过选择对人类经验的渠道，他得到了一些用流行的方法所得不到的看法。"

当然，布鲁莫的象征互动主义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布鲁莫理论的核心是依赖于“自我”这个概念。但是对这个概念的处理是并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斯特里克就认为，追随布鲁莫传统的社会学家都过于关注那种统一的、非分化的自我观点，而不是把自我看做一个复杂的实体。① 也许自我可以划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按一定的层序组织起来。批评者认为，与布鲁莫的理论相比，这种对自我的看法可以允许人们对自我进行更经验性的研究。

在布鲁莫自我概念上存在的问题也影响到他对社会的看法。布鲁莫总是避免概念的具体化——特别是和社会有关的概念。吉特林认为，布鲁莫的理论使得把社会看作“除了无数的自我在非结构性情境中的互动之外就什么也不存在了”。② 如果象布鲁莫这样来看社会，那么，要研究象分层、群体冲突、科层制这样的课题，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难的。

布鲁莫的象征互动主义也受到其他象征互动主义者方法论的挑战(如库恩)。③ 布鲁莫的人道主义的象征互动主义已被称之为“芝加哥学派”，相反，库恩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的象征互动主义则被称之为“衣阿华学派”。衣阿华学派强调自己与其他科学学科的共性，并利用更标准的技术进行研究设计。

米德和布鲁莫的象征互动主义是与社会学中的自然科学方法不一致的。实际上，任何向实证论的靠近，都同时意味着离开米德和布鲁莫所说的象征互动主义的核心，即社会行动的动态的、可以解释的性质。米德和布鲁莫传统的象征互动主义被看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忠实反对派”，但还不止如此。它代表了一种强烈反

① 斯特里克，《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最近的发展》。

② 吉特林，《社会学的反思：对当代理论的批判》，第217页。

③ 参见库恩的《在过去25年中象征互动理论的主要趋势》，载《社会学季刊》第5卷，第61—84页。

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根深蒂固的科学性和新实证论倾向的观点。

提　要

象征互动主义是与那种认为个人是由社会决定的产物的观点相对立的。确切地说，它认为自我是处于一种变化的过程中，这与功能理论那种理想化的、过分社会化的人的概念是完全不一致的。人把一种主观的意义运用于客体，而不是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现实的既定的解释简单接受下来。因此，社会结构被看作是社会成员共同行动的产物，而不是象杜尔克姆及其今天的信徒所假定的那样，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群体即存在于人的互动之中。

形成结构和制度的共同行动之所以可能，是出于象征互动，这种互动使用姿势和语言以传递意义。正是通过那种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的符号，才能对客体进行解释和定义。

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的理论前提使得他必须提出一种方法论以指导他的研究。社会行动必须被作为一种过程，并根据它是如何形成的来对它进行研究。因此，组织和结构都必须看作是行动的组织。象征互动主义力图解释人们是用何种方式定义、解释、处理他们所处的情境，并对结构的形成和变化发挥作用的。在经验性研究中，不能忽视自我和结构形成中的动态性质。

尽管布鲁莫的这种做法可以使方法论与象征互动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但布鲁莫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很难在经验研究中加以操作化。如同那些强调理论的检验和验证的社会学家一样，许多社会学家（包括衣阿华学派的象征互动主义理论家）都可以发现，在今天的社会学中要使用布鲁莫象征互动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不

可能的。在将来，象征互动主义这种社会学理论还能不能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一些早期的象征互动主义理论家已经转向本土方法学——这种理论与象征互动主义的假设前提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但它想把它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十二章　本土方法论:对现实习以为常的方面的研究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受日常生活中的成见支配的行动中，科学理性只能被作为一种无效的理想来使用。科学理性既不是稳定的特征，也不是日常例行事务中的值得认可的理想，如果试图将这些性质固定化，或是强迫人们在日常的行为中和它们相一致，就会夸大那种无意义的个人行为环境的特点，并使互动系统解体的状况大大加强。

引自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 283 页

加芬克尔(H. Garfinkel)的本土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学理论途径。虽然他清楚地属于人道主义传统，因为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是根本不同的，但他却对社会学家称之为现实的外观提出疑问。加芬克尔认为，那些提倡客观地研究他们的世界的社会学家们必须要对那个世界的现实提出怀疑。加芬克尔指责说，由于忽视了从怀疑主义的或怀疑的观点来研究人们的行为，社会学家们就自己创造了一种有秩序的、科学的人类行为的现实，但这个现实是不真实的。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本土方法学远不是一种关于行为的抽象理论。它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它要研究的是，人们是怎样赋予他们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经验以意义的。它为自己提出了

一个任务，即对人们在日常互动中对现实的构造进行经验性研究。

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在50年代就开始形成，那个时候加芬克尔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传授他的基本思想，但是，一直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大部分职业社会学家才意识到由加芬克尔以及他的学生和他的学生的门徒所发展起来的本土方法学的出现。由于加芬克尔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不容置疑的奠基者，我们将集中讨论加芬克尔对本土方法学的论述。但在讨论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之前，我们将简单讨论一下社会学思想中的这个流派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其他观点的关系。

虽然说本土方法学就是象征互动主义传统的一个直接分枝是不太恰当的，但它确实与象征互动主义有许多共同之点。① 这些共同点包括，他们的分析都集中在个人的面对面互动上，都强调语言的重要性，都力图从被研究的人的角度来解释经验性的现实，都认识到社会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对传统社会学所使用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对于后者，本土方法学特别批评了社会学在描

---

① 由于象征互动主义与本土方法学都对社会世界持一种主观主义的观点，丹金(N. K. Denzin)在《象征互动主义与本土方法》一文中提出，可以它们在解释社会秩序上的共同方法为基础，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但齐默尔曼(D. H. Zimmerman)和韦尔德(D. L. Wieder)在《评丹金》一文中则对丹金对本土方法学的理解提出了怀疑。"本土方法学家所关心的，并不是通过对行动者的观点的分析，对所观察到的有规律的、模式化的、可重复的行动提出因果解释。他所关心的是，社会成员是如何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中的秩序进行观察、描述和解释的"。根据齐默尔曼和韦尔德的看法，社会秩序的问题在社会学理论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但在本土方法学中则只是贴了点边儿。我们基本同意齐默尔曼和韦尔德的看法，并且认为本土方法学是社会学中的一种很不相同的途径。但我们也看到，象征互动主义与本土方法学有一些共同之点。

述现实上的失败，他们比象征互动主义更强烈地抨击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流行做法。正如我们注意到的，与既有的功能主义和象征互动主义的方法相比，本土方法学的发展是比较新的。也许正是由于它是一种新的方法，本土方法学还远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知识。斯特雷克（S. Strryker）正确地指出了对本土方法学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问题：

> 我现在由入了这样一个领域，如果天使们不怕进入这个领域的话，那是应该的，但我并不是一个天使。我并不认为我了解了在本土方法学题目下的所有的东西，既使是按照不同的脉络分别阅读一些人的著作也无济于事，我感到我所读到的这些人的著作都是乏味的、空洞的，难以从整体上领会它讲的是什么，甚至从局部领会都不可能①。

尽管本土方法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中需要加以讨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这与其说是由于其支持者的缘故，倒不如说是由于它所受到的批评。为了避开斯特雷克所说的那类问题，即本土方法学家本身所存在的互相冲突和矛盾的观点，我们的讨论将仅限于本土方法学的奠基者加芬克尔②。

在追溯本土方法学的起源时，穆林斯认为本土方法是开始于

---

① 斯特雷克，《社会心理学的某些新近发展》。

② 梅汉（H. Mehan）和伍德（H. Wood）在《本土方法学的现实》中认为，本土方法学中有许多互相争吵的派别，但他们又异口同声地主张："我不希望争吵，也不想创立另一个派别，我的本土方法学把不同的意见看作是有力量的标志"。梅汉和伍德在他们那部很厚的著作中，对本土方法学进行的讨论，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合性描述，即对在本土方法学这个标签下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综合。

加芬克尔，① 加芬克尔是功能主义者帕森斯的学生。加芬克尔除在哈佛接触到帕森斯的理论外，还曾和现象学家舒茨（A. Schutz）一起在社会研究新校一起学习。在舒茨看来，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互为主观性的世界，我们和与我们进行互动的人共同分享它。从这个意义上说，舒茨的理论与象征互动主义者米德（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简单地讨论过他的理论）的理论颇有共同之处。但舒茨认为，互为主观性的世界是由多重现实构成的，而日常经验的现实则是至高无上的。舒茨所关注的，就是这个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现实是为我们所接受的，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现实作为问题来怀疑的话，我们就是把对它的疑问暂搁起来。比如，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在他睡觉时电流仍会运转。假如他把闹铃拨到早晨6点，但当他听到铃声醒来，并打开窗帘时，看到的却是日到中天，于是，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电力不足。"怀疑暂搁"的原则也可以适用到我们日常与他人的互动中。当我们每天醒来的时候，并不会怀疑爱人的忠实，不会怀疑我们国家货币系统的运行，也不会怀疑我们的社会制度的现实。②

我们的常识性的现实感以及它的日常存在，可以称之为我们在社会世界中的"实践兴趣"。这种实践兴趣与科学家的理论兴趣或科学兴趣是不同的。科学理论是力图系统地观察和了解世界。在这里，怀疑暂搁可以使人们离得更近一些来对现象进行观察。在舒茨看来，人们并不是依照科学的理论来从事活动的，而是在实践的层次上从事活动，他们与那些也体验这个互为主观性世界的人

---

① 穆林斯，《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和理论群体》，第185—186页。

② 我们在讨论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时将会看到，这种理论就是想把舒茨的"怀疑暂搁"倒转过来。本土方法学家要做的是，暂停人们对现实的相信，也就是"现实暂搁"。通过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构造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的。

们一起分享这个互为主观性的世界。舒茨对常识性现实感的讨论为加芬克尔提供了一个研究本土方法学的角度，同时也为其他本土方法学家的著述提供了理论基础。本土方法学力图为舒茨提出的某些哲学观点进行经验上的证明。

什么是本土方法学

本土方法学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所有理论都是不同的，因为它批评标准的社会学都只是盯住社会中的秩序问题。社会秩序的现实被一些社会学家看作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个人通过反映这种文化的社会规范来内化这个现实。本土方法学反对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认为秩序有其自己的现实性。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秩序是由参与者赋予某种情境的。因此，无论人们从事什么活动，或是遇到什么情形，总是要使得它们"有意义"，并"创造出秩序"。本土方法学的这个原则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本土方法学所关心的是研究人的日常活动，特别是社会互动中的习以为常的方面。加芬克尔为本土方法学下的定义是，"研究索引性表达和其他实际行动，而它们则取决于那种有组织的狡诈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不断完成。"①而阐明"实际行动的理性上的可解释性"的方法包括：(1)客观表达与索引性表达之间的区别；(2)实际行动的反射性；(3)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的可分析性。对于加芬克尔用自己那种独特的语言所作的描述，还需要进行一些解释。

简单地说，本土方法学所关心的是，人们是怎样(使用什么手段)赋予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以意义的。本土方法学家关注着人们用怎样的方式为他们的现实加上秩序和模式。语言以及附着于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11页。

这样的重要符号之上的意义，是索引性表达的一个主要源泉。索引性表达是一个人为已发生的事情的时空所加的标号，它可以起一种“索引”的作用，以把发生的事情置于现实领域之中。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日常生活的索引都不是很精确的。假如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他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他也许回答：“大约是一个月之前。”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这种关于时间的不精确的索引性表达，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人们也不想用更严密的句子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我上一次看电影是今年的1月23日，这天是星期五。电影于晚上9时开始，一开始就激动人心，最后于11时12分结束”。这种关于时间的精确表述，可以称之为“客观性表达”，它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才使用(比如，要在病人的观察记录上记下自体的某些变化时)。 索引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反映了舒茨所说的实际的现实和理论的现实，索引性表达适合于日常的实践活动，客观性表达则是科学领域中的表达方式。因此，正是通过语言，特别是通过使用索引性表达，人们才能表达出他们为日常世界所创造出的秩序。

加芬克尔指出，对于大多数非正式的谈话来说，客观性表达是不方便的，但对于科学来说则是必需的。艺术的特征是索引性表达，但科学则依赖于客观性表达。这样，社会学就被置于一种两难状态。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要努力使用客观性表达，但它的研究对象日常使用的却是索引性表达。因此，对在使用索引性表达的互动的基础上来建立科学的现实的方式，加芬克尔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社会学中的标准的研究手段都致力于科学的严密性，但他们研究的则是从事构造现实的人。象社会学家所关心的决策、社会态度、影响力的来源以及其他的社会过程等现象，都不是按照科学的模式进行的，而是按实践的模式进行的。

第二，加芬克尔注意到，社会学家们并没有去寻找对那些有趣

的"实践行动"的解释。他的意思是说，科学观察家们在对人类行为的探索中，对许多事情都抱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加芬克尔认为，"实践行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许多系统的、重要的事情：源泉、目标、理由、机会和任务，……当然，还有对他们的程序是否充分以及他们的发现是否可靠进行争论或预言的基础。"①加芬克尔提倡要对这种实践行动进行研究，以确定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什么。在这一章的后边我们涉及到一个陪审团的例子。要给陪审员们提供一些规范和规则，以指导他们做决定，但这些陪审员们或许有自己的指导标准以确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如果忽视了这种习以为常的指导，就忽视了现实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社会学家在分析行动的时候必须记住，这种行动是发生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每一种行动都有一种可以追溯到其他背景中去的历史。这对于不断重复的行动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人以前没有从事过的行动来说也是如此。一个陪审员可能以前从没有参加过陪审团，但他还是可以用他从前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日常生活（它具有一种连续的历史）并不完全是或然性的。日常事件的不断重复，就可以使对暂搁的现实的怀疑成为可能。

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学向社会学中的秩序这个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他似乎认为，在社会事件中，很难有秩序可言。所谓既有的秩序，是依据一些规范建立的，正是这些规范指导着人们如何赋予他们的社会世界以意义。只是当现实受到挑战的时候，赋予意义的过程或在世界中创造出秩序才变得明显起来。可以来分析一场非正式的谈话，以为这个过程提供一个例证，它可以证明他们是如何使所谈论的东西有意义的。

---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7页。

共同理解的例证

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看到的，非正式谈话使用的是索引性表达而不是客观性表达。在日常的谈话中，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这就要求"听者要补充一些材料"，以使"谈话有意义"。下面就是由加芬克尔所提供的一个谈话的例子。右边是对实际说的简单句子的可能的解释。

丈夫：达那没用人抱着就往停车计时器里放了一个便士。	这天下午，我带着达那，我四岁的儿子从托儿所回家，当我在停车计时器旁停车时，他爬了上去，放了一个便士，在以前，他要上那么高，非得有人抱不可。
妻子：你带他上音响商店了？	由于他在停车计时器里放了一个便士，就意味着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停下来了。我知道，你要么是在去接他的路上在音响商店停了车，要么是在带他回来的路上在音响商店停的车。是在回来的路上吧，因为孩子是和你在一起，或者是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你都在那里停车了。
丈夫：不。我们是去修鞋店了。	不是的。在去接他的路上，我去了一下音响商店，在我

	和他一起回家的时候，我们去了修鞋店。
妻子：干什么去了？	我知道你上修鞋店肯定是有原因的，但你实际上是干什么去了。
丈夫：我给我的鞋买了一副鞋带。	你记得吧，有一天我的棕色便鞋上的一根鞋带坏了，我到商店是去买一副鞋带。
妻子：你那双平底便鞋也该换一双新后跟了。	你说的这件事我想到了。但你也应修一下那双黑色的平底便鞋，那双鞋需要换一个跟了。你最好早一点把它修好。

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上所讲的和所讲的实际内容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人们是按索引性表达的方式而不是按客观性表达的方式讲话的，这可以从左右两边的对比中找到例证。在谈话中，对言外之意人们是能够意会的。这种习以为常的、共享的沟通正是本土方法学家感兴趣的东西。

对日常活动中例行公事的基础的研究

在本土方法学努力向习以为常的现实进行挑战，并使日常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方面明显化的过程中，加芬克尔和他的学生使用了准实地实验（quasi-field experiment）的方法。与上面所引的谈话不同，这种谈话只是谈话的简单记录以及对内容的解释，准实地实验则涉及到对研究对象的控制，以便向人们构造情境定义的方式挑战。我们可以把加芬克尔提供的下面这个例子作为一个

例证。①

在星期五的晚上，我和我的丈夫正在看电视。我丈夫说他有些疲劳。我问:“你是什么样的疲劳，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是只是有点无聊”?

(S) 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大概是身体疲劳吧。

(E) 你是说筋骨疼呢，还是肌肉酸呢?

(S) 我想两者都有吧，不要太钻牛角尖。

(又看了一会电视以后)

(S) 怎么所有的旧电影中都有这种铁床架。

(E)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指所有的旧电影，还是指大部分旧电影，或者是指这一部旧电影呢?

(S) 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E) 我希望你能讲得更清楚一点。

(S)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别搞乱了。

在这个案中，充当实验者(E)的妻子就是正在向对象——他的丈夫——构造现实的方式进行挑战。当她用客观性表达的要求断绝了用索引性表达来谈论因果关系的期望时，他开始愤怒了，并且不知道她的行为的意义。

为了对社会中的习以为常的方面进行证明，加芬克尔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了一次准实验，即让学生充当搭伙者。在与家庭成员接触时，这些学生都是非常有礼貌的，只是在别人问他的时候才讲话，并且避免议论人。加芬克尔报告说，在绝大部分个案中，家庭成员都“呆若木鸡”，“急切地想把那些陌生的举动让人理解，以恢复正常的状态。”② 这个研究以及所设计的其他研究都可以证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42页。

② 同上，第47页。

明，人们是如何努力赋予他们的日常事务以意义的——既使是那些事物本来很难赋予什么意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还可以设计一些实地实验以对现实提出疑问，这种实验可以引起对象试图再创造出某种有组织的现实。

加芬克尔对陪审团的做决定过程进行了同样的分析。陪审团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过程，为加芬克尔提供了一个并非有意设计的本土方法学的例证，或称之为"由人使用的方法学"的例证。一个陪审员得到很多方面的信息，并且必须要确定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关于案例"事实"的集体知识形成了陪审员的决定。加芬克尔认为，这种做决定的过程受到规则和规范的支配，这些规则和规范为成为一个"好的陪审员"提供了指导。陪审员要从法庭教育、有关的手册以及其他地方弄清楚什么样的行为对陪审员来说才是适宜的。他们也从电视、电影，从互相之间，从上过公民课的高年级学生那里得到非官方的指导。"最后，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他们通常所从事的其他事务中，一个陪审员已经形成了一种信息储备，这种信息储备是有关从他们的观点看仅仅是理论性的、非实践性的、幽默的、假装的、'高年级的'、'低年级的'等等的程序的"。①

陪审员们带来了在日常生活中构造现实的规则。这种现实与他们作为陪审员的任务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作为陪审员，要从理论上来观察所发生的事情。相反，日常事务的共同点则是有疑问的。正如我们从在他们家中"扮演客人"的实地实验中看到的，学生们用现实的构造使其父母产生疑问。同样，在研究要求对谈话中的明显内容进行充分解释的准实地实验中，现实构造则使实验对象产生疑问。这种日常生活的现实通常不被注意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总是抱一种不怀疑的态度。但陪审员的现实只是部分地没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110页。

有疑问的；而要求他们部分地修改他们的日常生活规则。陪审员们同意遵守法庭的规则，这些规则无疑要求他们对某些关于现实的日常观念进行重新构造。他们被期望用客观的洞察力来代替主观的看法。加芬克尔认为，实际上陪审员只是部分地根据客观标准来做决定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修改了的日常活动的规范。因此，在索引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在陪审团的决定中。

加芬克尔对会诊记录进行了另一种本土方法学的观察。任何想使用作为资料来源的制度化记录的人都知道，记录上的信息并不是很完备的。那些被假定是在所有的个案中都简单地共同记录下来的事实，并没有被共同记录下来。加芬克尔对落掉的资料不是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而是力图对这种"糟糕的记录"做出解释。加芬克尔相信，其中的一部分解释与经济问题有关。这些机构都是在固定预算的基础上运转的。象年龄和性别这些明显的特征，无例外地会被注意到，但记载更详细的细节，则意味着医生要花很多时间。医生之所以没有选择所需要的资料（如职业史），只是因为那要花很多时间，而他们认为那样使用时间是不上算的。同样，管理者也并不强迫人们一定要得到这些资料，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更好地照顾病人。因此，对于许多资料中缺少背景材料的现象，可以作出这种理性的解释。加芬克尔从记录是"糟糕的"但组织理由是"好的"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讨论①。收集信息的职员所使用的这种习以为常的规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当了解的。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186—207页。

科学的理性性质与常识性活动

加芬克尔用一些并没有被公认的假设来对当代社会学的方法论进行批评。加芬克尔认为，日常世界是在充满索引性表达的系统上运转的，相反，社会学家则用客观性表达来对它进行描述。由于强调科学理性，社会学家却远离了日常生活中的理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情境定义"不能与"科学知识"混同起来。这两者都是理性的，但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理性类型。正如加芬克尔所强调指出的：

> 实际上，作为稳定的行为特征的科学理性是由理论化的科学态度支配的。相反，由日常生活态度支配的行动的明显特点则是缺少这种或是作为稳定的特点或是作为能得到认可的理想的理性。①

本土方法学家呼吁人们要对社会学的全部方法论，特别是调查和访问的方法，提出置疑。他们怀疑，在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调查和访问中，调查对象是否是被强迫接受预先规定好了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只能使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现实产生误解。有两种在社会学并不经常使用，但却可以为本土方法学家接受的研究方法就是参与观察和准实地实验。研究技术必须保证不将科学理性置于日常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理性之上。加芬克尔认为，"在由日常生活的预想所支配的行动中，科学理性只能作为一种无效的理想来使用。"② 如果强迫人们的日常行为与其相一致，就会导致夸大"个人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270页。

② 同上，第283页。

行为的无意义特征”①，而在这个时候，在本土方法学家的眼中，这种行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本土方法学所致力的目标就是，对日常的、常识性的现实给以充分的注意。

对本土方法学的批评与评价

从许多方面来看，本土方法学与戈夫曼的拟剧论和布鲁默的象征互动主义相类似；但在另一些方面，本土方法学则体现了同其他理论取向的彻底分裂。这种不同点和相似处，都可以见之于加芬克尔对人的形象、社会的形象的看法以及他对社会学理论的看法。

加芬克尔对人的形象的看法，与戈夫曼相当接近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戈夫曼看来，人的主要的兴趣是管理他给人的印象，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圆滑的。戈夫曼把人们分解为在日常情境中的行动和在例行活动中的行动。加芬克尔也研究日常情境和例行活动中的人，认为他们是通过心照不宣的理解去维持现实的。加芬克尔所关心的心照不宣的理解（自己知道，并知道别人也知道）与戈夫曼关心的圆滑是不同的。但无论是戈夫曼所讲的人，还是加芬克尔所讲的人，都没有证明功能主义和交换理论所讲的那种理性特质（目标取向）。虽然加芬克尔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但那是一种日常的实践理性，而不是科学或理论的理性，而后

① 加芬克尔，《本土方法学研究》，第282页。

② 戴维在对框架分析进行评论的时候指出，最好把戈夫曼看作是一个“社会构造论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

“戈夫曼总是想指出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然的社会构造。作为一个社会构造论者，他一开始就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基本的要素，然后再说明这些要素是如何通过社会手段转变（构造）为精心设计的事物”。

特别是在框架分析中，我们更能看到戈夫曼的拟剧论与本土方法学观点的相似性。

者对社会学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本土方法学也可称之为“关于荒谬的社会学。”① 它回避了人是被决定的还是自由的问题。正如李曼和斯科特所指出的：

> 对客观的哲学来说，自由与决定论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问题是行动者对现实的构造，以及他对自由和限制的印象。关于荒谬的社会学认为人在每一个场合中构造现实②。

因此，从本土方法学的立场来看，“自由”或“决定论”并不是一种客观现实，而是行动者的一种主观倾向。这种对主观性的强调，与布鲁默提倡的在社会学中研究意义和解释是很相近的。

就个人是行动的主要单位来说，本土方法学与交换行为主义、拟剧论和象征互动主义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对于霍曼斯、戈夫曼、布鲁默和加芬克尔来说，作为分析单位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组织或社会系统。加芬克尔进一步认为，正是个人在互动过程中互相传达出社会组织的印象。他要求对全部的客观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的问题提出质疑——交换行为论和拟剧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象征互动论则有意避开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在加芬克尔看来，重要的是要强调，如果离开人们对外在的他人的信任能力，社会就不会有其现实存在。最好把现实看作是一种不稳定的事物，它要求不断地构造和维持。正如特纳所指出的：

---

① 李曼（S. Liman）和斯科特（M. Scott）提出把本土方法学看作“关于荒谬的社会学”。他们认为：“世界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与那些试图发现行动的现实意义——社会学的现实，如社会行为的功能意义——的社会学相反，这种新社会学认为，所有的信仰系统，包括传统社会学家的信仰系统都是随意性的。这种对社会世界的看法，是对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社会学的一种直接挑战，与传统的观察社会秩序的方法根本不同。

② 李曼和斯科特，《关于荒谬的社会学》，第4—5页。

"秩序感并不是使社会可能存在的东西，而是人类积极地、不断地创造和使用规则以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一个现实的世界的能力"。①离开我们互相之间使对方确信有秩序和组织存在的能力，秩序和组织就不可能存在。

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已经看到的，大部分本土方法都倾向于对现存的社会学进行批判。本土方法学家曾对社会学中所使用的现存的方法论技术进行了批判，特别强调了它的缺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本土方法学家并没有明确而准确地说明他们自己的方法论是什么②。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本土方法学家虽然声称对日常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假设的运行有兴趣，但他们并没有能够证明这些假设是如何运行的③，也没有对社会现实的性质提出清楚的看法④。因此，正如穆林斯在《当代美国社会学中的理论和理论群体》一书中所指出的，本土方法学并没有对社会学做出众所公认的积极贡献。它的主要贡献是消极的，即对调查和访问等现有的社会学技术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的批判。到目前为止，穆林斯对本土方法学对社会学缺少积极的贡献的批评，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本土方法学是否能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成为一个实质性的领域，它是否还仍然是一种模糊的观点。

摘　要

本土方法学所关心的是发现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质。他们认为，对于所有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来说，日常现实都是基本

①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330页。

② 见科尔曼的《评论论文集》和席尔与克利廷登的《本土方法学讨论会纪要》。

③ 斯文森语。

④ 见《评论论文集》和《本土方法学讨论会纪要》。

的。他们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存在，这种现实是由个体行动者规定的，而不象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解释的那样。本土方法学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通过建立他们的社会背景而互相沟通。在每一个个人投入其中的场合中，他们都要实现所感受到的规则。但是，由于在每一种互动背景中规则都是不一样的，人们不可能对不同背景中的规则进行自动地概括。在每一种情境中，个人都要分辨出他认为是存在于那种特定场合中的互动规则。

本土方法学家认为，人们用以构造、维持和改变社会现实面貌的方法是可以观察到的，在建立社会学知识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就是进行这种观察。本土方法学家说，对于个人构造日常现实的方法的研究，将为社会学知识提供基础。因此，本土方法学家致力于研究人们在构造日常生活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主题看做是社会学研究中适宜的、怀疑性的资料。

本土方法学的著作已经成为来自传统社会学和激进社会学的批评的焦点。人们认为，本土方法学并没有明确而准确地说明自己的方法论，也没有证明关于日常现实的习以为常的假设是如何起作用的，他们也没有对社会现实的性质提出明确的看法。在受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人们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方法学能否作为一种观点存在下去。

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社会性构造：对结构主义与互动主义的综合

社会学是尽可能清晰地观察社会，不受个人好恶干扰地了解社会的系统努力。这种清晰性的理想（人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无私的清醒）是由马克斯·韦伯所称的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提出来的。这往往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事业……。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并不意味着他或是成为一个没有心肝的观察家，或是成为一个宣传员。确切地说，这意味着每一种了解都体现了与自己的价值观的紧张状态，而这些人实际是非常富有感情的。

引自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

似乎可以说，人本主义或解释性的社会学关注的是微观社会学而不是宏观社会学问题。而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自然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则趋于忽视个人，只集中研究社会结构。与此相对照，人本主义的理论则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强调把互动中的个人作为分析的适当层次。然而正如伯格对互动主义和结构进行的综合所表明的，解释性的社会学并非要局限于社会心理学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如同加芬克尔一样，伯格至今仍感激他以前的老师舒茨以及舒茨对现实进行社会构造的教导。舒茨的影响使得加芬克尔形成了本土方法学的实地实验，并对社会学中流行的方法进行抨击；相

反，舒茨的著作则促使伯格形成了一种不同的理论模式，即社会世界是如何被人们加以构造的。正如我们在讨论本土方法学时所看到的，加芬克尔所说的社会世界只有在行动者允许它存在的时候才存在，相反，伯格的社会现实则存在于自身之中，并按照结构主义所讲的方式作用于人类主体。与加芬克尔不同，伯格认为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现实（这是杜尔克姆和后来的功能主义者所关心的），但是这个客观现实的意义则是由个人从个人与客观世界的主观关系中引导出来的（米德和他的象征互动主义的追随者，特别是布鲁默都持这种观点）。

正如在开头的引文中所指出的，社会学这个"痛苦的事业"不仅必须在社会心理学和结构取向的社会学之间走钢丝，而且也必须在无价值的乏味与宣传之间保持平衡。为避免社会学中的这种痛苦和困难，伯格提出了两种方法：

> 第一个方法是把社会学的了解过程从所有的价值问题中分离出来，以便使社会学家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观察者；要么就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而不考虑社会学的洞察。这就是说，或者是非人道的（这样的个人是价值无涉的，而不考虑他的理智的活动），或者是屈服于非理性（个人只是在无法进行推理争论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另一种方法，也许是更简便的方法，就是抛弃那种进行价值无涉的理解的理想，明确宣告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或者是既不可能又是人们所不情愿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可以使得个人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解释社会世界——实际上，就是按自己喜欢的样子来看这个世界。①

伯格确信，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

①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第 vii 页。

并不意味着他或是成为一个没有心肝的观察者，或是成为一个宣传员”。他的主观价值将会与他的客观地进行学术活动的努力处于一种辩证的紧张状态。

在伯格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力图沟通微观与宏观社会学、价值无涉的与充满价值观念的社会学、结构主义与互动主义、理论社会学与评价性的社会学的努力。他使自己深入到社会学的“痛苦事业”中去，以图分析人们构造现实的方式。

对现实的社会构造

伯格与德国社会学家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合著了《对现实的社会构造》这部重要的理论著作(1966年)。这部著作虽然是合著的，但在这部著作中所发展的思想，却已见之于伯格的早期著作《社会学浅论》(1963年)中，并由伯格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一再应用。实际上，这部著作是伯格其他著作的基石，无论是那些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书，还是主要为社会科学家所写的著作，都是以这本书为根基的。

伯格和卢克曼把他们的理论概述为：“现实是由社会加以构念的”，① 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构造发生的过程。他把现实定义为“是属于我们认为不依赖我们的意志而存在的现象的性质”(正如我们无法“让它消失”一样)，以此承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伯格和卢克曼认为，我们都在寻求知识，或者说寻求“其现象是现实的”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同特点的性质”。社会学所从事的是对于知识和现实的一种特殊的探求，这种探求好象介乎于街道上的普通人与哲学家之间。街道上的普通人“知道”他们的现实，但用不着花时间去系统地分析它。相反，哲学家则要努力考察

①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6页。

知识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社会学家不能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什么东西是现实的"?相反,他们必须集中研究社会现实是如何发生的,而不去考虑它的可靠性问题。社会学家并不辩论一把椅子是否是一把现实的椅子,一个家庭是否是一个现实的家庭;他们把这样的标签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把明显的社会现实接受过来,并从那里开始分析。

伯格同意现象学中的这种观点:现实是多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可以回顾一下,本土方法学强调日常的、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的现实与科学的现实的区别)。伯格也同意加芬克尔这样的观点,即存在着一种压倒一切的现实,这就是"日常生活的现实",而这是一种更重要的现实。这种现实被认为是有秩序的、模式化的;这种现实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疑问的,因为它是被处于类型化(模式化)互动中的其他人所分享的。但与加芬克尔不同的是,伯格强调日常生活的现实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就通过外化过程创造客观的社会现实来说,人类是一种工具,而在同时,他们也通向内化过程(反映主观现实)受这种现实的影响。这种论题与反论题产生了一种综合,按照这种辩证的方式,伯格把社会看作是人的产物,而人也是社会的产物。在下面的篇幅中,我们将探讨现实的主客观方面所各自包含的涵义,以及客观化、内化和外化的辩证过程。

作为客观现实的社会

按照杜尔克姆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伯格承认客观社会现实的存在,这种现实可以按照社会制度的角度加以观察。但是,秩序并不是"事物的本性"。它并不是像密涅瓦那样从宙斯头上跳出来;而只能被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① 伯格同意杜尔克姆这样

①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52页。

的观点，这种客观的社会结构有其自己的特征，但它的起源必须按照人类的外化过程或按照与既有的结构进行互动的人来理解。这种外化过程进一步扩展为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它使得这种结构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停滞了的终点。反过来，通过外化过程创造的社会现实又反作用于社会中的人。这个辩证过程是不断进行的，因为外化与客观化只是历史上的“一刹那”。这个过程中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内化，或称之为将个人社会化到客观的社会世界中去[①]。所有这三个因素——内化、外化、客观化——都是共存的，互相之间按照一种辩证的方式进行工作。

支配客观社会世界的基本规则就是秩序。伯格认为，“社会学带来了一种经验，这就是，秩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社会就是强加于不断变化的人类经验之上的秩序”。他认为，“社会厌恶秩序混乱就如同自然界厌恶真空一样。”[②]伯格承认，社会秩序并不稳定，但是，按照功能主义的方式，他认为社会制度趋向于秩序均衡。

伯格和卢克曼把角色概念化为人类有机体与社会结构的连接体[③]，这也是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相类似的。社会结构由类型化的或模式化的角色行为构成——这种类型化是交互性的。虽然个人与角色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是按照角色履行的标准进行自己的活动的。这些角色类型“必须与行为的制度化相关。”因此可以说，角色所代表的是客观的制度秩序的基本单位。

然而，与大部分功能主义的模式不同，伯格和卢克曼强调的是与结构相伴随的过程。在现实性上，社会从来就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始终处于一种生成的过程中。因此，客观化表明的

①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61页。

②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第xv页。

③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72—79页。

是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世界变成一种有能力制约和塑造其参与者的现实。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通过预先获得大量的选择——不只是行动的选择，也包括思想的选择——来保护我们的明智。"然而有限制的选择仍然存在着，从而使结构能够逐步的变化。按照伯格和卢克曼所给定的事实，客观现实只是我们的复杂的世界的一个方面，社会学家还必须去分析主观的现实，主观的现实可以是一面镜子，但并不是与制度化的秩序完全相同。

作为主观现实的社会

如果说自然主义社会学强调的是客观的结构秩序，那么解释性社会学所体现的则是对人们的主观世界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已经看到，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是如何强调置于客观结构之上的主观现实的。伯格虽然在讨论结构问题上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理论上的努力，但是，他也对主观世界给予同样的强调。客观化仅是构造现实过程中的"一刹那"。这个辩证过程中的另外两个"一刹那"——内化，还包括在更小程度上的外化——都体现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综合的努力。

正是通过内化或社会化的过程，个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按照社会心理学的传统，伯格和卢克曼把初级社会化描述为个人在孩提时代经历的第一次社会化，通过这种社会化，孩子们被引进到客观的社会世界中去[①]。这时，个人遇到负责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重要他人(父母或代替父母的人)。受到这些重要他人支持的对现实的定义，被孩子们判定为就是客观现实。

由于不可能完全吸收现存的现实，孩子们会内化他们对现实的解释。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对于现实的"看法"，他把这种"看法"看作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伯格和卢克曼强调在我们的社会

①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130页。

世界中存在的是多面的现实。他们注意到，一个下等阶级的孩子不仅会被强加上一种下等阶级的观点，而且"他们还会按照父母所赋予他的个人习性来吸收这种观点"。尽管阶级、种族、宗教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变量都可以成为客观现实的指标，但任何一个群体中都不会有两个人是按照完全一致的方式社会化的。这个下等阶级的孩子与隔壁的同龄的儿童尽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仍然会存在差别。

虽然在客观的现实与主观的现实之间有一种对称关系，但这两种现实是不能等同的。伯格和卢克曼认为，"'在外部'是现实的，'在内部'也是现实的"，"客观现实可被'翻译'成主观现实，反过来也是如此。"① 他们认为，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互相协调，但客观现实总要"超过"单个的个人所能内化的。社会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彻底完成的过程。主观现实中的某些方面并不是起源于社会化，同样，客观现实也有一些不能被内化的方面。伯格和卢克曼进一步指出，由于社会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完成的过程，因此，这里就存在一种对维护现实的连续不断的挑战，并且特别需要对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对称性加以保护。②

外化是指人们集体构造新的现实的过程，而这些人们并没有被彻底的社会化。伯格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坚持认为，这种变迁是缓慢的，但却是持续不断的。伯格在各种文学刊物和杂志上发表过许多通俗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他所说的"现代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的社会学论文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并可用来证明外化过程。

现代性是指由最近几个世纪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整个世界的大转变，它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它也在人们的意识

①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133页。

② 同上，第147—163页。

层次上引起了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信仰、价值观念，甚至动摇了对生活的观念。"① 对旧的世界的内化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情愿，而与现代技术变迁将吻合的新的现实则在被外化，或被构造。

可以用一个例子以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很抽象的客观化、内化和外化过程。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择偶和结婚的模式正在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社会中，家庭规模在缩小，包办婚姻在消失，夫妇选择与父母分离的住宅，妇女解放，离婚也与前工业社会中的规范不同。在指导婚姻制度的结构性规范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是逐渐的，而在同时，社会的成员则在集体地构造着对社会现实的新的定义。在这个我们所选择的控制着家庭的规范方面发生的变化中（我们使用由于避孕而造成家庭规模缩小的例子加以说明），我们能够对客观化、内化和外化这个方面的辩证过程进行形象的说明。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美国的出生率在近 150 年中正在下降。比如，1930 年的出生率是 1800 年的三分之一。但在同时，在 20 世纪初，也有一种很强的反对控制生育思想传播的规范，计划生育的倡导者M·森格尔所遇到的烦恼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尽管一些宗教教派反对使用避孕用品，这些避孕用品还是在出售，被人们所使用，这个时期，出生率开始下降。对于客观规范的内化远不是彻底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对现实进行重新构造成为可能，这种新的现实鼓励人们做"负责任的父母"，而这是与家庭中孩子数目的减少以及有效地使用避孕措施的增加相伴随的。

对现实的社会构造及其合法性

按照韦伯学派的方式，伯格和卢克曼指出，客观的制度需要有

①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第 70 页。

合法性，即"对其进行解释并证明其正当性的方式。"①社会制度的最初的意义以及它们的构造过程或是丧失了，或是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人们总是要赋予制度和制度活动以一定的意义，这种共同"谎言"则成为合法性过程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的有限民主制度所包含的确切含义是由其创立者赋予的，这种意义只有历史学家才能了解，一般的美国公民对此知之甚少，但他们却假定，所有的人都会同样的被政府所代表，并平等地参与政府事务。在最近两个世纪中，由于宪法已经成文，因此宪法被合法化和理想化了。可以说，合法性的因素即是来自于个人的互动之中，对于这种合法性的描述再被加以客观化。这样，合法性就在客观世界之上加上了一种"赞成的印记"。

伯格所特别感兴趣的是现代世界的合法性问题。世俗化由于对"似是而非的宗教信仰和经验造成了广泛的威胁"而成为现代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两难状态②。伯格认为，宗教是反对无意义存在的最大堡垒。换句话说，宗教是将社会世界合法化的最大源泉。世俗化则意味着似是而非性的合法化减弱。正是在对宗教制度的变化的分析中，伯格通过社会历史分析应用了他的关于现实构造的理论。

神圣的天幕：伯格理论模式的应用

在《神圣的天幕：关于宗教的社会学理论的因素》一书中，伯格再一次介绍了他的关于外化、客观化和内化的辩证理论方案。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个人既是他们的社会的产物，又是他们的社会的创造者。作为一种宗教的制度要经历其他制度同样的过程。

① 伯格和卢克曼，《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第61页。

②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第78页。

换句话说，宗教也是人类所创造的，并已形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起作用并受到人们的作用。

伯格注意到，象他所做的那样把社会作为建造世界的活动来讨论，就等于说这是一种规范性的活动。规范是失范的对立面，而失范是指一种没有规范的状态。如果说失范代表了社会秩序的崩溃，规范则代表着秩序和对于秩序的规范性的规定。对于较大的社会来说，都有一种个人参与其中的共同规范或意义，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是与个人或主观意义一起存在的。伯格说："社会世界构成了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规范。客观的规范是处于客观化的过程中。"① 因此，规范成为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伯格所注意的就是这一点。

除了规范之外，还有一种伯格所说的风俗。风俗超越出日常生活的现实，而进入超出客观证明的领域。伯格认为，正是习俗派生了宗教的存在，而这是一种"人类的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活动，神圣的风俗才得以形成。"② 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风俗化与世俗的风俗化并驾齐驱。伯格认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实现风俗化的世俗努力。

从现实的社会构造的意义来说，宗教曾经是一种最广泛的最有效的合法性的源泉。正如伯格所强调的，"从历史上来看，在合法化过程中宗教的最重要作用，就在于宗教是唯一具有将人类的现象'置于'宇宙的参照框架之中的能力的。"③ 这样就可以说，在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构造的时候，宗教有利于两个重要目标的实现：(1) 它为现实提供了规范或意义；(2) 它使这种现实合法化，或是说打上赞成的印记。

① 伯格，《神圣的天幕：关于宗教的社会学理论的因素》，第26页。

② 同上，第27页。

③ 同上，第35页。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伯格宗教理论的根本之点是认为，宗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最大的挑战者就是科学，它已经取代了宗教的作为解释的源泉的地位。虽然科学能比宗教更好地解释自然现象，但可悲的是，科学却不能提供规范。现代科学中的解剖学可以确定儿童突然死亡的医学上的原因，但在这悲痛的时刻，科学却不能提供象传统宗教曾经提供的意义和慰籍。对尽善尽美而又无所不能的上帝的信仰，提供了深刻的寓意，但只靠科学却不能提供这种寓意。

通过使用他的辩证理论，伯格从历史上追溯了世俗化的起源及对宗教的影响。虽然伯格回避对宗教的未来作具体的预测，但他强调，宗教不仅有助于形成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而且这种活跃的（按其人们外化和改变现实的能力来说）也会改变宗教的未来。伯格运用历史资料追溯了制度化的起源（因而也是客观化的起源），探讨了在未来宗教非制度化的可能性。人们所感受到的整个客观世界包括神圣和世俗两个方面，宗教信条代表着神圣的方面，而世俗的方面则由科学信条所代表。在人们内化宗教的时候，宗教所采取的形式与伟大的先哲们对宗教进行内化时的形式是不同的。由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宗教现实的主观接受已经发生了改变，客观的教会制度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外化宗教现实，并导致宗教现实客观化的变化，如反对现存的教会，在他们仍是教会成员的时候并不全心全意地投人，拒绝接受某些教派的教义等。

作为一个神学家和社会学家，伯格反映了这一章开头的引文中所提出的与社会学"痛苦的事业"的斗争。在此后的著作中，伯格根据世界的日益世俗化来审视自己的宗教观点①。在他的宗教

① 见伯格的《神圣的天幕：关于宗教的社会学理论的因素》和《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

社会学著作中，伯格揭示了在他的科学学术观点与个人价值观之间存在的紧张状态。

伯格理论在婚姻问题上的应用

伯格认为，他的理论模式不仅可以运用于对社会和较大规模的制度的宏观分析，而且也可以应用于分析小群体。他和科尔纳（Kellner）试图将这个模式运用于两人群体即婚姻中的对现实的社会构造。正是婚姻的二人组合这样的小型的亲密群体，可以使个人在现实中外化自己，并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在家中就可以感受到的世界。

在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将他们各自的现实与对方的现实联系起来。结婚的双方各自成为对方的重要的他人。因此，婚姻的客观现实以及新家庭的建立都是新郎新娘的主观气质的产物；同时这个现实又反作用于结婚的双方，影响到他们个人的主观现实。比如，结婚可能意味着结束他们在单身时所建立的朋友关系，并建立双方都共同分享的新的朋友关系。同样的变化也可以发生在吃饭的爱好、娱乐、装饰选择等方面。这是贯穿于整个婚姻中的一种逐渐的过程。

争论与"交换思想"是在婚姻中构造新的世界观的主要途径。每一方都会从他们的主观现实中对争论中"形成"的观点作出贡献。关于家俱的式样以及想要几个孩子这样的讨论都会成为反作用于结婚双方的客观现实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个青年妇女在结婚前可能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当她的丈夫一直向她宣传他对本地政治事务的兴趣时，她慢慢就会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并分享他的观点。同样，她也可能把自己看作一个古式家俱的爱好者，以与丈夫对古典音乐的爱好相适应。这种

过程也可以发生在丈夫身上，如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培养自己对巴蕾舞的兴趣，以迎合妻子对中世纪艺术的爱好。在争论中可以将两种不同的经历“体现”出来，并形成新的定义，这种新的定义可以包含了他们所分享的婚姻现实。

伯格和科尔纳强调指出，在婚姻中对现实的构造并不是一种有计划发生的过程。相反，它是在双方互相认识并建成一个共同的世界的过程中自动发生的。他们的主观现实互相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不仅作用于创造者的客观现实。伯格和科尔纳认为，“结婚不仅涉及到进入新的角色，并且要远远超过这一点，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调节的相互性又一次与婚姻的平等观念的产生联系起来，在这之中双方都要求进行共同的努力。”①

个人并不是简单地进入预先存在的婚姻角色的。这里有一些被共同接受的指导他们各自行为的社会规范(比如，同居、生孩子、维持家庭契约、把对方的朋友看作自己的朋友)，而他们所共同分享的大部分现实都是由自己创造的。可以说，这种现实是被客观化的，并不仅对创造它的配偶发生反作用，而且对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发生反作用。

对伯格理论的批评

伯格的人道主义理论所取得的进展远不止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与戈夫曼、布鲁默和加芬克尔不同，伯格并不轻视或否认结构对于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在利用结构的理论概念和理论观点的时候，伯格能超越出微观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历史成为有助于描述现代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资料来源。但伯格在这一

① 伯格与科尔纳，《婚姻与现实构造：微观知识社会学的运用》，见迪雷茨尔编，《目前的社会学》，第50—71页。

点上是与其他人道主义理论家相一致的，即把社会结构中人们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的课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忽略那些有血有肉的组成部分。伯格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也是与人道主义和解释性的社会学家相一致的。

伯格把社会定义为“强加于人类的经验流之上的秩序。”①这种秩序是制约人们的潜在自由的力量，但这种制约却可以造成人的解放。这正如伯格所说的，“社会通过大多数人选择的先发制人而在行动和思想上来保护我们的明智”。②实际上，伯格是赞成社会制约的：

>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无意义”即通常被看作是所谓“异化”的源泉的，实际上是为个人和集体的明智所必须的条件。目前时髦的左派理想是“全部参与”，如果从每个人都将参与每一个影响个人的决策的意义来实现这种理想，就会形成一种不次于永久的失眠的恶梦。③

但是，尽管伯格所说的人是在结构上受客观社会现实的制约的，他们仍有着潜在的自由。伯格说，社会学指出了“社会对自由的限制——但反过来正是这种限制为实际上可行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空间。”④

伯格将他的理论取向称之为“保守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保守派，伯格怀疑那些提倡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因为他“深深地怀疑对现状的替代是否可以带来好处”。⑤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也对将社会学的事业由理论转向狭隘的研究持批判的态度。

①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第 xv 页。

② 同上，第 xvi 页。

③ 同上，第 xviii 页。

④ 同上。

⑤ 伯格，《系统与部落之间》。见伯格和纽豪斯编《运动与革命》，第 11—82 页。

在呼唤作为人文学科的社会学的时候，伯格提倡"对无限丰富的人类生活要具有一种开放性，……社会学家要允许自己理论框架的封闭性的墙壁留有'洞口'"①。社会学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事业要想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就不能轻易地将其模式化为可以进行僵硬的经验检验的僵化的命题公式。

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伯格并不情愿放弃价值无涉的学科模式：

> 我尽可能地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是价值无涉的，但在某些场合下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在这门学科在原则上不是价值无涉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宣传，成为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②

但价值不断成为伯格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紧张和苦恼的源泉，因为"社会学家（首先）就是人类中的一员，这使得他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在他工作的时候，他要背叛他的人性，并使自己成为抽象的科学的精神体现者（通过被称之为'错误的意识'和'坏的真理'的东西起作用）。"伯格用"从事社会学这种痛苦的事业"来处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包括政治和宗教。③有位评论家注意到了伯格的最近的著作，并说："伯格毫无疑问地所以被指责为要戴两顶帽子：'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家的博士帽，……和力图使我们这个令人茫然的时代有意义的天主教士的四角帽。"④确切地说，在伯格

① 伯格，《社会学浅论：人道主义的观点》，第168页。

②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和宗教中的游览》，第 xviii 页。

③ 伯格为感兴趣的读者提出了解决价值和现代性问题的不同作法：

> 在《飘泊的心灵》一书中我明谛地谈到了我对现代性对人类社会存在和意识的影响。想更多地了解我对政治的非辩护性看法的读者可以去看《神圣的金字塔》，而《安琪的传闻》则是将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与作为一个持相当异端看法的天主教徒结合起来的一部最厚的著作。

④ 哈森格尔，《社会学的真理》，见《高等教育史》第15卷，第18页。

努力形成一种人道主义的科学而又介入的理论时，他的著作在当代社会学理论观点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摘　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伯格力图将功能主义者所描述的客观社会世界与社会心理学家所强调的主观世界综合起来。他是按知识社会学的框架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即分析人类是如何构造客观与主观的现实的。

客观化、内化和外化，是历史所连续经历的三种过程。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逐步的、辩证的变迁，而不是一种急剧的、革命性的转变。"外在的"客观社会世界塑造个人；也就是说，人是他们的社会的产物。某些社会世界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它反映着我们的社会规范——如家庭法、财产保护法、契约的制定和撤销法等。而社会现实的另外一些方面则并不是如此稳定可辨的，但它影响着我们从穿着的风格、讲话的方法、食物的爱好到宗教和社会价值这一切事物。客观的社会现实通过孩子的重要他人反射出来（尽管孩子与他们的重要他人对现实的感受并不一样）。孩子们通过社会化过程来内化这些客观的现实，当他们长大成人还要继续内化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所遇到的新的情境。

但是，人类并不是完全由他们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化从来都不是一种完全成功的过程。这里有一种人们外化或集体地形成社会世界的余地。通过这种外化过程，社会秩序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反作用于造成变化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因此，社会又是人的产物，人们不只是受到社会的塑造，他们也有意或无意地努力改变社会。

伯格把这种理论模式运用对作为合法化制度的宗教的变迁的

宏观社会学研究和在婚姻中构造现实的微观社会学课题。在关于现代性的许多文章中他都使用了这个框架。无论是在他写的通俗读物中还是在社会学的专著中，伯格都在为形成一种人道主义的、与对我们的现实世界的分析有关的社会学模式而奋斗。

人道主义社会学小结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坚持自然主义社会学的信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同样，对于纯粹的人道主义社会学的认同也有着层次的不同。虽然那些人道主义者都同意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他们对于分歧的反应却并不总是相同的。

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人们是在何种程度上自由地创造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在所提出的四个理论家的著作中，戈夫曼的拟剧论是最有决定论特点的，他的有关总体性制度的著作可以论证这一点。无论是在一种制度中，还是在一种结构性的情境中，戈夫曼所讲的行动者都是对他们的环境发生反应。在阅读戈夫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解释时，所得到的印象就是，人们都认为他们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们却并不象他们所想的那样自由。当然他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生活戏剧的脚本，但无论他们怎样做，他们都是对脚本发生反应。

在加芬克尔、布鲁莫和伯格的理论中，"意义"都是一个中心概念，而在戈夫曼的社会学中却恰好缺少这个概念。加芬克尔试图分析"意义"是如何由明显的世界构成的。在加芬克尔看来，每个人都努力按照一种使之有意义的方法来定义他们的社会经历。加芬克尔所处理的是处于个人分析层次上的常识性现实问题，相反，伯格则是在集体分析的层次来处理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就是，主观现实（个人层次的分析）是怎样与客观现实（集体层次的分析）相符合的，以及意义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从对客

观现实合法化的形式上来看它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大部分解释性的社会学来说，意义是一个中心概念。

在人道主义社会学中经常出现而在自然主义社会学中常常受到忽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自我"。在这里我们会再一次看到不同之点和相似之处。我们认为，戈夫曼所讲的自我是多层面的，是由他们所处的特定的结构和情境决定的。这种个人从一种场合进入另一种场合，而很难有个人的历史感，而这一点恰恰是统一的基础。而布鲁莫所讲的自我，则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它比戈夫曼所讲的自我少一点决定论的色彩。它的长处是，它要比戈夫曼所讲的自我更加统一、更有创造性。而伯格所讲的自我则是对布鲁莫的自我和戈夫曼著作中所讲的被决定的人的一种综合。

如果说在自然主义理论家中对人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话，对社会的看法也是如此。戈夫曼和伯格按结构主义的方式承认社会现实的存在。在戈夫曼看来，既使是临时性的情境也具有一个可以影响我们的表演的现实。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伯格承认社会结构的存在——这种社会结构部分地是由它的成员创造的，但可反作用于它的创造者。戈夫曼和伯格承认社会结构大于构成它的个人，相反，无论是布鲁莫还是加芬克尔都不同意这个假设。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布鲁莫把制度看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仅仅是被合在一起的"共同行动"。加芬克尔在否定社会结构的现实时走得更远。加芬克尔认为，对社会现实加以组织的努力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现实，而只是一种主观感受。组织和结构存在于那些每天都在从事维持现实的不确定的任务的大量组织者的头脑中。

戈夫曼、布鲁莫、加芬克尔和伯格都共同信仰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即由于自然主义社会学占据支配地位而在社会学中流行的方法论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社会现实。但是尽管他们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各自解决方法论问题的方法却是不同的。戈夫曼把"不

系统的自然主义观察"作为基础资料，布鲁莫对他以前的学生的方法论表示赞同。而布鲁莫自己也形成了一些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些原则，他象戈夫曼那样提倡一种"对人类群体生活和人类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加芬克尔则形成了准实地实验和参与观察的方法，以作为本土方法学的资源来源。只有伯格为人道主义的资料基础加上了另一个方面——历史，这无疑是因为他所关心的问题超出了微观社会学的范围。由于伯格所关心的事情远超过典型的人道主义社会学所关心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他把关于过去的知识与对于当前的了解结合了起来，并对形成未来的图景作了一定的努力。

伯格所以作为评价性的理论家与非评价性的理论家之间的联结点。他自己的著作就处于评价性的和非评价性的人道主义之间。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那些对理论的应用很关心的人似乎很少能从他那里得到支持。他怀疑那种改良社会的庞大的学术设计。①然而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对评价性社会学的观点已经缓和多了。②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看到，人道主义社会学坦率地将自己与人文学科联系起来，这些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哲学和戏剧。虽然他们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但他们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它关于人的相对自由的假定与自然主义社会学的更加决定论的模式也是不同的。在人道主义社会学中，很少强调构成结构性整体的因素或部分，而更加强调人的活动与社会学家所讲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意义的研究或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这是解释性社会学的中心点。正是人们解释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能力使得他们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自然主义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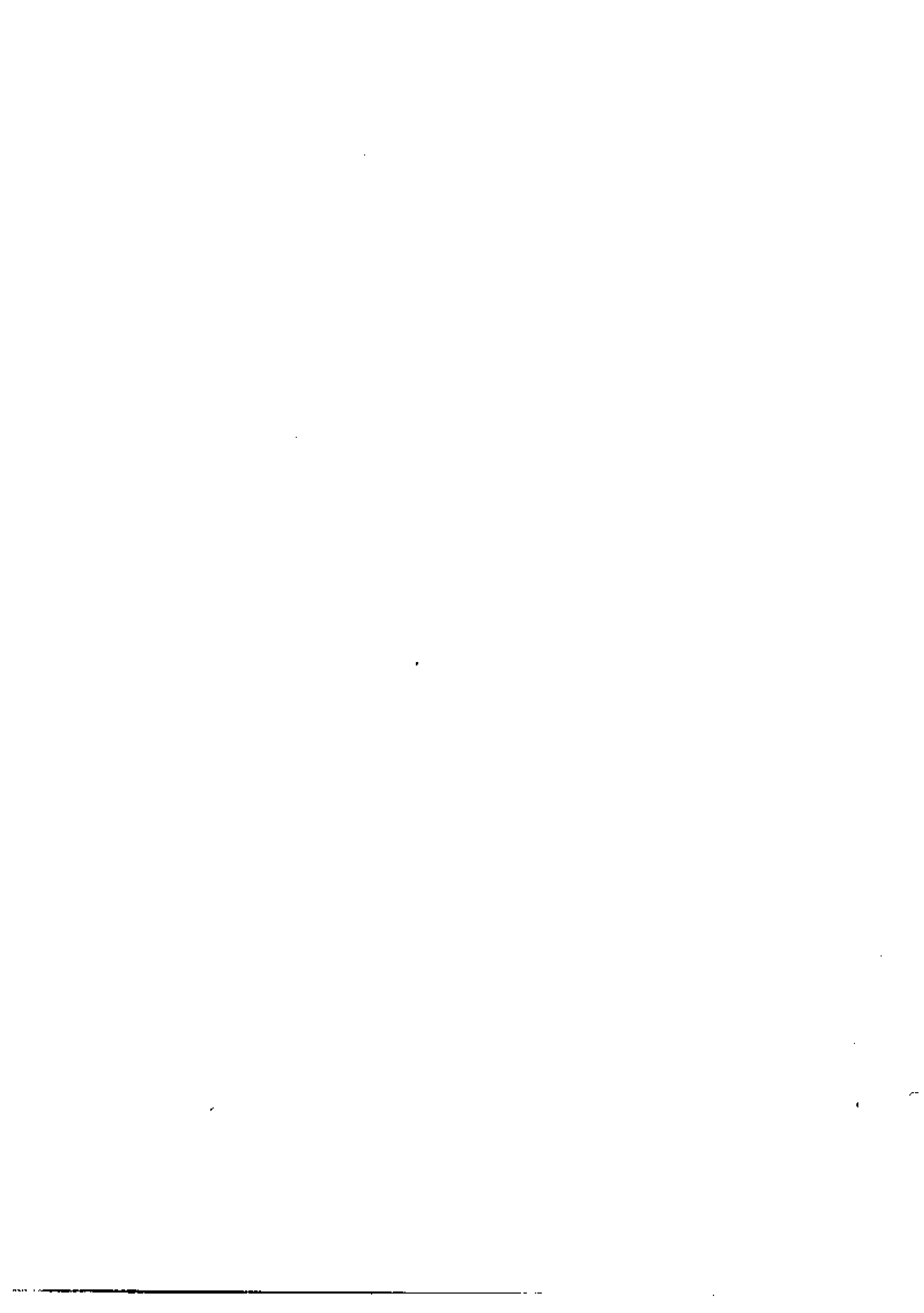
① 伯格，《系统与部落之间》，第20—21页。

② 伯格，《直面现代性：社会、政治与宗教中的游览》，第xix页。

与人道主义社会学的假设的差异常常导致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所关心的，是形成能更精确地量度社会现象的所谓定量技术。人道主义者则常常对这种方法进行批评，而提倡更多地使用定性研究方法。

第 三 部 分

评价性社会学理论家



第十四章　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呼唤：社会心理学与冲突结构主义的融合

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使人们理解更大的历史场面，理解他对个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涯所具有的意义。社会学的想像力也可以使人们搞清楚个人为什么在人生的沉浮中往往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发生误解。在这种人生的沉浮中，人们想要寻找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的框架，在心理学当中，阐明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的人们的心理的框架已经形成。按照这种框架，就可以将对个人的不安的关心转到明显的困扰上来，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就成了一个公共的问题。

摘自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

对自然主义的功能分析和人道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经常提出的批评之一，就是他们忽视了冲突。功能主义强调的是对于社会冲突的整合，而互动主义者强调的则是作为社会学分析单位的个人，这两者都不能形成一种能充分地解决强制和冲突这些宏观社会学现象的理论。一些结构取向的理论家，包括科塞、达伦道夫、布劳，都对功能主义拒不讨论冲突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且证明社会冲突问题能够从以结构为基础的观点加以解释。同样，也没有理由能够说社会心理学理论不能解决冲突问题，特别是当这样的理论试图超越出对于小群行为的分析的时候。

赖特·米尔斯(C.W. Mills)代表了一种从不忽视社会心理学原则，但又努力将这些社会心理学原则与对于结构的社会学关心联系起来的社会学理论。对于结构的关心也促使他靠近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应用的和评价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一个改革取向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著作证明了利益的冲突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现实。虽然他关心宏观的课题(这是为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所忽视的)，但他并不忽视个人(而许多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却存在问题)。综观他的所有重要著作，我们可以看到米尔斯对于个人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结构的关系的认识。

正如前面的引言所表明的，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米尔斯发出了对于社会学想象的最初的呼唤。这种社会学想象可以看作是"两种研究途径"的混合物，这两种研究途径，米尔斯称之为宏观途径和微观途径。宏观途径"用比较方法处理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他们的视野和历史学家一样广阔；他们试图对历史现象进行分类并用系统的方法把社会的各种制度联系起来，然后再把它们与流行的人的类型联系起来。"① 韦伯、马克思、齐美尔和曼海姆的著作都是宏观研究途径的例子。微观方法是以"小规模的问题以及它的证实统计模式为特征。"② 在米尔斯看来，"离开了社会哲学以后，剩下的似乎只是技术和很细小的问题。"③ 关于宏观的与微观的研究途径，米尔斯认为，"我们的问题和著作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越重要，我们对于问题的处理就会越不严格，我们的知识就会越不确定。"④ 米尔斯解决这种两难境地的方法，就是巡回于两个层次之间，这可以使我们既在宏观的层面上工作，也可以下降到微观层面

① 米尔斯，《目前社会研究中的两种研究风格》，见《科学哲学》第20卷，第267页。

② 同上，第267页。

③ 同上，第267页。

④ 同上，第268页。

以获得充足的证实材料。

米尔斯的对于"社会学想象"的要求是起因于他对社会学中过多的科学伪装感到不满。他对于极端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很少有温和之辞，他将他们称之为"科学家，"是一群他认为喜欢穿上胸前带有 I.B.M. 符号的白工作服的人。① 他们力图要象物理学家研究自然那样来研究社会和历史。米尔斯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它忽视了以下三个因素：(1)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2)权力的性质以及它与知识的关系；(3)道德行为的意义及其中知识的地位。米尔斯的社会学理论就是试图把这三个因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

米尔斯也相当激烈地批判了另外一个社会学流派，他称他们为"广涵理论家。"帕森斯可以作为这种广涵理论的代表。"广涵理论家"代表了一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组织地从明确描述、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中退出来的努力。"米尔斯说："他们在矫揉造作的文章中，叙述所阅读的19世纪卓越社会学家著作的杂乱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错误地把这些社会学家的开端作为结果。"② 尽管米尔斯死于帕森斯对自己的一些重要理论做出修改之前，但是说米尔斯会为帕森斯的晚期著作所深深打动，是很值得怀疑的。

米尔斯对社会学家中的第三个流派表示尊敬，这些社会学家对于特定现象对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感兴趣，并将这种意义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这些社会学家精通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对经典的社会学家如韦伯、齐美尔和曼海姆的思想甚为关注。这一派的社会学家把他们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关心与知识、历史学和传记

① 米尔斯，《IBM ＋ 现实＋人道主义＝社会学》，载《文学周末评论》(1954年5月1日)，第22页。

② 同上，第23页。

的使用结合起来。米尔斯对这样的社会学家表示信任，他们对相关性社会学理论感兴趣，并把历史与传记作为资料来源，这样的社会学家具有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经常被看作是改革取向的社会学的再生之父。他为把社会学归还给民众而热情工作——不然，社会学将陷入一种非评论性的破产地位，而他试图将社会学从这种状况中解救出来。他试图使社会学的领袖们重新关心时代问题。虽然米尔斯逝世于60年代早期，但他的许多著作在今天的影响要远大于刚问世的时候。

米尔斯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米尔斯于194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受教于两位经典理论大师——葛斯和贝克。特别是在葛斯的教导下，米尔斯潜心于德国的社会学传统。米尔斯还和葛斯一起编纂和翻译了韦伯的著作。米尔斯和葛斯对经典理论的共同兴趣和知识，产生了他们合著的一部名为《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著作。① 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按照社会心理学的逻辑来讨论社会制度。这部著作分成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围绕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是由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这个目标。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葛斯和米尔斯介绍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

社会心理学家试图描述和解释各种类型社会中人们的行

① 施米卡(J. A. Scimecca)在《米尔斯的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强调指出，《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一书是理解米尔斯后来的全部著作的基础。他认为，这部著作将"社会行为主义或实用主义所讲的个性形成与韦伯及其他德国社会学家所强调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综合。我们赞成施米卡这样的看法，即许多社会学家都没有看到米尔斯著作中的理论模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对《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一书给予充分的注意，而这本书可以看作是米尔斯后来著作的理论框架。

为和动机。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个人的外在行为和内部生活是如何与其他人的行动和生活相互作用的。他们试图描述通常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人的类型，然后通过探索他们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他们。①

这样，性格结构就通过个人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结构联结起来，这种社会结构包括亲属结构、宗教结构、经济结构，军事结构和政治结构。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研究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这两种结构的各自组成部分。葛斯和米尔斯认为，由于在每一种性格结构中生物有机体、心灵结构以及扮演角色的人的特殊作用，人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生物。人类是一种生物实体，这种实体包括有机体中的感情、情绪和冲动。在社会中，人们依靠这种生物的及心智的条件来承担角色。这样，葛斯和米尔斯用来形成社会结构概念的社会角色就成为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或叫社会制度之间的重要联结点。因此，政治秩序是由这样的一些制度构成，"在这些制度中人们要求使用和影响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和权威的分配。"②经济秩序则是由这样的一些社会制度构成，"人们用这些制度来组织劳动、资源和技术性工具，以便生产和分配商品和劳务"。③军事秩序"是由人们用以组织合法的暴力并管理它们的制度构成。"④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在葛斯和米尔斯所讨论的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联系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制度，都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个人和制度是互相依赖的，它们通过社会角色的

① 葛斯和米尔斯，《性格结构和社会结构》，第4页。

② 同上，第26页。

③ 同上，第26页。

④ 同上，第26页。

联结而产生一种交互影响。一个作为妻子和妈妈的人，就与亲属秩序联系起来了；如果她又是一个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就与宗教秩序联结起来了；如果她还是一个企业董事或工厂的工人，她就与经济秩序联结起来了。正是通过与其他人在结构性的背景中互动，一个人才能充分地表现自己，同时，也正是通过个人承担社会角色，制度才得以存在。

在《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第三部分，葛斯和米尔斯考察了把"个人和制度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机制"。① 他们讨论了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控制的重要性。他们按照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强调用来对情境进行定义的语言和其他符号的重要性。在第三部分中，如同在第一、二部分中一样，也有一些与社会心理学观点相类似的讨论。

在这部著作的第四部分中，他们关心的对象转到动态学以及历史对于进行充分的社会心理学评价的重要性方面。布鲁莫、戈夫曼、霍曼斯和加芬克尔虽然都关心使个人行为成为分析的单位，但他们都对历史不感兴趣，把历史置于他们的分析之外。葛斯和米尔斯强调历史条件对于人们的制约作用。

> 由于人类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因此它是一种独特的动物。必须按照历史的产物的意义来给人下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公式能适用于人类。决定他命运的既不是他的解剖学特点也不是他的心智特点。当他对于他所经历的情境做出反应的时候，他创造了他自己，而他所处的情境以及他对于情境的经历都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历史时代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作为个人时不能创造他自己的命运，而只有在作为社会成员的时候才能创造自己的命运的原因。

---

① 葛斯和米尔斯，《性格结构和社会结构》，第 165 页。

只有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范围内，他才能作为一个个人塑造自己。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集体地再塑造自己要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①

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是米尔斯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方法。他对于历史的了解，使他注意到社会冲突这样的事实，并且要求社会学去分析它。这有助于解释米尔斯为什么重视作为社会学资料来源的传记和历史。

米尔斯和权力研究

在50年代，米尔斯着手研究那些令人苦恼的时代问题，——从卡斯特罗的古巴到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米尔斯分析这些"令人苦恼的问题"时突出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样也是在今天有很大影响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对于权力研究的关注。他把社会生活看作是由对于权力的不断争夺构成的。米尔斯对于决策以及权力结构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强制性权力的兴趣，因为"它是权力的最终形式。"由于他的研究牢固地扎根于历史的观点，米尔斯说，"我认为'人们是自由地形成历史的'，但在实际上，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要求拥有决策的手段和权力，正是通过这些决策和权力，历史才得以形成。"

重要的是要记住，米尔斯是在功能主义发展到极盛时期写这些著作的。在那个时候，冲突观点，甚至冲突结构主义都还远远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在那个时代，人们强调的是远离时代问题的非评价性的、不偏不倚的社会学。虽然米尔斯对于科学地研究社会感兴趣，但是他强调，社会科学家应该关心与紧急的政治问题直接相关的社会学。他相信，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社会学家应该关心

① 葛斯和米尔斯，《性格结构和社会结构》，第480页。

我们时代人类生活的质量问题。哈罗维茨把米尔斯所关心的社会学问题概述如下：

> 要求把社会学还给民众，实际上使它非职业化的想法其基础在于米尔斯的这样一种认识，即在自然状态中，人基本上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对于情绪冲动、政治口号、地位符号等等发生反应的生物，社会学能够提供一种使人们摆脱个人主义的、宗派主义的神话式的傲慢而走向成熟的手段。社会学帮助人们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以及他们能够做什么。①

米尔斯的著作被进一步应用于研究变迁，并最终带来变迁。按照米尔斯的观点，人类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这要求社会学要探讨这种非理性。通过这样的探讨，人们可以较少地对情绪冲动、政治口号和地位符号发生非理性的反应。正是在这个背景中，米尔斯写了大量的关于权力和政治的论文，同时，他进行了对白领工人的研究，写了有关在美国掌握权力的那些人的论文。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米尔斯承认，在企业家和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作为缓冲带的中产阶级。曾对 19 世纪的工人状况进行过论述的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在工业社会中中等阶级的发展。这个"在 20 世纪的社会中承担着重要任务的行动者"的特点就是，他们并不象早期的企业家那样是独立的。②新的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美国人口的一个

① 哈罗维茨，«米尔斯简介»。载哈罗维茨编«权力、政治与人民：米尔斯文集»，第 17 页。

②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 4 页。

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中产阶级是由经理、领薪水的工人、专业职员、售货员以及其它办公室的办事员构成的。正如米尔斯所描述的，这些白领工人的大部分是在日益失去个人权力的可怜虫。他们是以从工作和他们自身中疏离和异化出来为特征的。

米尔斯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白领工人的论文。马克思认为，是劳动把人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人们通过作为一个农民、铁匠、医生或一个店主的劳动表现出他们人性。而资本主义所刺激起来的现代工业则使得通过劳动表达人性日益困难。一个农民辛勤劳动，并能看到自己收获果实；一个店主进行工作，并由他的事业成功得到报酬；一个医生可以治病，得到一种由于他的病人恢复健康而带来的满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却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无意义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中所雇佣的人被剥夺了通过劳动表达他们的人性的基本方式，因此，他们正在从自身中、从他人那里、并从自然中疏离出来。正是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充当了米尔斯讨论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础。米尔斯按下面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思想：

> 在白领工人中，领薪金的工人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异化出来便朝向类似卡夫卡的完成靠近了一步。领薪水的雇员虽然能处理大量他们非常愿意拥有但却不能拥有的东西，但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做。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以及产品制造出来之后，他得不到快乐。……在工作中他感到厌烦，工作时得不到休息，这种可怕的异化使他疲惫不堪。①

为了形成这个论点，米尔斯使用了他和葛斯在《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中所形成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必须依照对白领工人所处社会结构的理解把他们置于历史时代的背景上。然后必须把心理

---

①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 xvi—xvii 页。

学的分析与关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学框架结合起来。

米尔斯使用历史的资料来描述过去时代的小业主。米尔斯把这种小业主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不是被压迫的人，一个独立的而不受结构中的传统束缚的人，在这种结构中，个人的自由似乎是社会秩序的原则。”而在现代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小业主所面临的缺乏安全感的状况已经使他们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独立性以寻找能确保安全的政治手段。从1900年以来白领阶级的变化表明了他们地位的下降。这些趋势包括：(1)与老式的企业家相比，威望下降；(2)尽管其收入要稍高于各种领薪水的人们的平均收入，但实际收入在下降，在某些地方已低于前者；(3)办公室工作的机械化，威胁着许多白领工人工作的存在；(4)对办事员自主性的限制。因此，白领工人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例行公事、令人讨厌的；而且，将来能否出现会引起人们兴趣的工作，希望也是渺茫的。

米尔斯的关于白领工人的论文，已经受到批评，因为这种观点“仅仅是一种指责，而缺少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也没有指明改进他们存在方式的可能性”。① 也许米尔斯对于那些从蓝领变成白领的低等职员的问题夸大其辞。也许是米尔斯把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事情过于浪漫化了，只是选择和注意到一个企业家的那些美好的方面。然而，米尔斯确实注意到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即缺少权力。米尔斯强调，中产阶级的工人，甚至包括专业工作人员，一般都既缺少控制自己生活的个人性权力，也缺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力。

权力精英

权力问题是米尔斯在另一部经典性著作——《权力精英》中讨

① 雷斯曼(D. Riseman)，《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57卷，513页。

论的主题。在米尔斯看来，在那些处于权力结构最高层的人与不分享这种权力结构的人之间，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按照韦伯的方法，米尔斯把权力看作是既使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权力精英就是那些处于能作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的位置的人，而中产阶级则完全相反。

正如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结构所作的分析那样，作出至关重要决定的国家权力都依赖于大企业的领导人、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经济、政治和军事都是历史中的重要力量。而所有其他制度，包括家庭、宗教、大学和劳动都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可能对国家的政策制订做出反应，但却不能影响国家的政策制订。在20世纪，企业、政府和军队的规模都在增长。因此，这个三头政治成为影响历史的重要力量。

对水门事件进行的调查，揭露了一件丑闻。但假如米尔斯能活到这一天的话，也决不会对此感到惊讶。美国社会中的大量事实都表明了大企业与政府的互相联系。米尔斯认为，在一个人从三巨头政治的这一部分的领导人成为另一部分的领导人的过程中，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这种联系。麦克纳马拉从一个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成为约翰逊总统国防部长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例子。

米尔斯把权力精英看作是由有相似的起源和教育的人所组成的阶级。"他们的团结具有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基础，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他们容易连成一体。"① 米尔斯承认，他的观点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代。但他相信，在20世纪这是确实的，因为在20世纪，集权化的精英有了很大发展，而在过去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米尔斯认为，否认权力精英存在的观点是很流行的，但却是荒谬的。他试图粉碎这样一种"关于社会形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19页。

象的神话，即认为志愿团体和阶级民众将掌握关键性的权力”。①这种关于权力的多元论的观点不能解释一个国家中存在的不同层次的权力。米尔斯承认，虽然中间层次的权力可以根据平衡和折中理论来运行，但那种涉及国家和国际问题的最高层权力却不能按这种理论来运用。在讨论“战争与和平”、“不景气和贫穷”这类决定的时候，米尔斯认为，这些决定都是由三巨头构成的权力精英做出的。②

米尔斯揭穿的一个最大神话就是“平衡理论”。那种理论认为，“美国有这样的观点：政府是一种自治的机构，由利益竞争所造成的平衡来调节”。③美国人经常认为，议会起监督总统的作用，而最高法院则起维持权力平衡的作用。假如说在政府的三部分之间存在平衡的话（米尔斯认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米尔斯提请人们考虑，谁在国会中代表美国公民。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普通老百姓：

> 他们代表的是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人。那是些年龄较大、在本地出生、信奉基督教的有着特权的白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至少属于中上等级。一般来说，他们不受雇佣，也没干过薪水很低的工作。总之，他们是本地的新老上层阶级。④

实际上，在总统权力不断增加的同时，国会的权力已有很大削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揭露水门事件，它的结果是使总统权力的增长暂时停止，至少是减缓了这种增长。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国会已经能够作为一个权力实体乘虚而入了。米尔斯认为，我们的监督和平衡理论至多只有在特殊历史阶段才适用：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27—28页。

② 同上，第30—31页。

③ 同上，第242页。

④ 同上，第248页。

那些仍然认为权力系统反映社会平衡的人，经常把当今时代与过去的时代相混淆，把当今时代系统中最低和最高层次与中间层次相混淆。当平衡理论被概括为一种关于权力系统的主要模式的时候，它就缺少了一种历史确定性。实际上，平衡理论作为一种模式，它应是确定的，只能适用于美国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例如著名的杰克逊时期，或处于完全不同环境的（罗斯福）新政的初期和早期。①

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府的最上层，这只是权力精英的一个方面。在早期的美国历史上，从革命时代一直到19世纪的最初25年，对最高层次的全国性决策来说，政治制度起着主要的作用。在最高法院于1886年做出保护公司的决定以后，这种权力开始从政府转移到经济制度中。罗斯福新政就是对于经济失败的反应，它导致了政府权力精英和经济权力精英的联合。米尔斯认为，在当今的时代，企业与政府显然是不可分离的，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队的权力也在上升。米尔斯感到，“美国的军事结构已成为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按照米尔斯的看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权力精英注意的重心已由国家问题转向国际问题，而在这种决策过程中，军事领导人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米尔斯把美国的经济称之为“军事资本主义”。在美国，“经济既是一种持久战争性的经济，也是一种私人公司的经济”。③

从最近美国发生的历史上少有的骚乱来看，米尔斯对权力精英的讨论是有预见性的。总统和副总统被迫辞职，其他著名的政治家受到了指责，政府领导人的品质受到强烈的怀疑。对于这种政府解体，米尔斯在1959年就从社会学上提供了解释：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266页。

② 同上，第275页。

③ 同上，第275—276页。

从这种观点来看，雄心勃勃的青年政治家的最基本条件不在于他在道德上是否麻木不仁，而在于在美国政治活动中是否把当前的事情做好，而不要求道德上的敏感。大部分白领犯罪问题，公共道德松懈问题和个人正直感的低落等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不道德问题。①

对米尔斯理论的批评

米尔斯关于人、社会、社会学的形象与那个时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一些方面是对立的。大部分社会学理论都认为，人是由社会决定的，但又是理性的。相反，米尔斯则提出，人可能是自由的、非理性的。比如，功能主义倾向于把人看作是多少由社会结构决定的，相反，互动主义者则赞成米尔斯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多的自由。同时，大部分社会学理论家都认为，作为社会成员的是理性的、目标取向的人。而米尔斯则描述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方面。在揭示这种非理性的时候，米尔斯认为有些人愿意去改变社会结构。米尔斯也对有关社会性质的占支配地位的看法进行修正。功能主义和互动主义者把社会看作是有秩序的、模式化的，而米尔斯则强调社会是利益竞争的战场。在人们把科学的、实证的、价值无涉的社会学奉为理想的时代，米尔斯对学术性社会学的效果提出了疑问。

米尔斯对人的看法反映了作为社会产物的人与作为社会结构创造者的人之间的矛盾性。马克思为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而写作，如同马克思一样，米尔斯希望揭示人的非理性行为。承认了人们对地位符号和政治口号的反应是非理性的，人们也许就能够改变自己社会的历史。因此，在米尔斯看来，如果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属性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他们也许就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并最终导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243页。

致改变社会。比如，如果人们认识到在政治中是很难做到诚实的——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选民就会对政治口号少做出反应。如果认识到在今天民主理想的实现比过去还要渺茫，人们就会同产生权力精英的利益进行斗争。

但在同时，米尔斯也承认，历史上的制度会塑造个人。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自由也要受到控制，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米尔斯认为，大部分白领犯罪都是"结构性不道德"的结果。① 库卓特和金两人对米尔斯关于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的人的看法做出如下评论：

> 虽然米尔斯认为，权力处于支持制度的地位，但他仍关心这样一种事实，做决定的、要对后果负责的还是个人。米尔斯一方面用分析的观点将个人置于更广大的系统中，另一方面用人道主义者的敏感对有力量的个人却不能维护自己自主性的状况提出批评。②

个人自由和结构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在米尔斯论权力一书中表现得很明显。米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创造历史，但实际上，有些人的自由却比另些人大得多。因此，他觉得人是部分自由、部分被决定的，这有赖于他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对米尔斯来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权力结构是一种现实，它决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命运。实际上，批评者认为米尔斯对某些社会制度(特别是军事制度)的权力估计过高，而对群众的权力估计过低的做法③。米尔斯对权力结构的分析似乎是把人看作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243页。

② 库卓特(R. P. Cuzzort)和金(E. W. King)，《人性与当代社会思想》，第144页。

③ 在这些批评中有阿普特克(H. Aptheker)的《美国的权力》，贝尔(D. Bell)的《关于权力精英的再思考》，戴尔(R. Dahl)的《对统治精英模式的批评》和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的权力分配》。施米卡认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批评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地方性问题而不是集中于全国性的问题，这与米尔斯理论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

是精英人物的抵押品，他们的命运是由精英人物的社会活动决定的。但同时，米尔斯也希望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社会一历史状况虽然是客观的，能决定人们的生活，但也是可以用理性行为加以改变和指导的。

米尔斯对社会学的看法是与他对人和社会的看法相一致的。如果社会学要发挥它的潜能，就不应仅仅是发现事实，进行抽象的思考。米尔斯提倡社会学的想象，这种社会学的想象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愿意对社会问题进行考察。米尔斯敦促社会学家们致力于人道主义的、评价性的理论，对改进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进行设计。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知识应成为每个人都具有的知识，并用行动来实现它。

在告诫社会学家们注意唯科学主义的危险的时候，① 米尔斯也提出要用合适的资料来支持理论。有许多理论家重视冲突问题，米尔斯则强调历史观点的重要性。按照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方法，米尔斯用传记来对历史资料进行补充。

米尔斯认为：

社会科学都要涉及传记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互相作用。这三个因素——传记、历史和社会——是与对于人的恰当研究相一致的，在对一些流行的社会学流派进行批判的时候，我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那些学派的

① 将社会学作为唯科学而进行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唯科学主义使用科学的词汇却拿不出使人信服的科学结果，（2）科学主义所关心的只是报酬较多的领域（从研究得到的赞成、学生获得的地位的意义上说）。批评者认为，正是由于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和形成理论的技术大量增加，而这并无助于对社会世界的更好理解。因此，重要的潜在的社会学课题就是那些被忽视的领域。但米尔斯所批评的唯科学主义，而不是社会学对科学方法的使用。正是这种唯科学主义妨碍着人们对有关的知识的追求。

继承者们都抛弃了经典中的传统。历史是社会研究中的骨骼，如果不是这样地看问题，就不可能将我们当今时代的问题——包括人的性质问题——阐述清楚，而且还应认识到，应当形成这样一种关于人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是以社会学为背景的，并坚持历史的相关性。①

米尔斯本人的著作就表明，他在努力研究相关的社会课题。他按照他自己所说的"智力行业"的规则，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其学者生涯结合起来，并对社会课题，特别是当代社会的权力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

摘　　要

米尔斯所呼唤的"社会学想象"是对自然主义模式的一种批判，而后者在当代社会学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指出了美国社会学中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这种抽象的经验主义更多地是表现在它所使用的方法上，而是不表现在所涉及的课题上。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理解历史和传记以及在社会中这两者的关系的一种能力"。②米尔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既不能是很少或没有材料支持的抽象的、广涵的理论（米尔斯认为帕森斯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也不能是只有资料而很少有或没有相关的理论的抽象经验论。在《权力精英》和《白领》这两本书中，当他研究那些社会课题的时候，米尔斯对经典理论发生了兴趣。这两本书的资料都是从历史和传记材料中收集到的，包括新闻报道、传记和杂志的记载。因此，不仅米尔

①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1959年版，第143页。

② 同上，第5页。

斯的著作中所研究的课题是与社会相关的，而且还努力将资料和理论结合起来，以对那些社会课题进行研究。

在米尔斯的许多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权力精英》，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由大企业家、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和高级军事领导人组成的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米尔斯相信，在美国社会中，只有相当少的人才有能力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做出决策。只有通过增加对美国权力状况的公众认识，人们对政府做出认真的反应才有希望，而对相关的社会课题感兴趣的社会学，会促进这种公众认识。

米尔斯的著作所代表的是一种评价性的，人本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他的关于人的模式，很明显是人本主义的，是以互动论之父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著作为基础的。但是，他又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加上了历史的方面和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的认识。他的关于人可以自由地改变历史的信念，使得他呼吁恢复面对公众的社会学。在米尔斯看来，目前流行的自然科学的模式使社会学不能在影响社会变迁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学想象"的呼唤，就是对关心我们时代的相关社会学的呼唤。

第十五章　自控性社会：对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评价与综合

包括作者在内的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感到，理论与方法的结合恰恰是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科学的基础，实际上这种结合的工作已经在做。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还缺少点什么。

所缺少的主要是社会分析，即对于社会现象的系统探讨；换句话说，这谈及到对我们时代中的重大课题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同时也就涉及到对宏观单位的研究。虽然社会分析的目标是课题，但课题不是社会学建设的基石；关键的是工具，这种工具可以提高我们对社会性课题的分析水平，它可以改善我们这种业余性的、直觉的、新闻记者式的社会学。

引自伊兹尼：《作为社会学天职的社会分析》

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已经看到的，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那些著名的理论基本上都局限于关心非评价性的问题。这些作者都力图保留自己的判断和偏向，梦想创造出一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框架。理论的建立仅仅局限于讨论社会是怎样存在的，而不是讨论制订一种社会变迁的方案。社会问题虽然毫无疑问地属于结构的一部分，但它经常被看做是用不着过分详尽说明的病态。因此，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大部分观点都是分析性的理论，它们旨在描绘社会，而不在于利用社会学的知识改造社会。

在开始的时候，研究者往往有这样一种想法，社会学类似于物理学而不是类似于技术。社会学要努力去发现社会行为的规律，就象物理学家寻找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其他的应用领域可以利用社会学的知识，就象技术依赖于物理学所发现的规律一样。但是，社会学的理论不能受应用的要求的影响，包括不能受那种改造社会的目标的影响。

由于60年代社会骚乱的出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把社会学划分为非评价的和应用的或评价的两种类型是不妥当的。于是人们努力在社会学中开设培养设计社会调停的学生的课程。象米尔斯这样的一些人道主义社会学家很久以来就在关心将社会学的知识应用于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① 到60年代后期，已有若干受过良好训练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加入到关心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人道主义社会学家的行列。这些人，包括着各种各样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如拉兹菲尔德、豪斯、罗西等，在他们探求社会学的应用的时候，并没有抛弃原来的自然主义取向。在观察应用社会学兴趣的复兴的时候，会看到评价性理论的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在伊兹尼的著作中便可以发现，他在力图把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社会学与评价性的理论方法综合起来。

特别是在他称之为"生活的"著作的《自控性社会》一书中，伊兹尼试图把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参与统一起来。伊兹尼说：

> 我希望说明的是，社会科学理论在科学上可以是可靠的，在学术上是能够应用的，能够成为积极参预的桥梁。对事实

---

① 涉及应用社会学的著作如L·A·米切尔和C·M·班杰恩的《有计划的社会干预》，P·F·拉兹菲尔德和W·H·塞维尔及H·L·维伦斯基的《社会学的用途》，C·H·维斯的《行动计划评价》。

的陈述和价值判断都可以系统加以表述，而不至于混同或混淆。社会学的想象能够丰富社会科学而不能替代社会科学。我们反对那种认为社会分析不能超出中性的社会研究的范围的观点，这就如同我们反对那种认为命题的真理价值要按其对进步所起的作用来衡量的观点一样。①

伊兹尼使用的理论模式是控制论模式，这个模式对于现代普通系统论是基本的。通过这个模式，伊兹尼企图回答四个基本问题：

1. 如何控制人类的未来？

2. 如何使人类的历史摆脱命运的支配，而由理性的、自发的行动来创造？

3. 如何指导个体行动者？

4. 他们自我控制的力量在多大程度是可靠的。

伊兹尼通过把已经存在的观点综合成为一种控制论模式而形成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可以形成命题并对命题进行检验，也可以对资料进行编纂。

自控性社会：关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理论

一个自控性社会，就是在人们对他们处于其中的世界负责的社会。这种社会与消极的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在消极的社会中，人们被外部强力或活跃的他人所支配。伊兹尼说，在一个自控性的社会中，人们可以改变社会规律。在这样的世界中，人是创造者，他们创造他们的社会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自控取向有三个主要的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 viii－ix页。

组成部分：自我意识和聪明的行动者，一个或多个行动者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拥有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①。但是，这样的活动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因为每一次行动都会带来反行动。因此，自控性的人并不是简单地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的人。这样的人必须学习知识、了解情况，以便做出明智的行动。他们必须推迟个人的报酬的获得以利于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目标。

伊兹尼这里所讲的就是一种关于"社会自我控制的理论"。如同物理学家通过利用原子能以产生动力一样，社会学家必须学会利用社会能。伊兹尼认为，在机器中，有两次革命，即工作的机械化以及机器控制的机械化。在社会中，也有类似的两个步骤的革命。现代组织的发展类似于工作的机械化，它代表了一种有效地进行工作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机器。现在，我们所要面临的是通过社会指导来发展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组织机器的控制②。

伊兹尼认为，知识是理解和实现这样的自我指导社会的关键。包括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将被用于社会改造。伊兹尼按照下述方式揭述了他对社会改造的研究：

> 这种研究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的探讨，这种社会了解它自己，致力于更充分地实现它的价值，它要求有一种改造所需要的杠杆，能够对自我改造能力进行限制，以免它自我损伤。这就将是一个自控性的社会。③

关于宏观行动理论的基础

伊兹尼的理论是对于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这

---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4页。

② 同上，第7页。

③ 同上，第16页。

两种局部性理论的综合。他反对那种认为人类的关系纯粹是机械性的关系、可以按照研究化学关系和物理关系的同样方法来研究的观点。同样地，他也不同意另一种极端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行动的机械方面并不重要"，可以通过对做为关键变数的重要符号进行研究来提供解释的观点。伊兹尼认为，这两种理论观点必须结合起来以便对自控性社会做出解释。他强调："在原则上，控制是可能的，因为行动单位一方面存在于机械性世界，同时它们也对于符号做出反应"。这种控制依赖于三个基本因素：(1) 拥有知识的行动者的群体；(2) 行动者或群体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3) 对于权力的拥有，包括操纵可以改变社会规章的符号。①因此，所谓"自控的"，就是有知识的、有目标的、有权力的。

伊兹尼承认，虽然人们有行动的能力，但也存在对于这种行动的强制因素。他一再对某些现存的观点进行抱怨。功能主义提出的集体主义理论断定人们仅仅是他们的社会系统的产物。社会秩序是不受人类的控制的。在另一个极端的是象米尔斯这些对结构理论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伊兹尼认为，米尔斯的权力中枢代表了一种自愿主义的理论，它认为当人们愿意的时候，他们就能对社会秩序进行完美的控制。伊兹尼关于社会指导的理论力图把集体主义与志愿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人们有进行社会行动的能力，但他们也会认识到对于行动的制约和限制。这些制约并不是被看做是"被给定的"(象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那样)，而是过去的行动和选择的结果，——至少部分地是这样。因此，现在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去的志愿行动的结果。

在对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和既作为过去的行动的产物同时对现在的活动做出反应的社会的性质提出这些假设或假定前提之后，

---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26—29页。

伊兹尼指明了他的社会指导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因素。伊兹尼把社会关系分成三种类型，即规范性的，功利主义的和强制的。功能主义分析所强调的规范性关系要担负为人们所分享的规范和价值。原始社区和类似社区的组织（如家庭）就是这种关系的例子。在这种社区中，人们相互把对方看做目标，相互之间有一种非理性的契约。功利主义关系就是社会交换的理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一方都存在报酬的问题。在强制性关系中，互相做为对手，契约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伊兹尼认为，强制性关系涉及使用强力或被迫使用强力，一方的行动者反对另一方行动者。这三种类型的社会秩序划分的基础是纯理型的，通常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现实的社会关系，往往是这三种关系的混合物。

在社会指导理论中，两个重要自变项就是集体和国家。集体是以一套其成员分享的规范性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的。集体的概念相似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在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中，阶级的成员了解共同的利益，并团结起来形成行动的基础。除了这种由集体所提供的凝聚性关系之外，还需要一种控制网。在伊兹尼的理论看来，在一个社会成为自控性社会之前，以国家为代表的控制网是必要的。无论是整合或凝集，还是控制，都可以或是规范性的，或是功利性的，或是强制性的关系。

以国家为代表的控制中心包含着两类子单位，即精英人物和工具机制。这些子单位把控制中心与那些处于控制之下的成员单位联系起来。在伊兹尼的理论中，精英人物并不等于"统治阶级"。一个精英就是"对处理知识、进行决策和运用权力的工作进行控制的单位"。[①] 这些精英既不形成一个处于优越地位的阶级，也不一定需要处于领导地位。精英这个术语是指一种角色（而不是一个阶级），它的任务是处理知识、进行决策、发出要求。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113页。

控制因素之一：知识

在将控制模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候，知识或信息就被看做是实现系统的改造的能量形式。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以前部分所看到的，自控性社会中的控制要视行动者群体对于知识的掌握而定。伊兹尼认为，在社会的自我指导中，知识是一种根本的因素。在布里德（W·Breed）用更广泛的证据修改伊兹尼理论的时候，他对于过去运用知识的失败提出了一些解释。①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由于对越南的情况了解不多而做的轻率的决定；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则是60年代"反对贫穷的战争"。社会知识的拥有和使用应该有助于在将来减少文化中的这种失败。

虽然知识在这个控制模式中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它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决策和权力是这个模式中必须加以考虑的另外两个控制因素。由于可以利用的知识在不断增加，在工业化社会中，教育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自控性社会中，知识将使得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成为可能。伊兹尼假定："一个意识到他的社会环境他自身和他的内在控制的行动者，将比一个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特征但却没有意识的行动者更具有自控性"。② 意识的作用在于将某种现象放到一定的背景中来观察，或者说是"在一个更大的参考框架中来认识它的地位"。③ 意识到人们轻而易举地得到枪支造成了一个很高的杀人率，将会影响到公众舆论对枪支管制法律的支持。关于由很高成本的竞选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循私现象的知识将导致民众支持对政治捐款和竞选时间进行限制。但知识必须与自

---

① 布里德，《自我指导的社会》，第36—41页。

②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223页。

③ 同上，第226页。

控性社会控制模式中的其他因素(知识、决策和权力)联系起来。伊兹尼提出了下列命题以将意识和活动联系起来:

1. 只有在自控取向的其他因素也在增加或者其他因素比社会意识更加先进时,意识的增加才可能产生自控性。

2. 在意识处于高水平而契约处于低水平的时候,我们可能见到一种"我并不诅咒"的社会等价物(比如"颓废的社会")。

3. 当意识在高水平而知识在低水平的时候,意识的主要作用可以提高行动者不能应付他面临的问题的感觉(比如国家在70年代面临经济危机时,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①

控制因素之二:决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是一种关键的控制因素。但在自控性社会中,这些知识必须被付诸实践。这是由决策实现的,决策把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伊兹尼强调说:"正是通过决策的过程,那些由行动者的价值和目标决定的含糊和抽象的社会契约才能成为关于行动过程的具体契约"。②

社会指导理论断定,决策者可以在一个社会的更加广泛的限制因素中进行选择。决策意味着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替代方式之间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伊兹尼提出了决策的两种方法,即理性的模式和渐进模式。

决策的理性模式预先假定四个先决条件:(1)关于可以替代的行动过程以及其中每一种过程结果的信息;(2)依据其对于各种价值的意义,对可以替代的结果进行计算;(3)一套作为选择目标并判断替代行动过程基础的一致同意的价值;(4)对于所有有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238—239页。

② 同上,第249—250页。

关的替代方式的彻底研究。① 这第四个先决条件是不可能被完全满足的——这要有一切必需的信息。虽然可以改进沟通，但信息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渐进替代模式比理性模式的要求要少些。这种模式所要作的是相对令人满意的决定，而不是可能最佳的决定，它提倡使用孤立存在的策略。伊兹尼把这个模式描述如下：

> 在使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决策者并不是致力于一种综合性调查和评论。他们并不调查所有的替代政策，而仅仅调查那些在递增程度上不同于现存政策的政策。此外，所考虑的手段数量也较少。因此，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寻找信息和进行计算的范围以及所需要的代价。②

决策常常是以这种模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理性模式为基础的。但伊兹尼认为，这个模式只是反映了那些最有力量的群体的价值和目标，而不能反映更广大的社会的价值和目标。因此，正是这种观点导致了对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变迁的容忍。人们把递增描绘为象一个醉汉的历史蹒跚之路。

伊兹尼提出了进行决策的第三种途径，这种途径被称之为混合审视。混合审视代表了一种进行自控性决策的途径，这种途径把理性决策与渐进模式结合起来。混合审视需要从理性上探讨可能的行动，而略掉某些细节和个别的方面，同时，伴随着递增。伊兹尼把气象卫星及它的两个照相机做为混合审视的例子。③ 在其中的一架照相机摄取天空中广大的图景时，另一架照相机就来摄取细节。广角照相机审视着需要研究的天空，而另一架照相机可

---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 264 页。

② 同上，第 270 页。

③ 同上，第 284 页。

能用零度在拍摄细节。

伊兹尼认为，混合审代已经为科学家和执行者所使用，这样的决策过程是一个有效的决策过程。它把信息的收集、处理和评价与做选择的过程结合起来。这个决策的模式克服了理性模式和递增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以确保建立一种自控性社会。

在伊兹尼所讨论的控制模式中，还有一个附加的部分，即权力现象。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忽视权力。虽然伊兹尼认为权力是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他把权力看成是自控性社会中的一种关键性的工具因素，而不是控制因素。

工具性因素之一：权力

伊兹尼按照韦伯的方式把权力定义为"克服部分的或所有的阻力，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引进变迁的能力"。[①]伊兹尼发现，在他对于权力的讨论中，把权力与财产区别开来是有用的。财产代表了权力的基础或权力的潜在性。做出这样区别的好处是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在即使没有实际使用权力的情况下对服从现象做出解释。权力代表了实际运用的权力，而财产则是指潜在的权力。

实际使用的权力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即使用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产生对于它的反对。虽然社会需要控制(权力保障这种需求的满足)，但社会成员是期望自由的。伊兹尼力图探索那种能最好地满足这两种需要的权力类型。

在讨论财产和权力的问题的时候，伊兹尼把财产和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功利主义的，令人信服的和强制性的。"功利财富"包括：拥有的财富、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劳动能力等。"功利权力"是在那些拥有这些财富的人使用这些财富以对别人发生影响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314页。

时应用的权力。"强制性财富"就是军队、警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和劳动。"强制性的权力"是当一个单位使用强制性的财富以把一个预先规定的行动强加于他人时的强迫和结果。"令人信服的权力"则是通过对于符号的操纵以获得支持的方式来运用的权力。伊兹尼认为，令人信服的权力产生异化或疏离最少，而强迫的使用所造成的异化则最多。他进一步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其趋势是抛弃强制性的权力而运用功利性权力。这将确保较少地产生异化，使得社会对它的成员更负责任。

使用哪种类型的权力是随着获得的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伊兹尼认为，文化目标(比如教育、社会化、文娱活动)通常是通过规范性的控制实现的。要实现这种文化目标，往往不需要其他权力，异化程度也比较低。但是，生产目标(如制造商品，分配服务)的实现则较多地需要更为有效的功利权力。有关秩序的目标(如对犯罪的控制)则牵涉到强制性权力和强迫的使用。① 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种权力往往造成较多的异化，它至少部分地导致了监狱在对罪犯实行再社会化时的失败。

一般地说，总的趋势是由强制性控制到规范性控制。在后现代社会中，强调的重点将由强制的和功利性的控制转到规范性控制。这可以由劳动力中的这种变化来证明，这种变化导致了科层化的工作越来越少而自我指导的、非异化的位置越来越多。对于这一点，伊兹尼概括如下：

> 在历史上，"世俗的"趋势似乎是强制越来越少，功利主义越来越多，特别是规范性依从越来越多。随着那些没有实现功利控制的国家的功利控制的增多，当他们在经济发展以及对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370—373页。

于规范性指导的选择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他们便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一个社会自控性的程度越高，它对规范性指导的依赖也就越多。由于它产生的异化较少，因此它更有效率，反过来，规范性指导又会进一步降低异化的程度。①

社会的一致与责任

伊兹尼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子集体或子群体构成的松散的集合。这些群体包括家庭、宗教和民族群体、种族集体、阶级和自愿团体。这些子集体向更大的自控性集体，如国家，提供政治上的原料。伊兹尼认为，"一般地说，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动所涉及的大量是代表子集体的组织以及他们的结合体，而较少涉及没有集体基础的组织。"②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并不是对个人负责，确切地说，社会是对一致行动的集体和群体负责。

但是，国家并不是简单地实现集体的希望；它有自己的权力。自我指导的社会应该将两种基本成分结合起来，即控制（如在极权社会中存在的）和一致（如在民主社会中所强调的）。伊兹尼相信，在民主社会中实现这个任务的手段是较少地使用强制和说服，而更多地使用教育。在那里，应该有一种"有计划的自由"的或允许社会成员自由的指导原则。伊兹尼认为，这在后现代民主社会，是已经正在发生的趋势，在那里，控制已经增加，但那是一种允许更大自由的控制。法律要求工人拿出一定比例的工资作为社会保障或其他的退休基金。虽然这是一种控制形式，但它也提供了一种自由，使人们知道退休之后仍将得到一些收入。

---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380页。

② 同上，第441页。

一个确实负责的社会要了解它的所有成员的需要，而不是仅仅了解那些最有势力的集体的需要。自控性社会的理想是尽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必须允许群体的流动，并拥有获得权力的途径。

从异化到自控性社会

虽然可以说美国正向自控性社会发展，但如果认为他已经达到自控性社会，那是错误的。仍然有一些事情需要加以规划并进行工作。社会对于人的异化或不负责任，仍然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从根本上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不可靠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表面上负责任而实际上是异化的社会。伊兹尼说，这种异化的根源，不是在个人的精神世界中，而是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如果减少异化，就要对这种结构进行改造。①

伊兹尼认为异化和不可靠性的概念承认那些自控性社会必需满足的人类基本需求的存在。他试图为这种需要列出一个不完备的项目，包括：

1. 爱情的需要，也就是指对于团结，凝聚和爱的需要。
2. 对于认识的需要，也就是自我尊重，成就和赞赏的需要。
3. 对于范围的需要，也即是对取向、一贯性、综合和整体感的需要。
4. 对可重复出现的满足的需要，允许经常的、可预见的报酬。②

除了对爱情、认知、"范围"和可重复的满足的需要之外，其他的需要是有差异的。伊兹尼认为，承认差异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应

①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618页。

② 同上，第622—626页。

允许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规范的存在。同时，也应允许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在个性和社会化方面本来就存在差别。

这些"需求"并没有包括所有的人类基本需求。这些需求也不是由外部赋予的。伊兹尼强调从经验上研究认识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科学研究了解到人类的行动方向，自控性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对自控性社会的批评

伊兹尼将《自控性社会》称之为"生活的著作"，他力图在"每一个公开的场合都概括说明其中的主要观点"。① 在这部巨著中，伊兹尼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关于人、社会和社会学理论的模式。

伊兹尼关于人的形象很类似于自然主义理论和帕森斯理论关于人的形象。象帕森斯一样，伊兹尼把人类的行为看成是自愿的、目标取向的，但却是受他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结构制约的。在伊兹尼对异化和自控性社会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人们有人类的基本需求，但结构却会妨碍需求的满足。妨碍需求满足的结果就是异化人的产生。但是，如果行动者可以接触知识、决策和权力，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伊兹尼承认认识个人的重要性，但他又避开社会心理学的道路。正如弗里德里希所说："他抛弃现实的'个人'，转而使用'角色'、'社会单位'这样的术语"。②

伊兹尼和帕森斯都认为个人并不是社会学分析的主要单位。虽然他的理论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人类行为的实质既

① 兰斯基，《遗传困境：下一次技术革命》，第 51 页。

② 弗里德里希，《社会学的社会学》，第 39 页。

是“被决定的”又是“自由的”，但理论的重点却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弗里德里希把伊兹尼和帕森斯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帕森斯和伊兹尼把功能分析与关于社会的善良形象联系起来，强调一致的重要性。但伊兹尼进一步认为集体有一种‘自我’，他讲的是‘普遍的’或‘分享’的意志”。① 毫无疑问，社会构成了伊兹尼分析的单位，同时也是他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如同帕森斯的普通系统论一样，伊兹尼提出了一种社会控制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知识是社会加以改造的能量。知识与决策和权力一起成为社会系统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很清楚，伊兹尼的社会模式并不是静态的，而是有弹性的、可以加以改造的。伊兹尼并不迷恋于社会秩序，而是承认社会熵和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伊兹尼的模式与其他宏观理论模式也是不同的，它与帕森斯的理论和现代普通系统方法较为接近。伊兹尼不同于帕森斯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应介入现实问题。伊兹尼虽然没有象米尔斯那样对自然主义、非介入性的社会学进行批评，但他关心社会学需要涉及社会现实问题，就这一点，他与米尔斯是共同的：

> 美国社会学中缺乏的就是社会分析，缺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系统探讨，也就是说，缺少对我们时代中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论的关心，而这必然牵涉对宏观社会单位的研究。②

伊兹尼并不赞成取消学术性社会学。确切地说，他认为在“‘做为科学的社会学’之外还需要加上对应用知识系统的关心”。在伊兹尼看来，社会学可以仍然做为一门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但

---

① 弗里德里希，«社会学的社会学»，第39页。

② 伊兹尼，«自控性社会»，第133页。

是，需要用知识的应用来补充科学知识本身。①

提　要

把各种社会学理论综合起来以形成对社会的统一政治、经济分析，是《自控性社会》努力的目标。在这种分析中，既可以发现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关心，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对将社会结构改造为负责任的社会的信念。它试图把科学理论与评价性的社会规划结合起来。虽然它是宏观取向的，但伊兹尼也承认人在社会心理方面需求的现实性，而社会既可以妨碍也可以满足这些需求。通过使用控制模式，伊兹尼在《自控性社会》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结构和变迁的理论。

一个自控性社会所需要的是：（1）掌握知识的行动者群体；（2）行动者所致力于实现的一个或若干个目标；（3）接近以社会知识为基础进行决策的权力。要成为自控性社会，就要求知识、决策、接近权力。伊兹尼讨论了20世纪的知识爆炸和形势。然后他去探讨知识与决策过程的关系，发现理性模式的力度已变弱，替代性的递增模式更普遍的使用。接着，他提出了第三种决策模式，即把理性模式与递增模式结合起来，他称这种模式为"混合审视"。要实现这种决策过程，需要使用功利性、强制性和说服性三种权力。

自控性社会中的权力与消极的、不可靠社会中的权力是不同的。消极社会是一种对社会成员不负责任的社会，它使它的成员

---

① 伊兹尼对社会学中评价性著作的关心，可见之于他的《遗传窘境：下一次技术革命》。在解释他参加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联合举办的遗传学的意义的会议的原因时，伊兹尼"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遗传工程的重要意义上。"

屈从于他们既不理解也不情愿的强制。高度异化的结构主要依赖于强制和控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残暴的、非人性的。在不可靠社会中，社会虽对其成员负责任，但根本的条件是异化。而自控性社会则与这些社会相对立。自控性社会允许结构的变革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

伊兹尼的著作可用来证明一种既是科学取向同时又是评价性的社会学理论的模式。他的理论包括了与评价性的社会分析相联系的非评价性普通系统论基础。他试图打破纯理论与应用理论这样的两分法，证明社会分析以及对我们时代现实问题的关心可以丰富理论的成果。

第十六章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社会预测的冒险

承认对于理想有兴趣，在今天已经是过时了。科学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假设、参数、变数和范式。

我所关心的问题与此有所不同。我的兴趣在于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即描绘出广泛的、抽象的现实的轮廓，以对那些假设进行检验，而不是去控制它。它的"科学性"并不见得就会低于学术性的社会学。但它不是"文学性的"。它是作为一种"透视"的社会学，是达到对世界的老练的认识的一种方式。它一方面使用着与学术性的社会学相关的概念（群体、地位、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它又象文学分析一样，对行动中的道德成分感兴趣。

引自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贝尔（D. Bell）的理论代表了从一种想填平学科社会学与人道主义社会学之间的鸿沟的批判立场解决社会学问题的努力。他已经涉及了这样一些问题，如对50种"已经衰亡的政治观点"的分析；"观察未来公众政策制订的结果、对未来问题的预见，设计一种替代解决办法以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选择以及做出更加合乎道德的抉择"；他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虽然在每一本著作中，贝尔都使用了他自己的社会学框架，但他主要的目标是社会分析，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理论。象米尔斯和伊兹尼一样，贝尔致

力于那种愿意处理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介入性的社会学。

贝尔所特有的社会学方法可以称之为社会预测。社会预测把宏观的理论观点与对于"介入的、""有用的"社会学的兴趣结合起来，前者已经成为经典的社会学观点的一部分，而后者则要探讨我们时代的状况。贝尔把社会预测与早期社会学所做的预见工作区别开来。预见涉及的是事件的结果，比如，谁将在大选中取胜，谁将在战争中失败，但这样的预见并不能规范化，也就是说，预见不受规则的制约。① 相反，社会预测则努力去勾划出历史趋势所展示的可能性。只有在存在着规律性和可重复性的地方，或在存在着其方向可以用时间统计加以描述、或者可以按照历史趋势加以陈述的一贯性趋势的地方，社会预测才成为可能。贝尔强调说"只有在那些能够影响事件的人们具有一种较高的理性的地方，预测才是可能的。"②

但是，在许多人类事务中，这种理性恰恰是缺少的。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更是如此。在政治事务中，人类的活动往往是以特权和偏见为特征，而不是以一贯的理性行为特征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测人员将做些什么呢？贝尔认为，"虽然他们不能预见到结果，但他们能够确定有效地制订政策会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和限制。"③ 因此，确定这些制约因素，就成为社会预测的任务。

除了社会预测的模式之外，还有其他关于预测的模式。这些模式包括：技术预测，它确定技术发展中的制约因素；人口预测，它提供有计划进行的人口统计；经济预测，包括简单的市场调查、消费价格指标的结构、就业率等，它充当企业活动的指标；政治预

---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4 页。

③ 同上。

测，它涉及政治领域的趋势。这些预测与社会预测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预测把社会学变项(而不是技术、人口统计、经济、政治变项)作为影响其他变项的自变项。这种例子可以发现于把社会指标（如犯罪率和受教育年数）按社会学模式联结起来的努力之中，如托克奎维利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做的社会历史分析和韦伯的关于科层化及理性化扩散过程的社会经济理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贝尔最近的两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可以看作是他的社会预测的例子。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的序言中，贝尔简洁地说明了这两部著作的相互关系：

"这部著作与我以前的那本《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在那部书中，我试图表明技术以及作为革新和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知识编纂是如何改变技术经济秩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分层体系的。在本书这些论文中，我涉及的是文化问题，特别是关于现代性的思想，也涉及了在社会的价值观念强调无制约的欲望的时候如何管理一个复杂政体的问题。我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所看到的矛盾，产生于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联结点的分裂，产生于那种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中的流行的价值观念的享乐主义的影响。"①

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贝尔"主要关心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后果。"②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贝尔涉及的是社会的第三个部分，即文化。③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提供了贝尔关于社会的模式以及他的社会学理论。

---

①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 xi 页。

②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 13 页。

③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 10 页。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贝尔的主要假设是，西方世界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通过对于这个术语的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的分析来更好地加以理解。①

第一个方面是经济部分，在那里已经存在一种从商品生产到服务的变化。当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提高的时候，将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来。当国民收入增加——这部分地是转移的结果——的时候，对服务的需求就会提高。贝尔认为，"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服务部分超过就业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国家。"②

第二个方面发生于职业的领域。在那里有一种工作类型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专门职业和技术阶级地位的提高。"在美国，到1956年的时候，在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数量"。③到了70年代，白领工人已经超出蓝领工人五分之四。更令人吃惊的是专门性和技术性职业的增加。这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疗和保健人员、教师以及其他类似的职业构成的群体，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心脏。

后工业社会的第三个方面是"作为革新和制订社会政策的源泉的理论知识的集中。"④在知识方面发生的变化表明了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工业社会主要关心的是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机器与人的协调。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14—33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同上，第17页。

④ 同上，第14页。

组织起来的，知识被用来进行社会控制并指导革新和变迁；这个转变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这种结构不得不被在政治上加以考虑。"①在后工业社会，抽象的理论知识要比具体的经验知识更为重要。这种理论知识将成为制订政策的主要源泉。

第四个方面是未来取向，这种未来取向制约着技术和技术评价。换句话说，后工业社会能够控制和计划技术发展，而不是使它盲目发展。

第五个方面涉及到决策及一种新的"智能技术的形成。"这个方面与获得知识的方法和方式有关。"智能技术"包括运用科学知识以可复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代替把直观的判断作为解决问题的规则。

贝尔在他的理论中要分析的就是，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的特征和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科学的急剧发展和分化，新的智能技术的产生和理论知识的编纂。这种知识类型的转变，已经对我们社会中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贝尔所注意的正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

1. 从商品到服务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

在我们将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特质进行比较的时候，可以增加我们对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包括亚、非、拉大陆，前工业国家都仍然存在。其经济基本上由农业、采矿、捕鱼和林业构成。其生活基本上是同自然的斗争，它依赖于季节的变化、土壤的性质以及可以利用的水利资源。工业社会包括西欧、苏联和日本，他们都是商品生产。贝尔用下面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描述：

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的斗争。世界已经成为技术性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20页。

的和理性的世界。机器处于主导地位，生活的节奏决定于机器的速度；时间是顺序性的、有条理的、分隔均匀的。能源代替了体力，提供了提高生产率——以少求多的艺术——基础的动力，它是构成工业社会特点的大规模商品生产的条件。能源和机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①

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不是“对于自然的斗争”或“对于经过加工的自然的斗争”，它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它所依赖的不是“体力”（如前工业社会那样）或“能源”（如工业社会那样），后工业社会所依赖的是信息。在后工业社会中，越来越需要的是掌握信息的专门性职业。

但是，社会预测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对后工业化社会进行简单、具体的描述。社会预测的任务在于确定哪些是向这服务取向社会变迁的制约力量。这种变迁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生产率。”②贝尔认为，商品的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较之服务业快得多。在服务业中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由于服务业依赖的是要求服务的人，成本就会不断提高。这对于教育、现场音乐会和医疗服务，都是如此。由于服务是被时间固定了的，其产量的增加是困难的。

与服务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有关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制约”。服务业成本的上升比率要高于商品成本的上升比率。贝尔观察到，从 1965 年到 1970 年，汽车的价格上升了 15%，耐用商品（电视、器具、家俱）的价格上升了18%，服务（医疗服务、教育、娱乐、保险）的价格则上升了 42.5%。由于自从 1970 年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在上升，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是很渺茫的。③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 126 页。

② 同上，第 155 页。

③ 同上，第 156—157 页。

第三个制约因素是与通货膨胀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所制造的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这就使得在传统上就崇尚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成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由于成本的增长和保守主义的限制，进行劳动力实验以改变工作条件的余地已经很小了。从货币价值的角度说，代价是太大了。

贝尔认为，最大的制约因素还在于"在政体内部互相矛盾的要求在大量增加"。① 后工业社会日益成为一种公共的社会，在那里，民众对更高的生活质量的要求涉及到环境、娱乐和文化。贝尔说："所有这一切都牵涉到两个问题：由于我们缺少社会科学的知识，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做许多这样的事情，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去满足所有的或者是大部分的要求，我们如何决定首先要做什么呢？"②

2. 知识和技术方面：后工业社会的新阶级结构

贝尔认为，在社会中已经发生了一种影响到知识和技术的重要的结构性变迁。在那里不仅存在发明的指数增长，而且从工业时期以来，生活的规模也在扩大。贝尔又说：

> 今天，在工作中、在学校里、在邻居中、在一种专门职业或社会环境中的个人都能直接认识几百个人，假如人们考虑到我们生活的特别流动性，——地域的、职业和社会的——一个人一生中就会认识几千个熟人或朋友。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窗口，同时由于政治领域的扩大和文化因素的增多，人们所知道的人（和地点）的数目，就会以极高的指数率加速递增。③

在后工业社会中，不仅知识在增加，而理论知识也越来越成为革新的源泉，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分析表明，在后工业社会中大部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159页。

② 同上，第159页。

③ 同上，第172页。

分就业位置是在知识领域。贝尔估计，到1975年，在美国将有25%的劳动力具有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受教育程度，15%的劳动力将受雇于专门性的和技术工作。后工业社会将日益依赖于国家中受过教育的阶级。为了计划未来，重要的是要分析知识阶级及其职业分布。

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将较之以前更为重要。在后工业社会中，不是市场决定决策，分配资源的决定将越来越多地由政治中心或政府做出。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冲突和紧张将是不可避免的①。

贝尔勾划了未来后工业社会将会面临的一些重要决策的轮廓。这包括，(1)高等教育经费的提供方式，它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特点；(2)研究成果的评价，它的结果可以在未来用于分配稀有资源；(3)创造性和生产率的条件及基础的决定作用；(4)在实验室中做出的技术发明更快地用于生产过程，(5)对于知识发展速度的分析以及教师怎样才能赶上最新发展的方法；(6)控制社会变迁的问题。②

3．经济学模式和社会学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后工业社会中，除企业和政府之外的非赢利领域将大大发展。它包括学校、医院、研究所、民间的自愿团体。但同时，公司企业仍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社会的中心。因此，在研究后工业社会的时候，不能忽视公司的存在。以公司为特征的经济学模式将与以社会的非赢利的、服务部门为特征的社会学模式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贝尔分析了他们的名目的特征以及在后工业社会的前景。

经济学模式。直到工业化开始之时，社会才得以通过和平的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262页。

② 同上，第263—264页。

手段稳步增加财富并提高生活水平。大部分经济生活是一种消长游戏，获胜的一方通过战争、战利品、剥削等手段来获得财富，而以另一个群体的牺牲为代价。生产率的提高是设计机器的工程师和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而这将导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贝尔称它为经济学的模式：

> 经济学是一种在互相争夺的目标中最合理地分配稀有资源的科学；它是减少浪费的基本技巧——这是由主导的核算技术所规定的计算来衡量的。经济化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即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求模式的流动价格体系。①

换句话说，经济学模式代表了在互相争夺的目标之间对稀有资源的最合理分配。由于经济化，产生了一种合理的劳动分工、生产程序的制订；产生了一种以相对价格使资本和劳动力最佳地结合起来的努力。正唯如此，我们常把经济学化与"最大限度"、"最优化"和"最低成本"联系起来。但这个经济学的模式也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匮乏和污染时代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首先这种经济化模式所衡量的仅仅是经济商品，而忽视了象秀丽的风景、纯净的水源、阳光，工作中的满足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第二，这种模式并不考虑外在因素（或外部成本）。而这种成本会转嫁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或整个社会。空气和水污染就是社会成本的例子。经济学模式的第三个问题是"美国的经济体系强调满足个人的私人消费是首要的考虑，结果就是公共商品与个人商品之间出现不平衡"。② 比如，税收就经常被看作"是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而不是被看作为公共商品所花费的钱。因此，经济学模式是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275页。

② 同上，第280页。

以这样的命题为基础的，即个人满足是计算成本和效益的单位。贝尔认为，另一个模式，即社会学化的模式可以在后工业社会中成为更好的计算系统。

社会学模式。 贝尔把社会学模式定义为："用更自觉的方式判断社会需求的努力。……它是以明确的有关公众利益的概念为基础的。"① 这个模式牵涉到两个基本问题：(1)容纳了社会中所有的人的意见而有意识地确立的社会公正；(2)实现社会商品服从公共的或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服从个人的需求。社会学模式必须通过理性的途径制订公众计划。贝尔认为，"未来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将是考验我们预见社会和技术变迁的影响的能力，并且根据对目标的不同评价，以不同的代价来确定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②

贝尔强调，公司企业不能象过去那样简单地服从于经济学模式，他们必须承担社会学模式的义务。社会责任将在将来成为比今天更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人的工作满足感、少数群体的就业、对社区所负的责任和对环境所负的责任。在这些问题上，公司都必须服从于公众利益。从长远来看，在通往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公司将失去一些它原来具有的绝对性权力。

4. 后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

贝尔认为，新型社会的出现将带来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的问题。③关于分层和权力系统，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将与以前的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分层和权力系统都是以稀有资源的分配为基础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较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在工业社会中较重要的资源则是机器。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将成为重要的资源。每一个系统的统治人物，就是那些拥有人们

①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283页。

② 同上，第284页。

③ 同上，第43页。

所愿意拥有的资源的人。因此，在前工业社会，土地所有者和军人(保卫土地的)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的权力是以强力为基础的；在工业社会中，企业家处于关键性的权力位置，他们的权力是以对政治的间接影响为基础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大学和研究所将成为权力的所在地，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成为统治者。权力的手段将是理性的技术力量(由科学家提供)与政治力量(由权力精英运用)的平衡。因此，在后工业社会中，政治将扮演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当然政治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象技术和科学那样的理性系统。

贝尔所努力要做的，就是勾划出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的框架①。在后工业社会，分层系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人员阶级将处于最高地位。这个阶级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以及那些为了艺术和宗教文化知识的发展而工作的人们。这个阶级的下面是技术人员、半专业人员、神职人员、售货员，最下面是蓝领工人。在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阶级系统中，成就和个人能力变得日益重要。

后工业社会并不是一种彻底重组的社会，确切地说，那只是一种结构特征的变迁。正如贝尔所指出的：

> 从描述的意义上说，那里有三个组成部分：在经济上，有一个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是新的技术精英的产生以及新的分层原则的出现。②

在这个社会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强调现实就是自然(象前工业社会那样)到强调技术就是现实(象工业社会那样)，再到强调现实就是社会(象后工业社会那样)。而经过自我和外部世界的

---

①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375页。

② 同上，第487页。

互相认识，建设一个改进的社会，则是人们的任务。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贝尔在分析的意义上把社会划为技术经济结构、政体和文化。① 技术经济结构涉及的是生产组织及商品和劳务的分配，政体涉及的是合法地使用强力以及在社会正义和权力的领域中对冲突进行调节。以上这两点都是贝尔的上一部著作所论述的课题。在贝尔的另一部理论著作中，他给文化下的定义是"表达的符号：如绘画，诗歌、小说中的成果，或在祈祷、礼拜和其他的宗教仪式中，它都按照一定的想象方式，探索和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②

正如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的题目中指明的那样，他的观点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文化矛盾。"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组织类型、要求的规范和自我实现的规范之间的分裂，而后者已经成为文化的中心。"③ 在过去我们的西方文化——它在历史上就是与宗教相融合的——中有以基督教道德为指导的规范，这种规范已经结合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现在这些文化规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不仅已经"不能融合"，而且形成了矛盾。资本主义继续作为我们的经济体系，而我们的文化体系现在却面临一场"精神危机"。④

贝尔明确地把他的看法概述如下：

> 现在我发现，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系统)与文化已发生明显的严重分裂。前者是由一种经济原则支配的，而这种经济

①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 10 页。

② 同上，第 12 页。

③ 同上，第 15 页。

④ 同上，第 28 页。

原则是按照效率和功能理性被规定下来，在这种活动中，要把一切事物，包括作为物的人加以秩序化，才能进行生产组织。而后者则是被一种浪费性的、杂乱无章的、反理性反智慧的气质所支配，在这之中，自我被作为文化判断的基础，对于自我的影响就成为作事情的审美价值标准。15世纪所遗留下来的强调自我约束的性格结构虽然仍与技术经济结构的要求相适应，但却与文化发生深刻的冲突，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已经遭到全面的反对。①

贝尔相信，对于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信仰的破灭将在自我意识中产生一种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危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文化的特征。贝尔探讨了清教徒和基督教道德的影响。它不仅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不道德的先验的伦理观念”，而且也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新解放”运动，为享乐主义文化留下了发展余地，而这一切正是“存在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特殊矛盾之中”。②

贝尔虽然能正视他感到的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但他并不认为那就是反动的。他并不要求回到“美好的昨天”，而是更加坚定他对自由传统的信念。他所呼唤的是能够充当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文化基础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

这个基础必须通过联合三种行动才能加以建立：对于我们过去的再肯定，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了过去的继承性，我们就会了解对于后代的责任；承认资源的限制和无限需求的优先地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赞成平等，包括社会和其他相关的领域，以便使他们受到平等的对待。③

---

①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37页。

② 同上，第71页。

③ 同上，第281—282页。

对社会预测的批评

贝尔的社会预测力图将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结构主义结合起来，以发现社会所面对的某些制约因素。因此，作为社会预测基础的种种假设并没有超出社会学传统的范围。在贝尔对于现代性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基本假设，即社会是一种存在，社会学理论的任务在于描述社会的结构及结构的变迁，而人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大部分自然主义社会学理论中都包含着这些基本的结构主义假设。但是，贝尔也提出了其它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可以看作是由那三个基本假设中推演而来的。

在贝尔看来，社会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重要的是要分析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贝尔接受了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的看法。但是，马克思是把财富作为阶级的基础，而贝尔则认为，知识已经代替财富而成为权力的主要源泉。科塞已经对这个假设提出了疑问。他指出，贝尔证明了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那些拥有知识的人们的活动，但贝尔却没有说明这与权力究竟有什么关系。"他（贝尔）似乎没有认真对待这种观点，即那些雇佣拥有知识的人们、与他们签订工作合同的雇主和基金会——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对他们活动的影响远比他们自己要大得多"。① 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对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知识，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贝尔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也被批评为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福洛特就注意到，在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贝尔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贝尔根据经济结构对社会进行分类，而没有对其他社会制

① 科塞，《结构与冲突》，见布劳编《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第218页。

度给予充分注意。詹诺维茨也对贝尔的理论做出了同样的批评，他特别注意到，贝尔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自变项的政治结构的重要性，贝尔不承认政治活动对职业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的、持续不断的影响。科学家确实拥有知识，但当他们能行使权力的时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精明强干，而不是由于他们拥有某方面专门的知识。正是通过游说和形成压力群体——而不是从大学的象牙塔中——知识拥有者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那些并不怀疑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课题的理论家也对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结构与功能的描述提出了疑问。还有的人则怀疑，是否有什么后工业社会，我们的社会是否还处于工业社会的阶段。斯蒂恩就认为，贝尔只是简单地描述了社会中不断加快的变迁，并没有能够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贝尔看来，社会学理论的责任是在于描述社会结构中的模式以及结构的变迁。而且，这种理论能够用于预测社会趋势。这个目标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还没有对目前形势进行充分的分析，要做预测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批评并不完全同意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有人对贝尔理论的系统性程度提出怀疑。比如，欧尔森就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没有提出一种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它是一个"由富有见识的、新奇的但却没有很好加以组织的思想构成的迷宫"。① 欧尔森进一步认为，虽然贝尔想对美国社会进行描述，但却没能形成一种解释性理论。而解释性理论却恰恰是理论建设的目标。按这些批评意见，贝尔关于社会学目标的概念与他的关于理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

由于贝尔的主要兴趣是在于宏观社会学分析，他没有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但他有时也注意到人的属性

① 欧尔森，《评论论坛》，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80卷，第236页。

问题。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集体与自然的斗争塑造着人。在工业时代，人们对自然的依赖降低了，更多的是从事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的竞争，在这时候，技术秩序代替了自然界。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类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① 但他并没有对这些人际关系的实质进行分析。然而在他的论题中可以看出，人的由社会结构所支配的基本需要是固有的，虽然这种制约条件由自然变为技术，最后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贝尔认为"社会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意识的网络，一种想象，这种想象的实现成为社会"。② 在后工业社会，过去时代的制约因素突然消失，但新的制约因素却在成长。

但是，人的基本属性还是遗留下来了。正如贝尔所说的：

> 但是，人本身的双重属性是不会突然消失的，一方面是产生于原始冲动的凶残的侵略而造成分裂和毁坏；另一方面是在艺术和生活中寻求秩序，压制自己的意志以趋向于协调。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紧张状态规定了人类社会的状况，并且允许乌托邦观点的存在，这种乌托邦与现代人所寻找的"美好的将来"相比，也许是更现实的。人们总是把乌托邦想象为是对人与人之间达到合谐和完美状态的一种设计。在古代的智慧中，乌托邦是一种内容丰富的不可能性，是人类始终力求达到然而由于本身的性质而无法实现的一种想望的概念。但是，根据它的思想，乌托邦可以作为判断人类的一种标准、衡量现实的一种理想。③

贝尔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在他对社会现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第 487—489 页。

② 同上，第 488 页。

③ 同上，第 488—489 页。

实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塑造人和社会的强制力量。也许，这种理论方法更适于我们创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提　　要

把理论应用于研究未来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制约因素，这是社会预测的努力方向。贝尔在社会预测方面的工作，特别关注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后果。

贝尔假设，西方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下面这些变化代表了这种转变的过程：从生产商品到生产服务，从蓝领工作占主导地位到专门性的、技术性工作占主导地位，技术知识的集中化，未来取向，关心指导决策。在讨论这些变迁的时候，贝尔描述了后工业社会不能不做的一些抉择。这些抉择包括，为高等教育提供经费，对研究进行评价，分析知识发展的速度。他进一步认为，赢利性的公司将从属于非赢利性的公司，如政府、学校、医院和研究所。经济学模式以及它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法则将为有意识的、决策性的社会学模式所取代。贝尔预言，与今天相比，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责任将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贝尔的社会预测要依赖于历史的以及目前的经验资料，特别是大规模的普查资料，这样才能认识未来。研究资料不仅对于贝尔的研究工作是关键性的，在后工业社会中，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和评价将更加接近于人道主义对改良社会的关心。

第十七章 反省社会学:对社会的批判性研究

> 社会学的更新当然是社会重建的一个方面。很明显，如果不对我们既成的思考社会的方式进行批判性的修改，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一个重建的社会。……我想，新的社会将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表达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是怎样的。换言之，从某些方面说，新社会学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学。
>
> 引自古尔德纳:《论社会学》

正如引文所表明的，古尔德纳致力于将理论和社会密切地结合起来。他把他的重要著作之一《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1970)看作“基本上是开始了对社会学与社会的恰当关系，因而也是理论与实践的恰当关系的讨论”。① 古尔德纳对社会与社会学的连续不断地负责任地批评，以及他对形成相关性理论的努力，使他成为人本主义相关性理论的主要发言人。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理论家必须对这种理论以及产生这种理论的目标，做出个人的承诺”。②

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理论并不是一种能分析和解决现代世界中各种问题的全观性理论（holistic theory)，它只是代表了一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 82 页。

② 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 89 页。

种对社会和社会学的批判性的怀疑立场。古尔德纳把自己描绘为一个“罪犯”(outlaw),一个“苏格拉底”,①对他们来说,在批判的利剑和学术性的分析面前,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与此同时,他并没有自称提出了可以替代他所批判的理论的理论。

> 苏格拉底并不相信他要为他的批判权利提供一笔赎金,即提出一种正面的信条。苏格拉底没有提供正面的教义,他并不想用一种愚昧的生活来换取另一种愚昧的生活。因此,他否定了赠品,也否定了回赠。为了对所有的积极教义进行批判,为了找出它们的局限,苏格拉底必须用怀疑的目光盯着那些提供教义的人(以及渴望这些教义的人)。到头来,这些教义和希望这些教义成功的人——无论老的小的——都谴责他是一个“毒害青年思想的人”。这样,苏格拉底就成了一个罪犯,或者说是被当成了罪犯。②

古尔德纳很好地扮演了他自己所称的“罪犯”和“苏格拉底”的角色。他对那些陈旧的理论,特别是构成美国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或“学术性社会学”,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他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评,尽管他要比功能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因此,无论是“老的”学术性社会学家,还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这个“罪犯”所提出的批判弄得乱成一团。

古尔德纳已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及正在计划中的一些书,都是用来探讨西方政治文化和社会学的发展与危机的。他认为,现在有生命的社会理论史,都必须“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批判。”③一开始,古尔德纳在《柏拉图探索》(1966)一书中,讨论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第 xvi 页。

② 同上。

③ 古尔德纳,《柏拉图探索》,第5页。

了社会理论与经典的古希腊文献的关系，接着，又对“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进行了大量的讨论（1970），尔后，进一步形成了“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的思想（1976）。古尔德纳对历史、社会学和批判使用的标准是不同的，而这三个因素则是他的理论工作的基本内容。《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是对正统的美国社会学的抨击，《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继续对意识形态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柏拉图探索》则代表了古尔德纳在早期探讨社会理论的社会基础的努力。《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所要完成的也是同样的任务，只不过注意力从过去的理论转移到今天的理论上。古尔德纳试图通过《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一书，来打破学术性社会学的神话。而在最近的《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一书中，他则试图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在过去的十年中，古尔德纳在自己的著作里对社会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的分析，其目的是更好地了解社会。社会学与社会是互相联系的，前者反映了后者的价值假设。这种批判性的社会学的目标，是为它所揭示出的病态问题提供一种人道主义的治疗方法。古尔德纳注意到：现代的社会学家“被训练去研究、分析和认识现代的社会问题”，①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训练去‘解决’社会紧张状态，而且也没人鼓励他们这样做”。古尔德纳强调说，“社会科学家当然没有权力去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但他们有权力——如果说不是一种义务的话——告诉人们，他们可以相信人类的苦难，并且人类也可以找到克服这种苦难的社会替代办法。”② 这就是古尔德纳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并努力将其做为社会学的任务。

---

① 古尔德纳，《柏拉图探索》，第130页。

② 同上，第131页。

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

在这个世代，有好几本书都对价值无涉的社会学的可行性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即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著作被看做是社会学的社会学，①即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倡导者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从来都不曾是价值无涉的结果，社会学就是指定一些人来寻找琢磨不透的"社会学真理"。确切地说，社会学是生活在特定时空的人的产物。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一文化框架来对当代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

古尔德纳呼吁社会学的社会学要认识到，社会学是"人的种族"中的一员，他们也有同样的弱点、偏见和曲解。②社会学的社会学应当揭示出那些假设，以使他们对自己这个领域中的成见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无论这些假设是明确提出的，还是没有明确提出的，或者是背景性的假设。古尔德纳写道："因此，要认识社会学中正在到来的危机，就必须了解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智力框架和理论；就必须了解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更大的社会中的新发展可以使某些绝不是新的背景性假设成为有害的不和谐音。"③

在《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一书中，古尔德纳探讨了美国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功能主义曾经在几十年的

① 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是知识社会学这一较为广泛的领域中的一部分，它使用社会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自身发展。知识社会学要把知识——不管是科学、宗教、艺术，还是哲学——与知识所由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社会学的社会学所考察的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社会学——与其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提出描述和解释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社会学的发展的各种理论。

②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26页。

③ 同上，第34页。

时间里占据着支配地位，而现在却受到沉重的打击。这种理论所代表的，是我们的社会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一种"善良的适应"。由于功能主义深深地扎根于实证主义的土壤之中，并坚信最终的进步，因此它是很适合于作为世界力量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美国在大萧条中大难不死，并在世界大战中成为胜利者，又在50年代巩固了它所获得的世界权力。然而，在60年代，各种冲突的浪潮在20世纪上半期所取得的进步上面布满了阴云，它不仅表明了社会中的危机，而且也表明了社会学中的危机。强调秩序的帕森斯派功能主义，受到了分离出去的、试图寻找新的社会学理论的年轻学者的挑战（古尔德纳所讨论到的包括米尔斯、戈夫曼、加芬克尔、霍曼斯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本书中都已讨论到）。简而言之，作为一种理论的功能主义，是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社会结构的历史中的。因此，它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也就是以这个社会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为基础的。

那么，用何种方法才能解决西方社会学以及西方社会的危机呢？在古尔德纳看来，解决的途径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狭窄缝隙中，在社会学中，则是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汇合处。古尔德纳指出：

> 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在这种历史大分化的两方面都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移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些功能主义已经明确宣布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同样的，在苏联集团中，马克思主义者正日益受到学术性社会学的吸引，包括功能主义，甚至是帕森斯本人。无论是实证主义传统中的功能派继承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现在都在向对方靠拢，虽然是谨慎的、试探性的，但毕竟是在靠拢。①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449页。

古尔德纳呼吁要发展他所谓的反省社会学，以便能更好地认识社会学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它将走到哪一步。反省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学术目标是一致的，它要在社会文化背景中来分析知识的发展。反省社会学将探寻社会学的社会文化根源，这就如同社会学要探寻其他领域的知识的发展一样。古尔德纳呼吁反省社会学家要能认识到他个人和文化上的种种偏见——要尽其所能，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以学术性和相关性为特征的独立的社会学的目标。

在建设反省社会学的过程中，古尔德纳表明了他自己的假设，这些假设是他讲的那种社会学的基础。他承认，"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自己的批判者"，但他认为，重要的是他要揭示出自己的假设。① 与他对于西方社会学的批判相一致的是，他认为，在形成理论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自己选择的偏见。理论家经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既定的"，而拒绝承认那些与此不符的事情。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

> 很共同的现象是，社会科学家总是力图缩小社会事件或过程中与人背离的某些价值之间的紧张状态。许多理论著作都或是开始于现实与某种价值的不合谐，或是开始于一种关于现实的模糊的价值。因此，理论的形成常常是应付威胁的一种努力；换句话说，他努力应付的，是对他个人深深热爱的某种事物的威胁。②

因此，象所有的理论家一样，古尔德纳深深地投入到社会学中去。他必须承认，他关于社会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己的知识，是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他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种努力。

---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481页。

② 同上，第484页。

在讨论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时，古尔德纳假定了一种精英的存在，这种精英不仅支持社会学，而且愿意投资，然后再获得回报。古尔德纳认为，"它(反省社会学)认为，社会学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支持，这种支持可以使社会学在某些方面获得发展，但同时也对社会学造成了限制，扭曲了它的特征"。① 换句话说，人们所提供的关心，就足以并正在毁灭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性。因此反省社会学家必须投入寻找灵魂的工作，以免他们出卖自己的灵魂。

实际上，古尔德纳是断定在社会学中，大量拍卖灵魂的事情已经发生，并在继续发生，他认为，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学家所具有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同化，以服务于福利国家。 古尔德纳指出："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政府中的技术干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着社会学家的自由主义与他的职业兴趣的结合"。② 根据古尔德纳的观点，社会学家已是福利国家的一部分，他们支持这个体系并从这个体系中受益，这使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很难进行，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作为福利国家的受益者，人们期望社会学家为美国展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形象。这样的社会学家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必须按自由政体的利益从事活动，在市场出售自己的技能和专长。古尔德纳写道："换句话来说，为美国社会提供保障，这已经成为'快乐的'社会学家们的一种功能，它使人们确信，喝一杯混浊的水是安全的，喝酒则是危险的"。③ 因此，社会学家不能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来对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批判和研究。

古尔德纳确信，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和我们当代福利国家的基础。反省社会学家必须自愿地解剖和分析自由

①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408页。

② 同上，第500页。

③ 同上，第501页。

主义的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1976)中，古尔德纳继续分析了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

在古尔德纳最近的一部著作中，他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者有着共同的基本假设。《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所集中研究的是社会学以及如何打破社会学的神话，相反，《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一书则力图揭示出现代人所面对的意识形态中的问题。正如要打破美国学术性社会学的神话，古尔德纳就不得不去讨论社会结构一样，在他要打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神话时，他也不得不时常提到社会学中的问题。

古尔德纳认为，在社会学中，人们已经及时地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并进行了批判，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是很少见到的。传统的社会科学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在三个方面上是失败的，即它的单面性、非历史性和非反省性。由于它的单面性，它不能仔细地考察意识形态这个硬币的两个面，不能同时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主张以及它周围的现实。社会科学的观点也是非历史的，这使它不能充分注意到意识形态历史起源的复杂性。它又是非反省的，"尽管它注意到它本身由于自己的结构环境也已经意识形态化了，但却不曾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

在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时候，古尔德纳再一次重复了他在以前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重要观点。按照他在早期著作中的看法，社会学并不是游离于意识形态很远的。虽然人们在研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第4页。

究意识形态的时候，总是把它看作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但反省的社会学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也是"内在"的，存在于这个学科之内。正如古尔德纳写道的：

> 意识形态与社会学的界限并不是被智力的军队在行进中所遗忘的边陲。意识形态也不是从成熟的社会学中长出来的粉刺。这里仍然有一堵界墙，它是人们设置的，人们可以看见它，并且还要经常修补它。①

因此，在古尔德纳看来，要更好地了解社会学，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了解和研究意识形态，使对社会学的了解更接近自己的理性。古尔德纳自己的著作就力图超越出一般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它也部分地代表了"这样的一种努力，即为第三种知识形式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这种知识形式可以避免狂妄自大和错误的意识，避免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②

古尔德纳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是以基督教关于个人的权力和权利的观念为基础的，并深深扎根于这些观念之中。虽然宗教的根基在逐步削弱，但它关于权利与权力的观念在世俗思想中仍被奉为神圣的。按理性的修辞来说，"它用以使提出的行为公正化的，是逻辑和证据，这来自于对社会的看法；而不是对神灵的信仰、传统、以及代言人的启示或权威"。③实际上，世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已经进一步增强了加尔文教派关于个人权利和权力的观念。并且，它进一步促成了这样的观念："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是能够用知识和努力来获得自己的完善的"。④在世俗世界中，并不存在可以限制人类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存在。人是有力量的，他们知道没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第10页。

② 同上，第19页。

③ 同上，第30页。

④ 同上。

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们的潜能。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这些权力并不仅仅来自一些伟大的领袖和统治者，而且也来自大部分人民群众。然而，在同时，现代意识形态又不是一种乌托邦——它并不假定社会是完美的。古尔德纳认为，虽然意识形态增强了群众的力量，“但由于它所寻求的世界只是更好一些的，而不是完善的，意识形态反到成了一种悲剧，它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根本的改善。”①

在古尔德纳看来，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理想体系。随着时代的变化，意识形态由于宗教影响的缩小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理性来辩护的信仰体系，它也与实践相结合。只有通过群众的一定文化水平和大众传播媒介，它的发展才有可能。由于现代世界上符号和沟通工具的使用，意识形态才能销售出去，并对民众产生影响。

然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了。虽然它对人类能力进步的信念是令人高兴的，但在一个充满危机与短缺的时代，它面对的是许多的困难。古尔德纳认为，现代意识形态在实现自己的许诺方面是失败了。古尔德纳呼吁，要进行反省，超越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典型的单面性，这种单面性的支持者们对于它的弱点默不作声，批判则掩盖了它可能存在的优点。自我反省则可以使我们更接近于批判性的自我考察，以便使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与它在实践中的付诸实施能够更一致起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意识形态的理想与它存在于其中的现实文化的距离还很远。

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已经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古尔德纳认为，在“一个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的社会中，在整个社会以及各种科学化的科层组织的层次上，政治执行阶层已经习惯于想得到一种没有意识形态信仰的服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第75页。

从"。①那些在社会中负责的阶级似乎在要求这样一种不言而喻的要求，即无需借助于意识形态对群众的作用的对体系的服从。古尔德纳考察了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的根本矛盾"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发展：

> 它是以一种间接统治体系为基础的，这种体系要求一种意识形态整合的运行机制，但同时，它的领导精英和领导阶级则力图阻止意识形态机制的有效维持，而这种机制却是为自己社会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处于领导和统治地位的阶级，怀疑和反对那些追逐意识形态政治的人，他们把这种政治看作是一种非社会主义化的局外人政治，这些人并不是根据"博弈规则"做游戏。②

古尔德纳认为，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现代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但它还是力图在当代充当宗教的替代物，它想在技术社会中提供一种超然的存在和合法性。但是，意识形态对人的进步能力的强调，似乎已经使它丧失了自己的一些力量，而新的意识形态似乎还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古尔德纳认为，技术（包括消费主义、生产率和科学）强调的是享受生活，而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确切地说，它只是"表达了意识形态问题，但抑制意识形态的创造和适应"。③古尔德纳指出：

> 支配群众行为的，不是对技术的道德正确性的新信仰，仅纯粹是技术所带来的满足。如果让技术保持不变，而让满足的程度降低，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检验。在战争和经济萧条发生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这种并非有意进行的检验。我们可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第249页。

② 同上，第249页。

③ 同上，第245—246页。

以看到，维持现代公民道德和忠诚的，既不是科学与技术，即不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这里，仍然有一种对起辩护作用的意识形态的永久性需求。不断增长的理性化、技术硬件、科层组织科学化都不能代替这种需要。而且也永远不可能代替。①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法性问题，可见之于经典社会学著作中，包括杜尔克姆和韦伯的著作，他们都看到了作为一种合法化力量的宗教的衰落。古尔德纳对起合法性作用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寻求，即可看作是这些经典著作的回响。他自已的看法是，生态运动可以起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适合于一个面临严峻的物质短缺、生活水平下降或停滞、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代"。② 除生态学以外，一些其他的意识形态，包括新的宗教、准宗教和神秘主义运动，都正在发展起来，他们强调的是"非物质化的"日常生活。

意识形态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败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正在失败。正如技术只是服务于有限的群体，而不能成为一种把社会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一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服务的利益群体的数量更少，而且要以整个社会作为代价。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否定某种党派利益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与党派现实之间都存在一种紧张状态。一种理性的、似乎可能的意识形态，必须对部分和整体、个人和社会、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进行重新认识。

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对自己和现存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它必须为"无可非议的利益和价值提供基础"，并且"愿意为

---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第246页。

② 同上，第245页。

其负责任，并做出不断的努力以加深对自己的承诺的反省性的了解”。①古尔德纳将这种批判性的反省理论概述如下：

> 按其完善的形式，这意味着批判理论要拒绝所有的要求道德精英统治论和优越性的诱惑，要拒绝做出某种天真无邪的姿态的诱惑。按其完善的形式，它从不想象它的自我认识都是有价值的，也不会想象自己的允诺中没有含糊不清甚或矛盾的地方。批判理论要对是什么和希望怎样区别开。按其完善的形式，它把人类的解放作为目标，但它从不曾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观点，即它自己已经获得了那种解放，它也永远不会使自己忘记，它也具有一种受到压抑的潜能。它知道，它自己的理性也要受到它存在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限制，受到社会赋予它的主张的地位的限制。②

古尔德纳认识到，反省社会学必须进行不懈的斗争，但他指出，这种斗争就是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更好地了解它所研究的社会。

对反省社会学的批判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最后一个理论是有关对社会学的社会学的需求的，这是很合适的。古尔德纳所倡导的反省社会学强调，重要的是要认识作为社会学理论基础的那些假设。在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都提醒读者要注意每一种理论中明确表述或没有明确表述的假设。这样我们也就毫不奇怪了，古尔德纳所呼唤的反省社会学就常常注意到他的著作中对人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社会学理论的适宜模式所提出的各种假设。

---

① 古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第293页。

② 同上，第293—294页。

古尔德纳的反省意识形态和反省社会认为，人部分地是个自由体，部分地是个被决定的生物。正如他所指出的：

> 我认为，人都有认识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可以认识自己和他人。但在同时，人也置于各种其他条件之中，他们要受到各种力量的推动——生物的力量、生态力量、心理力量和历史力量，所有这些力量都按非理性的、冲动的形式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的行为，换句话来说，这纯粹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或法则。①

因此，人类的形象部分地是那种具有"全部人性"的人的形象，部分地是依赖物的形象，"它与低等动物甚或无生命的物体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而后者并不能受到某种认识和自我考察的作用。"② 古尔德纳对这种矛盾的状况进行如下的描述：

> 因此，人自然而然地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他们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他既是一个有成功的理智的生物，也是一个理性受挫的生物；他既是一个能使用独特的符号以表达他感受到的东西的语言生物，也是受前符号（pre-symbolic）力量推动的沉默的生物；他的行为常常受到生态学意义上的缺陷、骨骼结构、肌肉和大脑的限制，其进化也要受到外部的强制。③

但古尔德纳认为，人们所能获得的理性，在程度上要远远超过目前所能证明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使人进入更多的理性之中："社会科学的特定功能就是不断解决人类对自己的盲目性；帮助他认识到有哪些力量在对他起作用，而这些力量他平常是很难

① 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101页。

② 同上，第101页。

③ 同上，第101—102页。

发现的；帮助他把那些使他成为一个客体的自然力量变为处于他控制下的富有人性的可以控制的力量。”① 在古尔德纳看来，社会科学应当帮助人们从客体状况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能有更多自愿行为的人。②

古尔德纳关于人的理性、自愿行为的能力的假设，是部分地与互动主义者对意义、语言、符号的关心相一致的。社会学必须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作用就表现在，使人们能够理解事件的意义，即对于事件的意义提出问题并解释它，并在对意义的探索中，沟通世界与人。”③ 但在同时，古尔德纳也看到了人的决定论的一面，以及他与其他“沉默的客体”的血缘关系。社会学会有助于促进“沉默的客体与理性”的统一。④

古尔德纳似乎对社会现实采取了接受的态度，而没有提出疑问。正是通过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结构之中，社会行为才得以发生。古尔德纳接受社会存在的态度与大部分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看法

---

① 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102页。

② 古尔德纳认为，人具有一种超越决定论的、类似客体状态的能力，他的这种看法可以在他对一般对等性规范所做的修正中得到证明。古尔德纳承认对等性概念是富有启发性的，这个概念成为大多数功能主义者的思想的基础（见本书第二章）。他也注意到这个概念的弱点，并要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发展。在后来的一篇讨论《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的重要性》的论文中，他写道：

> 如果人们只是受对等规范指导，许多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就可能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人就会被消灭，或是引起严重的不满。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总会有一些人不能对他得到的好处做出回报。……因此，只是在人们可以移情于弱点和贫穷，只是在人们可以想象自己有一天也处于这种状态这一点上，他们才会根据这种对等规范产生一种预感，即他们在将来也会处于这种危险状态（见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260—261页）。

③ 同①，第103页

④ 同①，第104页。

是一致的。① 古尔德纳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和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古尔德纳的这个看法部分地是与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者的观点相一致的。社会学不只是研究社会结构，它也有助于创造和控制社会结构。社会学家不是“站在局外”来研究某些他可以逃避的事物；相反，他个人要投入到所研究的事物中去。因此，古尔德纳既呼唤反省的社会学，也召唤反省的社会，包括起合法化作用的意识形态。

正如我们在这整个一章中所看到的，古尔德纳倡导一种反省的理论。由于他怀疑完全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的可行性，② 古尔德纳提醒社会学家们要认识到成为他们工作的基础的假设和利益。古尔德纳写道：

> 简而言之，所寻求的是一种作为实践理性的真理，之所以说是实践的，因为它涉及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历史上形成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理解和改造。我们想了解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以及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事务，以便我们按照使其变得更好的方向来改造它；我们也想有更多的理论观念，以便我们能更好地改造这一切。③

① 在《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中讨论美国社会学的危机时，没有注意到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以及有了显著发展的社会心理学 传统，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G. H. 米德、C. H. 库利、W. I. 托马斯以及其他象征互动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没有被注意到。在古尔德纳看来，争论并不是发生在象征互动主义与功能主义这两个美国社会思想的重要流派之间，而是发生在功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这两者都是结构取向的理论。

② 古尔德纳是对流行的社会学作为一门价值无涉的科学的看法最先进行挑战的当代理论家之一。在某些社会学圈子中对这种看法的接受和歪曲，使古尔德纳“担心”，一门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的神话可能会被另一种神话所代替。一旦这种价值无涉的信念被接受，它就会为另一种新的又不失圆滑的反对物所取代（见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27页）。

③ 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100—101页。

古尔德纳批判了社会学想按照它所认为的理想的自然科学模式来建立自己的模式的盲目性。① 社会学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熟练性。它还必须自愿地对道德问题发表看法，并承担责任。古尔德纳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科学，都既具有建设性的潜能，也具有破坏性的潜能。② 社会学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都不会贬低不可缺少的科学客观性的规范；而只是认为它与对道德的冷漠是截然不同的"。③

因此，古尔德纳对将自然科学的模式应用于社会学的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将这种方式用于研究会"思想"的人类，就会使人类成为如同其他物件一样的控制对象。这样，社会科学就会被用之于控制人，就如同自然科学被用之于控制自然一样。④ 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科学模式会使人失去人性。

古尔德纳呼吁在社会学中进行思想的更新。一种仅有的社会学必然认识到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古尔德纳相信，通过对流行的理论的批判性分析，解放的社会学就会形成。

摘　　要

A. W. 古尔德纳的著作代表的是一种元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新的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古尔德纳呼吁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更新，以填平科学与人道主义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

① 古尔德纳，《论社会学》，第2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第492页。

古尔德纳呼唤一种反省的社会学，这种社会不会害怕用研究其他课题同样的探究方法来分析自己。同时，也必须愿意用同样的办法来揭示出那些假设，并积极地寻求揭露那些偏见和歪曲。古尔德纳冒着被批评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不是从事社会学的实践的可能，强调需要关于自我的知识。人不是被操纵的木偶；人有对社会中的人以及他与传统的关系进行思考的能力。

古尔德纳力图揭露出成为当代美国社会学基础的偏见和假设。他分析了现代社会学所面对的危机，即随着功能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统治地位的衰落，却没有出现一种强有力的替代模式。他力图说明美国的功能主义者是怎样找到一种关于价值无涉的社会学的理想的，而现实却是，社会学的事业主要靠福利国家的拨款。他所关心的是，在学术性社会学中广泛存在的自命不凡和错误意识。

孕育了美国社会学和它目前的危机的美国社会，也正在面临意识形态失败的危机。关于个人权利和权力的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步履蹒跚，新的意识形态正在诞生。恰如社会学必须是反省性的一样，社会也必须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反省性的分析。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错误的意识却广泛流传。

呼唤的是在分析社会学与社会时的反省性——自我认识。但这也是对更多的理性的呼唤，这种理性使自我认识成为可能。这也是对理论的呼唤，但这种理论是一种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相关性理论。

词 汇 表

行动（Action，或理性行动 rational action）

用最适宜的手段（如事本性组织、称职的领导）来寻求目的或目标（如组织、领导）的过程。

自控性社会（Active society——A·伊兹尼）

是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负责并控制这个社会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决策以知识为基础，而用权力去实施这些决策。

适应（Adaptation——T·帕森斯）

一种功能压力，指体系确保从环境中得到所需要的东西并通过整个体系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的能力；对于社会来说，这种功能是由经济满足的。

适应性增长（Adaptive upgrading——T·帕森斯）

是一种将更广泛的资源用于社会单位，从而使社会单位的运行摆脱进化以前所受到的限制的一种进化过程；比如现在教育的功能就是由新出现并代替家庭的制度（学校、职业学院、大学）来满足的。

失范（Anomie——R·默顿）

是一种不遵从状态，它产生于文化目标与适合于获得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相分离；比如高失业率(手段)就是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目的)的分离。

外表 (Appearances——E·戈夫曼)

个人门面的标志，它的作用是告诉人们表演者的社会地位；比如，穿白大褂，脖子上挂个听诊器的就是医生。

财产 (Assets——A·伊兹尼)

是一种权力的基础或潜在的权力；它可以是功利性的(以交换为基础)，也可以是强制性的(以强力为基础)，也可以是令人信服的(以对符号的控制为基础)。

权威 (Authority)

一种合法性的权力，它存在于社会中的特定地位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拥有权力的人手中。

阶级 (Class)

是社会中那些有着相似的强力、特定的制度化权力、特权和威望的人的聚合体；这些人依据共同的利益(如拥有财富、金钱)而联系起来。

阶级系统 (Class system——G·兰斯基)

是按照某些单一标准排列起来的阶级顺序；如政治阶级、财富阶级、职业阶级。

强制性关系 (Coercive relations——A·伊兹尼)

一种纯理型的社会关系，它涉及到使用强力或被迫使用强力，一方行动者反对另一方行动者。

集体（Collectivities——A·伊兹尼）

是以一套其成员分享的规范性利益和价值为基础群体；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相类似。

制约（Constraints——D·贝尔）

有效制订政策所受到的社会结构的限制；如可利用的资源的限制、通货膨胀问题的限制，可利用的教育和培训设施的限制。

控制网（Control networks——A·伊兹尼）

是对集体中的凝聚关系的补充，并具有指导社会的作用；如国家。

核心价值（Core value——L·科塞）

是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与枝节问题相对），对核心价值的打击会威胁到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群体。

风俗（Cosmos——P·伯格）

它超越出日常生活的现实，而进入超出客观证明的领域；它是宗教而不是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

控制论（Cybernetics）

是对人、动物和机器中的信息沟通的研究，它特别强调信息的反馈以及反馈在控制过程中的作用（见反馈）。

资本的分化（Decomposition of capital——达伦道夫）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散。

劳动的分化（Decomposition of labor——R·达伦道夫）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的加剧。

演绎理论（Deductive theory）

一种构造理论的方法，它从一般性的、抽象的、逻辑的陈述出发，达到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具体的命题(也见归纳理论)。

分化（Differentiation——T·帕森斯）

是指社会中的单位和子系统分化成具有不同结构和功能的单位的进化过程。

进退维谷（Dilemma——P·布劳）

是社会变迁的辩证力量之一，它要求在同样想得到的替代物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替代物包括：伙伴之间具有竞争性的、互相冲突的利益的"混合型竞争"；由于经常给予某种报酬而造成的报酬贬值的威胁；行动的多线性因果关系，既产生想得到的结果也产生不想得到的结果；以及"领导的进退维谷"。

领导的进退维谷（Dilemma of leadership——布劳）

获得权力和赢得赞同之间的冲突。

分配的公正性（Distributive justice——G·霍曼斯）

对在交换中报酬与代价成比例的愿望。

拟剧论（Dramaturgy——E·戈夫曼）

一种使用戏剧中的语言和形象来描述社会互动中的主观与客观事实的研究方法。

反功能（Dysfunction——R·默顿）

对社会系统起解体作用的项目或社会过程。

经济学模式（Economizing mode——D·贝尔）

一种强调在互相争夺的目标之间对社会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的生活方式；它强调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并将成本降到最低限度的原则(也见社会学模式)。

精英（Elite——A·伊兹尼）

专门对处理知识以及在应用权力时进行决策的工作进行控制的角色或控制单位。

整体效应（Emergence——P·布劳）

社会结构发展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使独立的成分从属于社会群体，并认为社会群体并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之和。

均衡(Equilibrium——T·帕森斯）

社会体系内部的平衡或正常状态。

本土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H·加芬克尔）

是对索引性表达以及其他实际行动的研究，而这一切则取决于那种有组织的狡诈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不断完成；正是通过这种

过程，个人构造他们的社会现实。

外在变数（Exogenous variables）

是处于新因果理论模型之外的变数，是没有加以辨别和解释的变迁之源。

外化（Externalization——P·伯格）

是个人集体地、逐步地改变模式化的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中的一个"时刻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彻底社会化的人集体地构造新的现实。

外系统（External system——G·霍曼斯）

指更大的环境，它包括所研究的内系统在内；如一个大工厂中的朋友群体。

面对面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E·戈夫曼）

在互相直接见面时，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行动的交互影响。

反馈（Feedback）

关于过去的行动结果的知识（通过个人、群体或机器）导致对于将来活动的修改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行动有效地朝向获得目标的方向。

信托体系（Fiduciary system——T·帕森斯）

文化传统的传递者对社会其他部分所发挥的托管作用。

框架（Frame——E·戈夫曼）

一种情境定义，它是根据控制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主观投入作出的。

前台（Front region——E·戈夫曼）

个人按一种一般性的固定方式进行表演，以为观看表演的观众规定特定的情境的部分，它包括布景以及由外表和举止构成的“个人的门面”。

功能（Function）

诸如葬礼的仪式和对于犯罪的惩罚等不断重复的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积极的功能有助于结构的维持，而消极的功能或“反功能”则会造成结构的毁灭。

功能替代物（Functional alternative——R·默顿）

一个功能主义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在满足某种功能先决条件的时候，可以由一种文化项目或活动来代替另一种项目或活动。

功能迫力（Functional imperative——T·帕森斯）

包括行动系统以及它的社会子系统在内的所有有生命的系统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的一些需求（也见潜在维模、整合、目标实现和适应）。

功能先决条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s）

传统功能主义的一个概念（在帕森斯理论中处于中心的地

益)，它认为为了使社会系统能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某些功能。

社会的功能统一性 (Functional unity of society)

默顿以前的功能主义的一个假设，它认为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互相配合运行，从而不致于产生持久性的既不能解决也不能调节的冲突。

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的斗争 (Game against fabricated nature——D·贝尔)

工业社会的经济，机械能为生产率提供了动力基础。

与自然的斗争 (Game against nature——D·贝尔)

以农业、采矿、捕鱼、伐木为基础的经济，它依赖于每年季节的变化、土壤的性质以及可以利用的水源等。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Game between persons——D·贝尔)

主要以劳务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美国的经济即属于此。

博弈理论 (Game theory)

一种构造理论的数学方法，它所强调的是，如果人们都是按照理性、并依据博弈战略原则行事，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也见消长博弈与非消长博弈)。

目标实现 (Goal attainment—T· 帕森斯)

是一种涉及到实现体系的目的或目标，并在这些目标之中建立优先次序的功能迫力。在社会中，这种功能迫力是由政体满足的。

群体（Group—G· 霍曼斯）

即在一段时间内互相进行沟通的若干人，他们的人数较少，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人道主义（Humanism）

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观点，它认为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这就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学则与包括历史、戏剧和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有着姻缘关系（也见解释性社会学）。

人道主义理论（Humanism theory）

一种社会学观点，它的目的不是构造精密的理论，而是理解人类的行为。不能将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类比（也见自然主义社会学）。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E·戈夫曼）

狡诈的互动实践，即在将自己展示给别人时，人们要努力选择正确的框架，尽量缩小自己的瑕疵（也见框架分析和瑕疵）。

不可靠社会（Inauthentic society—A· 伊兹尼）

表面上是积极的、负责任的，而实际上是消极的、不负责任的社会。

延伸内纳（Inclusion—T· 帕森斯）

新出现的资源被整合到更大的结构中去的进化过程。

渐进（Incrementalism—A· 伊兹尼）

一种决策模式，它通过"将就"提出令人相对满意而不是最为可能的决策；这种决策是较为零散、较琐细的决策（也见决策的理性模式和混合审视）。

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H·加芬克尔）

一个人为已发生的事件的时空所加的标号，它可以起"索引"，即把发生的事情置于现实中的特定位置的作用。

不可缺少性（Indispensability）

在默顿以前的功能主义者中广泛流传的一种假定的前提，即在体系的运行中，每一个文化项目都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任务。

归纳理论（Inductive theory）

构造理论的方法之一，它从具体的结论出发得出一般性的、抽象的原理（也见演绎理论）。

检视（Inspect—H· 布鲁莫）

探索的方式之一，它可以使研究者按照经验证据（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框框）对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考察。

工具—完备性轴（Instrumental-consummatory axis—T·帕森斯）

处理为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完备性）所必需的手段（工具性）的功能迫力。

整合（Integration—T· 帕森斯）

解决如何调适体系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整体的功能迫力。在社会中，这种功能迫力是由社会的社区满足的。

互动（Interaction—G· 霍曼斯）

某些受他人活动刺激而进行的活动。

内外轴（Internal-external axis—T · 帕森斯）

解决内体系以及与环境有联系的体系的需求的功能迫力。

内化（Internalization—P · 伯格）

现实构造的辩证过程中的一个“时刻点”，社会化由此得以进行。

内系统（Internal system—G · 霍曼斯）

处于分析之中的由互相依赖的部分所构成的群体（也见外系统）。

解释性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一种社会学流派，它强调主观解释以及附着于社会现象之上的意义的重要性（也见人道主义社会学）。

共同行动（Joint action—H · 布鲁默）

对不同参预者的不同行动的社会组织；是制度化的过程。

潜功能（Latent function—R · 默顿）

文化活动并非有意造成的、也没有被认识到的、但有助于体系的调适和适应的结果。

合法化（Legitimation—P·伯格）

对社会世界进行解释并证明其正当性的途径。宗教是前现代社会中合法化的主要力量。

宏观研究（Macroscopic research—W·米尔斯）

使用比较方法进行的对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如韦伯、马克思和曼海姆的著作（也见微观研究）。

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R·默顿）

文化活动中那些客观的有意造成的、有助于体系的调适和适应的结果。

显群体（Manifest group—R·达伦道夫）

由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形成的，在权威结构中寻求占有某种角色的群体（也见准群体）。

举止（Manner—E·戈夫曼）

是在告诉人们表演者在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时起作用的标志。

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R·默顿）

介乎于只需要工作假设的微观理论与形成统一理论的无所不包的努力之间的理论，微观理论是从大量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形成的，而统一的理论则要解释所有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变迁。

混合审视决策（Mixed-scanning decision-making—A·伊兹尼）

一种自控性决策的方法，它需要从理性上探讨行动的可能性，同时要省略掉某些细节和个别的方面，气象卫星的运行就是一个例子；它介乎于理性决策与渐进的决策过程之间，理性决策要注意到所有可能的替代方式，而渐进的决策则是在没有足够信息情况下的“将就”。

微观研究法（Molecular research methods—W·米尔斯）

对较琐细的问题的研究，它一般都采用可实证的统计模型（也见宏观研究）。

复式角色（Multiple roles—R·默顿）

一种多重互相联结的地位和被期望发生的行为，每一种复式角色都涉及到一个角色丛；比如，一个妇女可以同时是一个妻子、母亲、大学校长、教派成员、慈善事业的负责人。

自然主义社会学（Naturalistic sociology）

一种社会学流派，其特点是将社会科学比附为自然科学（也见人道主义）。

自然主义理论（Naturalistic theory）

一种社会学流派，它认为要构造社会学理论就要使用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模式（也见人道主义的理论）。

结果的净平衡（Net balance of consequences—R·默顿）

功能主义所使用的一种分析，它通过衡量文化活动的积极和

消极功能来确定其对体系的总体影响。

新因果理论（New causal theory）

运用统计分析在经验观察中建立模型，并使用这种模式化的资料来构造理论的数学社会学方法。

规范（Nomos—P·伯格）

使社会世界建立秩序的建设性活动，是失范或无规范状态的对立面。

非现实性冲突（Nonrealistic conflict—L·科塞）

不是由于对立双方具有竞争性的目标而是由于至少其中一方发泄紧张情绪的需求引起的冲突；比如在种族歧视中的“找替罪羊”。

非消长博弈（Non-zero-sum game）

以合作和冲突两种原则为基础的博弈模型，它并假定一定有“胜者得到一切”的结果；比如囚犯的窘境和性的战争（也见消长博弈）。

规范性关系（Normative relations—A·伊兹尼）

一种强调所分享的规范和价值的纯理型的社会关系，关系的目标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并常常是非理性的（也见功利性关系和强制性关系）。

客体（Object—H·布鲁莫）

所指的任何事物：如桌子、汽车、衣服等物质客体；包括社会

角色在内的社会性客体；诸如价值、权利和法律的抽象客体。

客观化（Objectivation—P·伯格）

现实构造的辩证过程中的一个“时刻点”，通过这个过程对客观的社会现实加以定义。

客观表达（Objective expression—H·加芬克尔）

对时空的精确表述，它可以将所发生的事情置于一种理论或科学的背景之中，比如，在医院和科学实验中对事件的时间的精确记录就很重要，相反，在日常谈话中则更多地是使用“索引性”表达（也见索引性表达）。

对立调解（Opposition ideals—P·布劳）。

重组和变迁之间的媒介，如在两党制中建立第三党。

特殊主义的标准（Particularistic standards—P·布劳）

只是由某一种内群体所赋予的地位特质，这种内群体如宗教、政治信仰等。

消极的社会（Passive society—A·伊兹尼）

人们受外在力量或能动的他人控制的社会。

维模（Pattern maintenance—T·帕森斯）

功能迫力或先决条件之一，它涉及的是如何依照某些秩序或规范以确保体系中行动的连续性问题。这种功能是由社会中的信托系统满足的。

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T·帕森斯）

对社会体系中的行动或角色进行分类的手段。这种包括五方面的方案是以特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分类为基础的。

表演（Performance—E·戈夫曼）

社会情境中特定参与者的全部活动。

权力（Power）

个人或群体既使是遇到反抗和抵制的情况下也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

权力精英（Power elite—W·米尔斯）

是相对于中产阶级而存在的、处于能作出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的位置的人。

实践兴趣(Practical interest—G·加芬克尔)

常识性现实和日常生活的存在，它是本土方法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从这个概念中产生了索引性表达的概念。

最小利益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G·霍曼斯）

在连续性的社会关系中，得到最小利益的人最能指定这种关系的条件。

命题（Proposition）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以构造理论的变数或概念的关系的陈述。

准群体（Quasi group—R·达伦道夫）

那种可以由目前没被认识到的潜在共同利益发展起来的潜在群体(也见显群体)。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 of decision making—A·伊兹尼)

决策的模式之一,它要求对所有有关的替代方式进行了解,并计算各种替代方式的结果,以便能更好地实现预先确定的某些目标(也见渐进和混合审视决策)。

现实性冲突(Realistic conflict—L·科塞)

从关系中特定要求的实现受到挫折以及对于参与者收益的评价中产生的冲突,它的目的是要获得假定的受挫目标;比如,在经济上抵制公司的不公正的雇佣关系。

现实(Reality—P·伯格)

属于我们认为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而存在的现象的性质(正如我们无法"让它消失"一样)。

还原论(Reductionism)

简单地用分析整体的组成部分来解释整体;更具体的是指用一门学科(如心理学、物理学)或自然现象(如气象、地理)来解释社会行为。

反省社会学(Reflective sociology—A·古尔德纳)

社会学的社会学中的一个派别,它按照社会学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来分析社会学的发展。

报酬（Reward）

个人在交换过程中所得到的任何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E·戈夫曼）

个人与一般公认的角色的分离点。

角色接受（Role embracement—E·戈夫曼）

个人所表现的对自己的角色的贴近；表明贴近社会角色的程度。

角色丛（Role set—R·默顿）

个人由于占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地位而形成的对角色关系的补充；比如，一个人由于占有中学校长的位置，就会涉及到与教师、学生、职员、管理人员等的角色关系。

剧情（Routine—E·戈夫曼）

表演期间所显示出来的预先建立的行为模式，它在人们互相接触的时候表现出来，或是由人们来表演。

强权统治（Rule of might—G·兰斯基）

是一种强制性统治，其特征是新的精英人物以强力夺取权力，最终往往要使用暴力。

权利统治（Rule of right—G·兰斯基）

制度统治；强力的作用降低，而更多地是依赖于对维护统治的信念。

安全阀（Safety valve—L·科塞）

由社会制度或活动构成的一种机制，它可以在不毁坏结构的前提下使敌对的空气排放出来。

科学规律（Scientific law）

理论构造的最后阶段，科学规律由关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精确的陈述构成，这种陈述是为科学研究所一再证实的，并通常是被这个领域的专家所认定的。

唯科学主义（Scientism）

某些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抨击，认为它们滥用和误解了社会学的科学性质；这种社会学充满了科学的词汇，但并不是追求科学知识；伪科学。

类似教派的群体（Seotlike groups—L·科塞）

根据某种特殊的特征挑选成员的群体。这些群体的规模往往是很有限的，并要求其成员将全部个性投入进去。

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R·默顿）

对于情境所作的错误定义导致一种使本来错误的概念得以应验的新行为。

自我指示（Self-indication—R·布鲁默）

运动着的沟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注视某一事物，对它作出估价，赋予它一种意义，并以意义为基础决定自己的行动。

敏化概念 (Sensitizing concept—H·布鲁莫)

使用概念的研究工具，它为研究者接近经验世界提供一般的参考和指导;如文化、制度、规范等。

社会预测 (Social forecasting—D·贝尔)

构造社会理论的一种方法，它力图勾划出历史趋势所展示的可能性，它的前提是断定现象都是有规则的、可重复的，或是断定存在有特定方向的一贯性趋势。

社会学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W·米尔斯)

微观研究方式与宏观研究方式的溶合，它将对评价性社会学理论的关心与作为资料来源的历史和传记的知识和利用结合起来。

社会学模式 (Sociologizing mode—D·贝尔)

用比经济学模式更自觉的方式来判断社会需求的努力，它是以明确的有关“公众利益”的概念为基础的（如空气和水源污染的代价，优美的环境的破坏的代价等)。

社会学的社会学 (Sociology of sociology)

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使用社会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来对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进行研究(也见反省社会学)。

瑕疵 (Stigma—E·戈夫曼)

使自己不能充分地被社会接受的缺陷；这样的人既可以是不受信任者(瑕疵是可见的)，也可能是令人怀疑的人(瑕疵并不直接

表现出来)。

结构功能主义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社会学理论流派之一，它把社会作为一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单位来研究，认为这些部分要适应于整体；它认为社会是由互相依赖和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有着指导身分角色的规范，身份互相联系而成为制度，在社会中，制度都是互相依赖的。

结构 (Structure)

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单位，或说是有着相对稳定模式的体系。

象征互动 (Symbolic interaction—H·布鲁默)

涉及到刺激、对刺激的解释，并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作出反应的行动；它不同于非象征的或简单的刺激-反应行动。

系统 (System)

由互相依赖的部分组织而成的功能整体；比如，电力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

剧组 (Team—E·戈夫曼)

表演某种剧情时进行合作的一些人。

理论 (Theory)

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套陈述——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理论是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

总体性制度（Total institution--E·戈夫曼）

相当一批处境类似的人，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在那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切断了与更广大的社会的联系，这些人形成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有正式管理的生活区。比如精神病院、监狱、疗养所等。

类型化（Typification—P·伯格）

标志着行为的制度化的交互性、模式化的角色行为。

普遍的功能主义（Universal functionalism）

默顿之前的功能主义中广泛流行的假定前提，即认为任何标准化的社会与文化形式都具有积极的功能。

普遍主义的标准（Universalistic standards）

无论拥有还是不拥有这种价值的人都认为是有价值的身份特质；如财富、健康、美等。

功利性关系（Utilitarian relations—A·伊兹尼）

以社会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一种纯理型的社会关系（也见规范性关系与强制性关系）。

价值（Value—P·布劳）

是在一种制度之内或在几种制度之间进行交易的媒介；它可以是对立性的、普遍主义的，也可以是特殊性的；也就是说，对一个组织的价值的分享，是将那些从未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互动的人凝聚起来的媒介。

价值（Value—G·霍曼斯）

是在互动过程中引发出报酬的事物。

价值概化（Value generalizations—T·帕森斯）

是通过比所涉及到的情境更高层次的概括性价值模式对新出现的结构和资源加以合法化的进化过程，其目的是使这些结构和资源与广泛的需求联系起来；比如，关于"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就曾经用来对西方的配偶选择、枪支所有和使用的不受限制、堕胎的合法性等现象加以合法化。

消长博弈（Zero-sum game）

博弈的方法之一，在这种博弈中，各方都知道固定的博弈规则，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有选择的自由，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所作的选择。大部分室内游戏就是消长模型的例子（也见非消长博弈）。